［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著

JIWEI ZHUMING JINGJISIXIANGJIA DE SHENGPING SHIDAI HE SIX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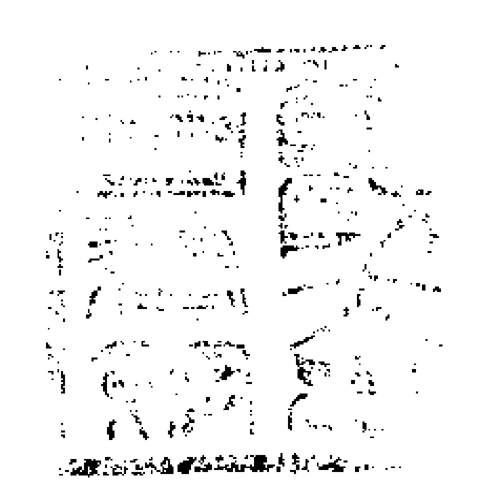
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


国防大学 2 060 4077 3

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

〔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 著

蔡受百 马建堂 马君潞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Robert L.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The Lives, Tim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Simon and Schuster / New York

根据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1986 年版译出

JǏWÈI ZHÙMÍNG JĪNGJÌ SĪXIǍNGJIĀ DE
SHĒNGPÍNG SHÍDÀI HÉ SĪXIǍNG

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

〔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 著

蔡受百　马建堂　马君潞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0881-6 / F·94

1994年 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年 7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282千

印数2 300册　　印张9 7/8

定价： 7.90 元

译 者 前 言

本书原名《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在这里，“世俗”作“经济”解，“哲人”的意思即是“思想家”。作者之所以称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世俗哲人”，是由于这些经济学家把“人们一切活动中最富于世俗性的欲望——追求财富——包含在他们的思想方案之中”。作者认为这一点正是思想家中“最高明的，最引人入胜的”见解。为显明易懂，中译本将副题“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用作书题。

作者罗伯特·海尔布罗纳1936年就学于美国哈佛大学，从此时起他一直从事研究著名经济学家的学说。本书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于1953年问世，1961年再版，1967年第三版，1972年第四版，1980年第五版，1986年第六版。

本书原由蔡受百先生根据第四版译出。1988年我和马君潞、胡海峰、鲁光四人应某出版社某丛书编委之约译出本书第六版。1989年8月因该丛书编委会解散，译稿遂搁置。后获悉商务印书馆有第四版的译稿，便建议商务据第六版出书。商务欣然同意，并邀我根据第六版对蔡受百先生的译文进行校订，补充了第六次修订版序言，更新了第十和第十一章。

本书着重介绍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熊彼特等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对各经济思想家的主要学说，如斯密的市场分析，李嘉图的分配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等均有

详细的评述。当然，作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本书是经济学说史方面的一本颇有参考价值的读物。曾被译成24种文字，现在是西方不少大学经济学说史方面的所谓“标准著作”。它既有思想解剖，又有历史陈述，颇值得一读。

马 建 堂

目　录

第六次修订版序言

本书是我34年前写的一本书的第六次修订版，它以《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为题出了许多版，现在它的历史已长于当年我写作它的岁数。该书始料未及的全部经历[1]，(写作时我尚是个研究生）使我们有理由在说明第六版有哪些变动之前，先来谈谈它的写作经过。

在五十年代初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我是借给一个自由谈栏目写稿为生，出于需要或纯属偶然，有时的议题与经济学相去甚远。出于上述的某种缘由，约瑟夫·巴纳斯(Joseph Barnes)，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的高级编辑，邀我共进午餐，并交谈各种的出书意向。然而，它们之中似乎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失望之余，我认识到，我与第一个出版商的午餐不太可能引出一个出书合同。不过，巴纳斯可不这样轻易失望。他又开始询问我在新社会研究院的学习情况，我感到我是满腔热情地谈起一个关于亚当·斯密的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研究班课程，该课程是由富有灵感的阿道夫·洛尔(Adolph Lowe)讲授的，读者将会在本书中对洛尔教授有更多的了解。即便尚没到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们俩都明白这点：我已经发现了论文的主题。下一学年结束后，我便急忙告诉洛尔教授，我准备撰写经济思想的演进史。

洛尔感到惊讶。他权威性地下结论道，“这是你不能做的题

---

[1] 指该书被译成24种文字，并六次修订。——译者

目！"然而，我深信我能够做这一题目，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正如我无事不写一样，我的性格生来就是信心和天真的混合，而这天真只有一个研究生才能拥有。在为自由谈栏目撰稿和进一步的研究之余，我写出了前三章，并惶惶然地交给洛尔教授过目。他读完以后，说道，"你必须做这一题目！"这就是一个非凡人物（现在，他虽百岁高龄，但仍是我最热情、最严厉的批评者）的气质。在他的帮助下，我确定了我要写的东西。

既然已经动笔，就需要确定一个书名。我清楚，经济学这一名词已经没有任何票房价值，于是我苦心孤诣地寻找一个替代物。对我来说，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午餐是与"竖琴师"杂志编辑弗雷德里克·刘易斯·阿兰（Frederick Lewis Allen）共进的，我给他写过几篇文章，他对我友善之至并帮助极大。我向他诉说为书命名的踌躇，并告诉他我想把书名定为"金钱哲学家"，虽然我也知道，"金钱"这个词并不太恰当。他说，你的意思是"世俗的"。我说，"这饭我请了"。

我的出版商对这一题目却不像我那样有兴趣，使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当这本书开始售卖后，他们建议将书名改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幸运的是书名并没有改。也许，他们估计公众可能不会理解"世俗的"（Worldly）的含义，这一词也真的被不少的大学生误拼为"Wordly"，或许他们预料到一些困难，比如有这样一件我很久以后才听到的事，一个大学生在他所在学院的书店中寻找一本他忘掉了作者姓名的书，他苦思一阵才想起该书古怪的名字是《充满龙虾的世界》[①]。

迄今为止，《世俗哲人》已经售卖了比我所能想象的还多的版

① 在原文中，"世俗哲人"（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与"充满龙虾的世界"（A World full of lobsters）读音相近，所以出现读者凭读音而完全写错书名的笑话。——译者

本，并且我还被告知，成千上万的人在它的引导下进入了经济学领域。我虽不能承担与此相伴生的作为结果的痛苦，然而，我却是高兴地从许多经济学家那里听到，是本书所描绘的经济学的形象引起他们最初的兴趣。对此，我一直是引为自豪的。

第六版与上一版相比，有以下三方面的不同。首先，如同先前一样，重新翻检一遍能使我改正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有的是不可避免地遗留在手稿上的，有的是出版以后的研究才发现的。这也提供了一个变换重点和阐释形式的机会，这一改动反映着我的观点的演进。不过，这些改动是微小的，能够注意到它们的只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从而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在新的一版中一一列出。

第二方面的改动较为重要。当《世俗哲人》问世之时，J.K.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在浓笔重墨地欢迎它出版的同时，也发现了两个值得抱怨的缺点。第一个缺陷是没有提及A.马歇尔，伟大的维多利亚经济学家。这一缺憾被迅速地弥补了。第二个缺陷是没有任何脚注，之所以将脚注略去，是恐怕把读者吓跑。加尔布雷思的第二个挑剔同他的第一个挑剔一样也是对的。不过，我不情愿改变这种已赢得了广泛接受的叙述形式。然而，我长期以来一直为缺少支持性的引文而苦恼，所以，在这一版，我最终以书后注的形式来消除我的遗憾。需要提及的是，最初的文稿得以写出的研究材料早就遗失，这样，一部分资料来源不得不靠记忆，一部分则依赖于J.查萨(Chatha)博士的学识与勤奋，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在少数几个地方，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对此，我已在注释中指出。

提供这一修订版的最主要动机是考虑更新最后几章主题的愿望。在那里，我过去一直讨论的是现代经济学家的大量的幻想、希望和先兆，如同我在前五版中所发现的那样，迄今为止这些一般性的预言没有一个得到证实，要证实我们社会制度现实的变化和现

代经济学的失败，就需要对我们现存历史环境的经济逻辑进行强制性的和持久的评判。

如其企求未来的另一方案，我决定不如以强调经济研究自身的基本性质的方式来改动最后几章。我深信这一新重点将会吸引我的读者对作为社会考察的一种形式的经济学进行思考，这种社会考察甚至比世俗的哲学家们的戏剧性的描叙更加深刻。经济学是关于人类了解自身权力的历史的饶有兴趣的一章。然而，它却不是完全靠自己而得以确立的一章。经济推理之所以获得无以复加的魅力，是因为其复杂的损益分析是更高级的道德剧、权力争夺，以及在某种最深刻的意义上，社会凝合的极端紧张的助推器。经济思想史中也许最令人吃惊的是，无论它的作者还是其读者都不能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探究的这些基本方向。

最后请允许我对读者，特别是我的学生和教师表示感谢，他们送给我的改正的便条、不同的意见或相同的证明是富有创见的，并都是值得欢迎的；我希望《世俗哲学家》将继续为那些接下来成为"捕虾者"和出版商的读者，以及那些决定成为经济学家的勇敢的人们敞开经济学奥妙的大门。

罗伯特·海尔布罗纳

1986年夏

第一章　导言

这本书写的是少数几位博得奇特声誉的人物。从所有的供学童读的历史课本的标准看，这些人是从来不提起的——他们既不统帅军队，不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也不统治国家，在有关永垂史册的那类事件的擘划中很少参与。他们之中，有些人未尝不声名洋溢，但没有一个是民族英雄，有些人曾受到浮辞污蔑，但没有一个可以说是民族败类。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之许多政治家的光辉业绩，往往具有更大的决定性意义，比之敌军的出入国境，往往更加使人心慌意乱，比之国王或立法院的出于善意或出于恶意的法令，往往具有更加有力的作用。这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影响舆论，会动摇人心。

凡是能左右人们的意向的，则其所掌握的权力，就比军人或君王所掌握的还要大，他们会震撼世界，塑造世界。这些人在行动上极少表现，主要是作为学者，静静地、不引人注目地在工作，至于外界对他们有何看法，为毁为誉，则大都不甚介意。但是他们影响所及，会使国家毁灭，大陆爆炸，会支持政权，也会破坏政权，使这个阶级反对那个阶级，甚至使这个国家反对那个国家。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阴谋诡计，而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具有非常巨大的力量。

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要知道，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但奇怪的是，我们对这些人所知者何其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备受经济问题的折磨，经常为经济事务而忧心忡忡，经常要谈论的是经济问题，那么，总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对大经济学家，会同那些大哲学家或大政治家一样地家喻户晓。但实际却不

是这样，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大经济学家只是一些过去的模糊人物，对他们当初争论得那么热烈的问题，一般的态度只是敬而远之。据说经济学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但这门科学既冷僻又艰深，最好是把它交托给惯于同精深微妙的思维活动打交道的那些人。

再没有比这个想法与实际情况离开得更远的。那些认为经济学只应由教授们来钻研而与大众无关的人忘记了，这是一门与会使大众陷入困境的那类情况打交道的科学，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的。有些人浏览了一下经济学教科书，就断言经济学惹人厌烦，这就跟读了一本数理逻辑入门书的人，说学习战术必然枯燥无味的情况一样。

不，那些大经济学家从事研究时，那种激动和紧张的情况，是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能与之相比的。他们所涉及的思想，与大哲学家的一些思想不同，那是与我们的日常劳动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的；他们所主张的试行方案，不能像一般科学家那样处于隔离状态下在实验室里进行。大经济学家的想法和见解是会撼动世界的，他们的错误，也足以遗害苍生。

凯恩斯勋爵（他自己就是一位大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他的想法对还是不对，比一般所认为的作用要大得多。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他们，很少是别人。事业家自以为可以完全不受智力上的影响，而实际却往往是某一已亡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的狂人，听信的是无稽之谈，他们的那种狂暴行为，其根源往往是出自几年以前某一不学无术作家的作品。可以肯定，与思想之逐渐受到侵蚀这一事实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利，是大大地被夸张了的。"

当然，经济学家并不都是出类拔萃的智者。有许多在编写教科书，有些是极端无知的，有些则抱着极大的热忱在钻研细节。如

果认为今天的经济学缺乏魅力，缺乏那种大胆的冒险精神，那就不能怪别人，只能怪经济学的那些实践者。因为那些经济学家并不只是在智力上失惊打怪、小题大做的人。他们以整个世界为题材，用各式各样的态度——愤怒的、因绝望而不顾一切的、对前途怀有希望的——来描写这个世界。他们的工作使异端邪说演化为常识，一方面说明某些常识实际是迷信，其辛劳过程并不亚于一座现代建筑物的逐步构成。

这一些注定要改造世界的人物，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说起来简直使人难以想象。

他们之中，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疯子、牧师、股票经纪人、革命者、贵族、美学家、怀疑论者和流浪者。什么国籍、什么职业、什么性格都有。有的才华横溢，有的惹人厌烦，有的喜欢奉承人，有的简直使人难以接近。其中至少有 3 个，会发财致富，但是有许多人，连自理个人财务这一初级经济学也没有过关。有两个是著名商人，一个始终没有能比旅行推销员的地位更进一步，还有一个则把他自己的财产都花光了。

他们对世界的见解，就同他们财产的多寡一样，各不相同——也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一群好争论的思想家。一个是妇女权利的终身拥护者，另一个则坚决认为可以用实例证明女子的智慧不及男子。一个认为所谓“绅士”无非是伪装下的野蛮人，另一个则认为“非绅士”才是未开化者。一个广有资财，却主张废除财富，另一个家境清寒，却不赞成慈善事业。他们之中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尽管缺点累累，但依然不失为一个锦绣乾坤，有些人则毕生致力于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

他们都从事著述，但是把这些作品集成一个文库时，其内容之驳杂将无出其右。有这么一两个人，他们所写的书远销于亚洲的茅庐泥棚；有些则不得不把他们那些淹没无闻的作品自费印行，但

是除了范围极窄的一小圈子以内的人以外，一般读者从未过问。有少数人在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足以使千百万人惊心动魄；还有一些人所写的对世人也同样重要，但读时却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这样看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他们的个性、经历或倾向性，甚至也不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共同特性别有所在，那就是：共有的一种求知欲。他们都被所处的花花世界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它的表面上的混乱，是在那种岸然道貌掩饰下的残酷行为，是往往不被觉察的辉煌成就。他们全都专注于他们同胞们的行动，首先是因为其同胞先为自己谋取物质财富，然后是因为他们以损人利己为手段，从中夺取份外利益。

我们把这类人物叫作世俗哲学家，这是由于他们企图把人们一切活动中最富于世俗性的欲望——追求财富——包含在他们的哲学方案之内。这也许是哲学家中最高明的，但肯定是再没有比此更能引人入胜或更加重要的。谁会想到去过问一下一个贫寒之家的安排和设计，一个投机者在行将倾家荡产时那副绝望和悲惨的神情，要求法令勿朝令夕改的群众在街头游行示威，或者是一个水果商向他的顾客在笑脸相迎。然而，大经济学家的信念是，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各不相关的线索，可以织成一条壮丽的花毯，从足够远的距离来看，可以把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看成一个有秩序的行列，使一片嘈杂的喧嚷转为声调和谐的大合唱。

这真是难以索解的信念！然而，结果证明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些经济学家把他们的模范著作在他们的那些世代里展出以后，上述贫民和投机者、水果商和群众，就不再是在舞台上被莫名其妙地拼凑在一起的不协调的演员，而是彼此都知道，在扮演一个角色时不管愉快不愉快，为了使这场戏得以继续下去，台上的角色就得继续活动下去。经济学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以后，一个平淡

无奇的、混乱的世界，就变成了个有秩序的社会，就有了它自己的意味深长的生活史。

经济学家所耿耿于怀的就是从事探索社会史的秩序和意义，因此，这也就是本书的主题所在。我们所从事的，不是对原理的一次讲课旅行，而是对足以塑造历史的那些思想的一次观察历程。我们在行程中要碰到的，不仅是教书匠，还有许多穷苦人、群氓、成功和失败的投机者，甚至还有杂货商。我们先要回过头去考察一下，在一些大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中，我们自己社会的根源，这样就会使我们了解这些大经济学家自身，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个性往往是吸引人的，而且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是有其根源所在的烙印的。

如果我们一开头就从大经济学家的第一位——亚当·斯密他自己说起，那就比较方便。但是亚当·斯密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而我们必须说明一个使人困惑的事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6000年，然而没有出过一位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世俗的哲学家。奇怪的是，远在法老时代以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

我们将用整整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对于比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存在得还要早，存在的时间持续得还要久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经济学家的出现，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在未经探索以前，我们是无法为大经济学家的产生设置一个背景的。我们所关怀的，主要是生在最近两个世纪的少数几个人。但是首先必须了解在他们登场以前的世界，必须留心观察在大变革的动荡和痛苦挣扎中使现代——经济学家的时代得以诞生的那个早期世界。

第二章　经济革命

自从人类从树上爬下来以后，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这不是从个人来说，而是从作为社会团体中一个成员来说的生存问题。他至今仍然生存着，这一点足以证明，他在解决问题上是成功的；但是，即使在最富的国家，也仍然不能免于艰苦和贫困，这就足以证明，问题的解决，至多只是部分的。

然而，我们对于人类没有能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乐园这一点，并不能十分苛求。在这个星球上要谋求生存、维持生计是艰难的。人类的生活在开始经营缔造时，在驯养动物、播种种子、发掘露层矿砂那种种方面的说不尽的困苦艰难，简直使人难以想象。只是由于人类是长于合作的群居动物，才使他们自己得以永久生存。

但是，他的生存得依靠他的同胞这一事实本身，就使生存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人不是蚂蚁，不像蚂蚁那样具有天生的群居本能。正相反，他似乎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性格，这是他天然的禀赋。虽然他的体格相对说来比较脆弱，因此迫使他寻求合作，但是他的不受羁勒的内心力量会使他破坏与同伴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原始社会，在生活的挣扎中所采取的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合作，是由环境决定的；当一个社团面临着饥饿的阴影时——例如爱斯基摩人所处的情况——那么，完全出于自卫本能的需要，便推动一个社团进行日常的劳动协作。在不太紧迫的情况下，人类学者告诉我们，男子和妇女在广为接收的血缘和其它关系的强有力的指导下完成他们的规定工作。在她那本关于非洲布什人[①]

① 生活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译者

的出色著作中，E.M.托马斯女士描述了一个大羚羊如何在亲属们和亲戚们的亲属们之间分配，分配过程一直到“没有一个人比他人吃得更多时”为止。但是，在一个先进的社团中，环境的这种有形压力是没有的 当人们不再肩并肩地共同从事与生存直接有关的劳动时（实际上，当居民中的半数或半数以上从不接触土地、进入矿井、从不亲手盖房子、或者甚至进入工厂时）人类之得以持续存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成就。

事实上社会的存在是岌岌可危的。一个现代社会要受到无数危机的摆布。如果农民不栽种足够的庄稼，如果铁路职工突然心血来潮要想当簿记员，或者是簿记员想当铁路职工，或者是如果想当矿工、炼铁者、或工程学学位候补人的，为数过少，总之，世上的行业千千万万，如果任一行业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勤劳生活的秩序便会被打乱，每日每时，社会都面临着崩溃的可能；这不是由于自然界的力量，而完全是由于人的意向所在之难以预测。

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是用三种方法来防止这种祸患。

为了使社会得以持续存在，他们用传统观念来组织社会，对各种不同的和必要的工作，得按照固有的风俗习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儿子得仿效其父亲之所为，样板就这样保存下来了。亚当·斯密说，在古埃及“有一条人人应当遵守的原则，他必须继承其父亲的职业，如果另辟蹊径，那就犯了最可怕的渎职罪。”同样情况，直到最近，在印度的某些职业是传统地由某一种姓指派的；在许多非工业地区，一个人的职业，还是生来就注定了的。

否则社会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以由最高当局用高压手段使社会所需要进行的事务得以完成。假如不是有个富有想象力的君王想到要建筑金字塔，古埃及就不会有这样东西；假如不是由于符合旧习惯或个人的自身利益，苏联也就不会执行五年计划。政治策略且撇开不谈，俄国和埃及都是独裁主义国家，它们

都用最高统治者的法令、以及违背法令时得由统治者任意处罚的这种办法，来保证经济上的持续存在。

很久以来，人类就根据这两个解决办法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来应付生存问题。只要问题是用"传统"或"命令"的方法来处理的，就决不会产生所谓"经济学"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虽然历史长河中的各个社会都已呈现出令人异常惊讶的经济上的多样性，尽管它们有高贵的君王和委员们曾用干鳕鱼和石子作为货币，以最简单的共产主义方式或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分配它们的货物，只要这些是在传统或命令下进行的，就不需要经济学从旁帮助，使它们理解这些行为。神学家、政治理论家、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都有，似乎有些奇怪的是，独独没有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要等到解决生存问题的第三个方法发明以后才会出现。这一惊人的发展是，让各个人（只要他遵守着一个主要的指导原则）做他认为对他说来最适合的那种工作，社会借此即得以持续存在。这个新奇策略叫作"市场制度"，其规律出奇的简单——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是最大的金钱上的利益。在市场制度下，促使每个人努力工作的是求利这一吸引力，而不是"传统"的拉力或统治者的高压手段。此时，虽然每个人可以随着他贪得本能的指导，喜欢做哪一行就做哪一行，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自然会使社会的必要工作安排就绪。

使经济学家得以应时而起的，正是对生存问题这种似是而非的、微妙而困难的解决方式。它不像习惯和命令那样简单明了，只是出于每个人的求利之心，就可以使社会得以持久存在，这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只要习惯和命令不再管理这个世界，社会上的一切工作——肮脏的以及舒适的——就可以完成，这一点是不容易一下子就弄清楚的。当社会不再听从某一个人的命令行事时，谁还能说，事情究竟会演变到什么样为止？

承担解释这个谜的是经济学家。但是直到市场制度这一概念获得认可之前，是根本没有什么谜可解的。直到很少的几个世纪以前，人们还不能完全肯定，是不是应该用怀疑和厌恶的眼光来看待市场制度。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传统和命令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老规矩下过活，现在要放弃这个保障，而改行市场制度这一可疑而使人困惑的活动方式，这就可以说是等于进行一次革命。

从现代社会的形成来看，这是曾经发生过的最重要的革命；从根本上说，比法国、美国、或者甚至俄国的革命，在扰乱人心方面更加严重得多。为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为了了解它给予社会的冲力之大，我们必须深入到早期的、久已被忘却了的那个世界，我们自己的社会就是导源于那个世界，从那个世界而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为什么经济学家的到来要等得这么久。

我们且巡礼一下这个早期世界的东鳞西爪。

第一站：法国。时间，1305年。

我们访问的是一个集市。一批旅行商在一天早晨，带着武装护卫队来到这里，他们搭起了漂亮的帐篷，正在同当地人民做买卖。出售的是各种各样的外国产品：绸服和塔夫绸、香料和香水、皮革和毛皮等等；有些来自地中海东部，有些来自斯堪的那维亚，有些只是从几百英里以外运来的。来到这些棚店的，除平民外也有当地贵族和贵妇人，他们对庄园生活感到厌烦，急于要到这里来换换空气，他们所想望的，除了阿拉伯的新奇货物，还想了解到从这些远得难以想象的地方传入的一些新词：divan〔东方国家的国务会议〕、syrup〔糖浆〕、tariff〔关税〕、artichoke〔朝鲜蓟〕、spinach〔菠菜〕、jar〔大口瓶〕之类。

但是，我们在帐篷里面所看到的却是一种奇观。桌上摊开的关于商业往来的书册，有时不过是关于交易的笔记簿。举个例，一个商人在他摘录中载明，"有个人在降临节后欠我10盾。他的名

字也忘了。"计算时用的大都是罗马文字，金额常常搞错；把长除法看作一种神秘事物，怎样使用"零"是不十分清楚的。就人们好炫耀、好寻欢作乐这方面的习性来看，总的说来，集市是桩小事。当时在一年中越过圣哥大水道(历史上第一个吊桥)运到法国的货物总量，还不能装满现代的一辆货运列车；庞大的威尼斯舰队所运载的商品总量尚无法装满一艘现代钢制货船。

第二站：德国。时间，1550年。

安德烈亚斯·里夫，一个商人，大胡子，穿着皮外衣，正要到他在巴登[1]的老家，他写信给他妻子，说他游览了30处市场，旅途劳顿，患了鞍疮，但更加磨折人的是所处的环境，在行程中大约每6英里就要停下来交纳通行税，单是从巴塞尔和科伦[2]之间就交税31次。

还不仅是这样。他所访问的地区，各有它自己的货币，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维持治安章程。单是在巴登一带就有112个不同的长度单位，92个不同的面积标准，65个重量单位，163个谷物的计量单位，123个液量单位、63个酒的特有单位和80种不同的磅重单位。

我们继续前进：地点波士顿，时间，1644年。

一次审讯在进行中，一位叫罗伯特·凯恩的，"是个年高的福音公开信仰者，具有卓越才能，其人广有资财，只有一个孩子，为了良心关系，也为了宣传福音，来到这里"，他被指控犯下了滔天罪行：他用每一先令要赚取暴利六便士。庭上在辩论，为此要不要把他逐出教会，但是，鉴于他过去为人清白无瑕，结果予以宽大处理，罚款二百镑了事。但是，可怜的凯恩先生在教会的长老面前感到

---

① 巴登(Baden)，德国西南部一城市。——译者

② 巴塞尔(Basle)，瑞士西北部一城市。科伦(Cologne)，德国西部一城市。——译者

狼狈万分，"忏悔自己的贪黩行为时涕泗交流"。波士顿的教长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宝贵机会，于是利用凯恩犯罪这一活生生的例子，于礼拜日布道时大声宣扬，提出了经商时应当防止的一些错误做法：

"1.只要有可能，在买进时尽量压低价格，卖出时尽量抬高价格。

2.如果在海运时遇到灾害，货物损失了一部分，就提高其余部分的价格。

3.虽然在买进时付价过高，仍然按买进时过高的价格卖出。……"

教长大声叫嚷，这些都是荒谬的，极端荒谬的。为财富而求财富，就堕入了贪婪之罪的深渊。

让我们折回到英国和法国。

在英国有家庞大的商业组织：商人风险者公司，制订了加入公司组织时应遵守的条款，其中有：不得出粗鄙之言，同业之间不得争吵，不得玩纸牌，不得饲养猎犬，不得在大街上携带不雅观的包裹。这真是个古怪的商行，听起来就像是个共济会或互助会。

后来在法国，纺织业曾展现出许多创新精神，为防止这种危险性和破坏性的倾向，柯尔贝①于1666年颁布了一条法规，对纺织品所含纱线有严格规定。从此第戎(Dijon) 和雪兰吉(Selangey)两地的纺织物，包括织边在内，一律含有1408条细线，不能多也不能少。在奥塞雷(Auxerre)和阿维龙(Avallon) 两地和其它两个制造业城，织物细线的数量是1376；在凯蒂兰 (Châtillon)是1261根。任何布匹一旦发现不符合规格，必会遭到公众的抛弃，如违反三次，其织造商便声誉荡然。

关于这类已成陈迹的零星、片断的情况，有些是共同之处。这

① 柯尔贝(Colbert)，法国政治家，财政家。——译者

是由于，首先，以个人利益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制度的适当性（即使不能说必要性）这一想法还没有生根。其次，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在社会竞争中还没有受到重视。实用事务的领域，同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的领域还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除非把这两个领域分开，否则就不会发生像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活动的速度和情绪。要使这两者分开，就必然要经过长期和剧烈的斗争。

认为求利是比较近代的概念，也许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习惯于相信，人实质上是贪得的动物，如果听任他自行其是，他就会跟任何不自重的商人一样地行事。我们经常听说，求利的动机是人类有生以来所具有的。

但情况不是这样。就我们所知，求利的动机，不过和"现代人"同样年纪。即使在今天，为求利而求利的概念，对世上大部分人说来还是陌生的，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也以这一概念的不存在而引人注目。17世纪一位传奇人物威廉·配第爵士（在他的一生中，当过船舱服务员、叫卖小贩、裁缝、医生、音乐教师和学校创办人）认为，"对拿工资的人来说，是难望他们重视劳动的，他们之所以劳动，只是为了吃和喝而不是为了工资。"他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对当时的人有偏见，他所提出的批评，仍然可以施之于现在不熟悉工业化的民族。在这些地区所见到的是，一批未经训练的生手不习惯于工资劳动，对于工厂生活觉得不自在，对于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理解的，增加了工资也不会使他们工作得勤奋些，结果只是多虚耗些光阴。所谓求利这一概念，所谓每个人都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努力改善他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想法，就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时的人民说来，其广大中下阶层对此都是陌生的，直到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期，这种想法才获得广泛散布，至于东方文明地区的大部分，这个想法是大都不存在的。求

利作为社会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它跟印刷的发明同样时新。

不仅求利概念决不是像我们有时所想象的那样普遍．而且对这一概念的社会认可，其进展更加缓慢，受到的限制更严。在中世纪时代，教会的教导是，“基督教徒不应经商”，在这个格言后面的想法是，商人在社会中是个扰乱因素。在莎士比亚时代，一般普通老百姓（实际是除上流阶级以外的一切人）的生活目标，并不是提高他的生活处境，而是维持他的处境。甚至在初移居到美洲的英国清教徒看来，把求利概念当作可接受的（甚至有帮助的）生活目标，那就简直无异于附和魔鬼的邪说。

当然，财富是始终存在着的，而贪婪行为也至少与圣经故世同样古老。但是，少数几个大人物对财富的艳羡，和遍及社会的对财富的共同争取，这两者之间有天渊之别。商业冒险家，例如腓尼基人的航海贸易，在远古即已存在，以后史不绝书，如罗马的投机商如威尼斯人的长于懋迁，如汉萨同盟，如伟大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探险者，他们为个人的发财致富而寻觅一条到印度的航线。但少数人的冒险活动和全社会表现出来的勇于进取的精神，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试以16世纪时的大银行家富格那个不同寻常的家族为例。当他家鼎盛时，拥有金矿和银矿，拥有贸易特许权，甚至有权可以自行铸币。他家的资产远远超过帝王的财富，战争时的费用以及帝王的家庭开支，就是由富格家族筹集的。老安东·富格死亡后，他的长房侄汉斯·雅各布拒绝接管这个庞大的银行企业，理由是他在城市里的业务和私务过多，无法分身。汉斯的兄弟乔治说他宁愿安闲度日，不愿插手这些杂务；第三个侄子克里斯托夫对此也同样不感兴趣。结果这个大富之家的继承人之中竟没有一个认为值得找这个麻烦的。

除君王（指其中之有实力的）和偶然发生的像富格家族那样的

情况之外，早期的资本家并不是国家的栋梁，而往往是离群索居者或是受到排挤的分子。但是这里或那里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小伙子。例如在芬切尔的圣戈德里克，开始是个流浪者，靠在失事的船舶中搜集些残存的货物度日，由此逐渐成为一个商人，他发财致富以后，就隐居起来，结束他的余生。不过像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只要永生观念在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视尘世生活为暂时所难免的烦恼，企业精神就不会得到鼓励，也不会成为精神上的营养滋料。君王所需要的是财富，因此要打仗，贵族需要的是土地，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贵族会愿意出卖他祖先的产业，这也使他有必要进行战争。但是大多数平民——农奴、乡村手艺人、甚至制造业行会师傅——都不想惹事生非，只想父传子，子传孙，依着老样过下去。

作为日常生活中正常指导的求利这一概念的不存在——事实上是教会对这一概念所怀的嫉视态度——构成了在10世纪到16世纪的奇妙世界和亚当·斯密之前一两个世纪的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其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怎样"谋生"的想法还没有形成。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完全一回事。劳动还没有成为达到目的的方法——这里所说的目的是可用以购买事物的金钱。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当然，其中也包括金钱和商品，但是，所以从事劳动，主要是出于传统观念，认为这是生活的自然方式。总之，此时还没有出现"市场"这一社会的伟大发明。

当然，从有史以来，市场即与历史共同存在。在公元前1400年，即有法老与地中海东部其他各国国王往来贸易的记录；用黄金和战车来交换奴隶和战马。但是，尽管交换这一概念和求利概念几乎同人类的存在一样古老，我们却不可误以为全世界都像20世纪美国的学童那样具有商业买卖倾向。据说对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你不能问一只钓鲣鱼的钓钩值食料多少，因为他们从来不做这

种交易，这样提出问题是要被认为荒唐的。另一方面，在非洲某些地区，询问一个女人值几头牛是完全合法的；可是，在我们看这件事时，就同毛利人看待将鱼钩换食料时一样的诧异（虽然，这里仍有天赋的差异，但我们与非洲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但是，市场——无论它是在原始部落中使用的将东西随便扔在地上的方式进行交易的市场，或是中世纪时令人兴奋的巡回集市——跟市场制度并不是同样事物。市场制度并不只是交换商品的一个手段，它是供养和保持全社会的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在中世纪社会的意念中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们已经看到，当时认为，普遍性求利这一概念，对神是有极端侮慢性的。如果把这个概念再扩大些，认为求利的奋斗实际上可以使社会团结在一起，人们将把这种想法看作简直是发疯。

这种盲目态度是有它的理由的。在中世纪，在文艺复兴中，在基督教改革运动时期，实际上全世界在16或17世纪时代，靠市场制度配置的生产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还不存在。如果把土地、劳动和资本解说作土壤、人类和工具，那当然是与社会本身同时存在的。但是，抽象的土地或抽象的劳动在心头是不会立即引起反应的，就跟抽象的能量或抽象的物质不会立即引起反应的情况一样。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的"要素"，作为不具人格和人性的经济实体，就跟微积分一样，还是近代发生的概念。实际上，前者的年岁比后者老不了多少。

试以土地为例。直到14或15世纪，还没有至少在近代意义上可以自由买卖、可以产生地租的土地。当然，土地总是有的——庄园、采邑、公侯国君主的领地，但是，实际上这些并不是遇到必要时可以自由买卖的房地产。上述这类土地所构成的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为个人身分的威望，为社会的军事、法律和行政的组织提供了基础。虽然这些房地是可以出售的（出售时有许多附带条件），

但一般说来，并不是供作出售的。一位有名望的中世纪贵族，决不会想到出售他的土地，就跟美国康涅狄格州州长不会把几个村子出售给罗得艾兰州州长的情况一样。

劳动同样缺乏自由出售的可能。我们谈到今天的劳动市场时，指的是为寻找工作者提供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组织，个人可以向出价最高者出售其劳务。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网状组织；有的只是从事劳动的由奴隶、学徒和熟练工构成的一个大杂烩，但是这些人从来不把劳动的绝大部分投入市场进行买进或卖出。在乡间，农民生活所依靠的是他的领主，他耕的是领主的田，在领主的磨坊磨麦子，用领主的炉子烤面包，在战争中为领主尽力，他的报酬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这些就是作为一个奴隶的义务，而不是作为自由订约的主动者的"劳动"。在市镇，一个青年人开始当他师傅的徒弟，他的学徒年限，同他共事的人数，以及报酬数额，工作时间和工作时所使用的方法，这一切都由行会规定，师徒间是没有什么谈判余地的，只是当情况难以容忍时，才会偶尔发生个别性罢工。这里与其说是劳动市场的话，还不如说是一个医院。

再谈一谈资本。如果把资本解说作私人财富，那它肯定存在于前资本主义世界。但是，虽然存在着资本，却没有把它放置在新的和有进取心的用途的推动力上。那时信守的格言不是冒风险和求变化，而是"安全第一"。所偏重的，不是最简捷、最有效的生产技术，而是时间拖得最长和费力最大的生产技术。广告是禁止的，某一行会会员如果制出了一件优于他的同事的产品，将被看作叛逆行为。16 世纪，当英国纺织业在大规模生产上初次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时，行会即向国王提出抗议。像这样一个炫奇弄巧的工场（有200张织机和包括厨师和面包师傅在内的照料全体工人的服务职员）当即被国王宣告为非法，认为像这样的效率和财富的集中将

树立一个恶劣的先例。

因此，中世纪时市场制度之所以无法想象，是有其确切和充足的理由的，那时对生产本身这一抽象的要素还没有构想出来。中世纪时既没有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者的概念，因此也就没有市场，既没有市场(尽管有许多丰富多采的当地商业中心和巡回集市)，社会就只能按风俗和传统习惯展开活动。由地主们发号施令，生产就按照他们的意旨而盛衰起落。当没有号令可以遵守时，生活就按固有的常规过下去。假使亚当·斯密生存在1400年以前，他就会感到没有必要去创立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要了解中世纪社会是怎样会团结在一起的，其间并没有什么奥秘之处，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计划，也没有什么隐蔽之处可供揭穿。那么伦理学和政治学呢?是的，在低级贵族和高级贵族之间、在高级贵族和国王之间的关系上，可以加以合理解释之处是很多很多的，在教会的教导和商人阶级的执拗倾向之间的抵触，也有大量问题可供冥思苦想。但是经济学呢?却没有什么可供探讨。当庄园和教会的法规和一成不变的风俗，像本摊开的书那样明摆着，谁还会去过问供给与需求、成本或价值那些抽象的规律呢?亚当·斯密在那个早期时代，也许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但决不会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那样他将一无所成。

直到18世纪，这个自我繁殖、自给自足的伟大世界，才迸发成一个喧阗扰攘、奔波忙迫的花花世界，否则，几个世纪以来，任何经济学家也将无所措手足。“迸发”这个词这里也许用得有点过火，因为其间的演变要经过几个世纪，而不是一次猛烈的突然爆发。但是，变化的过程虽然拖得很长，却不是一次和平的演进，而是一次使人感到极度痛苦的震动，是一次革命。

单是土地商品化，使处于社会关系上等级制度下的土地改变成许多空地和有利的地基，就需要完全根除牢固的封建生活方式。

要使受庇护的奴隶和学徒(在家长制的借口下无论怎样富于剥削性)转变成"工人",就得造成一个骇人的阶级,叫作无产阶级。要使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就得把弱肉强食的原则教给守在谷仓边的胆怯的居民。

所有这些,简直没有什么安宁的前景可言。谁也不希望生活商业化。只有让我们回到上面的末一旅程,去看一看那里发生的经济革命,才会意识到,对这一变革当时反抗得何等剧烈。

我们回到了法国,时间是 1666 年。

当时资本家所面对的是扰乱人心的一种冲击,由于市场结构的日益扩大,终于无可避免地引起了新的呼声:要求变革。

发生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纺织业行会的师傅,对于他的产品是不是可以进行革新。得到的裁决是:"1 个织布商,如果要按照他自己发明的方法对 1 件织物进行加工,这个问题须先经 4 个最老的商人和行会中 4 个最老的织布商考虑以后,呈准市镇法官,方得按照他自己所希望雇用的人数和所用纱线的长短进行加工,否则不得擅自处理。"由此可见,有多少变革的建议会知难而退。

布织业问题经处理之后不久,纽扣制造商行会发出了愤怒的呼声,说成衣商在用布制造纽扣,这是前所未闻之事。政府对此表示愤慨,说技术革新不应威胁安定的行业,对布扣制造者,甚至对其使用者,一律处以罚金。但是行会会长还没有感到满足。他要求有权可以搜查人们的住宅和衣橱,甚至要求如果在大街上看到有人穿戴这种破坏性商品,可以进行逮捕。

对变革的这种畏惧心情,并不只是限于几个吓坏了的商人的使人觉得有些好笑的抵抗。资本在认真地抵抗变革,监狱是敞开的,准备随时用刑律对付。英国于 1623 年,对一项织袜机的专利要求,不但加以拒绝,而且由枢密院下令,对这类危险的奇技淫巧之物一体查禁。法国认为印花布的进口将危及它的服装业,结果

通过所采取的对付办法，使 16000 人丧失生命！单是在瓦伦斯[①]，由于犯了私运印花布的罪行，一次就被判处绞刑 77 人，用刑车处死 58 人，充当船役奴隶者 631 人，只有 1 人幸免于难。

但是，资本不过是发狂似地躲避市场方式的生产因素之一。劳动所遭到的情况，甚至还要险恶。

让我们再回到英国。

时期是 16 世纪末，是英国进行扩张和冒险的伟大时代。女王伊丽莎白作了一次成功的周游国境的巡视。但她回来时有些郁郁不乐。她沮丧地说，“到处都是穷人！”这个说法是有些不可思议的，因为还只是在 100 年前，在英国所看到的，多数是耕种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即所谓自由民，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独立、自由和繁荣的居民集体，使英国引以为荣。而现在情况却成了“到处都是穷人！”在这一间歇期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发生的是大规模征用土地运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这一运动的开始，因为它还在开端时期。此时羊毛成为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而羊毛生产者是需要放牧场的。这种牧场系以圈起公共用地的方式取得，就像用碎布制成的百衲衣那样，系用零星的小块土地拼凑而成（这类小块土地并没有篱笆或栅栏围住，只是借助于东一块石头、西一棵树来辨别那是属于哪个人的土地）。在公共用地上原来是大家可以放牧他们的牲口的，现在却突然宣称归某一庄园的贵族所有，不再归教区的全体居民使用。原来是属于一种集体所有制，现在却成为私有财产。原来在土地上活动的是自由民，现在满眼所看到的却是羊群。有个叫约翰·海尔斯的，于1549 年写道：“以前是 40 个人靠这块地过活，现在 1 个人和他的牧羊人就占有了这块地的一切。的确，祸根就在于这些羊，它们把耕种业

① 瓦伦斯（Valence），法国东南部一城市。——译者

务逐出农村，而最重要的粮食就是由此而来的，现在满眼看到的却全是羊，羊。”

圈地法的范围和影响之大，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早在16世纪中叶，即因此发生过多次暴动，单是其中的一次，就死了3,500人。当18世纪中叶，此法仍在全力执行，直到19世纪中叶，才走完了这一可怕的历史过程。例如于1820年，在美国独立战争将近50年之后，萨瑟兰女公爵在794,000英亩土地上撵走了15,000佃户，给以131,000只羊，并作为补偿，对迁出者每户平均租给瘠地2英亩。

但值得注意的还不只是大规模地强夺土地。悲惨的是农民方面发生的情况，他被剥夺了使用公共用地的权利以后，就不再能自立地成为一个“农场主”。当时没有工厂可以进去工作，即使他愿意，也无法使他自己变成一个厂工。他走投无路，就不得不沦为社会中最痛苦的一个阶级——农业无产者，当农业工作无可措手时，就沦为乞丐，否则为盗贼，而通常是成为一个穷人。英国议会鉴于全国贫民惊人地增加，企图把他们强迫限制在所在地区，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对于居留在当地的，给以微薄的救济金，对一些流浪汉则施以鞭笞、在肌肤上烙印或毁伤其肢体。在亚当·斯密时代有个社会改革者，对流浪的贫民主张设一专门机构加以禁闭，他一本正经地提出，可以把这种机构叫作恐怖之屋。这个国家为防止贫困所采取措施中之最糟的是，把贫民拘留在他居处的当地，使他依赖救济金勉强过活，这就堵塞了对问题唯一的可能有的解决方法。这并不是说英国的统治阶级都是残酷的，全无心肝的。实际是他们不懂流动劳动力这一概念的作用，劳动力如果是流动的，它就可以按照市场的需要，什么地方有工作，就到什么地方去就业。统治者对待劳动的商业化，就跟对待资本的商业化一样，在每一步上都有错误看法，都存有戒心，要加以抗拒。

具有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市场制度，就这样在痛苦

的挣扎中产生，这种痛苦的挣扎开始于13世纪，直到19世纪还没有走完它的过程。像这样的不被人们所理解、不受欢迎和缺少计划的革命是从来没有的。但是，由此形成的市场的伟大力量是不能否定的。它狡猾地甩掉了风俗、习惯的老框框，目空一切地扯掉了传统这一惯例。尽管在纽扣制造商的一片喧嚷声中，最后战胜的终究是布扣商。尽管枢密院采取了那些措施，而织袜机却变得那么宝贵，在70年之后，就是这个枢密院，竟下令禁止织袜机出口。尽管使用了刑车，而印花布贸易却发展得飞快。经过保守分子的最后反对，在祖先的产业上终于产生了有经济意义的土地；通过雇工以及雇主的多次呼吁，终于从失业的学徒和流离失所的雇农中产生了有经济意义的劳动。

社会就像一驾大马车，它长期地走着"传统"这个下坡路，现在终于在车上安上了内燃机。交易、交易、再交易，利得、利得、再利得，这些活动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得令人吃惊的推动力。

是什么力量强大得足以粉碎一个舒适的、既定的社会，而用这个新的、不受欢迎的社会来代替的呢？

这不是出于单独的某一重大理由。新的生活方式是从旧的方式之内成长起来的，就像蝴蝶孕育在蝶蛹之内一样，当生活的骚动强大到足够的程度时，它就突围而出，把旧结构打得粉碎。造成经济革命的，并不是什么某些重大事故、个别的冒险活动，这一或那一法令或有权威的人物。这是内在成长的一个变化过程。

首先是，**在欧洲逐渐出现了民族的政治单位**。在农民战争和国王征服的打击下，早期封建制度孤立的存在渐渐转变成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随着君主政体的成立，带来了民族精神，一方面又转过来对优惠工业予以皇家庇护，如巨大的法国织锦业建筑工程、舰队和陆军以及其他一切必要的附属行业的发展。那些在16世纪折磨着旅行商人的无数的规章制度，渐渐地让位于国家法规、统一

的度量衡和或多或少统一的通货。

政治变动的一个方面是，鼓励人们到国外去探险，从而使欧洲获得革新。在13世纪，波罗作为一个无掩护的商人，在他大胆的旅行中，到了大汗的国土；15世纪，哥伦布在伊莎贝拉王室的赞助下，航行到他认为的目的地。从个人探险到代表国家的探险的变化，是从个人生活到国民生活的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转过来，那些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资本家，代表国家从事大规模的冒险活动时，却把财富和对财富的意识带回到欧洲。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说，"黄金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无论谁有了它就成为他所要得到的万事万物的主人，甚至可以使灵魂进入天国。"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情感也就是一个时代的情感，这就加速了一个新社会的到来，这个社会所重视的是求取利得和适应机会，所追逐的是金钱。顺便提一提，我们注意到，东方的财富的确是惊人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①的一次航海中，作为一个股东所取得的份额，足以偿清英国所负担的外债，使预算归于平衡，并且，用以在国外作出的投资，按复利计，其数额之巨，足以相当于1930年英国在国外财富的全部！

变动的第二支伟大力量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勇于怀疑、爱寻根究底和人文主义观点的影响下，宗教精神的缓慢衰退。今天的世界把意想中明天的世界推在一边，于是尘世的生活变得更加重要，因此物质标准和通常的享受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在对宗教的容忍程度上的变化的后面，兴起了新教教会，这就加速了对工作和财富新态度的形成。罗马天主教会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商人，毫不迟疑的把高利贷叫作罪恶。但是现在的所谓商人，每天在社会上向上爬，他已不再只是一个有用的附属物，而是新社会的一

①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1543—1596年），英国航海家。——译者

个组成部分，对于他的职能已有必要加以重新估价。新教会的领袖为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混合铺平了道路。所赞扬的，绝不是为了与尘世隔绝而安于贫困，或离群索居，从事冥思苦想，而是尽量利用天赋的才能从事日常事务，这就是对神表示虔诚的积极贡献。贪得的欲望，已成为公认的品德——这不是直接为了私自的享受，而是为了增益上帝的光荣。在这里，富裕与修真悟道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或者是富人与圣徒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相差不过一间而已。

有一个在12世纪即已流传的民间故事，说一个高利贷者，当他步入教堂准备举行婚礼时，被一个坠落的雕像击伤。经审查后方知，所坠落的是另一高利贷者所铸之像，由此可见神意对货币商之不满。直到17世纪中叶，还发生了一起可怜的罗伯特·凯恩与清教徒宗教权威发生冲突的事故。在这样的敌视气氛中，市场制度是不容易发展的。因此，精神领袖对市场方式的有利无弊这一点的逐渐接受，对这个制度的充分发展说来是非常必要的。

在缓慢的社会变迁中，还潜含着一股深层的力量，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终于使市场制度的兴起成为可能。我们惯于认为中世纪是个停滞的、缺少进步的时代。然而在500年间，中世纪人创立了1,000个城市(一个巨大的成就)，用原始型、但是可以使用的公路把它们连接起来，粮食即由此运入以供养其居民。只是由于这类活动，才会使货币与市场以及买进与卖出，在生活中日益惯常起来。在这一变动过程中，权力自然会被吸引到通晓银钱事务的那些人——商人——的手里，从而离开不懂行的，倨傲的贵族的掌握。

进步并不只是这一缓慢的货币化过程。其间还涉及一个在性质上极其重要的技术进步问题。在某种适度的会计方式未经产生以前，商业革命是无法开始的；虽然威尼斯人于12世纪时已经使

用某些高级的会计方法，但是欧洲商人在会计学上的无知状态，比小学生并高明不了多少。要使簿记知识的广泛需要获得认可，是需要时间的。直到17世纪，复式簿记才成为一个常规做法。在对货币不能加以适当的处理和计算以前，大规模商业是无法顺利展开的。

就影响的普遍性而言，其最重要的也许是科学上求知欲的打动。虽然要等到亚当·斯密的时代，人们在技术上才会转入一个新天地，但是，如果不是在与工业有关的方面陆续出现了一连串发明和发现，为后来的演变准备好条件，就不会发生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出现了印刷机、造纸术、风车、机制钟、地图和许多其他发明。发明这一想法本身，开始获得认可，于是人们对实验和创造开始加以青睐。

这些事件，单独地活动时，是没有一件会搞乱社会的。实际上，其中有许多既是人类组织大骚动的前因，也是它的后果。历史上的变化是不会突如其来的，发生巨大的骚动时，从开始到结束，会延伸到很长时间。市场生活方式的迹象与传统方式会肩并肩地同时存在，在市场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组织的指导原则之后，昔日的残迹还会持续存在一个很长时期。例如，法国直到1790年还没有最终取消中世纪的行会和一些封建特权，在英国，管理行会业务的工匠法规到1813年还没有废除。

直到1700年，在亚当·斯密诞生前23年，当局还在禁止商人携带"不雅观的"包裹，还在为价格的是否"公道"发愁，还在为坚持先人的日益衰微的经营方式而努力奋斗。此时社会所注意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一套新的，"不证而自明的"箴言，其中就有这么几条：

"每个人对金钱天然是贪得无厌的。"

"没有一条法令反对求利观念。"

"求利观念是讲求经商之道的一个核心。"

一个新概念产生了："经济人"——只要引导某人的是他操奇计赢的头脑，这个苍白的幽灵就会跟着他寸步不离。课本上不久就开始谈到许多像荒岛上的鲁宾逊·克鲁索那样的人，他们处理其事务时，就像许多善于精打细算的会计员那样。

有件事把欧洲给吸引住了，突然发生了对财富和投机的新的狂热。1718年在法国有个苏格兰冒险家叫约翰·劳的，组织了一个不可靠的、滑头的冒险事业，称为密西西比公司，所经营的是在美洲开采大量黄金，同时进行推销股票，据说入股者一夜之间就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为争夺取得股票的权利，发生了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斗殴及凶杀事件。据说一个旅馆服务员竟获得了三千万利弗尔。当这个公司将为投资者带来可怕的损失，摇摇欲坠时，政府为了想避免一次灾祸，集拢了成千的穷人，扮作一帮矿工，拿着凿和铲，在巴黎的大街上列队而行，装着要出发到埃尔多拉多①之乡。当然，这个组织不久即告崩溃。不过100年前，作为一个资本家是不大出头露面的，现在却成为在大街上推推攘攘的、企图暴发致富的一伙，变化得好快啊！再者，上述的事例表明，大家会轻易相信这样露骨的一个骗局，可见其求财之心是何等热切！

这一转变并无任何过错，我们的巡礼已经结束，市场制度已经诞生。此后如何让它存在下去这个问题的解决，所依靠的既不是风俗习惯，也不是命令，而是由市场本身把一些求利者结合在一起的这些人的自由行动。这个制度将被称为资本主义制度，构成这个制度的基础的求利概念是那样深入人心，以致于人们不久就确信它是人类永恒而又普遍的天性。

这个概念是需要有个哲学基础的。

---

① 埃尔多拉多(Eldorado)，想象中的黄金国。——译者

前曾一再说过，人作为一个动物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他建立了一个社会以后，是不愿意就这样听其自然的，他必须让自己相信，他所在的那个社会，是一切社会中之最好的，其内部安排所反映的，必然是上帝在外部作出安排时的意旨所在。因此，每个时代总会产生一些哲学家、卫教辩护士、批评家和革新者。

但是，早期哲学家所关心的，总是集中在生活的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只要统治世界的是风俗和命令，贫和富的问题就根本不会打动早期哲学家的心情，至多不过是付之一叹，或加以奚落，认为这是人们内心卑鄙龌龊的又一迹象。只要人就像蜜蜂一样生来是个工蜂，就没有人会找麻烦去研究关于劳动人民的基本理论——谈君王们的不测之威和捉摸不定的举动，比谈劳苦大众会使人兴奋、会使人谈起来眉飞色舞得不知多少倍。

亚里士多德说，"人从生下来的那一时刻起就注定，有些是使唤人的，有些是被人使唤的"；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在早期哲学家的心目中，对于劳动人民与其说有蔑视之意，不如说漠不关心。广大劳动下层阶级的存在，只是被认为理所当然之事，对一位绅士或学者说来，要他从事于考虑银钱出入和市场买卖之事，不仅太辛苦，而且太粗鄙。这些人要运用思维、进行角逐的是帝王的、神性的和其他方面的权利，是世俗的权力和精神上的权力，而不是有进取心的商人的意图。虽然个人的富裕，对于得以得心应手地处世方面有它的作用，但是对财富的斗争，还没有普遍到无孔不入、还没有感到显然有其必要性时，就无须使财富有一个全面的基本理论。

人们对肮脏的、吵吵闹闹的市场的外貌也许会忽视于一时，然后也许会展开猛烈的攻击。最后，当这种现象深入到学者自己的内心时就会想到，较好的办法是去过问一下，在那里也许还有些高

妙之处未经发现。于是为了这个目的，一些学者，在亚当·斯密之前200年，就从事于编造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

但是，当他们要试图实现这个目的时，他们所提出的是何等支离破碎的一连串奇谈怪论。

他们起先发现，严重的生存竞争的最高目标是积累黄金。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科泰兹①和弗朗西斯·德雷克，不仅是为国家尽力的冒险家，也被认为是经济进步的促进者。对重商主义者（我们用以称呼那些讨论关于商业问题的小册子作者和小品文作者）说来，这是不言而喻的，致力于经济的那些人的天然目的是使国家臻于富强，而富强的最重要因素是黄金。他们所重视的是巨大的舰队和冒险活动，使国家在财富上收入累累而支出无多，其压倒一切的信念是，如果大家去追求财富，国家就决不会不繁荣昌盛。

到了18世纪，最初的重视黄金，开始显得有点天真、幼稚了。继起的新学派越来越着重商业，以此作为国家活力的重要根源。因此，他们所面向的主要问题不是垄断黄金市场，而是帮助上升中的商人阶级，并推动其工作时创造更多的财富。

新的哲学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如何使贫者安于贫困。大都以为，除非使穷苦人永处于穷苦境地，否则就不能指望他在不要索高工资的情况下，诚恳地从事辛苦工作。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8世纪初最精明和最苛毒的社会评论家，写道，"要使社会幸福……，就得让大多数人无知和穷困"。所以当时的重商主义作者不仅忽视英国廉价的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力，而且还对此表示欣赏。

当时在这个观念混乱的日常生活中置入某种秩序的，决非仅仅是"黄金"和"商业"两个观念。有无数的小册子作者、教区牧师、

① 科泰兹(Cortez 1485—1547年)，西班牙人，墨西哥之征服者。——译者

狂人或怪人、及执拗和抱偏见的人，对社会活动尽力辩护或加以诅咒，从而作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困难在于，所有这些模式都不顶用，都不能解决问题。这个说，一个国家显然买进不能多于卖出；那个坚决认为，一个国家所接受的如果比它所交换的多，处境就当然会好些。有的坚决认为商业会使国家富强，把商人的地位抬得很高；有的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商业不过是农民强健躯体上的寄生虫。有的人说，穷人是上帝的意思要他穷的，即使不是这样，他们的穷困对国家的富强说来也是必要的；有的人把贫穷看作对社会的祸害，看不出贫困怎么会创造财富。

在这一大堆混乱的、互相对立的推理中，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人们坚决要求某种理智上的整理，从而帮助他们了解所生存的世界。经济世界看上去是有点冷酷无情的，然而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难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① 要说，"再没有比商业更需要用哲理来阐明的"。总之，经济学家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混乱中出现了一位智力惊人的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从而在关系重大的那一年中加上了个第二个革命事件。在海洋的这一边在政治上诞生了一个民主国，在那一边在经济上却展开了一幅蓝图。但是在欧洲，尽管没有全都仿效美国的榜样，而斯密第一次揭开了现代社会真实图景之后，整个西方世界都变成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他高瞻远瞩，在几个世代中，成了在经济见解上的典范。亚当·斯密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革命家，他只是对于他看来十分清晰、十分明显，而且并不新奇古怪的一些事物，作了一番解释。他把他所获得的——世人一直在搜寻的——印象，如实地提供给他们。《国富论》问世以后，人们就开始用新眼光来察看他

①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英国辞典编纂者，作家。——译者

们的世界，他们看到，事体是怎样与整个社会相配合的，看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跨着雄伟的步伐，向着一个遥远而灼然可见的目标奋勇前进。

第三章 亚当·斯密的奇妙世界

18世纪60年代到英国去访问时，多半会听到在格拉斯哥大学有个叫亚当·斯密的人。斯密博士即使不是妇孺皆知，也至少说得上是个知名人物。伏尔泰知道他，大卫·休谟是他的知交，学者们从俄国远道而来，听他经过仔细斟酌的热情讲话。他除了以学术上的成就闻名外，还以具有奇特的个性著称。他有时会把精神专注于一处，显出神不守舍的样子。有一天他同一个朋友边走边热烈讨论什么时，不慎落入一个鞣制皮革的坑里，竟把坑里的水当作饮料，说一生从未尝过这样难吃的茶。他的奇行怪癖是很多的，但从未以此影响到他在才智上的表现。亚当·斯密是他的那个时代的第一流思想家之一。

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伦理学，在那个时代，伦理学所包含的比我们时代的要广泛得多，其中包括神学、道德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这就包含了从人们对保持秩序与和谐的最崇高的冲动，到个人挣得一个生计时的不那么有秩序和不那么和谐的活动的比较不愉快的研究。

神学的意旨所在是在混乱的秩序中探索人生的目的，使人类情感的冲动趋于理性化；斯密博士在阐述构成天地万物表面上混乱的自然法则时，在听众看来他的心情是很舒坦的。但是，当他注意到范围的另一端，要从事探索在营营扰扰的日常生活之下的宏大结构时，人们不免要感到，这位好心肠的博士是在把他的哲学理论扩展到适度的界限之外。

如果18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景象会使你联想到什么，那么你

所想到的绝对不会是合于理性的秩序和合乎道德的意图。只要你不是把眼睛单是盯着有闲阶级的优雅生活，你所看到的就必然是在最卑鄙形式下进行的粗野的生存竞争中一幅难堪的社会景象。在伦敦优雅的客厅或绅士们的富裕地区之外，满眼所看到的是掠夺、残酷和自甘堕落的现象，其间还混合着极其荒谬和迷惑人的风俗和习惯，有些还是多年遗留下来的和属于时代错误性质的。社会团体并不像个仔细装配起来的、其中每一部分对整体都有所贡献的机器，它倒像个詹姆斯·瓦特所造的蒸汽机：颜色黝黑，音响很大，效率不高，而且很危险。斯密博士对这样一个社会所看到的，却是秩序、目的和意图，这是使人感到惊讶的！

假定我们去参观康瓦尔[①]的一个锡矿。看到的是矿工们一个个正在降落到矿井，他们到达底部后就点起一支蜡烛，支手舞脚地躺下睡觉，直到烛光熄灭。然后工作两三小时，从事采矿，直到第二次传统的休息时为止，这次休息足够抽一次烟。整个半天就这么消磨过去，其中大约一半时间是用于挖掘矿层的。如果我们向北走，鼓起勇气到达拉姆或诺森伯兰[②]的煤矿去看一看，就会看到另一样光景。这里男女在一道工作，上衣完全脱光，由于劳累过度，望上去憔悴不堪，简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在那里通奸的风俗极其粗野，匆匆一瞥之间即可以目成，随时择一比较隐僻之处即可以获得满足；7 岁到 10 岁的小孩，在冬天从未见过阳光，就要供作使唤，帮矿工们搬运一桶一桶的煤，博得一些小额施舍；孕妇就像马一样拉煤车，就在黑暗的洞里生孩子。

不仅矿井中的生活显得这样残酷，这样凶暴，在地面上见到的情景也不见得好多少，同样使人难以联想到秩序、和谐和人生的目

① 康瓦尔(Cornwall)，英国西南部的一个郡。——译者

② 达拉姆(Durham)和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都是在英格兰东北部的郡。——译者

的所在。在国内许多地区，一伙一伙的农业贫民游来游去在寻找工作。当收获期时，来自威尔斯高地的“古代布列顿人的一伙”（他们这样称呼自己），会成群结队而至；有时在全伙中也会有一匹无鞍无辔的光秃秃的马，有时只是全伙徒步而行。常见的是，一伙中只有一个人会说英语，就由他担任这一伙和那位绅士式的农场主（他们所要求帮助收割的就是他的田）之间的中间人。在这种情况下，这就难怪工资要低到每天 6 便士了。

最后，让我们到一个生产城市去看一看，还会看到些别的怪现状。1742年由洛姆兄弟建立了一个厂，我们看到它也许会感到惊奇。这是个巨大建筑物（就那个时代而言），500英尺长，6 层楼高，丹尼尔·迪福① 说厂内安装的机器有“26,586架纺车，97,746个机件，水车每分钟绕转三次，每次缫丝 73,726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照料机器的童工们，一班要工作 12 到 14 小时，他们的伙食处在一个临时工房里，就在一个黑黑的炉子上烧来吃，但卧处据说是一直保持着温暖的。

在 18 世纪时看来，以及我们用近代的眼光看来，这是一个何等离奇、残酷和乌七八糟的地方。然而，使人觉得可怪的是，这样的情况竟会同斯密博士的道德哲学方案融洽一致，而且这位博学的人实际上认为，这一切都具有深远意义，都与自然规律相配合，可供进行探索。

这位温文尔雅的思想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别无所好，所好的只是书”，有一次亚当·斯密向他的友好卖弄他所珍藏的书时，就是这样形容他自己的。他肯定不是个仪容漂亮的人。我们从一个大纪念章上看到他的面相，下垂的眼皮，深眼窝，下嘴唇突出，一个大鹰钩鼻子。他一生受到过神经方面的

① 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1659—1731年)，英国小说家，《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译者

折磨，他的头摇晃不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怪模怪样。

此外他还以常常会处于游心于物外的状态闻名。当18世纪80年代斯密接近50岁时，爱丁堡居民在一个欢乐的场面上，以合乎礼仪的方式款待他们最杰出的公民。这时他穿着件浅色外套，短裤，白丝袜，有扣的鞋子，戴的是平顶阔边的海狸皮帽，拿着手杖，在一条用圆石砌的路上行走。但是他两眼望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像是在唠叨些什么。他每走一步就要迟疑一下，似乎想换个方向走，甚至想倒退着走，一个朋友说他样子就像个蠕虫在地上爬。

他的心不在焉状态是常会发生的。一天他只穿着睡衣来到他的花园，一时竟沉溺于幻想之中，一直走了15英里才恢复正常。又一次，在爱丁堡与一个声名显赫的友人同走时，他的扈从边向他敬礼边递上他的手杖。对斯密说来，这类事已经有过无数次，但他这次面对这位工作者突然陷入了催眠状态。他用手杖向对方回礼，更使他的客人惊异的是，他毫发不爽地用他的手杖向他的扈从重复了后者对他的一举一动。当这一符咒的魔力解除以后，斯密却站在一长段踏级的顶端，手里仍然拿着手杖，全然不知道他刚才的那番出格举动，他把手杖搁在一边，然后从刚才谈话的中断处继续谈起。

这位有时会神不守舍的教授，于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菲弗郡的克科迪，其地号称有1,500居民，当斯密出生的时代，有些城镇的居民还用钉为货币。他4岁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斯密被一帮过路的吉普赛人拐走了。出于他叔父的努力（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死去），对这帮吉普赛人进行追捕，他们在逃跑中把小亚当抛弃在路边。某一为他写传记的人说，“我担心他将来会变成个穷苦的吉普赛人”。

斯密虽然从早年起，甚至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会不时发生神不守舍状态，但他是个聪明的学生。他显然早就注定，在日后要从

事教学生涯，他 17 岁时就到牛津大学去求学（那时他是骑马去的）在那里呆了 6 年。但是牛津到后来才成为一个高等学府，当时还不是个学习集中的所在，大多数教授久已公然放弃了教学工作。一个外地旅行者于 1788 年看到在那里举行的一次公开辩论时，感到非常诧异。所有 4 个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都默无一言，都在阅读当时流行的小说。由于那时的风气是，进行讲授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因此斯密在学习过程中大都是无所师承的，自己认为读什么书适当就读什么。有一次他几乎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本大卫·休谟的《人性论》，认为休谟即使可能成为一位哲学家，读他的书也是不相宜的。

1751 年斯密 28 岁，受聘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不久又受聘为伦理学教授。格拉斯哥与牛津不同，后来成为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以拥有一批出色的有才能的人物而自豪。但是它与现代的所谓大学这一概念还有很大差别。比较古板的一派教授，对于斯密轻率而又热情奔放的那种作风，并十分不以为然。他做礼拜有时会面带笑容（那时他无疑正沉溺于幻想中）；他是那个令人厌憎的休谟的坚定不移的朋友；他向大学会请求准许免除在上课开始时举行祈祷；他祈祷时带有某种“自然宗教”风味——所有这些他都受到了时人的指摘。如果我们知道斯密自己的老师赫奇森在格拉斯哥曾创立新学风，拒绝向学生用拉丁文讲课，那么对以上所述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不合群不可能是太厉害的，因为在 1758 年他提升为系主任。当然，毫无疑问他在格拉斯哥的生活还是愉快的。他在晚上有时玩惠斯特①（他的神不守舍习性，往往使他成为一个有点靠不住的打牌人）有时参加学会，此外则过他宁静的隐居生活。他受到

① 惠斯特（whist），一种牌戏，后来的桥牌戏即由此演变而成。——译者

他学生的爱戴，以讲演者著称，甚至博斯韦尔①也来听他的讲。人们为对他表示尊敬，往往故意模仿他那奇特的步态和说话的姿势。甚至在书商的橱窗里还放着他的半身雕塑像。

使他获得声望的不仅仅是他怪僻的个性。175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立即引起了轰动。这本书名叫《道德情操论》，由此把他推到了英国哲学家的最前列。这本书所研究的是对事物的道德上的认可和非难这种观念的根源。人是抱有自私观念的动物，那么，他是怎么会（这时自私观念好像是处于隐伏状态，或是转变到更高一级）对事物作出道德上的判断的呢？斯密认为答案是，我们具有一种能力，能使我们自己处于第三者地位，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从而对一件事情的道德（与自私相对）价值形成同情的观念。

这本书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德国，"亚当·斯密的问题"成为人们最喜欢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一论文却受到了一个吸引人的人物查尔斯·汤增德的赞许。

汤增德似乎是在18世纪时很多的那些奇妙人物之一。他是个机智、甚至博学的人，用霍勒斯·沃波尔②的话来说，"他博闻强识，几乎无所不能，只要他多一点诚意，多一点常识，意志坚定些，就肯定会成为在他的时代中一位最伟大的人物。"汤增德以主张游移不定著称，当时盛传一则笑谈，说他一天胁部作痛，竟说不出是左边痛还是右边痛。他作为英国财政大臣时，实际上助成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他的方法是否认殖民地居民有权推选自己的法官，一面对美产茶叶征收重税，仅此足以证明他是何等缺乏常识。

但是，他虽然在政治上目光短浅，在哲学和政治学上却是个诚

---

① 博斯韦尔（Boswell），苏格兰律师，作家。——译者

②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年），英国作家。——译者

笃的学者，因此成为亚当·斯密的一个信徒。他还在实际上对他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帮助。1754 年汤增德与达尔基思伯爵夫人(迪克柳公爵的寡妇)结婚，这对他说来是一次辉煌而有成就的结合。现在他要为妻子的儿子寻觅一位家庭教师。那时，英国上层社会对子弟进行教育时，其方式主要是进行一次大旅游，认为在欧洲大陆作一次逗留，可以使子弟的举止臻于文雅，这是切斯特菲尔德①勋爵所竭力提倡的。汤增德认为亚当·斯密博士是小公爵旅游时理想的伴侣，决定给以年俸 300 镑，此外还给以费用上的津贴和终身养老金每年 300 镑。这是难以拒绝的一个再好没有的建议。那时，教授是直接从他的学生那里收取学费的，他所获得的至多一年也不会超过 170 镑。值得高兴的是，当斯密博士离校时，他的学生们拒绝接受他的退款，说他们所获得的教益已经远逾此数。

这位家庭教师和小公爵于 1764 年离英赴法。他们在图鲁斯②呆了 18 个月。这一对伴侣一大一小，再加上斯密欠高明的法语，使他回想到在格拉斯哥的安静生活，望之如在天上。然后他们又向南走(在那里他遇到了他所崇拜的伏尔泰，并严词拒绝了一位多情的侯爵夫人的殷勤致意)，从那里到了日内瓦，最后到巴黎。为了避免周游各地的无聊，斯密开始写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关于这一题材，他曾经在格拉斯哥作了讲演，曾经在爱丁堡上流社会中的许多晚上展开辩论，曾同他的至友大卫·休谟详细地进行讨论。《国富论》就是由此酝酿而成。但此书的最后完成，还是在 12 年之后的事。

他在巴黎的处境比前有所改善。这时他的法语虽然还是说得很糟，但是已经足够使他和法国第一流的经济思想家展开详尽的讨论。所谓经济思想家，这里指的是 M·魁奈，他是路易十五的宫

① 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 1694—1773)，英国政治家，作家。——译者

② 图鲁斯(Toulouse)，法国南部一城市。——译者

廷医师，是庞帕多夫人[①]的私人医师。魁奈成立了一个叫作重农主义的经济学派，设计了一种关于经济的图表，叫作《经济表》。这个《表》所显示的确实是一个医生的见解——他的想法与当时仍然认为代表财富的是实实在在的金和银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坚决认为财富是由生产而来的，财富从这个人转到那个人，在全国流通，使整个社会获得不断补充，就像血液的循环那样。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米拉博[②]把这个说法看成是堪与文字和货币居于同等地位的一大发明。但是重农主义的困难在于，它坚决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财富"，至于制造业和商业只是一无效果地处理财富。因此，魁奈的说法在政策的实施中只有有限的实用性。诚然，他是提倡自由放任政策的，与当时的想法完全相反。但是把工业看作是一种不结果实的操作，也就不能认识到，劳动无论如何使用(不仅是用于土地)都会创造财富。

认识到劳动而不是自然是"价值"的源泉是斯密最伟大的见识。这也许是因为他生长在商业繁荣的国家、而不是农作物遍布的法国的缘故。无论原因如何，斯密不能接受重农学派信徒的农业偏见(魁奈的追随者，如米拉波，除一味奉承外，一无所长)。不过斯密私下对这位法国医生却是非常崇敬，如果魁奈没有在他成书之前死去，斯密是会把《国富论》献给他的。然而，重农主义与斯密的苏格兰眼光从根本上则是格格不入的。

1766年，公爵的兄弟(后来他也加入了他们的旅游团体，和他们作伴)在巴黎街道上被人杀害，于是这次旅游即告中止。小公爵回到了他在达尔基思的庄园，斯密则先到伦敦，然后到克科迪。在此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就呆在那里，他的那部伟大著作就在此时逐步地走向具体化。这部书大部分是他口述的，口述时他惯于

① 庞帕多夫人(Mme. Pompadour，1721—1764年)，路易十五的情妇。——译者

② 米拉博(Mirabeau，1749—1791年)，法国演说家，革命家、政治家。——译者

倚在壁炉边，他时常神经紧张地揉着他紧靠在墙上的头，以致墙上被他的润发油染上一块油迹。他偶然也到达尔基思庄园去访问他以前照管的孩子，还不时到伦敦去与时下的文人学士讨论他的观点。其中之一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斯密跟他属于同一俱乐部的会员，虽然斯密同这位年高德劭的词典编辑者是难得在真正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聚谈的。沃尔特·司各脱爵士告诉我们，约翰逊于初次见到斯密时，就对他的某些说法进行抨击，斯密当即辩明他观点的正确。大家要问的是，"那么约翰逊是怎么说的呢？"斯密满面怒容地说，"该死的，他说'你撒谎！'""那么，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你是个……的儿子！'"司各脱说，两位伟大的有德操者就是在这样的交往情况下初次见面和分手的，而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两位伟大哲学教师之间的经典的对话。

斯密还碰到了一位既可亲可爱而又有才智的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国人，后者对他提供了大量关于美洲殖民地的实情，关于他们有朝一日在世界舞台上会担任的角色，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斯密后来所写关于美洲将由殖民地组成一个国家时说，"这些殖民地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空前的、最强大的国家"，这个说法无疑是受了富兰克林的影响。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两年后斯密被任命为爱丁堡海关税务司长，这一闲差一年可领薪600镑。他始终和他一直活到90岁的母亲住在一起，过的一直是宁静、安详的单身汉生活，他对生活是满意的、安心的，但是他那种神不守舍、心不在焉的老毛病，却始终未能祛除。

以上说的是他的生平，那么他的那部书呢？

据说他的著作"不仅是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物，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产物。"然而严格说来，它并不是"有独到之见"的著作。在斯密之前，有一大批观察者——洛克、斯图亚特、劳、孟德维尔、配第、肯

蒂隆、更不用说魁奈和休谟了，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也近似于他所看到的世界。斯密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吸取，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作者有百人以上。但是别人只是在这里钓几条鱼，那里捕几只虾，而斯密的网却张得很大；别人所澄清的只是这一点或那一点，而斯密所说明的却是全景。《国富论》并不具有纯粹的独创性，但无疑是一名作，是一杰作。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部书所表现的一幅巨大的全景。一开头就是出名的一段描绘制针业在工作上的细致分工，由此牵涉到种种问题，如“美洲殖民地新近发生的扰乱”（斯密显然以为，等到他的书付印时，美国独立战争即将过去）、牛津大学中学生生活的虚度光阴，以及 1771 年以来关于捕捉鲱鱼的统计数字。

看一下坎南为此书所编制的索引，就可以知道斯密的参考范围和思想范畴之广。这里姑且举示列入字母 A 项下的 10 来个词条，以见一斑：

阿巴赛兹（Abassides），撒拉逊人[古阿拉伯人]在其统治时的繁荣昌盛

阿伯拉罕（Abraham），古希伯来笨重的货币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用盐块为货币

为公众演出的演员（Actors, Public），因从事这一工作时所蒙受的耻辱而获得补偿

非洲（Africa），其地有权力的君王的处境，远不及在欧洲的农民

酒店（Alehouses），其为数众多，并不是饮酒致醉的有力成因

大使（Ambassadors），委任时的最初动机

美洲（America），[以下有整整一页的参考条目]

学徒（Apprenticeship），对这种奴役的性质的说明

阿拉伯人(Arabs),他们支援战争的方式

军队(Army),当反对不忠诚的牧师时，对君王说来的一种保障

这个印得很精的索引计长63页，内容所涉及的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财富——其主要的享受、部分是在于由此而来的夸耀作用；贫穷——有时会使国家产生野蛮的、无人性的风俗；食欲——在有限容量的范围内对食物的欲望；屠夫——残忍的、可憎的行业。"原著长900页，读过这部巨著以后，对英国18世纪70年代关于学徒、熟练工和正在发展的资本家，关于地主、牧师和国王，关于工厂、农场和国外贸易，便会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印象。

这部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在运用一个写百科全书的头脑来进行思考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是不含有像百科全书那样有条不紊的精密性。那个时代的作家们没有受到许多"如果"和"但是"条件的约束而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限制，因此极有可能使一个像斯密那样伟大的天才，在其著作中实际上囊括那个时代的大量知识。因此这部书无所回避，无所减削，也无所顾忌。这真是一部读起来要使人恼火的书！它一再拒绝花了很大气力，用50多页篇幅才得出的结论，用简括的一句话来表达。论证是充满了细节和观察资料的，往往要把外面装饰物除去，才能发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钢铁结构。例如，谈到银价问题时，斯密就插入了一段"逸出本题"的话，这段话就占了75页；又如谈到宗教问题时，他也会游离题外，纵谈关于道德的社会分析。但是，尽管这一著作篇幅浩大，其中却充满了洞察力、观察力和恰当的词语，增加了文章的生气。首先把英国称作"店小二之国"的就是斯密。"就人的才华和气质说，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搬运工人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就同马斯锡夫和灵猩①的无多差别一样"——说这个话的也是斯密。关

① 马斯锡夫(mastiff)，一种两耳下垂的大猛犬；灵猩(greyhound)，一种身体细

于东印度公司——那时它正在东方进行劫掠——他写道，“这是个极其奇特的政府，属于那个行政机构的成员，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想离开那个国家，一旦他带了他的全部财物离开了那里以后，即使那个国家全部被一次地震所吞噬，他也满不在乎”。

《国富论》绝对不是一本教科书。亚当·斯密的书是为他的时代写的，不是为他的课堂写的；他所讲解的学说对治理一个帝国说来，是有重大意义的，不是供学术界传阅的抽象理论。亚当·斯密所要屠宰的恶龙（例如，为了驳倒重商主义理论，要写上200多页，才能置它于死地）还活着，在他的时代，虽然有点疲倦，但是还喘着气。

最后还有一点，这本书是有革命性的。当然，斯密是决不会主张打倒绅士阶级，推崇无收入贫民，从而对这样一种大动乱抱同情态度的。然而，尽管是这样，《国富论》却含有革命的意义。斯密并不是个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的、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的辩护士；我们会看到，他所赞赏的是这个阶级的工作，但对它的动机是感到怀疑的，对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他是放在心上的。他所关怀的是，促进全国财富的增长。对亚当·斯密说来，组成财富的是社会全体人民所消耗的商品；要注意这里的全体字样，这是对财富的民主的、因此也是激进的基本原理。黄金、金银财宝、国王的窖藏，已一去不复返了；商人或农民的特权、制造业行会这些概念，都已成陈迹。我们所处的是现代世界。构成经济生活最终目的的是，每个人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流量。

那么，从这部书可以得到些什么教益呢？

亚当·斯密所注意的有两大问题。首先，他想揭示的是社会所以能团结起来的那一机制。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忙忙碌碌，这是个莫大的离心力，人们是怎样不会受到这个

长、善于赛跑的狗。——译者

离心力的影响的？使各个人的活动与团体的需要相一致的是什么力量？既没有中枢的计划权威，又没有悠久传统这一稳固力量，社会是怎样使它生存所必要的那些事务得以安排就绪的？这些问题终于使斯密形成了市场规律这一想法。他所探索的是他所谓的"无形之手"——"人们的利益和爱好由此可以导向最适合于全社会利益的方面"。

但市场规律只是斯密所探究的一个方面。还有个引起他注意的问题：社会将走向何处？市场规律就像解释旋转着的陀螺为什么不会倒下去的那个规律一样，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陀螺由于在旋转，它会不会沿着桌面移动。

按照斯密以及信奉他的一些大经济学家看来，不应该把社会想象成人类静态的成就，它不会从这一代到下一代按照原样地、一无变化地重演下去。正相反，他们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有它自己的生活史。实际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国富论》是关于历史的伟大论著，说明"完全自由的制度"（斯密把它叫作商业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形成，怎样逐步演进的。

但是在没有了解斯密对市场规律的阐述之前，我们是不能贸然去接触这个比较重大、比较迷惑人的问题的。因为市场规律是会使社会趋于繁荣或衰退的更大规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一个漫不经心的个人与别的每一个人保持行动一致的机制，会影响到社会自身随着岁月的流逝将发生变化的机制。

因此，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市场机制。它并不是什么可以激发幻想或鼓动情绪的东西。它尽管枯燥无味，但是有一种迫切性，使我们对它不得不隆重看待。对市场规律的了解，不但是对亚当·斯密社会的了解说来是必要的，而且就是这些规律，将构成卡尔·马克思极其不同的社会的基础，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不同的社会基础。由于我们大家（不管你觉察不觉察）都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

下，因此应该很仔细的观察一下。

亚当·斯密的市场规律基本上是简单的。它告诉我们，在某一社会组织中某一事态变化的结果，会带来完全明确和可以预见的后果。还告诉我们，在所处的是具有同样动机的各个人的那个环境中，出于各个人利己之心的驱使，将产生竞争，由此进一步证明，竞争怎样会使社会按照它所期望的数量和它所准备支付的价格，获得它所需要的那些商品的供应。且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样发生的。

这首先是由于作为一个推动力的利己之心在导使人们去做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是社会愿意进行付偿的工作。斯密说，"我们所以会从屠夫、酿酒者或面包师傅那里得到我们饮食之所需，并不是出于这些人的仁慈或善行，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怀。我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所想到的也绝不是他们的仁爱，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他们所想到的也绝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他们的利益。

但自私自利不过是说明了情况的一半。这一点只会驱使人们行动起来。要防止个人贪求利润之心使社会受到过度的勒索，还需要有些别的因素，否则整个社会只是在利己之心的驱使下展开活动，则社会中将满是冷酷无情的牟利者。这个调节因素就是竞争，从而使社会中一切成员互相抵触的自私心理化为使大家得以交受其利的后果。因为如果每个人只顾自己占尽优势而不计及对方所须支付的代价，则他所面临的将是一群具有同样动机、同样处境的人。如果某人力图超过一般可接受的动作的水准，则别人将争先恐后地利用此人的贪黩之心。某人如果让他的利己之心越出常轨，则他将看到，竞争者将乘虚而入，将他的生意夺走；如果他对他的货物取费过昂，或对他的工人拒绝支付如别人所支付的那样多，他就会发现，在前一情况下将找不到买主，在后一情况下将找

不到雇工。这些都是《道德情操论》里的话题，人们的自私动机，通过相互作用，却会发生极端出人意料的结果——社会的协调和一致。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关于提高价格的问题。假定有100个手套制造商。每个制造商，出于利己心的推动，都想把他手套的价格提高到生产成本之上来谋取额外利润。但是他无法这样做。他如果提高他的价格，他的竞争者将横加干涉，用售价较低的办法把他的市场夺走。只能由所有手套商都结合起来成立一个团结一致的阵线，才能索取高得不合理的价格。假使是这样的话，这种勾结性的结合体也会被来自另一领域的（比方说制鞋业）有进取心的制造商所破坏，他可以把他的资本转变为制造手套来偷偷地占有市场。

但是市场规律不仅会使产品有一个竞争价格，它也会使社会上的生产者注意到社会所想要的商品的数量。假定消费者方面决定，他们需要生产较多的手套、较少的鞋子。因此，民众对市上所存手套将争相抢购，而制鞋业将黯然无色。结果由于消费者所买进的超过了市上所存的现货量，手套价格将提高；由于消费者对所存的鞋子不甚注意，其价格将下降。由于手套价涨，手套业的利润将提高；鞋价低落，鞋业的利润将减少。这里利己观念会再次起作用来恢复平衡。当鞋厂缩减其产量时，部分工人将从制鞋业解脱出来，这时手套业既在迅速发展，他们将改就该业。结果十分明显，手套产量将增长，鞋产量将降低。

首先，这正与社会的要求相适应。既有较多的手套投入市场以适应需要，手套价格将回跌到正常状态。鞋子的产量既减少，它在市场上的剩余状态不久将消失，其价也将上升到正常状态。通过市场的作用过程，社会改变了它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以适应其变化了的需求。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人发出过命令，也没有计

划权威制订过什么生产日程。一个是利己观念，一个是竞争，彼此间互起作用，就完成了这一转变。

还有个最后的成就。市场是按照公众需求的最后仲裁人的意旨来调节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正同这个情况一样，它也会调节生产商品的那些人的收入。如果某一行业的利润过于丰厚，就会有大批商人拥向这个领域，直到把盈余降低为止。如果某一种工作的工资特别高昂，脱离了常轨，就会有大批人拥向这一有利的职业，直到所得的报偿与所需要的技术和锻炼程度相类似的其他工作相比相差无几为止。情况相反，如果某一行业的利润或工资过低，则资本和工人将流向其他各业，直到供给可以进一步适应需求为止。

所有这些，也许显得有些初级知识色彩。但是可以看一看，亚当·斯密在以利己之心为动力、以竞争为调节者这一原则下，他是怎样进行叙述的。首先他说明，怎样使价格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在被任意摆布的情况下，脱离生产的实际成本。第二，他说明社会怎样诱使它的商品生产者提供它所需要的事物。第三，他指出，为什么高价格是一种会自动愈合的创伤，因为它会使有关的那些行业的生产增加。最后，他指出，在全国主要生产阶层的每一级，其收入基本相同。总之他在市场机制中发现了一个使社会的供给有序的自动调节体系。

请注意"自动调节"这一绝妙的后果是，它会成为它自己的护卫者。如果产量、价格或某种报酬偏离了社会上规定的标准，自有一种力量会调动起来，使之复归原位。这是个难以理解的怪事，市场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巅峰，却成了个大家的最严厉的监工。人们也许可以对一个计划委员会的裁决进行控诉，或对一个执政的当权者乞取些恩惠，但是在市场机制的"无名氏"压力下，却谈不上什么控诉，也谈不上什么乞求。这么说，所谓经济自由就不像初看起来

那么踏实了。在市场上，你可以随己之意，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如果你所做的得不到市场的赞可，则个人自由的代价是经济上的毁灭。

情况当真是这样的吗？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在绝大程度上确是这样。当然，即使在他的时代，也已经有一些对市场制度自由运用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制造商会联合起来人为地操纵价格，雇工会联合起来抗拒由于竞争使工资降低的压力，可以察觉到的是，那时已经有一些比较不安定的迹象。那个隆姆兄弟厂不只是工业上的一个奇迹和使参观者感到惊讶的所在，它已预示大规模工业即将到来，雇主作为市场上极有势力的个人行动者即将出现，这时纺织厂里的童工，作为市场的一个因素来考虑，当然还不能认为与饮之食之并对他们加以剥削的雇主具有同等势力。尽管这些现象的预兆不祥，但是18世纪的英国，虽然不能与亚当·斯密意念中的模式完全符合，却是跟它相接近的。生意是经得起竞争的，工厂一般都是小规模的，当需求上升或下降时，价格的确会提高或降低，并且价格的确会引起产量和职业上的变动。有人把亚当·斯密的社会叫作原子式竞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上，无论在劳动力方面或资本方面，在生产的作用过程中，没有一个作用者强大到足以干预或抗拒竞争的压力。在那个社会，在一个任何人可以参加的竞赛中，每个人都为他的利己之心所驱使而竭诚努力。

那么今天呢？市场的竞争结构是不是仍然在起着作用呢？

这不是用简单答复可以说明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市场的性质已经有了巨大变化。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原子式竞争的社会，其中没有一个敢逆流而进。今天市场机制的特征是参与者在规模上的巨大，有庞大的公司，有同样庞大的工会，它们显然不是以业主和工人的个人身分采取行动的。它们单是由于规模巨大，即足以抵抗竞争的压力，无视价格信号，它们所考虑

的不是在日常买卖中眼前的情况，而是从利己观点出发的长远利益。

此外还有政府干预这一势力的兴起，改变了市场结构的范围。这一势力就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那样，不承认市场为主人，对市场往往要进行指挥而不是服从市场规律。显然，所有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市场原有的指挥作用；以后我们还要看一看当代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但是，尽管 20 世纪的工业社会有它新的特性，而利己和竞争这两大原则，不管它怎样时而被冲淡，时而被回避，仍然是行为的基本准则，没有一个当代经济学家对它们可以完全置之不顾。我们所生存的，已经不是当初亚当·斯密所生存的那个齐整的社会，但是，如果通过表面去进一步看问题，我们仍然可以隐约看到市场规律的影子。

但是市场规律只是说明了使社会产生结合力的那种行为。还得有别的一些东西，才会使它行动起来。《国富论》问世后 90 年，卡尔·马克思发出了其兆不祥的预告，说他发现了个"运动律"，说明资本主义怎样先是缓慢地、勉强地进展，然后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但是，《国富论》已经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亚当·斯密的所见与马克思的预测完全不同，在他的意念中，社会是在缓慢地、完全乐意地，但是多少有些难以避免地走向瓦尔哈拉①。

多数观察者预言，瓦尔哈拉是最终归宿。1792 年约翰·宾爵士游历英格兰北部时，他就从车窗中所见写道："啊！这里是个壮观的大厂，整个地区的宁静生活都被它搅乱了。理查德·阿克赖特②爵士对家庭和国家说来也许大有贡献，但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我对他的事业却抱有反感，不得不痛加呵斥，他的事业已蔓延到每个恬

---

① 瓦尔哈拉（Valhalla），（北欧神话），神接待阵亡将士英灵的殿堂。——译者

② 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年），英国纺织机发明者。——译者

静的角落，破坏了正常秩序和天然风光。”他到曼彻斯特时说：“唉呀，这里简直是个狗窝！”。

的确，英国的很大部分是狗窝。经过三个世纪的扰攘、使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得以成立这一事实，似乎只是为更大的动乱作准备，因为新近解脱出来的生产要素，开始结合成一个新的、可憎的形式——工厂。有了工厂，就发生了新的问题。在约翰爵士游历之前的20年，理查德·阿克赖特发明了纺织机。但是，造成了机器以后他发现，要配备工作人员却不容易。当地工人不能跟上工序的“正常速度”；而且对领工资的工作一般还加以鄙视，有些资本家新建成的工厂，却完全由于人们的盲目憎恨，被夷为平地。阿克赖特不得不求助于童工，认为“他们的小指头比较灵活”。而且由于他们没有经过农事或工艺方面的独立生活，对工厂生活的锻炼比较容易适应。结果这一行动被赞美为心地慈祥之举——使用童工不是会减轻“无收入贫民”的负担吗？

当时对工厂除了抱有既赞许又顾忌的复杂心情外，如果有什么问题足以吸引热心公益者的注意力的话，就是这个无所不在的无收入贫民的问题。1720年时，这样的人在英国足有150万；其时英国全部人口只有1,200到1,300万，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就会感到，这是个令人惊愕的数字。因此当时充满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案，但大都是一无所成的方案。贫民共有的弊病是安于现状，不求振作，一方面酷慕虚荣，竭力模仿处境胜于自己的起居习惯，模仿时心情之热烈，已达到可惊的程度。劳工们实际上是在饮茶！一般平民所喜爱的是小麦粉制成的面包，而不是传统的大麦或黑麦面包！当时的思想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所有这些现象将如何演变下去？贫民的需要对国家的福利说来，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当时有个小册子这么说，“高明的办法是解除痛苦，不是纠正弊病”。）对社会上必不可少的阶层如果听其消失，则社会将出现什么情况？

虽然对当时这一巨大、可怕的"低级秩序"问题，仍然可以用"可惊"这个字眼来描述人们对其的态度，但肯定不能用这个字眼来描写亚当·斯密的哲学。他说，"如果社会中大部分人民是贫困和痛苦的，那这个社会就肯定不会繁荣、昌盛。"他不仅作出了这样激进的论述，接下去还表明事实上社会是不断在改进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总是在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推进。它的推进，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人要这样，或者是议会通过了一条法令，或者是国家打了一次胜仗。这是由于在事物的内部有一个隐蔽的动力，它就像个庞大的发动机，会对整个社会赋与动力。

亚当·斯密在观察英国的现状时，感觉到有一个突出的事实，使他有了深刻印象。这就是，通过对劳动的细致分工和专门化，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斯密在一个制针厂里看到的是："头一个人把铁丝拉长，另一个把它拉直，第三个把它切断，第四个把它削尖，第五个把针的另一头磨光，以备安装针头；单是制针头就需要三道工序，把针头安上是一项专门工作，使之光洁是另一专门工作，甚至把针别在纸上也是一项单独工作。我曾看到一个经营这种业务的小厂，只雇用 10 个人，因此其中有些是一个人承担两三道工序的。虽然他们很苦，只备有一些必要的机器，但是全力工作时，一天可以制成针 12 磅。一磅约有中号大小的针 4,000 根以上。因此，这 10 个人一天可以制针 48,000 根以上。如果他们都是各不相谋，独自地进行制造，则每个人制成的针肯定不会超过 20 根，甚至一天一根针也制不成。"

不用说，现在的生产方式比 18 世纪不知复杂了多少倍。斯密，他尽管加以否认，但是对那个 10 人小厂所获得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所以他要加以评述，他要是看到了一个使用 10,000 人的厂，将作何感想！但是分工这一伟大发现并没有使事态趋于复杂化，而是减省了大部分的辛劳。它的优点在于能够增进斯密所谓

的“普遍的富裕程度，使富裕延伸到社会的最低阶层”。在我们今天所处比较占优势的地位来看，18世纪的所谓普遍富裕也够可怜的了。但是，如果我们用历史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把英国18世纪工人的命运，同他一两个世纪以前的前辈比较，这就很清楚，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平，但是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斯密把他的论点说得很生动：

看一看在一个文明和繁荣的国家中，一个工匠或工人在工作时所使用的设备就可以知道，为他提供这些设备的人，虽然因此所使用的精力只占其全部工作中所使用的一小部分，但是牵涉到的人数，却多得无法计算。以工人穿的一件呢制外套为例，这件东西看上去似乎很简陋，却是许多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牧羊者、羊毛的分类者、梳理者、漂洗者、染色者、纺织者、整理者以及许多别的人——这些人拥有不同的技术，必须采取协作态度，才能完成这一看起来不起眼的成品。此外为了使工人能够买到这件外套，还得有多少商人和运输业者，还得牵涉到大量商业活动和航运事业，因此还得有许多造船工人、海员、制帆者、制绳者……

同样情况，假使我们考虑一下他所使用的衣着和家具：他贴身穿的粗亚麻布衬衫、他脚上穿的鞋子，他睡觉用的床、他烹调食物用的炉子、为此需要用的煤（这得到地壳底去挖出来，也许要从水上或陆上老远的地方运来）、他厨房里的一切其他用具、他餐桌上的用具，刀子和叉子、用以放置和割切他的食物的陶制或金属制的盘子、为他准备面包和啤酒的各色人手、为了使他的屋子通光线和蔽风雨的玻璃窗、为了向他提供优美的和使人感到愉快的创造力所需要的知识和艺术……；假使我们对所有这些事物作进一步考察，就会认识到，没有盈千累万的人给以帮助和协作，这个在文明国家中极

其平庸的人就无法获得他生活上必要的供应，即使按照我们离事实很远的、极其简单的想象，他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他的供应与大人物的奢侈生活相比，无疑是非常简陋的；然而一个欧洲王子同一个勤俭的农民在供应上的相差程度，并不一定会超过后者同一个非洲的国王——他对成千成万裸体的未开化者的生命与自由握有绝对的控制权——的相差程度。

是什么力量在驱使社会，把它的财富这样惊人地增加起来的呢？部分是市场机制自身的缘故，市场在一种社会环境中会利用人的创造力，鼓励、甚至迫使他从事发明、革新、扩张和冒险。但是，在市场无休止的活动的后面，还有其性质更加重要的一种压力。实际上斯密是看到了根深蒂固的演化规律的，它推动着市场制度，使生产力盘旋上升。

规律中的第一个就是积累规律。

在亚当·斯密生存的时代，正在发展中的工业资本家是能够、并且确是从他的投资中获得大量财产的。理查德·阿克赖特年轻时跟一个理发师当学徒，于1792年故世时遗留财产500,000镑。塞缪尔·沃克开始时在罗瑟拉姆一个铁匠店里工作，身后在那里遗留下一个价值200,000镑的炼钢厂。乔赛亚·韦奇伍德于初步成立他的陶器作坊时，看见工人不好好工作，就在近旁的树干上潦草地写着"这样为韦奇伍德做活是不行的"，结果他的遗产价值达240,000镑，还有很多地产。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发财致富的机会到处都是，只要脑子灵，眼睛尖，又勤勉耐劳，就可以捷足先得。

绝大多数蒸蒸日上的资本家，其自始至终的唯一目标是进行积累。当19世纪初，为了在曼彻斯特创办一所主日学校，募集了捐款2,500镑。当时在这个区域内最大的集体雇主，纱厂主，为这个正义事业只捐款90镑。这个年轻的工业贵族对于他的资金还

有比向非生产性的慈善事业进行捐助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进行积累，而亚当·斯密对此是全心全意地加以赞可的。谁不进行积累就活该倒霉。至于“对他的资本抱自暴自弃态度的人、对于把正当基金的收入滥用于不合适用途的人说来，就像是把他先人辛苦集聚起来的资金(可以说是，其目的是要把它用于支持工业的)去浪费掉，为此他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亚当·斯密并不赞成为积累而积累。他毕竟是个学者，具有轻视财富的学者胸襟。事实是他从资本的积累中看到了对社会的莫大利益。因为如果把资本投放于机器的使用，就会促成神妙的分工，从而成倍地增长人类的生产力。因此积累成了斯密又一个有双重意义的行为，使贪得之心化为有利于社会福利的举动。斯密并不担心 20 世纪的经济学家将面临的问题：个人的积累当真会使就业增加吗？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能够无限度地改进的，市场的大小只能以它的地理上的限度为止境。斯密说，只管进行积累，这是对社会有利的。诚然，在他那个时代的生气勃勃的气氛中，对能够进行积累的那些人说来，并没有不愿意这样做的任何迹象。

但是——困难就在这里——积累不久就会达到一个境地，到那时将不可能进一步进行积累。因为积累的意思就是产生更多的机器，而机器更多的意思就是对工人有更大的需求。由此将使工资越来越高，直到利润——积累的来源——被吃光为止。怎样越过这个难关呢？

这个障碍是通过市场制度的第二个伟大规律来克服的：人口规律。

在亚当·斯密看来，工人就像任何商品一样，可以按需求来生产。如果工资高，工人的人数将增加；如果工资低则人数将减少。斯密说得很干脆，“控制人的生产的，就像任何商品一样，必然是对

人的需求”。

这个想法也并不是像乍看起来那样地天真的。在斯密的时代，在下层社会中幼儿死亡率高得惊人。斯密说，“在苏格兰高地，一个母亲生了20个孩子，而存活的不到两个，这并不算什么稀罕”。在英格兰许多地区，孩子中的半数在4岁以前死亡，差不多在任何地区，孩子中的半数只能活到9岁或10岁。在下层社会中，因营养不良、生活环境恶劣、寒冷和疾病而丧生者，比比皆是。这就表明，高工资虽然对出生率的影响不大，但由此可以使生活水平提高，改善其生活环境，使孩子成长到工作年龄的人数增加，在这方面的影响却未可轻视

结果是，如果积累的初步影响是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则这一点也必然意味着增加工人的人数。市场的作用过程也是这样。市场上的高价格会使手套的生产增加，而手套的产量扩大，也必然会压低其价格；正同这个现象一样，高工资会使工人人数增加，而人数增加对工资水平却会引起相反的压力。人口和手套生产的问题一样，就涉及工资方面的情况而论，是有自我纠正作用的。

这就意味着积累可以安全地继续下去。工资提高可以使进一步的积累无利可图，而人口增加对这一趋势却可以起缓和作用。积累会引起自我破坏作用，而正是在这一破坏过程中却得到了挽救。高工资的障碍被人口增加所克服，而正是高工资才使人口增加有了可能。在这一祸福相倚、此起彼伏的自动过程中，同一因素，似乎将使体系走到尽头时，却巧妙地把它带到健康成长所必要的道路上来，这一现象是有些迷惑人的。

现在可以看一看斯密是怎样为社会构成一个永久存在的事态的。社会就像一系列连锁的数学命题那样有规律地、必然地从开始一直向上进展。试探性的市场机制，从任何起点开始，先使劳动和资本在各种用途中的报酬归于均等，务必使所需求的那些商品

按正确的数量生产，还得保证商品的价格，通过竞争，不致脱离生产成本的范围。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社会是动态的。从起点开始，就发生了财富的积累，由这一积累所导致的是增加生产便利和扩大分工。到此为止，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出于积累的结果，当资本家为新厂物色工人时，会使工资提高。工资提高后，进一步积累时就会觉得无利可图。体系势将陷于止步不前状态。但是，工人使用他们的高工资时，会在使死亡率降低的情况下抚养他们的孩子。因此工人的来源将增加。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出于工人间的竞争，将再次压低工资。这样，积累就可以继续下去，又一次盘旋上升将重新开始。

斯密在这里所描写的并不是商业循环。这是一个长期进程，是缓慢的演变，而且是非常确凿的。假如市场机制在作用过程中是没有什么枝节的，一切就是由前一环节所决定，一经决定即不能改变。在社会内部就像装置了一个往复式机械，这时指导生产的只有民众的爱好，国内实际的物质资源则处于这一因果过程之外。

此外还可以看到，斯密认为可以预见的是，事态会不断改进。诚然，工人人口的上升，总是会迫使工资回向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但是“回向”不同于“回到”；只要积累过程在继续下去，就在“回向”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在斯密看来，是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在这一期间，实际上社会有无穷无尽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斯密并不以为这是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他读过伏尔泰的《天真汉》，他自己也不是潘哥拉斯博士①。但是没有理由为什么它不会向改善和进步的方向移动。实际上对市场机制如果听其自然，别去干扰，则伟大的社会法则自行演变的结果，必然会走向进步。

① 潘哥拉斯(Pangloss)，伏尔泰《天真汉》一书中的人物，一个幻想家。——译者

向在一般眼界以外的极远处看，可以看到社会的最终归宿。到那时，社会的资源将终于枯竭，不再能继续进行积累，“自然的”工资水平，经过一段长期的、逐渐的上升以后，将回落到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地主的日子过得很好，而由于人口众多，一般农民却不得不靠神赐的、供额有限的土地度日。资本家将遇到逆境；财富已经增加到了几乎难以数计的程度，但资本家所获得的，除管理薪给外，只有微簿的利润；他工作艰苦，报酬优厚，但肯定不是个日子过得非常奢华的大富豪。在这里，贫与富交织在一起，蔚为奇观。

但是社会要走到它最后安息处的那段路是长的，在亚当·斯密的世界和值得花费许多时间去讨论细节的那个最后落脚处之间，有许多事要做。但《国富论》是行动的方案，不是乌托邦的蓝图。

此书问世以后的获得世人接受是慢慢地来的。差不多在书出版8年之后，在议会中才有人加以引证，首先这样做的是最有权威的下院议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①]（后来他承认，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当此书得到社会的重视时，开其端者却是我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当时正在发展的资本家——要晓得，这个崛起的、顽强的暴发阶级对于经济上的平等或公正这类20世纪的想法是全不介怀的——关于他们自己对工厂法的反对，在斯密的论述中找到了完美的理论上的根据。斯密曾谈到“商人和工厂主的无耻贪婪和垄断态度”，他还说这些人“既不是、也不应当为人类的统治者”——所有这些，他们都置之不顾，他们所赞许的是斯密从他的研究中得出的伟大论点：不要去干涉市场。

斯密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一回事；他的拥护者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另一回事。我们说过，斯密不是任何某一阶级的支持者。

---

①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年），英国政治家，演说家。——译者

他是忠于他的思想体系的。他的全部经济思想导源于对市场会引导体系到达最高利润率的程度这一能力的毫不动摇的信念。市场——这个神奇的社会机构——如果不受干扰，自会满足社会的需要，此时演化规律将发生作用，使社会获得它应得的报酬。斯密既不反对劳动，也不反对资本，如果说他有任何倾向性，那么，他所支持的是消费者。他说，“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然后对于把生产者的利益置于消费者大众利益之上的那些说法痛加申斥。

但是，正在发展的实业家，从斯密对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市场的歌颂声中，却找到了他们对政府准备改善当时在制造业中存在的种种恶劣情况的初步尝试拟加以抵抗和拦阻的理论根据。斯密的理论，并不是必然会导向自由放任主义的。对亚当·斯密说来，把政府的重要意义降到最低度是最好的办法——政府是好浪费的，无责任感的，而且是非生产性的。然而亚当·斯密未必像他身后的赞赏者所说的那样，对包括以增进公共福利为目标的一切的政府行动都反对。例如，他警告国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结果，会使人孤陋寡闻，趋于愚昧，因为“大部分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必然是在工作中形成的。人的一生如果只是在完成少数几个动作中度过，一般说来，他就会变成极端的愚昧无知。除非政府采取某些措施努力防止”，否则工人的高贵品质将下降。同样情况，他是赞成推广学校教育以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的，以防止他们沦为巨大机器的一个小小齿轮。

斯密所反对的是，政府对市场结构横加干预。他反对对进口加以抑制，对出口则加以补助，反对庇护工业，使它免受竞争影响，反对政府在非生产性的用途上进行花费。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这些举动，在其思想深处所主要关心的是商人阶级的利益。当政府干预到福利事业时，到底会削弱还是会加强市场的作用过程，这对后代的理智方面会有深远影响，但斯密却从不过问这个问题。在

斯密的时代，除了济贫税之外，实际上没有什么有关福利的法规，政府是统治阶级的不加掩饰的同盟者，政府内部的主要争论是，受益最大的应该是地主阶级还是实业阶级。至于工人阶级在经济事务的管理中应否有发言权的问题，对任何高贵人物说来，简直想也没有想过。

对亚当·斯密思想体系说来的头号敌人，与其说是政府本身，不如说是在任何形式下的垄断。他说，"同一行业的人难得碰头，但是在偶然相聚时，谈话中总是归结到彼此密谋，如何进行反对公众，或者是如何设法提高价格"。这类行为所带来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们自己应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这种现象毕竟不过是人类自私生性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于它妨碍了市场流动的运转方式。斯密的想法当然是对的。如果相信市场的作用会按尽可能低的价格生产最大量的商品，任何对市场的干扰就必然会降低社会福利。在斯密的时代，如果在英国任何地方的制帽商不能收两个以上的学徒，如果在谢菲尔德[①]没有一个刃具商可以收一个以上的学徒，市场制度就不可能产生充分效益。在那个时代，如果把贫民约束在本教区，阻止他们在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去找工作，市场在需要工人的地方就找不到工人。在那个时代，大公司享有经营国外贸易的专利权，公众这就无法获得廉价外产品的充分利益。

斯密说，所有这些障碍必须消除。在价格、工资、利润和生产方面，必须让市场自由去寻找它自己的标准；任何对市场的干涉，只会损害国家的真正财富。政府对制造业的任何法令（即使要求厂家粉刷墙壁的法令，或制止雇用童工管理机器的法令）都可以被看成是妨碍市场自由发挥作用的措施，结果人们常引证《国富论》，用以反对人道主义的法规。因此，如果有人发出警告，认为如果对

① 谢菲尔德(Sheffield)，英国中北部城市，钢铁业中心。——译者

18世纪的实业表示感兴趣，一般说来就意味着对公众有进行欺骗、甚至压制的企图，这个下警告的人就会被认为是经济的"守护神"——这个想法，对此人说来，可谓不虞之誉。甚至在今天，在对斯密的经济思想不加深究的情况下，往往把他看作保守的经济学家，而事实上他对商人动机的公开敌视态度，比多数现代自由学派经济学家的这一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某种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的整个奇妙世界所证明的是，理性和秩序最后战胜武断和混乱的这种18世纪信念。斯密说，不要蓄意为善，让善行作为利己之心的一个副产品自然地冒出来。这就像一个哲学家，把这样的信念投入一个庞大的社会机器，把自私本能在合于理性的情况下化为社会品德。斯密对这种哲学信念后果的信心是确定不移的，绝对没有什么犹豫不决之处。他主张法官的报酬应由诉讼当事人支付，而不是由国家支付，这样，由于它的自身利益，就会促使他迅速处理案件。他对于所谓有限公司这一新出现的商业机构，看不到有什么前途，他认为这种非个人机构似乎很少可能会唤起必要的利己之心去完成艰巨复杂的任务。即使最大的人道主义运动，如废止奴隶制度，也牵涉到自身利益问题；亚当·斯密说，最好废除奴隶制，因为说到底，这样做也许会比较占便宜。

整个复杂的非理性化世界被简化为一个理性的框架。在此框架下，人类的分子便被很巧妙地安排在一个趋利避损的单极系统里。这一伟大的安排秩序工作，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人在从中指导，而是由于自身利益和竞争这两大因素的作用，自然会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物整理得井井有条。人能够尽最大力量去做的是，帮助这个自然的社会力量前进，消除足以妨碍这一社会的物理现象的自由演变的任何障碍，停止企图脱离它的束缚的一切不对头的努力。

尽管带有18世纪的浓厚特色：笃信理性、自然法、和作用与反作用的机械论，但是，亚当·斯密也并不是没有他的特有贡献的。不要忘记，斯密系统中最大的受益人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对日常生活的经济意义作出这样说明的还是第一次——消费者是主宰。

总的看起来，他的理论体系到今天还依然存在的是什么？

不是伟大的进化理论。我们将看到，继起的大经济学家会大大地改变这个理论。但是，我们不要把亚当·斯密的理论看成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所得出的阐述是他无法控制的。斯密是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学家；他生前没有看到市场制度受到大企业的威胁，也没有看到他的积累规律和人口规律被50年后的社会学发展所搅乱。当斯密在世时，还没有发生可以叫作"商业周期"这一事物的端兆。他所描写的世界的确存在过，他的系统化论述也为世人提供了关于它的扩张趋势的精彩分析。

然而，在斯密的观念中必然有所缺失。他虽然看到了社会的演化，却没有看到一次革命。斯密在丑恶的工厂制度中、在成立未久的商业组织的法人形式中，或者是在工人构成其保护组织的软弱无力的尝试中，没有能看到一种新型的、带破坏性的、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初步涌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研究方式是，预先假定，18世纪的英国处境将永恒不变。这种处境只会在量上发展——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财富；但其性质将保持不变。他所研究的是静态社会中的动力学；社会会成长，但永不会成熟。

但是，他进化观虽然已被广泛地修正过，他所绘制的关于市场的伟大蓝图，仍然是莫大的成就。诚然，"发现"市场的并不是斯密；别的人在他之前就指出了怎样由于自私和竞争的相互作用，会带来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但是，首先了解在这样观念下的作用的全面经济意义的，首先以广泛和有系统的方式提出一个完整方案

的是斯密。他使英国、然后使整个西方世界懂得市场是怎样使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他是第一个在他所达到的了解程度上建成一个社会大厦的。后起的经济学家对斯密对市场的描绘将加以润饰，对随后发现的一些不足之处，将急切地进行探究。但是，斯密对社会的这个方面加以描绘时的丰富多彩和生气勃勃，是没有人能赶得上的。

就斯密见识之敏锐和知识之广博而言，我们只能加以赞叹。只有18世纪，才能写出这样浩瀚而又深刻的作品。《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其它少数论文所共同显示的是，斯密绝非只是经济学家。他是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结合。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人类动机、历史阶段和经济机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伟大的自然设计师"（斯密如此自称）的计划。从这点而论，《国富论》也绝非一部最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是人类自身冒险的巨大概念的一部分。

还不止于此，《国富论》常常以它敏锐的观察使我们感到惊讶。斯密150年前就预见到了凡勃伦所看到的现象，斯密写道，"多数富人对其财富的主要享乐在于对财富的夸耀，在他们看来，当他们在富饶的程度上具有明确的标志，表明再没有人能超过他们时，其衷心的愉快是无可比拟的"。他是走在他时代前面的一位政治家；他说，"如果大英帝国的任何海外省不能对整个帝国的供应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时期就要到来，即它在战争时期就无须为保卫那些地区而负担费用，在和平时期就无须为那些地区的任何民用或军用机构提供经费，就不要再使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和设计适应附属国的平庸。"

也许将来再不会有一个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那样紧紧把握他的时代了。可以肯定，此后再不会有人在从事写作时，像他那样态度安详，不存丝毫倔强不服之心，批评时尽管深刻，而一无怨怒

之意，尽管态度乐观而一无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与他的时代具有同样的信念，实际上还有所推动。这是个人主义的时代和着重理性的时代，两者都会被滥用于最残酷、最狂暴的意图，而斯密却决不是个沙文主义者、基督教义辩护者或折衷主义者。他在《道德情操论》里说，“世上的人，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为的到底是什么？一切贪婪和雄心壮志，一切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到底会获得什么结局？”他在《国富论》里提供了答案——一切对财富和荣誉的争夺的最后理由是为大众谋福利。

斯密在晚年所赢得的荣誉和尊敬已臻于极点。伯克[1]专诚到爱丁堡去看他；他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他看到《国富论》被译成丹麦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唯独牛津大学对他不重视，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名誉学位。有一次小皮特（当时的首相）正与爱丁顿、威尔伯福斯和格伦维尔[2]会谈，亚当·斯密也被邀参加，当这位大哲学家走进屋子时，大家都站起来。他说“诸位先生们，请坐下”。皮特回答“不，我们要等您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您的门徒啊”。

斯密卒于1790年，时年67岁。奇怪的是，他的死亡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也许人们正在全神贯注地为法国大革命事变和英国农村方面可能引起的反应担优。他下葬于坎农门教堂墓地，坟上的墓碑非常不显眼，上面写着：亚当·斯密，《国富论》作者，长眠于此。很难想象一个更为持久传世的碑铭了。

---

① 伯克（Burke，1729—1797年），英国政治家，作家。——译者

② 爱丁顿（Addington，1757—1844年），英国政治家，1801—1804年任英首相；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1759—1833年），英国博爱主义者，主张废除奴隶制度；格伦维尔（Grenville，1712—1770），英国政治家，乔治三世时的首相。——译者

第四章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预测

使英国在整个18世纪期间大部分感到烦恼的，除了贫困这一无所不在的问题外，就是全国人口究竟有多少的问题。问题的可虑之处在于，在英国看来，它在大陆上天生的敌人人丁兴旺，而它自己资源贫乏，人口当在减退中。

英国对于国内究竟有多少人口心中无数，但是有些自惊自诧，以为国内人口稀疏。直到1801年，才举行了一次真正的人口调查。但当人口调查开展之际，它却被指控为“英国自由主义残余分子的颠覆阴谋”。英国关于人口状态的早期知识依靠的是业余统计学家的努力：普赖斯博士，一位不信奉国教的大臣；霍顿，一个药剂师，兼营茶和咖啡买卖；和格雷戈里·金，他是以制地图为业者。

1696年，金根据户口税和洗礼登记的记录，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1696年时约550万，看来似乎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估计。但是，金所关怀的不止是当时的情况。关于未来的展望他说，“极有可能，英国人口于600年之后，即公元2300年，将增加一倍。再下一次，即在1200或1300年之后，也即公元3500或3600年，人口将再增一倍。到那时，全国将有2,200万人”，这个制图者然后再慎重地加上一句，“这个世界料想是可以持续到这么久的”。

但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金的人口缓慢上升的预测，已为另一见解所取代。理查德·普赖斯博士以18世纪货币户口税记录与更早期的这一记录比较，断然证明，英国人口从王政复

辟①时期以来下降了30%以上。他计算的正确性显然是可疑的，别的研究者对他的研究结果激烈地提出质疑；然而当时对于普赖斯所提出的则认为是事实，对于政治上的要求则认为极其可厌。威廉·佩利，一位神学改革者，埋怨说，“人口衰退是国家可以遭到的最大的弊害，应优先考虑如何使之增进，其他任何政治意图均属次要”。佩利的信念并不是孤立的，首相小皮特甚至提出了一个新的济贫议案，其特有目的是增加人口。议案的内容是对幼儿进行大量补助，因为在皮特看来十分明显的是，一个人只要有孩子，即使他的后代会变成贫民，也会“使国家增加其充实程度”。

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人口问题的引人注目之处，并不在于作为一个国家的英国当时是否真的陷入了国势日微的危险处境，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关于人口问题的见解与坚信自然法则、理性和进步的哲学观念相协调到多大程度。事实上是，人口在减退吗？那就应该鼓励它增长，增长时应该在亚当·斯密所说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指导方针的有益启发下进行。人口在增长吗？那就很好，因为人人都认为增长中的人口是国家的一项财源。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问题，对社会的前途总是乐观的；或者换个说法，我们可以断言，在人口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人们对前途的信心的。

由这一乐观看法得出的推断，似乎再没有像威廉·戈德温那样天真、那样单纯的了。戈德温是位大臣，是个小册子作者，他看到这个尘俗的世界而感到沮丧。但是他对将来的情况所看到的，却是一片光明。1793年他出版了一本书——《政治的公正原则》，在这本书里，他对现在的一切痛加指责，但对遥远的将来则说得天花乱坠，在那时看到的，“将不再是少数富人和大批穷人。将不再

① 指1660年查理二世的复辟。——译者

有战争和罪恶，无所谓赏罚，也没有政府。此外，将不再有疾病、苦恼、忧郁或怨恨。”多么奇妙的想象！这种说法当然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他所号召的是完全平等，是最彻底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甚至婚约也将废弃。但是考虑到此书售价较高（每册价三畿尼），枢密院决定对作者免予起诉。当时在贵族客厅中相与谈论戈德温先生的鲁莽想法，一时成为风气。

其时有一个家庭也在进行这种谈论，那是在离吉尔福德不远的奥尔巴里区，那里住着个奇特的老绅士，他于1800年去世的时候，《绅士杂志》把他说成是个“地地道道的行径古怪的人”。这个古怪的人叫丹尼尔·马尔萨斯，大卫·休谟的朋友和卢梭的热烈赞赏者。他曾跟卢梭作过一次采集植物标本的旅行，并曾受赠了卢梭的植物标本簿和这位法国哲学家允请自行分送的一套赠书。他同当时为数很多的那些悠闲而又爱寻根究底的人一样，最喜欢的莫过于找个人同他讨论理智上的问题，双方辩难，喋喋不休，他通常的谈论对手就是他天才的儿子，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教士。

这时戈德温所描绘的乐园会极其自然地被提出来，供作他们讨论的题材。可以意料的是，老马尔萨斯，作为卢梭的怪特的信徒，对出于高度推理的乌托邦会倾向于同情。但是，小马尔萨斯却没有他父亲那样乐观。实际上，当辩论在进行中时，小马尔萨斯已经渐渐看到，在现实的人类社会，同永久和平与富裕的这个美好的、想象中的乐土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说服他的父亲，他把他的反对意见详细地写了下来，结果，丹尼尔·马尔萨斯对他儿子的见解所得到的印象竟这样深刻，他主张把这篇论文发表出来，并献给社会。

于是，1798年，一篇长50,000字的匿名论文公布了。它的题目是“论人口原理和它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结果，一个不切实际的

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小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他所提供的，不是欣欣向荣的辉煌气象，其景色是阴郁的，贫瘠的，使人看了灰心丧气的。

这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说，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个趋势是，人口会超过一切可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社会远不是在上升到更高水平，而是会在一个绝望的陷阱中被抓住，此时人类的生殖欲望势必把他们自己猛力推到仅仅足以生存的边缘。人类走向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一方是成倍增加的人口，另一方是不管怎样勤奋努力也不会感到富余的食物存量。

这就难怪卡莱尔[①]读过了马尔萨斯的文章后，要把经济学叫作"沉闷的科学"了，而不幸的戈德温则抱怨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

马尔萨斯在理智上压倒的一击，就破灭了走向自给自足和景色宜人的一个时代的美好希望。但是，就好像这一击还不够似的，同时有一个类型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另一个哄骗人的假设，也在准备予以致命的一击。大卫·李嘉图，是个获得惊人成就的证券经纪人，他准备提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论，这个理论虽然没有认为人类将遭灭顶之灾那种论证的引人注目，但将以它自己的温和方式，对亚当·斯密所持的乐观前景以同样的打击。

因为李嘉图所预见的乃是那种，所有的人一齐登上"进步的多级扶梯"的社会理论的终结。与斯密相反，李嘉图所看到的是这个多级扶梯对不同阶级会发生不同的效应，有些人会得意洋洋地扶

---

① 卡莱尔(Carlyle，1795—1881年)，苏格兰作家、历史家、哲学家。——译者

摇而上，直到顶端，而其他人则才登上几级，即被踢回到底层。更糟的是，使这个扶梯移动的人并没有随之上升，而从中得到充分利益的那些人，却一无所为而坐享其成。这里还要把这个隐喻更推进一步——如果你仔细看看正在登上顶峰的那些人，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扶梯上要觅得一个安全处境，就得不断展开猛烈的斗争。

对亚当·斯密而言，社会是个大家庭；对李嘉图说来，社会却是一个内部分裂的营地，他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从《国富论》问世40年以来，英国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个是正在发展的实业家，他们在忙着经营工厂，与议会取得联系，增长在社会上的威信；另一个是大地主们，他们有财有势，大都是根深蒂固的贵族，对于这些庸俗无耻的暴发户的侵占行为抱忿恨态度。

这不是由于资本家在赚钱这一事实激怒了地主，而是由于前者坚决认为粮食的价格过高这一糟透了的情况。因为从亚当·斯密以后的短时期间，英国在粮食的供应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一向是个谷物出口国家，现在却不得不向国外购买粮食。普赖斯博士虽怨声不绝，说英国人口在迅速减少，但人口的实际增长使谷物需求超过了供给，使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涨了三倍。价格上升，农业利润也跟着上升；在苏格兰的东洛锡安地区，利润和地租两者，平均占所投资本的56%；在另一个300英亩的一个农场，这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中型组织，1790年获利88镑，1803年，121镑，10年后，160镑。在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同意在过去的20到25年的时间里，地租至少已上涨了一倍。

谷价既猛涨，于是有胆量的商人开始在国外购买小麦和燕麦，把它们运入国内。地主对这类活动当然是要感到不安的。农业对贵族说来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业务——巨大的业务。例如乔舒亚·班克斯爵士于1799年，为了安顿为他管理在林肯郡

里夫斯比的产业的职员，需要用防火墙和铁门隔开的两个房间，使他感到自豪的是，需用256个抽屉来分类贮存关于农场的文件。虽然这样一个地主是靠他的田地生活的，是热爱他的田地的，虽然他天天跟他的佃户见面，跟他们一起讨论种植物的轮作事宜和施肥的好处，但是他没有忘记的一点是，他的收入取决于他售出作物时的价格。

因此，使海外来的廉价谷物泛滥市场是地主们所难以忍受的。但是，对他们说来有幸的是，要反对这种困苦的局面，抵御的手段就在手边。地主在议会占有支配势力，只须通过立法，产生一个硬性的保护制度就行了。于是通过了一个谷物法，对谷物的进口规定了一个有伸缩性的税收制度，国内价格跌得越低，则征税越高。实际上是规定了一个底价，使低价小麦永远不得阑入英国市场。

但是到了1813年，局势却变得无法控制了。坏收成和对拿破仑的战争共同促成了谷物异常的高价。小麦售价每夸特118先令，即每蒲式耳约14先令。据此，一蒲式耳小麦的售价等于一个工人的每周全部工资的两倍（试把这一点同美国的情况作一比较，美国小麦1970年以前所曾经达到的最高价格是1920年每蒲式耳3.50美元，其时每周工资平均为26美元）。

显然，谷价之高已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对此怎样应付已成为当务之急。议会仔细考虑了其时的处境，得出的决议是，对国外谷物征税还得进一步提高！其理论基础是，暂时的高价格对英国扩大小麦生产，终究会起刺激作用。

这是实业家所受不了的。资本家与土地拥有者的情况不同，他们需要的是贱价谷物，因为对工人所支付的数额，主要取决于粮食的价格。实业家所以为廉价粮食奋斗，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伦敦一个大银行家亚历山大·巴林在议会里说，“工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不论一夸特的价格是84先令还是105先令，在前

一情况下他们得到的是无黄油面包，在后一情况下得到的还是这个。”巴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管面包的价格怎样，工人所得的工资反正仅足以糊口，再没有别的。但是从需要发放工资和追求利润的那些人的观点来看，谷物——和工资——是贱还是贵，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商界组织起来了，议会发现申诉书如雪片飞来，其情况为前所未见。鉴于国内的情势，感到新的高税谷物法有些行不通了，非得加一番考虑不可了，于是在下院和上院任命了两个委员会，把问题暂时敷衍下去。幸而拿破仑于下一年战败，谷价又降低到比较正常的水平。但是对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说来这是一个标志，还得经过 30 年，谷物法才会最后取消，才会允许廉价谷物自由输入不列颠。

不难看出，为什么大卫·李嘉图在这样一个危机发生的时期中从事著述时，会用与亚当·斯密完全不同的、比他悲观得多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学。亚当·斯密从社会中看到的是一场伟大的协奏曲，而李嘉图看到的却是艰苦的斗争。在《国富论》的作者看来，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人人会分享上帝恩惠的一份；在大致 50 年后一个证券经纪人的写作中见到的是，社会不仅分裂成敌对的团体，而且似乎难以否认的是，在斗争中合法的成功者——勤勉的实业家也必然要失败。李嘉图认为在社会进展中的唯一受益者是地主阶级——除非能够破坏它对谷物价格的控制。

他于 1815 年写道，“地主的利益是始终与社会中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对立的”，由于这一明确的判决，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变成了公认的内乱。经过这样公开的宣示以后，关于这个世界毕竟会变成最合理的世界的最后一点希望就完蛋了。现在看来似乎是，社会即使没有被淹死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稠密的沼泽中，为了在大卫·李嘉图的不可靠的、移动的扶梯上占得一席安全之地，它在

搏斗中也将被扯得四分五裂。

我们对于这位悲观的教士和这位抱怀疑态度的证券经纪人的非常使人不安的见解，得进一步仔细的考察一下。但是，可以先看一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像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在背景和经历上相差得这么远的这样两个人，是很难想象的。如我们所知，马尔萨斯是英国上层阶级一个行为古怪的人的儿子；李嘉图是从荷兰移入的一个犹太商人—银行家的后代。马尔萨斯是在一个富有哲学思想的父亲的亲切指导下准备进入大学的（他父亲的教师之一，曾因表示希望法国革命者入侵和征服英国而被监禁）；李嘉图14岁时即在他父亲身边工作。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他是个职业经济学家，在一个建立在靠近东印度公司的海莱伯里地区的学院里教学，训练东印度公司年轻的行政官员，而李嘉图于26岁即开始独立经营业务。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起来；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在财务上独立，他开始时有资本800镑，当他于1814年42岁引退时，根据不同方面的估计，有财产50万到160万镑。

说也奇怪，马尔萨斯是个院士，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李嘉图是个经商的，却成了个理论家；这位从事商业者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最后的一个矛盾是，马尔萨斯收入无多，却为有钱的地主辩护，李嘉图是个富翁，后来他自己也成为大地主，却同地主的利益作对。

他们的背景、经历和受到的锻炼都不同，因此，他们的表现也完全不同。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的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则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他又说，"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

有被人饶放。30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

这样的谩骂必然要落到一个主张“精神抑制”的人的头上。然而，马尔萨斯既不是个过分拘谨的人(按照他的时代的标准来说)，也肯定不是个残暴之人。诚然，他主张废除济贫税，甚至反对为工人阶级进行的住房建筑计划。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内心的对贫民阶级利益最诚挚的关怀，跟某些他同时代的社会理论家认为可以让贫民平平安安地死在大街上的冷酷无情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马尔萨斯的态度与其说他缺乏同情心，不如说他具有高度的逻辑头脑。按照他的理论，根本的困难在于世界上人口过多，倾向于促进“提早结合”的任何做法，只会加重人类的苦难。人类在饮食男女的大欲之前是无法抵拒的，不是靠慈善事业所能援救得了的，由于人类将继续繁殖，这样的慈善事业只是在伪装下的残忍。

但是逻辑不一定会受到欢迎。一个指出社会结局黑暗的人，很难指望会赢得大众的尊敬。没有一种学说受到过这样的谩骂：戈德温说“马尔萨斯的理论所要展示的主题是要证明，那些致力于人类社会有一个可观和基本的改善的人们的错误，是多么的有害”。正鉴于此，马尔萨斯被排除在正派的思想家之外并不令人吃惊。

另一方面，李嘉图可以说是一开头就走好运的人。他在血统上是犹太人，他摆脱了家庭，接受了教友派教义，娶了个他所钟爱的漂亮的教友派姑娘，结果可以说，他在社会地位上和个人的种种方面都已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应邀为议院的两派说话时，他说，“当我听到自己的嗓音时，禁不住感到惊慌”。在场者所得到的印象则各不相同，有的人说他的声音有些“尖锐刺耳”，有的人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不管怎样，当他说

话时，议院是留神听的。他分析问题时，态度诚恳，才华横溢，他无视事态的颠倒反复，只是集中于基本的社会结构，有人说，"他说话时好像是从另一星球中掉下来的"，结果，他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他是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坚决拥护者，是议会腐败和天主教迫害的反对者——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值得怀疑的是，钦佩他的人读他的文章时，究竟懂了多少，因为再没有比李嘉图文字更难懂的经济学家。但是，文词也许很复杂，使人难以捉摸，它的含意是清楚的——资本家利益和地主利益的对立是不可逆转的，地主的利益对社会是有害的。因此，一般实业家不管对他的文章了解不了解，他已成了他们的战士；政治经济学在他们一伙里受到了这样的欢迎，以致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要查问，她们会不会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们。

李嘉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尽管备受人们的崇敬（虽然他是个极其谦逊和性情孤独的人），而马尔萨斯则备受揶揄，但是，后者关于人口的文章则广被传阅并受到赞美，然后又一再受到反驳，反驳时情况的激烈即足以证明，他的论点是有分量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马尔萨斯对经济学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则人们淡然处之，即使偶尔浏览，也是出于一种忍让精神，姑且展卷一读。马尔萨斯有一种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处得都不好的感觉，但是他完全不能用清楚的逻辑方式把他的论证提出来，他甚至以标新立异的态度，说这种沮丧情况（他把这一点说成是"普遍的过剩"）会倾覆社会，而李嘉图则可以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对现代读者说来，马尔萨斯的这个说法会多么使人恼火！他是偏于直觉的，是重视事实的，他生性会惹事生非，他头脑不清的讲解，在那位具有光彩夺目的才华的证券经纪人面前，将无可抗御，后者只是作为一个抽象的伟大结构来

理解这个社会的。

他们之间展开了在一切有关方面的争论。1820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篇幅摘录了这位教士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观点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从而轶出了他著作的本题之外。

最奇怪的是他们两人在私交上却很亲密，是要好的朋友。李嘉图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在金银价格问题的精彩的书信之后，他们两人于1809年相遇，然后两人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先生（他竟敢冒冒失失地表示出来）的反对意见。起先是詹姆斯·穆勒，然后是马尔萨斯，发现了写这些书信的作者，这三人从此结为知交，一直持续到终生。一连串的通信在他们之间交流着，彼此之间不断地进行访问。玛丽亚·埃奇沃思，一位同时代的作家，在日记中说，"他们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

他们所进行的并不都是严肃的讨论，他们都是很通情达理的人。马尔萨斯不知是为了遵守他的理论还是为了别的原因，结婚得很迟，但他很喜欢参加社交集会。他故世以后，有个认识他的人回想他在东印度学院的生活情况时说，"那些悄悄的戏谑之言，那些外表上的敬意，年轻人偶尔爆发的'造反行动'，那位波斯教授奇特的文雅举动，以及带些老式的那些夏夜聚会，现在这一切都已成陈迹了"。

一些小册子作者把他比作撒旦，但马尔萨斯是个漂亮的高个子，为人彬彬有礼，他的学生在背后管他叫"大爷"。他仪表上有个缺点——缺唇，那是从他远祖遗传得来的，他的话有时会使人难以听懂，在字母L上发音有困难，有一次他对着一位有地位而听觉有毛病的夫人的助听器说：您想去看一看基拉尼湖吗？"她听不懂这

句话，一时显得很窘。这个发音上的缺点和他的名字与人口过剩问题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使他的一个相识这么说：

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在这里。我为他邀来了一些可人意的未婚男女款待他。他是个温厚的人，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只要不触及人口过剩问题，就不会发生任何可能有的不愉快情况。……马尔萨斯是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假使我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能具有像他那样的智慧，就是说话时口齿不清些我也不在乎。

李嘉图在家里也喜欢招待客人，他的早餐是有名的，他似乎很爱好猜谜之类的游戏。埃奇沃思女士在她的《生活与文学》中谈到了他生活的一个侧面：

花花公子——史密斯先生、李嘉图先生、范妮、哈里特和玛丽亚这一伙人都得意洋洋，去寻欢作乐，有些人还在梳妆打扮。李嘉图先生有时独自地昂首阔步而行，像个花花公子，样子很滑稽可笑。

作为一个商人，他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他的兄弟写道："他治产致富的能力并没有受到人们多大重视，大概最能显示他过人的才华的，莫过于他的经商能力。他在业务上一切细微曲折的知识无所不备，于计算数字时具有惊人的速度。关于他自己的巨额交易，他具有可以不费什么气力而从容办妥的能力。他镇静、沉着的态度和敏捷的判断力，使得他在证券交易所的同事们远远落在他后面"。后来他的儿子还说，他父亲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他具有过人的观察力，一般人都把事态的重要性过于夸大。他说，"一般人做证券交易时假使都能像他父亲所见到的那样，价格涨落的幅度就会小些 他买进，是由于他知道，未来的过度的涨势会使他获得利润．当证券在下跌时他卖出，是由于他深信，惊惧和恐慌会使价格低落到基于情势没理由跌到那样低的程度"。

这是个难以理解的颠倒的安排——一个偏重理论的证券经纪人与一个偏重实践的神学学者。尤其不可理解的是，这一个对银钱业务非常内行，而那一个讲求事实和数字的人，对此却茫然不知所措。

当拿破仑战争时，李嘉图是银行团内一个公债承购者，这个银行团向财政部购入债券，然后把它们陆续提供给认购公众。李嘉图为了照顾马尔萨斯，时常为他做些小额债券交易，使他能够博得些微利。在滑铁卢战争前夕，马尔萨斯在交易所的交易，正处于小额“多头”地位而使他感到神经紧张。他写信给李嘉图，“除非这样做是错误的或给您带来不便……，还是尽早趁机把您许诺给我的股票卖出，以便多少赚点。”李嘉图照他的嘱咐做了；但是他自己由于职业投机者所具有坚强的持久力，不但不结束交易，而且继续买进，使自己处于最大限度的多头地位。威灵顿胜利了，李嘉图满载而归，而可怜的马尔萨斯则错失良机。李嘉图曾漫不经意地写信给这位教士，“这次由于价格上升而获利之丰，如我所预料或希望的一样。在债券上我一向是个大赢家。现在谈一谈我们谈惯的论题”，于是又投入了商品价格上升时理论上的意义的讨论。

他们之间无休无止的讨论，通过书信和访问，就这么持续下去，一直到 1823 年为止。李嘉图给马尔萨斯最后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他突然于这一年死去，时年51岁。马尔萨斯则一直活到 1834 年。至于他对大卫·李嘉图的看法：“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虽然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但是关于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所说的，彼此的意见却没有分歧。这是由

于马尔萨斯有名的《论人口原理》于1798年出版以后，似乎不仅是已经彻底阐明了问题，而且对于困惑着英国社会的可怕而持久的贫困现象，也已作了详细说明。有的人已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人口和贫困两者似乎是互为因果的；还会由此联想到当时流行的一个不足凭信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叫胡安·费尔南德斯的，把两只山羊运到智利沿海的一个岛上，希望将来在岛上有羊肉可供食用。后来回到这个岛上时他发现，山羊已经增殖到出于情理之外的程度，于是又运去了两只狗，它们也在繁殖，从而削弱了山羊的增势。詹姆斯·汤申德牧师写道，“这样就恢复了一种新的平衡。两种中最弱的先死，那些最有活动力、最壮健的则保全了它们的生命”，他还加上一句，“调节人类多寡的是食物的数量”。

这个范例虽然意识到平衡必须由自然来安排，但是仍然没有得出暗含在问题之内的、最后的决定性结论。这是要留给马尔萨斯来做的。

他是从带有某种魔力的包含在加倍增长这个概念之中的、纯数字上的可能演变开始的。他对繁殖的令人惊愕的增殖力的重视，获得了后起学者们的充分支持。有一位生物学家计算了一下，假使有一对动物，一年生10对，那末在20年后，其后代将达700,000,000,000,000,000个。哈夫洛克·埃利斯[①]说，一个微小的生物体，假使在其繁殖中不受妨碍，则30天后，其后代将成为一个比太阳大百万倍的一个莫大的体积。

但是，关于自然生产力的这类示例，就其本身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类的正常生殖力究竟有多大？马尔萨斯的设想是，人口在25年内增加一倍。按照他的时代说，这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设想。这需要一个普通的家庭有6个孩子，假定其中有两

① 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年)，英国心理学家，作家。——译者

个在达到结婚年龄之前死亡。关于美国，马尔萨斯指出，在前一个半世纪中，其地人口事实上每 25 年增加一倍，在某些边远的落后地区，生活比较自由，比较有利于健康，其人口每 15 年增加一倍！

但是与人类的增殖趋势——不管是 25 年还是 50 年增加一倍，对这里的论点是无关紧要的——对照，马尔萨斯反对那个无情的事实，即土地与人不同，是不能增加的。通过勤奋努力，土地是可以增加的，但进度缓慢，而且颇多周折，与人不同，土地是不能生育的。因此，人口会按几何级数增加，而可耕地的量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

结果当然，人口迟早必然会超过食物量。马尔萨斯在《论人口原理》里写道，"拿全世界来说，假定现在人口是 10 亿，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 的系列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 1、2、3、4、5、6、7、8、9增加。两个世纪之后，人口与食物之比将是 256 比 9，三个世纪之后将是 4096 比 13，两千年之后，差距之大将无法计算。"

对未来的这样一个可怕的观念，足以使任何人听了不寒而栗。马尔萨斯说，"这个观念是充满了阴暗色彩的。"这位烦恼的教士不得不断言，这种人口与粮食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只会引起一个结果——使人类的大部分永远沦于某种困境。不管怎么样，这个巨大的、而且一直在扩大中的裂口必须把它堵塞起来，人缺了食物毕竟是不能生存的。因此，在原始社会中有杀害婴孩的风俗，因此有战争，有疾病，首先还有贫困。

如果这还不足，"饥荒似乎是大自然的极可怕的最后一着。由于人口的力量超过了地球上向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力量，人类就必然要发生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的夭折。人间的不道德行为是很能起作用的，因此，自会想方设法来减少人口。如果通过这类斗争还不能奏效，那么，易致疾病的气候，流行性传染病，瘟疫会列队而

进，把盈千累万的人一扫而光。万一这类情况的有效程度仍然不十分显著，那么，还有无法规避的、大规模的饥荒在后面，在它的大力一击之下，使人口与食物两者相抵于平”。

难怪可怜的戈德温要抱怨说，马尔萨斯把进步的同情者变成了进步的敌对者。因为这的确是个使人绝望的理论。人类经常处于由于他自己的压力而被淹死的威胁中，除了靠“道德上的约束”这根弱不禁风的小草之外，没有——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行挽救。要靠道德上的约束来对抗男女之间的大欲，怎么靠得住呢？

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吗？

就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而言，世界人口增长的一般趋势，至少在欠发达世界，似乎是符合他的预言的。当时，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如果在后50年里，人口增长的势头得不到抑制的话，那么世界人口将高达200亿—— 5倍于1970年的人口。

今天，钟摆似乎又摆向另一边。事实上，关于人口问题的思想总是在两种极端间摆动；令人惊疑的是，在他那著名的论文第二版中，马尔萨斯本人就变得较为乐观，这距其第一版只有5年。当时马尔萨斯是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想法上面，即劳动阶级会通过推迟婚龄而学会自觉的“控制”。

当代谨慎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大幅度的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革命、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中，绿色革命带来了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印度目前已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并成为中等的粮食出口国。所以，虽然农学家每年仍在焦虑等待着好收成，全球灾荒的悲观前景——这是马尔萨斯供与求的代数学引起的——却不再被人们看作真实的预测。20世纪80年代被埃塞俄比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人类悲惨画面所惊呆了的电视观众虽没目击马尔萨斯的预言成为现实，但却看到了当地恶劣条件，如旱灾和简陋的交通网所造成的结果。

然而，更需要摆脱的不是粮食生产的增加，而是马尔萨斯的幽灵。专家们警告道，即便全球灾荒似乎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然而，人口压力却仍是急迫的。联合国以目前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为基础，作出了一个预测，认为印度50年后的人口将像中国那样多，孟加拉人口要增长两倍；而肯尼亚要增长4倍。这些数字也许不意味着灾荒，但却意味着沉重的社会问题，例如日益增长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而涌入城市。在一次于1981年召开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诺贝尔专题讨论会上，统计学家谈到了不发达国家中15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特大城市人口的可怕增长。一个观察家评论道："像疥疮那样不断蔓延，这些人类的拥挤地区肯定会对世界产生严重的政治挑战。""如何能使城市大众免除这种冷酷的腐败，或者如何免除专制和无序的诱惑？"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忘记马尔萨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人类先天性的指数增长内在地具有超过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能力。于是，仍有必要像把握等式的供给方一样来把握需求方。需要做的就是像增加粮食生产那样控制人口的生育。

世界范围的人口控制是可能的吗？令人惊异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回答之所以使人感到惊奇，是因为人口统计学家怀疑人口"疾病"困扰着的国家能否克服农民的无知、有组织的宗教抵制和冷酷的政治诸障碍。现在，乐观的气氛在增加。像墨西哥和中国这样不同的国家，都已经从忽视或彻底的抵制转向热情的生育控制。即便长期使人口统计学家感到失望的印度也决心——甚至有时是无情的——引入计划生育。

努力开始有所收获。1970—1975年间，尽管灰暗情绪流行，人口增长率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降。当然，人口增长已没有停止——联合国的人口专家指出，世界人口将从现在的50亿增长到100亿，那时它才会停止增长。然而，至少和最终，增长率正在放

慢，稳定态将在下一个 20 年中出现，这是一个十年前不可思议的成就。

问题是胜利不能公平分享。例如在西欧，我们实质上已经是 ZPG——人口零增长。在美国，关于未来人口的预测正在稳步减少，我们现在的预期是，2020 年美国将有 2.5 亿人口，这是一个虽增加拥挤但尚不会危及我们生活质量的数字。

然而，对粮食最为短缺的世界最贫穷地区而言，预测不是这样确定。在那里，出生率也缓慢下降，然而下降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并且起点很高。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而言，马尔萨斯幽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消失。

奇怪的是马尔萨斯没有关注那些人口问题今天变得非常严厉的地区。他考虑的只是英格兰和西方国家，而不包括东方和南方大陆。所幸的是马尔萨斯搞错了。在英国，1860 年，有 60%以上的夫妇育有 4 个以上的小孩；但是，到了 1925 年，只有 20%的夫妇育有 4 个以上的小孩。而在同时期，仅有 1 个或 2 个小孩的家庭却从 20%增加到 50%以上。

是什么东西将西方从马尔萨斯式人口倍增再倍增的恶性增殖中拯救出来呢？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原因：我们尚未完全清楚人口的成长率。当然，生育控制毫无疑问起了主要的作用。生育控制原来是叫做“新马尔萨斯主义”，无疑的，此种称谓是会令马尔萨斯不满的：因为他本人是十分不赞成这种方法的。实际上，有史以来上流阶级似乎一直在实行生育控制，这是为什么富人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多的原因之一。由于英国和西方的财富逐渐增加，穷人就不仅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像富裕阶级那样控制他们子孙的繁殖。

使马尔萨斯预言在西方失效的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是巨大的城市化运动。在农村，孩子是资产，而在城市孩子则是负债。于是，

经济的考虑加上日益增长的生育控制的知识阻止了可怕的人口爆炸的出现。

于是，这种悲惨的前景在英国没有出现，马尔萨斯计算的可怕逻辑只限制在财富和进步滞后的地区。当然，在马尔萨斯时代，没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出现。尽管对此有严重的误解和谣传，即把人口统计看做实行军事独裁的前奏，英国在1801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约翰·理奇曼 (John Richman)，一个公务员和统计学家估计，英国人口在30年内已增加了25%。虽然人口没有成倍增加，但是，毫无疑问的，设若不是由于大众贫穷与疾病之故，英国人口将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增加。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未来的生育率会下降；一般皆认为英国将永远面临可悲的贫穷问题——而它完全是源于不断增殖的人口拼命地在求取不足的粮食供应。在这种情况下，贫穷已似乎不是偶然造成的，亦非上帝的意旨，或是由于人类本身漠不关心所致。它毋宁说是某种恶毒的天意在谴责人类，使其陷于永恒悲惨的境地里，好像由于大自然的吝啬，人类朝向自我改善的一切心血，最后几乎都变成一场闹剧。

这一切皆是十分令人丧气的。佩利(Paley)这位曾敦促“人口的大量增殖，应优先于其他任何政治目的”的神学家，现在也不得不投效于马尔萨斯的旗下；皮特(Pitt)，这位曾希冀以更多的人口来壮大英国国力的首相，现在也不得不遵从马尔萨斯的意见。撤回提高贫民救济金的法案。柯尔雷基 (Coleridge) 曾将这种可悲的情景综述如下。“最后，看看这个强大的国家，”他写道：“它的统治者及一切贤达之士，皆不得不听命于马尔萨斯(和佩利)！这是可悲的，太可悲了。”

任何人，只要听了马尔萨斯的话之后还没有感到十分沮丧，就只能转而求助于大卫·李嘉图。

乍看起来，在李嘉图笔下的并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世界，至少

并不比马尔萨斯的世界更可怕。在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内阐述的是一个干巴巴的、贫乏的和浓缩的理论体系，这里没有充满活力的叙述，也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的写实性的细致描绘。这里有的只是原理，是一个有才智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比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为稳定的一些现象作出解释时提出的抽象的原理。同欧几里得所提出的那样，他所提出的是基本性的，不加渲染的和有一定结构的，但是与一套纯几何学上的定理不同，这个体系是有人情意味的，是个悲剧性的体系。

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就得花点时间先介绍一下剧中的主要角色。这些角色并不是我们所惯说的人，只是些典型。这些典型也不是按照这个词的日常意义来说的有生命的，它们所遵循的是“行动的法则”。这里没有什么亚当·斯密世界的那种喧闹和奔忙；我们所看的是一种典型的木偶戏，把现实世界化为一种一度空间的漫画，这是个把一切都剥去，只剩下经济动力的世界。

我们遇到的是些什么角色呢？首先是工人，是经济活力的无差别的单位，他们唯一有人性的方面是，无望地醉心于在委婉的说法下的所谓“家庭生活的快乐”。这种不可救药的爱好的结果是，工资每一次增长，便会带来人口的增加。亚历山大·巴林说，这样，他们就只能啃黑面包。从长远观点看，由于他们自己的弱点，他们就注定要处于仅能维持生活的边缘。李嘉图跟马尔萨斯一样，认为只有“自我克制”是解决工人大众的问题的唯一办法，他虽然对工人是具有良好愿望的，但是对自我克制的力量没有多大信心。

其次要遇到的是资本家。他们不是亚当·斯密笔下的隐相合作的商人。他们是成熟的人和始终不会变的那一类人，他们在世界上的全部意图就是进行积累，就是节省利润以便供作再投资，从而雇用更多的人为他们工作，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个可靠的

办法。但是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们之中如果有一个发明了一种新的制作方法，或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商业门路，因而使这个幸运儿大有所获时，通过他们同道之间的竞争，一些不当利得，很快地就会化为乌有。其次，他们利润的多寡，主要取决于所支付的工资，我们将看到，在这方面会引起很大的困难。

到此为止，除了现实的详细叙述这一点之外，跟亚当·斯密的所述，离开得并不十分远。当李嘉图谈到地主时，事态才会变了样。

李嘉图把地主看作社会组织中唯一的受益人。工人从事工作，为此他取得了工资；资本家是一场戏的主演者，因此他取得了利润。但地主的利益是靠土地之力得来的，他的收入（地租）既不是出于竞争，也不是出于人力。实际上，他的收入是在损害别人的利益下得来的。

我们得暂停一停来了解一下，李嘉图是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原来他对社会的病态的看法是来源于他对地主的地租所下的定义。在李嘉图看来，利息是使用资本的代价，而地租却并非仅仅是使用土地的代价。地租是一种性质极其特殊的报酬，是来源于所有土地的生产力并不是相等的这一可证明的事实。

李嘉图说，假定有两个邻近的地主。一个地主的土地比较肥沃，由100个人使用一定量的设备进行耕作，可以生产谷物1,500蒲式耳，另一个地主土地的肥力较差，使用同样的人数和设备，只能生产1,000蒲式耳。这不过是出于大自然的技术上的事实，但是会带来经济上的后果：在那个幸运的地主的土地上所产生的谷物，其每蒲式耳的价格将较贱。很明显，由于两个地主所支付的工资和资本的成本必然相同，那个多收获500蒲式耳的人，与他的对方相比，将居于有利地位。

根据李嘉图的说法，地租就是由这个成本上的差异发生的。如果需求很大，足以使得在生产力较低的那块田地上值得进行耕种，则在生产力较高的田地上耕种，肯定将变得非常有利。实际是，两块田地间利益的差距越大，则地租的差距越大。举个例，如果在一块瘠土上，按每蒲式耳2美元的成本种植谷物，可以勉强获得一点利润，那么，一个幸运的地主，在其肥土上按每蒲式耳0.50美元的成本即可生产谷物时，他肯定将获得大量地租。由于两个农场是在同一市场上以同一个价格(比如说2.10美元)出售其谷物的，那个较优土地的所有人将把这一成本上的差额1.50美元收入私囊。

所有这些，听来似乎极其平淡无奇。但是，试把这个说法应用到李嘉图所设想的世界，其不愉快的后果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李嘉图看来，经济世界在不断地倾向于扩张。资本家在积累，他们在建立新店和新厂。因此，对劳动者的需求在增加。这就会使工资提高，但这时的现象是，因为工资增加，不久就会诱使不可救药的工人阶级去尝一尝家庭社会的那种内藏祸机的快乐，从而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使更多的工人泛滥于市场。但是(这是李嘉图的世界跟亚当·斯密有希望的前景离开得最远的地方)人口既然在增长，就有必要进一步伸展耕作的界限。人口愈多则需要谷物愈多，因此需要的田地也愈多。十分明显，新开辟的田地生产力必然没有已经在使用的那样高，因为农民于选择土地时不会那样笨，会留着好土地不用而先用差的。

这就表明，当人口在增长时，使用的土地越来越多，谷物的生产成本将继续增高。当然，谷物的售价也将提高，此时，处境优裕的地主的地租也将跟着提高。不仅是地租，工资也将提高。因为谷物的价格提高后，就不得不提高工资，使工人能够买得起黑面包，把他们的生活维持下去。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悲剧是怎样展开的。资本家——他首先是对社会发展负有责任的人——现在却处于受到两面夹攻的境地。第一，由于粮食涨价，他得支付较高的工资。第二，由于越来越差的土地在陆续投入使用中，优质土地的地租在提高，因此，地主的处境远比从前优越。地主在社会的成果中所享有的份额既增加，只有一个阶级能够被挤在一旁，让出空位给他，这个阶级就是资本家阶级。

这个结论，跟亚当·斯密谈社会发展的壮观场面时的情况，相差得多么大！在斯密的世界，随着分工的进展，社会的日益富裕，各个人的日子都会一天天好过起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一结论是与斯密不能预见到土地是社会进步的瓶颈有关的。

与此相反，在李嘉图的世界里，居于有利地位的只有地主。可怜的工人则永远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上，跟在每一次工资提高的后面的总是一群孩子，因此工资都被孩子的增加抵消掉了。资本家经过工作、节省和投资，到头来他的一切辛劳只是一场空：他的工资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而他的对手——地主，却比他富裕得多。地主可以一无所为，只是收他的地租，他稳坐泰山，眼看他的地租日增月涨。

这就难怪李嘉图要反对谷物法了（同时他还表明，通过自由贸易，会使英国获得廉价谷物）；也难怪地主要倾其全力地奋斗30年，一心想把廉价谷物排斥于国门之外了。新兴的实业家从李嘉图的说明中看到，他的理论正合他们的需要，这是多么自然的现象。低工资是不是应当由他们负责呢？不，这只是由于工人自己的盲目性，使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增加。那么，对社会的发展，他们是履行了责任的吗？是的。那么，他们花费了精力，把利润节省下来，以进一步扩大他们在生产上的冒险活动，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吗？他们从一番辛苦经营中所得到的只是，眼看地租和货币工资在增

长，而他们自己的利润却在萎缩。推动经济机器的是他们，而地主只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享受一切的快乐和报酬。的确，一个敏感的资本家会扪心自问，这样的事值不值得干下去。

这时除了教士马尔萨斯，谁会挺身而出，说李嘉图对地主的看法有欠公道？

让我们记着，马尔萨斯不只是一个人口问题专家。他首先是个经济学家，关于地租的理论，在李嘉图自己还没有提出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前，他事实上已经提出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跟他的朋友所得出的不同。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发表于李嘉图的书出版后的3年）里说，“地租是现在的辛勤和智慧以及过去的力量和技巧的报酬。当购入土地时，总是连同在土地上所花费的劳力和才能一并购入的”。马尔萨斯还在一个脚注内加上一句，“事实上李嘉图自己就是个地主，是就我的意思说来的一个好榜样”。

这不是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反驳。李嘉图并没有把地主描绘成一个阴险、作恶的人物。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地主经常改善他的土地的生产能力。虽然他指出，地主这样做是扮演了资本家的角色。然而，他用不可辩驳的逻辑指出了，作为土地所有者，即便忽略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也会坐享谷物高价之利。没有任何个人意志在起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力量使地主阶级处于坐享社会成长之利益的地位。

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去描写他们反复辩难的细节。重要的是，李嘉图对地租所设想的那些可怕的暗示，从来没有实现。实业家后来终于压倒了地主的权力，终于达到了使廉价粮食得以输入的目的。在李嘉图时代，当麦价将上涨到可怕的高峰时，在数旬之内即恢复常态。同样重要的是，人口从来没有增长得快到使国内的资源难以应付的程度。因为根据李嘉图理论，地租起因于优质土

地与劣质土地之间的不均等，如能控制住人口问题，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不会发展到使地租收入引起社会惊慌的地步。但是，试想一想，假使英国人口达到一亿，并且不得不全部用国内农产品供应其所需，它今天将居于何等处境。再假定，它的谷物法一直没有撤消。那时，李嘉图所描绘的由地主控制社会将成为可怕的现实，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在现代西方世界，地租差不多已成为一个专供学术上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不是由于李嘉图的分析有欠正确，我们能免于遭受李嘉图所述的困境，只是由于工业生活展开的迅速，使我们得以从马尔萨斯所看到的悲剧中得到挽救。工业制度不仅在生育上起了"刹车"作用，而且大大提高了我们从土地上生产粮食以供处理的能力。

同时，马尔萨斯感到还有一个值得关怀的原因。他担心的是他所谓的"普遍过剩"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况——商品充塞而得不到买主。

这样的想法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在李嘉图看来，这是难以置信的荒谬之谈。英国在商业上是有过风波的，但所有这些都显得是有些特殊原因可以追查的——银行破产，无理由的投机爆发或战争。更加重要的是，李嘉图以他严正的心情，认为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是决不会发生的。

李嘉图的论证被一个叫 J.B.萨伊的年轻法国人所看到。他提出很简单的两点。首先他认为商品的欲求是无限的。亚当·斯密说过，对食物的欲求可以受到一个人的胃的容量的限制，但是，他对衣服、家具、奢侈品和装饰品的欲求似乎是大得不可计量的。李嘉图和萨伊都认为，不仅需求是无限大的，而且购买的能力也是有保证的。因为生产每件商品时总有些花费，总是有它的成本的，而每一项成本所体现的总是某人的收入。不管这项成本的形式是工资、地租还是利润，其售价所得自然会增加某人的收入。既是这

样，怎么会发生普遍过剩的情况？商品是存在的，对它们的需求是存在的，购买它们的收入也是存在的。只是纯反常行为才会使市场找不到需要出清存货的买主。

虽然李嘉图认为这个说法从表面上看是正确的，但马尔萨斯却不是这样。要驳倒这个论点并不容易，因为它在逻辑上的确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马尔萨斯从以商品换收入这一方面看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他说，通过储蓄这一行为，会使供给超过需求；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在今天看来，这似乎又是一个已经研究得富有成效的问题。李嘉图直截了当地说这都是些废话。他在一张便条里说，"马尔萨斯先生似乎从来不记得储蓄就是花费，跟专门称之为花费的花费一样地确凿无疑"。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所以会不怕麻烦地把他的利润储蓄起来，无非是为了要把它重新用于实业去赚取更多的利润，如果认为此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说法使马尔萨斯陷于窘境。他同李嘉图一样，认为储蓄的意思就是花费——指的当然是实业目的上的花费。但是，虽然如此，在他的论证中似乎还有些什么——只要他能够指出来。结果他从来没有能够这样做。例如，他在写作中表明，积累并不是像李嘉图所想的那样完全具有必要性：

有许多商人虽然有大量财产，但是在他们取得这项财产的期间，几乎难得有一年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他们在奢侈品、享乐品和馈赠品这些方面的支出的。

李嘉图对此用铅笔写了下面一段话，痛加驳斥：

说得对；但是，假使一个同业商人取得的是同样的利润，却不愿意增加在奢侈品、享乐品和馈赠品方面的支出，那么，他的财富与所说的那个商人相比，将增加得更快。

可怜的马尔萨斯！他在往返辩难中是没有获胜希望的。他的论证已经陷于混乱状态，这点他自己也许已感到。他曾经写道："当我仍未为李嘉图先生的逻辑折服的时候，但有时却几乎被他的权威动摇了，因为我对他那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天赋评价极高，并深信他对真理的热爱和真诚。"遗憾的是，几十年来马尔萨斯从没能使他的推理一致或使人全部理解。因为他感到的困惑是要在某一天才会引起经济学家注意的一个现象——繁荣与萧条的问题；而李嘉图所着手处理的却是与此全不相干的另一问题。在马尔萨斯方面，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存在那里的有多少？"在李嘉图方面，他所注意的是一个更加富有爆炸性的问题，"各自所得到的有多少？"这就难怪他们要各执一词，争得无休无止，他们所谈的原来是不同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当所有这些争论都已过去之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究竟是什么？

李嘉图所提供给世人的是很清楚的。他把世界的外象剥去，把它的本质显露出来，让大家来检查，让大家所看到的不是表的外壳，而是表壳的轮机。正是在这个不现实的世界中，可以使它的力量显示出来，因为大大简化了的社会的无所遮蔽的结构，不仅可以显示地租的规律，而且还可以阐明国外贸易、货币、赋税和经济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李嘉图通过构造一个典型世界，使经济学有了一个有力的抽象工具，如果要洞察日常生活其底蕴、要了解它的潜在机制，这个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正如与李嘉图同代的一些观察家所说，抽象这一工具也能应用于撇开棘手的事实，——一种被称做李嘉图缺陷的用途。然而正是由于李嘉图的这一使事物简化的贡献，经济学才被称为一门科学，然而，也许正是由于他对过度简化的偏好，使这门科学带有一些疵点。

马尔萨斯在抽象世界的构成上，从来没有获得多大成就，因此

在学术上永久性的贡献较小。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人口问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得以使他的名字到今天还脍炙人口。他已经意识到——虽然未能作出说明——普遍萧条的问题，这是个在他的书出版了一个世纪以后，使经济学家手忙脚乱的问题。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两位的主要贡献也许在他们技术上的成就之外，因为他们当时绝对没有蓄意要做出这样的贡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作出了一件惊人之举。他们把当时的乐观看法变成了悲观看法。此后再也不可能把人类的世界看成一个社会自然力量必然会使大家的生活逐步改进的活动场所了。正相反，那些一度认为似乎带有目的论意义的企图、要使世界享受协调与和平的自然力量，现在看来，似乎变成了不怀好意和含有威胁性的力量了。人类即使没有陷于大量饥饿人群的呻吟痛楚之中，似乎也将遭受到商品泛滥成灾而缺乏接受者之祸。不论处于哪一情况，为争取进步的长期斗争，其前途总是黯淡的，结果工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资本家的努力将受到欺骗，地主则贪婪地盯着他的不劳而获的、一直在增长中的掠夺物。

这两个人使世人信服，大家都生活在黄粱美梦中，这可不是个小可的成就。他们所提出的证据是这样的富有说服力，使人们开始不在假定的自然法则结构以内，而是在无视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为社会寻找出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已经表明，如果听其自然，则社会将沦为人间地狱。这就难怪一些改革者要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们将努力抵抗社会的自然倾向。如果在随波逐流中将把我们引向礁石，那我们就逆流而泳，于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放弃了一切所持有的、对世上的正义感的忠实信心。

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把全部信心寄托在理性、秩序和进步的一代的最后的人。他们既不是他们所不赞成的那个制度的辩护士，也不是其保护人。说实话，他们是不偏不倚

的，对社会不断的变动，他们是站得高高的，远远的，他们用客观眼光来测定社会潮流的趋向。如果所看到的是不合他们之意的，那也好，反正不能归咎于他们。

由于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正直的人，所以有些什么想法就追究到底，不管追究的结果如何。马尔萨斯在一个脚注内指出，李嘉图是地主的敌人，而他自己就是个地主，这条脚注似乎值得引述一下：

> 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

他们去世之后，一位苏格兰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对他们加以称颂时，颂词隽永。他说，“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

第五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梦幻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为什么要用悲观态度来观察这个世界，是不难理解的。于 19 世纪 20 年代时住在英国，就会觉得其地是个抑郁寡欢的所在。尽管那时它在欧洲大陆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似乎被禁闭在国内从事于甚至更加险恶的斗争。很明显，任何人只要留心一下就会看到，正在发展的工厂制度对社会欠下了债，而且以可怕的速度在增长，清算的日子不能永远延宕下去。

的确，在那个时候，工厂工作的情况是那样可怕，说起来会使现代读者毛发悚然。1828 年，一个激进派杂志——《狮子》，发表了关于一个叫罗伯特·布林科的使人难以置信的经过情况，布林科是被送到在洛丹姆一个厂的 80 名贫困儿童之一。这些男孩和女孩都是 10 岁光景，他们日夜要受到拷打，这不仅是为了些微的过失，而且是为了刺激他们低落的工作情绪。后来布林科被调到利顿，以前后两厂相比，在洛丹姆的待遇还算是比较仁慈的。在利顿，孩子们跟猪混在一起，在饲料槽中争夺厨房下脚，时常受到拳打脚踢，在性生活方面受到凌辱，他们的雇主，一个叫埃利斯·尼达姆的，有一个使人听了要打寒战的怪癖，他拧孩子的耳朵时，一定要用指甲掐到肉为止。厂内的工头甚至更加恶毒，他把布林科的双腕缚住，吊在机器上，使他双膝弯曲，然后用重的东西压在他肩上。这个孩子和他的同事们在冬天差不多是光身的，冻得面色发紫！

毫无疑问，这样的残酷现象只是例外，不是常规；实际上出于主张改革者的热情，在报道中也许有过甚其词之处。但是，尽管认

为所述不足全信，仍然可以由此说明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在这种风气下，人情的麻木不仁已成为常态，更加重要的是，认为这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事。工作人员清晨六时到厂里上班，晚上十时回家，一天工作 16 小时并不为奇。有许多厂主不允许工人自备钟表，而厂里的钟则非常神妙，在仅有的几分钟进餐时间会走得特别快。那些富裕的和较有远见的实业家，对这类过份行为未尝不摇首叹息，但是他们的工厂经理和受到强烈压力的竞争者，则对此种情况视若无睹。

工作情况之悲惨并不是引起社会不安宁的唯一原因。机器现在正风靡一时，而机器的使用就意味着，用不会口出怨言的钢铁制品取代劳动的双手。早在 1779 年，由 8 万工人组成的一群暴徒，向一个工厂进行攻击，把它夷为平地，原因是敌视所安置的难以饶恕的机器，1811 年，反对工业技术的抗议书席卷全英国。其时在乡村到处都是被拆毁的工厂，随着这一破坏行动之后的是，在废墟上竖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内德·卢德到过了”。当时谣传有个卢德王或卢德将军在指挥这一群暴徒的活动。当然，实际并无其事。他们被称为卢德派，对工厂的仇恨情绪是纯自发的，把工厂看作监狱，对雇佣劳动仍然加以鄙视。

这次骚动在国内确实引起了一些忧惧心情。在有声望的人物中，只有李嘉图认为机器也许不一定符合工人的直接利益，由于他说了这句话，人们认为这是智者千虑之一失。对多数观察者说来，则在表示其意见时态度比较轻率：下层社会在失去控制，应当严加处理。在上流人士看来，局势似乎暗示，一次猛烈的、恐怖的大决战即将来到。诗人索塞说，“穷人反抗富人的暴动，是一切灾害中之最可怕的，这个时候只有靠军队保护我们，至于能依靠军队到多久，这是我简直想也不敢想的问题”。沃尔特·司各脱爵士说，“在我们脚底下，已经布满了地雷”。

当时既处于这样的气氛，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所以会成为悲观者和冲突的预言者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在这个黑暗和不安的时期，在英国某一场所，却闪烁着一线光明，就像风暴中的一座灯塔。在苏格兰的深山中，距离格拉斯哥大约有一天路程，其地风气闭塞到税卡管理人开始其工作时，甚至不知金币为何物，拒不接收，在那里有几座其貌不扬的、砖砌的七层楼厂房，自成一团体，称为新一拉纳克。从格拉斯哥到这里，在高峻的山路上，参观者络绎不绝——在1815到1825年间，在新一拉纳克来客签名簿上签名的不下2万人，其中大人物有大公爵尼古拉斯，后来成为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有奥地利王子约翰和马克西米利安，来访的大众中则有教区代表团、作家、改革者、多愁善感的女士和抱怀疑态度的商人。

他们来到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的证据，表明工业生活的龌龊和腐败堕落，并不是社会中必不可免的现象。在新一拉纳克所见到的是一排排整洁的工人住宅，每家有两个房间，在这里垃圾都整齐地堆在路边，而不是随意乱丢，狼藉满地。至于工厂，使参观者所看到的景象尤其夺目。每个雇工在身边挂一块小小立方形的木头，在每一面分别漆成黑、蓝、黄、白等颜色。从最淡的到最深的各种颜色来区别行为的不同等级：白是优秀，黄是良好，蓝是一般，黑是低劣。工厂经理一眼就可以看出工人工作得怎么样。结果，所看到的多数是黄色和白色。

还有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厂里没有童工（至少没有10岁或11岁以下的）。那些工作的人，每天干活不过短短的10小时零45分钟。此外，他们从来不受到惩罚，除少数成年的不可救药者，由于酗酒成癖或某些类似的恶行，不得不予以开除以外，纪律似乎不是用威吓而是用怀柔政策来维持的。厂经理的办公室长年敞开，任何人可以（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对任何章则向经理提出反对意见。

厂内对每个工人的作风或态度都有详细记录，以供规定那个立方木的色泽时的参考，任何人可以检查这个记录簿，对于所记录的如果认为有不公道之处，可以提出意见，要求更正。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孩子们。他们不是在街上乱冲乱撞，参观者发现他们在认真地活动和游戏。最幼小的在学习他们所看到的石头或树木的名字；年龄略大些的，在学习什么叫名词，什么叫形容词和副词的简单语法。看来也不像是在下苦功，在学习中得到的快感很大。孩子经常在一些姑娘们的引导下集合起来唱歌跳舞，这些姑娘得到的指示是，当孩子提出问题时，有问必答，应当相信孩子是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或犯错误的，对孩子决不可滥加处罚，要孩子进步得快些，则言教不如身教

这必然是个奇妙的、甚至鼓舞人心的景象。对一幅欢乐儿童的景象所受到的感动之深，一个事业心强的男子汉决不能与一个软心肠的姑娘相比，因此，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是，新一拉纳克所起的作用是有价值的，非常有价值的。经营这个机构的不仅是个天使，而且是个注重实践的人。

负责新一拉纳克事业的人，不仅是个注重实践的天使，而且是个不大可能遇到的人物。罗伯特·欧文，“新一拉纳克的仁慈的欧文先生”，跟许多19世纪早期的改革者——我们现在管他们叫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在性质上是实用性与天真、成功与失败、常识与愚蠢的不可思议的混合。他赞成废止用犁而改用铲，他从白手成为一个大资本家，然后从一个大资本家成为一个私有财产激烈的反对者，他赞成对贫民作善举，因为由此将产生效益，然后又主张废除货币。

很难相信，一个人的一生会发生这么多意料不到的转折。罗伯特·欧文1771年生于威尔士的一个贫寒之家，9岁离开学校，成为亚麻制品商的一个学徒，这个商人的名字听起来不大悦耳，叫

作麦克格福格。他也许会一直呆在那里，运气好的话，有朝一日，这家店的名字也许会改为麦克格福格和欧文，但是他雄心勃勃，决意跑到曼彻斯特，在那里，凭着向他哥哥借到的100镑，使自己成为一个小型资本家，从事于制造纺织机。但是他好运还在后面。有个德林克沃特先生，是一家大纺织企业的老板，有一天他发觉缺少个厂经理，于是在当地报纸上登报招聘。欧文对于纺织厂的事一无所知，却获得了这个职位，他获得这个职位时的方式，可以供作一些作家在描写关于凭借勇气和机遇而平步青云这类情节时的参考。欧文于50多年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戴上帽子，径自走到德林克沃特的办公室，'你几岁？''到今年5月20岁'是我的回答。'你一星期喝几次酒？''我一生从来不喝酒'我说，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感到脸红。'你需要多少薪水？''一年300镑'是我的答复。'什么？'德林克沃特先生有些惊讶，'一年300！我记不清楚今天一早有多少人谋这个工作，但是我知道，把他们所要求的加起来也没有你要求的这么多。'我说，'我不能受别人所需之数的限制，我之所需却不能再减了'。"

这是欧文特有的姿态，他终于如愿以偿。他到20岁时，已成了个纺织界少年中的奇才——一个有吸引力的年轻人，高鼻梁，长长的脸，双眸莹泽，即此可见其胸怀磊落。6个月后，德林克沃特先生表示愿意让他分享业务利润的四分之一。但是这还不过是他难以置信的发展前途的一个前奏曲。数年后他听到，在新一拉纳克的穷村子里有一批工厂要出售；凑巧的是，拥有这些厂的那个人的女儿，就是他所爱上的对象。无论是要把这些厂弄到手，或者和厂主人的女儿成婚，看来都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厂主人戴尔先生是个热烈的长老派信徒，他决不会赞成欧文在宗教上激进的自由思想见解，况且这里还有个怎样筹措资金来买下这些厂的问题。但欧文是难不倒的，他就像以前对待德林克沃特时一样，径

直去看戴尔先生。结果，他借到了钱，买下了厂，赢得了与他女儿的婚约，总之，一切都迎刃而解。

事情大可以适可而止了。1年以后，欧文使新—拉纳克改变了面貌，5年以后，人们简直认不出它了，10年以后它已誉满全球。对多数人说来，获得这样的成就也可以满足了，他除在欧洲博得目光远大和慈善为怀的好名声之外，他个人拥有的财产至少达60,000镑。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欧文的事业虽然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但他把自己看成是个思想家，而不只是个实业家，在他看来，新—拉纳克决不是以行善为主而已。说得更确切些，他野心勃勃，怀有为全人类谋福利的一种想法，他想借新—拉纳克的成就来测验他的这一理论。他认为人类的生活是要受到环境的支配的，如果能改变环境，人间真正的乐园即可成为现实。对他说来，新—拉纳克就好像是实验室里他的一种想法的考验物，由于他的这次试验获得了辉煌成就，因此似乎无可怀疑，为什么不能把它扩大到全世界。

他的机会不久就来了。拿破仑战争过去了，但困难问题却接踵而至。一连串的马尔萨斯所谓的"普遍过剩"毁坏了这个国家；从1816到1820年，其间除一年外，生意是糟透了。一时国内人心惶惶，群氓蠢蠢欲动。于是约克公爵、肯特公爵和其他显要人物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从事调查研究危机发生的原因，这时理所当然地邀请了慈善家欧文先生，请他提出他的看法。

结果委员会所收到的是它所完全没有料到的。它总以为欧文先生提出的必然是关于工厂改革等方面的计划，因为他是以缩短工时和废除童工的倡导者闻名的，而事实上看到的却是范围广大的关于社会改组的一个行动计划。

欧文所建议的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使贫民从事生产。

为此他主张组织所谓合作村，由800到1,200人组成这样一个村，大家一道在农场或工厂中工作，各自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家族则住在密集在一起的“方形屋子”(这个词立即引起大家的注目)里，每户各有私室，至于起居室、阅览室和厨房则几户公用。孩子在三岁以上膳食即分开，养成他们将来易于接受一种教育的熏陶的作用，从而形成他们的优良性格。在学校的周围是花园，由稍微大些的孩子照料，园外就是大片田地，供种植作物——不用说，种植时用的是铁锹而不是犁。在住宅的远处是工厂单位，这实际上将是一个有计划的花园城市，一种集聚区，一种公社。

委员会诸公看了这个计划大大地吃了一惊。在不受限制的自由放任时代，它完全不打算采用有计划的社会团体制度。于是谢绝了欧文先生，把他的想法审慎地搁置起来。但是欧文却不肯罢休。他坚决要求审查一下他的计划是否适用，这时解释他观点的一些小册子大批如潮水般地涌入议会。他的决心再一次赢得胜利。于1819年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大卫·李嘉图)，其目的在于试行募集所需要的96,000镑，来建立一个完备的、试验性的合作村。

李嘉图对这个计划虽然愿意让它试一试，但态度是怀疑的，而民众对它却不是怀疑，而是对这个想法表示厌恶。一位社论撰写者说，“罗伯特·欧文先生是个慈善的纱厂主，认为世上所有的人，就像是出生已几千年的一根根小草，现在需要把他们重新安排一下，他因此决定把他们安置在新式的方形物内”。

威廉·科尔特(其时因他的激进思想而流放在美国)，出言尤其不逊。他说，“这位先生主张建立一个贫民公社！结果得到的是令人惊奇的和平、幸福和国家利益。我看不出，这个美梦究竟如何能实现。欧文先生的方案，至少是一个完全新奇的事物，因为像贫民公社这样一个东西，我相信还没有人听到过。再见吧，拉纳克

的欧文先生”。

欧文当然没有什么贫民公社的幻想。他的观点不同，认为贫民如果得到了工作的机会，在整饬的环境下，一些不良的社会习惯很容易转变，从而改邪归正。而且获得这样改正的还不只是贫民。合作村显然与工业生活的骚乱情况不同，别的团体看了这种榜样，也自然会跟着做。

但是很明显，事实上是只有欧文在这样想。心情严肃的人从欧文计划中看到，它对固有的社会秩序是个扰乱因素；思想激进的人只是把它看成一场闹剧。结果，这个试验对于所需要的资金从来没有能募集成数，但是这位不屈不挠的资本家不肯罢休，他原来是个慈善家，现在却成了一个专业化人道主义者。他已经发了财，现在却要把他的财产用作实现他的思想时所需要的资金。他把在新一拉纳克的事业卖掉，于1824年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未来的公社。他选择美国作为他一显身手的地方是很自然的，其地人民享受政治上的自由已经50年，要建立一个乌托邦，还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适宜的呢？

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进了一片广达3,000英亩的土地。于1826年7月4日举行了落成式，还发表了个精神独立——不受私有财产、无理性的宗教和婚姻的拘束——的宣言，然后为它起了个表示愿望的美称，叫作“新的协调”，这以后就让它自己想办法来应付环境。

结果是一无所成，事实上也必然如此。欧文所设想的是，一个乌托邦会全面地、突然地出现在眼前，而没有想到去破除旧社会那种不完善的环境。他也缺少规划——在几周之内，就有800个移居者慌慌张张地一拥而至。甚至起码的防止欺诈的措施也没有。欧文的一个同事用不正当手段在土地上设立了一个威士忌酒蒸馏室，使欧文的声望受到损失。由于欧文本人不在当地，用冒名顶替

办法成立敌对公社的情况也相继出现。总之，贪得习惯的吸引力太强大，不是理想的束缚所能抵御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公社居然能存在到像它实际存在的那么久，倒是有些令人惊讶的。

到 1828 年，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个事业失败了。他把地产卖掉（在这一冒险行动中，丧失了他全部财产的五分之四），去向总统杰克逊谈他的计划，后又向墨西哥的圣安纳谈。他们除礼貌上的周旋外都别无表示。

欧文这时回到英国。他虽然在名声上稍有所损，但仍然是"慈善的欧文先生"，此时在他一生的经历中最后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又将发生。因为虽然社会中大部分人对他的合作村想法备加讥嘲，他的教导对某一部分人（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深刻影响。现在已经到了现代化工会首次出现的时候，纺织工、陶工和建筑工的领导者开始把欧文看作能够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的人——实际是，看作他们的领袖。与贵族不同，他们是认真地对待他的教导的。当贵人们的委员会在讨论合作村事宜时，以欧文的方针为依据的、各种真实的工人合作社，在比较有节制的规模下，在全国相继出现——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甚至还有少数严格按照欧文先生的想法的、注定要倒霉的、撇开金钱不计的合作社尝试。

这些合作社，没有例外，都失败了，一些撇开金钱的合作社，也同样以破产告终。但是，合作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却扎下了根。有 28 个自称为罗奇代尔[①] 合作社创立者的热心人，开始发起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运动。在欧文看来，这不过是一时的兴趣，但后来却发展成为英国工党重大的力量根源之一。奇怪的是，他心力交瘁地进行的那些方案都不久成为陈迹，而他最不注意的运动却得以长期存在。

---

① 罗奇代尔，英国西部一城市，靠近曼彻斯特。——译者

欧文没有时间再顾到合作社问题，这是有他的理由的。当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巨大的道义上的改革运动，以他特有的精力充沛的方式，疯狂地投入了这一运动。他一度是个穷孩子，一度是个资本家，一度又是个社会缔造者，现在却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们吸引到他周围。他给他的规划起了一个颇为动人的名字，叫作全国生产阶级和有效阶级道德工会。这个名字不久即缩减为全国统一工会，但仍感到其名过长，就干脆缩减为全国工会。工会的领导们就在这个旗帜下集合起来，1833 年，正式开展了英国工人阶级运动。

这是个全国性工会，是今天的工业工会的先驱者。它的会员人数达 50 万，这在当时是个庞大的数字，事实上全英国每个重要的工会都包括进去了。但是与现在的工会不同，它的目标并不以工时、工资或者甚至经济特权这些方面为限。以全国工会作为一个手段，其目的不仅是在于改善社会，而且在于更深一层的改造社会。因此，它的最低纲领虽然是要求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的改善，它还得对合作村这一模糊的混合物的宗旨进行剖析，如废除货币以及在欧文写作中谈到的其他种种杂七杂八的意见。

欧文提出了他的最后一招向国家挑战。这是一次绝对的失败。美国不准备有一个地方工会，英国也不准备有一个全国工会。地方工会不能控制其会员，地方罢工会削弱全国性机构。欧文和他的助手们发生了争吵，后者指责他是无神论者，而他则说他们煽动阶级仇恨。于是政府出来干预其事，在愤激情况下尽力消弭这一发展中的动向。雇主阶级在全国工会听到了私有财产的丧钟声，要求严格执行反对工会条例。没有一个初期的运动能够顶得住这样一个严重的打击。不到两年，这个伟大的工会即消声匿迹，而欧文此时年已 64 岁，他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已到了最后一幕。

他又活了 20 年，这位工人阶级的长者所主张的仍然是合作化

观念，所偏爱的仍然是用铲而不是用犁，所怀疑的仍然是货币。1839年，尽管受到一个叫作“和平抑制不忠实行为协会”的一些好心肠人的反对，但欧文仍然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但一切都完蛋了。在晚年他从事于研究唯灵论，写了无穷无尽而一无结果的小册子，同时以写作令人惊奇的《自传》自娱。1858年，他已87岁高龄，在依然满怀希望中死去。

多么使人难以置信和富于浪漫色彩的生活经历啊！现在回想起来，引起我们兴趣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不如说是他的经历。欧文决不是个真正有创见的思想家，也肯定不是个容易被说服的思想家。一个他的同时代作家语带讥讽地说，“欧文不是个读了一本书之后他的想法就会有所改变的人”；麦考莱是听到了他的声音就要躲开的，说他“是个有礼貌的惹厌人物”。

无论怎样牵强附会，也不能说他是个经济学家。但是，他还不止是这样；他是个经济学革新者，他重新制订了经济学家要处理的原始材料。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欧文要求的是改造世界；但是，别的人只是有力或无力地从事写作，发发议论，而他却是个一往无前地要将改革付之实施的人。

经一再考虑之后，我们觉得也许在他后面隐伏着一个高明的见解。在他的儿子罗伯特·戴尔·欧文所写的传记中谈到他一件轶事，很巧妙地说明了这里谈到的这一点：

他的父亲（罗伯特·欧文）说，“亲爱的卡罗琳，当孩子发脾气而哭闹时，就把他放在儿童室中央的地板上，如果他不停止啼哭，千万不要把他抱起来。”“但是亲爱的，他会整个钟头哭下去的。”“那就让他哭。”“这会损害他娇嫩的肺部，恐怕还会引起痉挛。”“我想不会的，无论如何，这总比使他将来成为一个无法管教的孩子好些。人是受环境控制的生物”。

“人是受环境控制的生物。”但是，除了人自己之外，还有谁来

制造环境呢？世界并非必然是好的或者不好的，要看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而定。欧文在这个观念上为后人留下了希望的人生观，这个观念与铁铲优于铁犁，或者是关于货币、或者是关于合作村那些怪诞不经的想法，要强有力得多。

在 19 世纪反对初期资本主义那一群抗议者之中，罗伯特·欧文肯定是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但决不是其中之最特殊的。以性格之反常而论，当首推伯爵圣西门，以思想之怪僻而论，则再没有可与夏尔·傅立叶媲美的。

圣西门，单看他的名字就可知道他是个贵族，他的家世据说系出于沙勒曼大帝的后裔。他出生于 1760 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使他意识到祖先的高贵，保持其家族荣光的重要意义。当他还是个青年，每天早晨由一个贴身男仆把他唤醒时，总要大声说，"起来吧，伯爵先生，今天您还有许多要事要料理"。

一个觉得自己是被历史选中的人，就会做出怪里怪气的事。对圣西门来说是，因此使他过分的任性行为有了一个借口。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把对原则的坚持和纯粹的顽固、愚蠢两者混淆起来；据说，有一天一辆运货车碍及儿童在街上的玩耍，他即当街躺下，一动也不动——谁敢把一个年轻的伯爵推到沟里去呢？稍后，他父亲叫他去参加圣餐，他拒不遵命，他的顽固不化的父亲却不买帐，就干脆把他关起来。

他的放纵自恣，也许会使他转向于一切政治集团中最放恣的路易 16 宫廷。但是，他所醉心的是与朝廷概念最不相投的想法——民主政体，因此得到了挽救。这位小伯爵于 1778 年到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干得很出色。他参与五次战役，获得了辛辛纳特斯勋章，最关重要的是，他成为自由与平等新思想的最热烈的信徒。

但是，这还不是他所干的所谓要事。战后他留在路易斯安那；

他从那里到墨西哥，力劝总督造一条运河，此举如果实现，将成为巴拿马运河的先导。这条运河若造成，当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他的想法落空了，当然，其间想象的成分占十分之九，计划的成分只占十分之一。于是这位年轻的革命贵族回到法国。

对法国大革命说来，他来得正是时候，他以满腔热情投入这个革命。他的故乡法尔维的市民请他担任市长，他拒绝了，说选一个旧贵族当市长将开恶劣的先例，后来无论如何要把他选入国民议会，他提出放弃自己的衔头，成为普通公民。他的偏爱民主并不是出于伪装；圣西门对于他的同胞是有真挚感情的。一天在大革命之前，他正在车马烜赫地赶往凡尔赛，中途碰到个农民，驾着牛车颠顿于泥途中。他立即下车，尽管穿着考究的衣服，却帮着农民推车，一面同他攀谈，觉得大有意思，就遣散了自己的车马，和这位新相知一道到奥尔良。

革命对他做出的安排是奇奇怪怪的。一方面他机敏地从事于对教会地产的投机，使他自己颇有所获；另一方面他忙着从事于巨大的教育计划，由此使他与外国人多有接触而引起人们的猜忌，结果使他受到保护性的拘留。他逃脱了，然后部分由于他的浪漫气质，部分由于他真正的高尚品质，当他听到他旅馆的老板被冤屈地指责为对他的逃亡有勾结行为时，他又出来自首。

这次他被正式投入了监狱。但是，就在这狱室中，对他出现了上天的启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一生所期待的。启示是在梦中出现的；圣西门是这样说的：

> “当革命最残酷的时期，在卢森堡关押中的一个晚上，沙勒曼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说，‘自从世界开始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家族曾享有既产生了一个第一流英雄又产生了一个第一流哲学家的光荣。这份光荣是留给我家享有的。我的孩子，你作为一个哲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将和我作为一个战士和政治

家所取得的成就相等”。

圣西门没有再问下去。后来他被释放出狱，就把他积聚的钱财倾注于探求知识的方面。他确实要想知道应知的一切，把法国所有的专家学者——科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都邀请到家里，为他们的工作供给资金，无止境地向他们提出问题虚心请教，使他可以对世间的万事万物，无所不知。这样的行动方式是有些越出常情的。有一个时期他感到，为了进行社会研究，他还缺乏关于家庭生活的直接体会，于是他决定结婚，约定结合以三年为限。结果觉得一年已够了——他的妻子话说得太多，他的宾客酒也喝得太多，把结婚作为一个教育方式是有它的限度的。他又改变了主意，向欧洲最漂亮的女子德斯塔厄夫人求婚，他认为这是能够了解他的计划的唯一女子。他们会见了，但是以虎头蛇尾终场；她认为他精神抖擞，但根本不是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热情也一落千丈。

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探求，所引起的刺激作用固然很大，但从财务上说是灾难性的。他在支出上的浪费，达到漫无节制、不计后果的程度；他的一次婚礼，花费之大也出于意外。他起先看到他自己家道中落，然后渐渐沦于真正的贫困。他不得不寻一个书写工作，然后在膳宿方面依靠一个老仆的仁慈惠助。同时他在从事写作，所写的是有关对社会各方面的调查、研究、考察、建议，他一息不停地写了许许多多论文。他把这些作品送给当时的一些权威人士，并附条说明他处境困难，措辞哀婉动人：

先生：

务必要救我一救，我已饥饿欲绝，靠面包和水维持生活已经15天。为了支付我写文章用的稿纸，除了衣服，我已经把什么都变卖了。由于我求知欲盛和渴望改善公共福利，以及希望找到一个和平手段，结束涉及整个欧洲社会可怕的危机，以

致陷入这样的困境。……

没有人伸出同情之手。1823年，尽管他家属给了他一点补助金，他终于绝望地开枪自杀。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完全做到他所愿望的任何事，枪杀的结果只是瞎掉了一只眼睛。他继续活了两年，贫病交加，而仍然神志专一，心高气傲。当他临危时，召集了少数几个门徒在身边，向他们说，"记着，一个人要做大事，就得充满热情"！

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足以证明这一闹剧式目的是有它的道理的呢？

一件怪事：他居然创立了一个产业工人的宗教。他不是通过他的著作做到这一点的，他写得够多了，但读者寥寥，也不是通过他所做的什么"大事"。在说不出所以然的情况下，凭他个人的魅力，形成了一种教派，从而聚拢了一小帮信徒，可以说使社会获得了一个新的形象。

这是个怪特的、半神秘的、无组织的宗教，情况也并不足奇，这是建立在一个未完成的、倾侧的大厦这样一个意识之上的。但是，甚至建立者的意思还不是这样一种形式暧昧的宗教。圣西门死后就出现了圣西门教堂，在法国还有六个分设的教堂，在德国和英国也都有这样的教堂。也许比较得当的是，把它们比作兄弟间的关系，信徒们都穿着蓝色衣服，他们彼此间则按"父子"的次序排列。作为这位宗教创立者的教义上的象征，他们穿上了一种特制的马甲，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自己既不能把它穿上，也不能把它脱下，从而强调每个人都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兄弟般地相互依存。但是这个教派不久即退化为不过比崇拜略胜一筹的一种崇拜的仪式，因为近代的圣西门分子不久即设计了一套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个准则在有些情况下，无异是经过正式编纂的道德败坏准则。

圣西门所鼓吹的主义，用现代眼光来看，并没有什么骇人听闻

之处。它所宣告的是，一个人如果要分享社会的成果，“他就必须工作”。与这个前提的结论相比，罗伯特·欧文的“方屋公社”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圣西门说，“假定法国突然丧失了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等等，直到假定3,000名专家、学者、艺术家和手艺人都计算在内(圣西门并不以他的那种风格的经济学著称)。这样将获得什么结果?结果将是一场大灾难，将使法国失去它的灵魂。

他接下去说，现在假定法国丧失的不是这些比较少数的人，而是一下子丧失它的上流阶层——国王、国王的兄弟德贝利公爵，一些公爵夫人、政府的官员、法官和10,000名最富的土地拥有者——一共是30,000人。结果呢?圣西门说，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好人，但是，对于他们的丧失将只是一个情感上的问题，国家几乎不会受到损害。任何一类人都可以代为这些可爱的、为其职业增光之人执行职务。

这么看来，由此得出的教益是很清楚的。应当受到社会中最高报酬的是一切类型的劳动者——工业家，懒汉的所得应当最少。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怎样呢?由于处理的错误，事实上适得其反——那些做得最少的，得到的最多。

圣西门提议，要把金字塔摆正。社会的组织实际上就像一个庞大的厂，组织社会时所遵循的，应当是组织一个厂的原则，从而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政府应当是经济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应当为事物作出安排，不是对人发号施令。报酬应当按比例分配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应当分配给社会中的积极分子，而不是懒汉式的袖手旁观者。圣西门所宣扬的不是一次革命，甚至也不是如我们所了解的社会主义。这是对工业作用的一种赞美，是对劳动社会中懒汉反而获得财富的这样不成比例的份额的抗议。

至于对这种不公平现象应当怎么办，则不赞一词；后来的圣西门分子，则越出了他们奠基人的范围之外，主张取消私有财产，但即使是这样，他们所提出的也不过是关于社会改革的一种模糊的纲领。这是要牵涉到进行时的方式方法的，但是它所缺少的正是这一套具体方案。它指出了社会财富分配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但是对于要求改正这种现象的那些人说来，却无所指导，使他们陷于失望状态。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具体方案的缺乏，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情况与圣西门刚刚相反的一个人会获得一些成就。使一位贵族出身的人受到激动的是对一些崇高思想的热情，而使夏尔·傅立叶受到激动的却是对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的热情。傅立叶跟圣西门一样，认为世界已经无可奈何地陷于瓦解状态。但他提出的对策是明确的，是从最琐碎的细节着手。

圣西门是生活上的冒险家；傅立叶是在空想上的冒险家。他的个人经历是个空白：他出生于1772年，是贝桑松的一个商人的儿子，他作为一个不得意的旅行商在消磨时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一无所为，甚至也没有结过婚。他有两种爱好，一个是花草，一个是猫。他只是在最后一段寿命中，才采取了对社会有所祈求的态度，在他一生最后的两年期间，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守在一间小屋里，希望有大资本家会来找他，为他整顿乾坤计划的实践提供资金。这个小小的售货员写道，“我独自一人打破了2000年以来政治上的愚蠢行为，并为当今和未来的几代人找到了巨大的幸福源泉”。如此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于是，他不能不静候在家，等待作为救星的资本家准备好他的资金，前来协助。可是从未有一人光临过。

对傅立叶这样一个人，如果说得客气些，是行为有些古怪，如果说得准确些，大概是略有些神经失常。他的世界是个想象力的

产物：他相信，地球上有生物已历时8万年，前4万年期间向上摆动，后4万年向下摆动。在这两个时期的中间（在算术上不必认真计较），存在着一个为期8千年的幸福的顶点。我们已经过了混沌期、朦昧期、宗法政治期和野蛮期，现在生活在8个上升阶段中的第五阶段。在我们前面的是保证阶段（这一点洞察力不算坏），然后沿着上坡路达到和谐阶段。待达到极乐世界后，这个跷跷板将倾覆，我们将重新开始，经历一切阶段，如此周而复始。

但是，当我们深入到和谐阶段时，奇情异彩将纷纷出现：从北极流出的只是和缓的水流，海洋中的水成了柠檬水，代替那个孤独的卫星的是6个新月，新品种将相继出现，与和谐阶段更加配合："反态"的狮子，性格驯良而极其得用，"反态"的鲸，可以把它拴在船上为人类服务，还有"反态"的熊、鼠和虫。我们可以活到144岁，其中120年光阴可用以无限制地追求性爱。

所有这些，加上他对其他星球上居民的描写，使读他书的人感到，他简直是个疯子。他也许是的。但是，当他以明亮的眼光来观察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时，却看到了混乱和悲惨，还看到了改组社会的方法。

他的处方十分明确：应当把社会组织成若干"法郎吉"(Phalansteres)，那是由一些大型旅馆构成，其布置有点像欧文的合作村。对旅馆的情况作了细致的描写：其间有一个主要建筑物（旅馆的各种各样的房间及其面积的大小都想到了），环绕其周围的是农场和工业企业。旅馆内的住所在等级上有高低之别，可以按照你的财力随意选择——一等、二等或三等，你在静居独处方面，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就达到什么程度（包括在室内用膳），你如果需要文化方面的熏陶，可以使你恰如其份地如愿以偿。通过集中处理可以提高效率：傅立叶，这个老单身汉，对于集中烹饪的成就，描绘了一幅令人馋涎欲滴的图景。

当然，每个人每天得工作几个小时。但是没有人会逃避工作，因为每个人所做的都是他所最喜欢的。这样，干脏活的问题就解决了，方法是由喜欢这项工作的来做。喜欢干这个的当然是孩子们。于是一群群小家伙将高兴地走向屠宰场或者从事修路，使他们可以消磨时光。有些孩子是怕干脏活的，那就去照料花木，或者为他们的父母矫正语言中不正确的发音。在工人中将展开友好竞赛，看一看谁干得最好；在梨树和菠菜的栽培者之间，在煎蛋卷的厨师和香槟酒装瓶者之间，将展开热烈的竞赛。这个法郎吉原则一旦扩大到全球，就需要建立 2,985,984 个法郎吉。

这个计划整个说来是极其有利的，其利润将达 30%。但是，这是公共的利润，应由各方面分享，5/12 属于劳动，4/12 属于资本，3/12 属于"才能"，要力劝每个人成为既是个部分的所有人，又是个工人。

傅立叶的想法虽然显得有些怪诞离奇，但是，即使在以实用与常识为重的美国，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一点表现的。有一个时期，在这个国家有 40 个以上的法郎吉，如果把欧文式公社和各种宗教机构归在一起，则至少有 178 个"空想的"团体，其各自拥有的会员人数从 15 到 900 不等。

它们的种别是多不胜数的：有些虔奉宗教，有些是无神论者，有些宗旨高尚，有些则放荡不羁，有些是资本主义的，而有些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在美国成立的法郎吉，有设在俄亥俄的"特朗布尔"，设在长岛的"现代"，有"欧奈达人"、"布鲁先·法姆"和"新伊卡利亚"，还有一个很别致的法郎吉，叫作北美法郎吉，在新泽西，它从 1843 年持续到 1855 年，然后以半旅馆、半公社形式拖了好多年，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结束。

这些空想的社会团体没有一个有坚实的根基。幻想世界与现实的摩擦作斗争时是困难重重的。一切设计出来的、空想的社会改

革计划，就其实践性而言，没有一个是与法郎吉相差得过远的，然而却没有一个像法郎吉那样能使人听得津津有味。如果能住进法郎吉，有谁会不愿意？傅立叶是个温和的空想家，他对于他所生活的世界，历历如绘地指出了它的悲惨和不幸，但是对于他所要消除的世间的病害提出他的处方时，掺入了过多"天国的"成分。

这些空想家是不是显得有些荒谬？的确，他们都是些梦想家；但是阿纳托·弗朗斯[①]说过，如果没有空想家，人类到今天还住在山洞里。每个人总不免要有一点疯癫意味。即使是圣西门，也曾严肃地思索过，海狸作为一种最聪明的动物，它会不会有朝一日代替人类成为世间的主宰。但是这些都不值得注意，因为他们都是些行为古怪的人，或者是，由于他们吸引人的善于作奇思幻想的特性实在太突出了。他们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是由于他们是勇敢的，为了重视这种勇气，我们就得了解和评价一下他们生存时社会的智力状态。

他们所生存的世界是残酷的，无情的，但是在经济规律的幌子下，却把这种残酷予以合理化。法国财政家和政治家纳克尔在两个世纪交替时说，"假使能够找到一种食物，不及面包那样可口，但其营养可以增加一倍，那么，人们的食量就可以减少到两天只进餐一次"。这种见解，听起来虽然有些刺耳，但是其间却寓有万物皆有定限之意。残酷的是世界，而不是世界上的人民。世界是由经济规律指挥的，而人们对经济规律却不是可以或应当开玩笑的。它就是在那里，如果对它的作用所召致的不幸后果，认为是不公正行为而加以诅咒，其愚蠢就等于是对潮水的涨落引起悲伤。

规律是不多的，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怎样详尽阐述经济分配的规律的。这些规律所

---

① 阿纳托·弗朗斯(Anatole France，1844—1924年)，法国小说家，讽刺家。——译者

说明的，似乎不仅是社会的产品倾向于怎样分配，而且是应当怎样分配。但规律表明，利润是由竞争控制从而使它扯平的，工资是始终处于人口压力之下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地主的地租会自然增长。事情就是这样。人们也许不一定喜欢这个结果，但是很明显，这个结果是社会动力的自然成效；其间既不涉及个人的恶意，也不涉及个人的操纵。经济规律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要向它挑战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一个初级经济学课本曾写道，“百年以前，只有博学多闻的人才能探究经济规律，今天已成为育儿室里的老生常谈，唯一真正的困难是，这些规律实在太简单了”。

难怪这些空想家会趋于这样的极端。规律看起来确是不可侵犯的，然而它对之负有责任的那个社会的状态，却使人无法容忍。于是他们鼓足勇气，实际上在说，整个社会必须改革。如果资本主义是这样的，是要把罗伯特·布林科拴在机器上的，那就让我们挑选些任何别的什么吧——合作村、道德准则，或者是讨人喜欢的、具有娱乐气氛的法郎吉。空想家——除了在这一章里提到的之外，还有许多人——是情感方面的改革者，而不是理智方面的改革者。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他们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一个理由。所谓“乌托邦”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目的的问题，而且是手段上的一个关键。他们与共产主义者截然不同，所希望的是使上流社会中的成员相信，获得社会改革的最终利益的是他们自己。共产主义者讲话的对象是群众，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有必要时主张使用暴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完成他们的计划而向之呼吁的是他们自己的一类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自由思想的中产阶级公民、或者是在理智上解放的贵族。即使是罗伯特·欧文，也希望与之相伯仲的大富翁们领会他的见解。

但是还要注意到，他们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他

们都是经济改革者。自从柏拉图以来，就存在着空想的社会建立者，但是，到了法国大革命，他们才既对经济又对政治这两个方面的不公平引起反应。由于引起厌恶情绪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因此自然会产生对私有财产以及为之作斗争的那些人的反感。他们之中很少想到的是，在体制以内进行改革。我们要记着的是，那个时代还是软弱无力的工厂法初步出现的时候，那时重视这种苦苦争取得来的改革的，主要是并非真正愿意改革的分子。空想家所需要的是，比改革更进一步，他们要的是建成一个新社会，在其中占优势的是"爱你们的同胞"，而不是互相倾轧，尔虞我诈。财产的公有性和共同的所有制，将成为人类进步的检验标准。

他们都是些极其善良的人。然而，尽管具有忠实的意图和诚挚的理论，却缺少作为一个社会上体面人物的特征，缺少这样一种人的认可。但是，他们却在最意想不到的场合找到了这样一个人，这就是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有点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在这一章谈到的每个人，总有些使人难以相信的特殊性格，但约·斯·穆勒也许是其中之最特异的。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是个历史学家、哲学家、小册子作者，是李嘉图和杰里米·边沁的知交，是19世纪初期第一流才智人士之一。詹姆斯·穆勒差不多对任何事物，特别是对教育，都有一定的见解。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他了不起的成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生于1806年。于1809(不是1819)年开始学习希腊语。7岁时已读了柏拉图对话集的大部分。次年开始学习拉丁语，在此期间就通读了希罗多德、色诺芬、迪奥杰尼和卢西恩[1]部分的作品。在8岁到12岁期间，他读完了弗吉尔、

[1]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第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史学之王；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约434—355)，希腊将军，历史学家，迪奥杰尼(Diogenes，公元前

霍勒斯、利维、萨勒斯特、奥维德、特伦斯、卢克雷休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①的作品；精通了几何、代数和微分，写了一本罗马史，一本世界史节略，一本荷兰史，还写了几首诗。在他著名的自传中他说，"我从来没有用希腊文作过诗，也很少用拉丁文作诗。这并不是由于我父亲不重视从事于这种锻炼时的价值，而实在是由于没有时间"。

穆勒于知识已经很丰富的12岁时，开始研究逻辑学和霍布斯②的著作。他于13岁时，对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一切，作了全面观察。

这样的教养方式有些怪特，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是简直令人惊骇的。没有假期，"恐怕破坏了努力学习的习惯，养成娇惰的恶习"，也没有男朋友，甚至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所受的教育与抚养方式跟正常方式是大不相同的。足以使人感到惊奇的，不是在于他随后产生了伟大著作，而是在于他居然避免了他个性的一次彻底毁灭。他曾经有过一次精神崩溃；当他20岁时，对于长期养成的、惯于从事的智力方面的工作和努力，突然感到干燥乏味，不能使他得到满足，当别的青年们从智力活动中获得佳趣时，可怜的穆勒却难以看出其中的佳趣何在。他经受了忧郁症的不断折磨，然后阅读了歌德、华滋沃思③以及圣西门的作品，所有这些人通过书本触动他的情感时，跟他父亲对他在理智方面所施的庭训都一样

412—323)，希腊大儒学派哲学家；卢西恩(Lucian，公元前120—200)，希腊讽刺作家。——译者

① 弗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霍勒斯(Horace，公元前65—8)，罗马诗人，讽刺家；利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罗马历史学家；萨勒斯特(Sallust，公元前86—34)，罗马历史学家；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7?)，罗马诗人；特伦斯(Terence，公元前190—159)，罗马喜剧作家；卢克雷休斯(Lucretius，公元前约99—55)，罗马哲学家，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约448—385)，雅典诗人，喜剧作家。——译者

② 霍布斯(Hobbes，1588—1679年)，英国哲学家。——译者

③ 华滋沃思(Wordsworth，1770—1850年)，英国诗人。——译者

深刻。这以后他认识了哈里特·泰勒女士。

倒霉的是中间有个泰勒先生，他对穆勒不理不睬。哈里特·泰勒与穆勒爱上了，在整整20年间，他们互相通信，一道旅游，甚至住在一起，但都是清白无辜的(假使我们相信他们之间互相通信中所表明的那一切的话)。然后由于泰勒先生的逝世，解除了中间的障碍，两人终成眷属。

这是一对天生的佳偶，哈里特·泰勒(以后还有她的女儿，海伦)为穆勒完成了开始得那么迟的"情绪上的觉醒"，这两个女人使他看到了妇女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人类的权利。哈里特死后，当他回忆一生的经过，想到她们两人对他的影响时，他说，"无论是现在或今后，如果有人想到我和我所做的工作，他切不可忘怀的是，这不是出于一个人而是出于三个人的智力和良心的成果"。

我们已经看到，穆勒于13岁时，就通晓了当时所存在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直到30年后，他才以名家之笔写出了两大本《经济学原理》。这就好像是，他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从事积累学识达30年之久。

这部书就整个经济领域作了全面评述。他再踏上前人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走过的道路——他们所提出的地租、工资、价格和赋税问题。但这决不是对已被接受为定论的教条加上一番刷新。这部书自有它自己的新发现，穆勒自己认为这个新发现是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的。这个发现和许多伟大的见解一样，是极其简单的。它只是在于指出经济规律的真正活动范围是生产，而不是分配。

穆勒的命意所在是很清楚的：生产的经济规律关系到自然。劳动在这一用途还是在那一用途中具有较大的生产性，是不能任意决定的，至于土地生产力递减这类经济现象，也不是变幻莫测，或者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自然的稀缺和冷酷无情是实际存在的事

物，一切经济行为准则（它告诉我们怎样使劳动成果扩大到最大限度）就跟气体的膨胀或化学物质的相互作用一样，是与人力无关的，是绝对的。

但是，就经济学的规律而言，与分配问题是无关的，这也许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尽我之力，一旦生产了财富之后，我们对它就可以为所欲为。穆勒说，“东西既然已经在那里，人类，不论单个地说还是集体地说，对于它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们可以喜欢在某种条件下交给谁处理，就交给谁处理。即使某个人，不靠任何人的帮助，凭他个人的辛劳，生产了一件东西，除非获得社会的认可，他也不能据为已有。如果社会没有为了防止他的财产受到干扰而出钱雇人专司其事，那么，不仅社会可以把它拿走，而且个人也会（也可以）把它拿走。因此，财富的分配所依靠的是社会的法律和风俗。决定条例内容的是，社会中的统治者部分的意见和感情，这些条例是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大不相同的，如果人们喜欢这种现象的话，其不同的程度可能还要大”。

这对李嘉图的信徒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把他客观的研究结果僵化成社会的障碍。因为，穆勒的话意味着什么是再清楚不过的。不管社会的“自然”作用会压低工资、使利润趋于均等化，或提高地租，或者是不论什么，对这些都不用担心。如果社会不喜欢其作用的“自然”结果，只要把它们更换一下就行了。社会可以实行征税和资助，可以实行没收和再分配。它可以把它所有的财富献给君王，或者是用以经营一个庞大的慈善机关；它可以对刺激和鼓励给以适当的注意，也可以（风险由它自己承担）置之不顾。但是不管怎样做，这里是无所谓“正确的”分配的，至少经济学对此没有要求进行探索的任何权利。这里是无法向“规律”进行呼吁，从而证明社会应当怎样分配其成果才是正确的，只有靠人类对分配财富的看法如何，来决定处理的方式。

事实上，穆勒的发现并不像他深信的那样千古不朽，因为就像保守的经济学家迅速指出的那样，当人们介入分配过程时，同时也介入了生产过程。例如，对利润提取100%的税金无疑会对收取多少税金产生恐怖的影响。马克思从另一角度也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像穆勒所想的那样把生产和分配划分得一清二楚，这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其分配方式都是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例如，封建社会没有工资，并不比资本主义有更多的应得权益。

所以，从左和右各方面的批评来看，社会限制其分配方式的自由程度是有限的——比穆勒暗示的还要狭窄有限。然而，低估和夸大穆勒的洞识都是错误的。因为有限的存在意味着机动的空间，资本主义不是在改革的范围之外。确实，新政和斯堪的纳维亚福利资本主义是穆勒关于社会理想的直接表达。穆勒认为，社会可以通过强制的道德价值医治社会自然运转的弊病，即使社会变化是有限的，谁又能说它没有变化呢？

在穆勒所处的年代，他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两股新鲜空气。在自满和虚伪盛行的年代，他以巨大的热情和毅力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区分了生产和分配之后，他在他的《原理》中，继续探索由各类空想改革者提出的当时的"共产主义"设计——让我们不要匆忙加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穆勒并不太清楚马克思的学说。

一些人对以上提出的"共产主义"设计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穆勒仔细考虑了这些意见，认为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另一方面，在他震惊世界的名言中，他总结了他的观点：

> 如果要在共产主义及其一切冒险性与现在的社会状况及其一切苦难和不公平之间进行选择；如果私有制存在的必然后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劳动产品分配，即所得几乎总是与劳动成反比例——绝大部分落到完全不劳动者的手里，剩余的大部分则分给几乎是挂名的劳动者，然后，在所余不断

递减的条件下，劳动越沉重越不痛快，报酬则越少，直到最后，最疲劳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者连维持生活第一需要的报酬都没有把握得到——如果只在这种状态与共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无论共产主义有多大困难，这些困难在进行对比的天平上不过是一粒沙子罢了。

但是，穆勒继续写道，这并非真正的选择。因为他相信，对私有财产还没有一个公正的审判。欧洲的法律和制度反映的是昔日残暴的封建制度，而不是穆勒相信可达到的改革的精髓，这种改革是通过穆勒叙述的原则实施的。

所以最后，穆勒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转而提倡真正的革命变化。第一，他从艰难坎坷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一个人类精力的必要发泄口。

"我承认，"他写道，"我本人并不沉醉于那些认为人类的正常状态乃是不断地努力追求进步，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地相掠夺乃是现有社会生活形态的主张。"

但是厌恶获得财富并不能使穆勒否认财富的用途。"人类的精力必须使其用于追求财富上，犹如它们先前用于追求战争一样，直到人类的心智能够成功地导向从事更好的事物上为止，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停滞腐朽，还不如任其用于追求财富。正因为人类的心智是粗俗的，因此他们自然需要粗俗的刺激，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妨让它们去追求粗俗之物。"

于是，他就有第二个也许更具有说服力的理由。穆勒估计一下设想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赞成者和反对者以后，他用下面这些话表达了他看到的困难：

问题在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没有任何的个性庇护所，社会舆论是否会变成暴君的桎梏，每个人完全依存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监督一个人，是否会把所有人的思想感情和行

动弄成单调的清一色的……否定精神独创的社会不能称谓健康的社会。

这是作为政治学家的穆勒的话语，其后他写了一本《论自由》的小册子，也许这本书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感兴趣的，仍是作为经济学家的穆勒，因为他的《原理》远远超过了对社会改革进行可行性探索这一范围，它是关于资本主义系统的设计模型。在此之前，斯密和李嘉图都曾设计过许多模型，但穆勒的模型和别人的模型迥然不同。我们从前面已经得知，穆勒重要的是一个寻求改变社会行为的信徒。所以，他不再咽下李嘉图的悲观论调——人口增长的压力失去了改善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的所有机会。相反，穆勒认为工人阶级能够接受教育，从而认识到他们面临的马尔萨斯式的危险，自觉地控制人口增长。

穆勒的模型——工资变动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压力，同斯密和李嘉图的模型有明显的区别。如前所述，积累过程使工资上涨，但由于没有儿童的食物，减少了工资对利润的压力。结果，工资将上涨，资本积累将趋于停滞。所以，穆勒的系统接近一个高度稳定的状态，假如没有严重的人口压力，穆勒的系统就可以像斯密的或李嘉图的系统一样获得成功。

我们现在来看另一方面。穆勒不愿意把他所看到的一个稳定状态作为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而愿意把它看成是良性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把它的精力用来认真对待正义和自由，不只是经济增长。穆勒深信，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稳定社会里，巨大的变革将会产生。国家将禁止地主不劳而获，正像国家征收遗产税一样。工会将代替工厂主管理企业。通过工会发挥出来纯粹的竞争优势，工人们的合作将赢得优势。旧的工厂主将他的财产卖给劳动人民，他们领取退休养老金，而资本主义将逐渐消失。

所有这些不正是一个空想家的狂想吗？追溯一下《原理》最后一版发行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世纪，当我们发现穆勒深信英国将处在一个“手掌宽度”的稳定状态时，我们只能一笑了之。然而，展望一下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代或两代所要面临的问题，并且重新思考一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诸如瑞典或奥地利，设法向着社会主义方向适应和改变他们制度的程度，我们就不能仅把他的幻想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痴心妄想而不予考虑。也许，因为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以他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他深沉的论证文体，限制了他雄辩的高度，所以他的文章不足以吸引现代读者。还有，穆勒自己留有一个退路，当他发现他已经被领出前门时，他有发现后门的办法。

所以，让我们庄重地向他告别。他这个受人尊敬得几乎到被崇拜地步的人，一直活到1873年。他的温和的社会主义遗产在他剔除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绝望与他的希望组成的幻景不断交替中得到原谅。终究，他所倡导的思想并不惊天动地，但是他也使许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被接受，诸如地租税、遗产税和工人的联合组织。他不敢保证工会发展的可能性，也不敢肯定好的总是好的，就像他发表的受人尊重的意见不见得永远受人尊重一样。英国人的教条核心是：渐进主义者、乐观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并且缺乏激进的色彩。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在他生前，那个二卷精装本就再版了7次，他又以他特有的性格，自费印行了一种廉价本，使工人阶级可以买得起。在他去世之前，这种廉价本印刷了5次，都行销一空。穆勒成了他的时代的大经济学家，当时被说成是李嘉图恰当的后继者和继承者，即使与亚当·斯密相比也无愧色。

除了经济学，就他本人来说也是备受尊敬的。除了《自由论》

以外，穆勒还是《逻辑学体系》、《代议政体论》和《功利主义》的著者，所有这些都是在其各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他不止是才华卓越，而且已接近于被当作圣徒看待。当赫伯特·斯宾塞①(在哲学范围内的他的劲敌)发觉自己处境贫困，难以完成所计划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写作时，是穆勒为他的计划提供资金的。他写信给他的劲敌，"我仍然希望您接受我的帮助，请不要把此举看作私人之间的恩惠。此举与这一点毫无关系。这里只是为了一个重要的共同目的而形成的一种简单的合作方式，在这一方式中，您提供您的劳动，让我来对您的健康有所帮助"。

再没有比穆勒的性格更具有典型性的。他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对她所怀有的一片忠诚的热爱，使他的朋友认为已濒于盲目境地；还有一个是对知识的追求，他对此是百折不挠的。他进入了议会后提出了保障人权法案，但以时机未成熟而宣告失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这一失败毫不介意。他既有所见，就得有所写，有所说，如果单是就某一人的赞可而言，则唯一要紧人物是他所热爱的哈里特。

她去世以后，还有她的女儿海伦，现在同样是他必不可少的人物。穆勒出于感激心情，在他《自传》里说，"我在这样重大的一次损失之后，在这荣枯莫测的生活过程中又得了一次奖，肯定没有人比我更侥幸的"。他和海伦一起在阿维农②，离哈里特坟墓不远处，度过了他的晚年。他是个绝顶聪明而伟大的人。

还有最后的一桩巧事。他的经济学名著（其中谈到了世界将走向进步、和平的变革与时机的改善，等等）发表于 1848 年。这也许不是一部开创新纪元的书，但肯定是一部划时代的书。由于命运诡异的播弄，另一本篇幅小得多的书（一个小册子）也发表于这一

①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译者
② 阿维农(Avignon)，法国东南部一城市。——译者

年。这本书名叫《共产党宣言》，它用辛辣的言词，在短短几页里，就破坏了约·斯·穆勒贡献给当世的平静而精神活泼的有理性的推断。

第六章　马克思冷酷无情的理论体系

《共产党宣言》一上来就用耸人听闻的词句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幽灵肯定是存在着的，对欧洲大陆的旧秩序说来，1848是恐怖之年。革命热情在高涨，而一片怨愤不平之声则在耳边轰鸣。一时之间（在一个短短的时刻中）看上去好像旧秩序要垮台了。在法国，一位魁梧的中产阶级君王路易·菲利普，与当时的困难局势作斗争时，终于垮下，他退位后逃到萨里作为安身之处，巴黎的工人则一哄而起，像汹涌的怒潮般奔向市政厅，在那里升起了红旗。在比利时，统治者由于受不了惊吓，表示要提出辞呈；在柏林堆起了路障，枪弹飕飕地横空而过；在意大利，暴民在骚动；在布拉格和维也纳，暴动的民众在仿效巴黎，占领城市。

《宣言》大声疾呼，"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统治阶级确是在发抖，它们到处看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它们的恐惧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法国的铸工车间，伴随着大榔头的锤击声的是工人激进歌曲的歌声。德国浪漫派诗人海因里希·海因在参观了一些工厂之后说，"对我们这一辈文质彬彬的人说来，

贯穿在这些歌曲里的恶魔似的音调，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宣言》里的话尽管说得咄咄逼人，但是这个恶魔似的音调并不是在号召共产主义革命，它只是由于受到挫折和失望而发出来的呼声。这时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反动派的控制之下，而英国的情况不同，其地的生活却是宁静而美妙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谈到法国政府的特点时，说它“全然没有一点改革精神，差不多完全凭一时的冲动（而且是比较卑鄙、比较自私的冲动）行事”，而负有这样的名声的，并不单是法国。就德国方面说，这时已经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还没有议会，没有言论自由或集会权利，也没有出版自由和陪审团的设立，至于王权神授这一陈旧的概念，则不容有与之有一发之差的任何想法。意大利则是个时代错误的各种王权的大杂烩。俄国在尼古拉斯一世（尽管他曾经访问过罗伯特·欧文的新一拉纳克）的统治下，被历史学家德·托克维尔[①]说成是“欧洲专制政治的柱石”。

由上述情况引起的失望情绪，如果得到适当的引导或指导，则恶魔似的音调也许会变成一次真正的革命。但是，这类暴动事实上是自发的，不受训练的，而且是无目标的；他们开始时很得手，然后当他们感到疑惑，第二步应当怎么走时，旧秩序却以席卷之势获得了恢复。这时革命热情降低了，在那些没有降低的地方，则毫不留情地被压垮。国民警卫军在伤亡了1万人的代价下，征服了巴黎的暴民，于是路易·拿破仑僭窃了国家，不久就把第二共和国换成了第二帝国。在比利时，则认为还是让国王留在那里好，他接受了这番美意，但废除了自由集会权。维也纳和匈牙利的老百姓则受到来自堡垒的炮轰。在德国，在一次制宪会议中，很好地讨论了拥护共和体制的问题，后来分成许多派别互相争吵，然后不光彩地

① 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作家。——译者

把国家奉献给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更加不光彩的是，这位君王宣称，他将不接受出自无知的普通平民所贡献的王冠。

一场革命过去了。当时来势凶猛，还流了血，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结果。在欧洲出现了几个陌生面孔，但是，政策大体上仍然同以前一样。

不过对于刚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小批工人阶级领导者说来，并没有使他们深感绝望的理由。诚然，他们对之抱着很大希望的革命，已渐趋平息，隐藏在欧洲各地的激进分子，正在受到比前更加严厉的搜捕。但是所有这些，对之都可以保持一定的泰然自若的态度。按照他们对历史的了解，1848 年的暴动，不过是正剧开场前的一次彩排，还有好戏在后面，那种使人望而生畏的壮观场面的终于胜利地出现，是不容丝毫怀疑的。

这个同盟刚刚出版了说明它目的所在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就是《共产党宣言》。但是，《宣言》里所有的一些口号和犀利的措词，其用意所在还不只是要煽动革命情绪，或是推波助澜，在一片喧嚷声中添上一个呼声；《宣言》还怀有另一想法：一种历史哲学观，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值得想望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者与要把社会改组成比较符合其愿望的形式的空想家的想法不同，他们没有乞助于人们的同情心，也没有沉溺于平地起楼台的痴想。正相反，他们所提出的是，使人们把命运寄托在一颗星上，然后注视着这颗星顽强地穿过历史的黄道带①。这里不再有两方之间的竞争，不再有由于道义或情感上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现存秩序令人不能容忍，因此这一方或那一方应该获胜的想法。情况相反，这里是对于哪一方必然要得胜的冷静分析，由于那一方

① 黄道带(Zodiac)，古天文学上虚设的假想带，在黄道左右各展开约 8 度，为日、月及主要行星运行之道，黄道带共分 12 宫。——译者

是无产阶级，其领导者就只好等待，但是它最后是不可能失败的。

《宣言》是为未来写的一个纲领。但是有一点也许使它的作者们感到意外。他们是准备等待的，但是没有想到要等上70年。他们已经仔细看了欧洲，把那里看作首起发难的最有可能的温床，至于对俄国那只角，根本就没有瞟上一瞟。

众所周知，《宣言》是那个怀着满腔不平之气的有才能的人卡尔·马克思脑力劳动的产物。说得更确切些，是他和他的一位非凡的志同道合者、赡养者、同胞和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同协作的成果。

他们是很有趣的、并且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困难在于，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人；作为一个人的马克思隐藏在作为一个形象的马克思的后面，而恩格斯则在马克思的影子的后面。如果我们按照崇拜的人数来判断，把马克思看作一个宗教领袖时，就必须把他与基督或穆罕默德并列，而恩格斯这就成为圣保罗或约翰之流。一些学者们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里，以崇拜偶像的态度吟诵这两个人的著作，他们却嘲笑反宗教的博物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已被宣告为圣徒，而他们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却仍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两种待遇对他们说来都不相称，因为他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的作品既不是圣经，也不是诅咒。这些著作属于伟大的表达经济观点的一类，为我们阐明了、澄清了世间的一些事物，同放在书架上别的伟大作品一样，这些著作既不是没有缺点的，也不是没有价值的。一般人都抱有以马克思为一个革命者的成见。但是，假使世上没有存在过一个马克思，也会有别的社会主义者和别的新社会预言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并不是他们的革命活动，这类活动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大的成果。资本主义必须最后勉力对付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

家的马克思。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预言，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预言上建立起它的高楼大厦的。

但是，让我们且先看一看这是两个怎样的人。

他们在仪表上是彼此大不相同的。马克思看上去像个革命者。他皮肤黝黑，双眼深陷，炯炯发光，他的孩子们把他叫做摩尔人[①]。他身材粗壮、结实，须发蓬松，说起话来有些咄咄逼人。他不是爱整洁的人，屋子里到处都是纸张，文件，堆得乱七八糟，满是灰尘，马克思本人即安身于此中，他穿得很邋遢，不断地抽烟，在刺痛眼睛的烟雾中踱来踱去。另一方面，恩格斯作为他所鄙视的资产阶级的一个成员，是当之无愧的，高高的个子，长得很漂亮，举止彬彬有礼，看上去像个喜欢走马击剑的人物。

他们不仅外表不同，个性也截然相反。恩格斯是个机警而轻松愉快的人，赋性灵敏，据说他能勉强说 20 种语言。他喜欢资产阶级生活中的享乐，精于品评酒类，还有一点说起来很有趣，他虽然倾心于无产阶级，却花了许多时间，深情地（但是枉然地）试图证明他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夫人，玛丽·伯恩斯（后来她死后，她的妹子利齐），实际是一位苏格兰诗人的后裔。

马克思却凝重得多。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德国学者，是个细致的、慢工出细货的、肯下苦功的、甚至抱病的求全责备者。恩格斯写文章时，不消片刻，一挥而就；马克思只是为生前不及完篇而发愁。恩格斯只是为阿拉伯语中4,000个动词的根感到困扰；而马克思经过 20 年的实践，说起英语来还是结结巴巴。他写信给恩格斯，谈到事态的发展使他感到窒碍时，我们差不多如闻其声。但是，尽管与恩格斯相形之下，他是比较迟钝的，他却是两者之中智能较大的一

① 摩尔人（The Moor），指柏柏尔人（Berber）的后裔，居于非洲西北部。——译者

个，恩格斯所提供的是题材中的广度和闯劲，而马克思所提供的是题材中的深度。

于1844年，他们在巴黎第二次碰头，从此就开始了他们之间一生的协作。恩格斯起先只是打算对马克思作一次访问，但是彼此之间要说的竟然那么多，结果他们之间的谈话持续了10天。他们的话题简直没有一个不要经过反复修改或彼此间的争论的，他们的通信可以编成好几本书。

他们走向巴黎的公共集会场所时，所经过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①]教徒，气量褊狭，是莱茵兰[②]的一个制造商。当弗里德里希还是个青年时，他极其爱好作诗，后来他父亲匆匆离开了不来梅，去学习出口业务，同一个牧师住在一起。按照卡斯珀·恩格斯的见解，宗教和谋利两者是对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疗法。恩格斯恭顺地依从了他的父亲，致力于经商。但是通过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对商业觉得处处看不入眼，同他父亲所要求的严格标准格格不入。后来他到船厂去工作，但是他敏锐的眼光所注意的，不仅是雕金镂翠的头等舱室，还同样注意到人们"挤在一起像街上铺路石一样"的下等客舱。他开始阅读他的时代的激进作品，当22岁时，他渐渐倾向于共产主义思想；所谓"共产主义"这个词，除了否认以私有财产作为组织社会时经济上努力的一个手段外，当时还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以后他转到曼彻斯特，去加入他父亲所经营的纺织工业。在他看来，曼彻斯特就像不来梅的船厂一样，有它光辉外表的一面，也有它的黑暗面。在华丽的大街上，商店鳞次栉比，而围绕着城市的郊区，则满是悦目的城郊小屋。但是还有个次等曼彻斯特。它隐藏在头等的后面，经过苦心设计，使厂主在往返于他们办公室的

① 加尔文派，法国宗教改革者加尔文(Calvin)所创立的教派。——译者

② 莱茵兰(Rhineland)，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译者

途中决不会看到它。聚集在这个地区的一些人，在污秽和了无生气的环境中，长时借吸毒以麻醉自己，赖以寻觅片时的自慰，就这样过着绝望和残酷无情的生活，把时光消磨过去。恩格斯在莱茵兰故乡的工厂地区也曾看到类似的情况，但是直到他在曼彻斯特作了考察，才真正看到了每一个小家小户的生活状态。他将调查所得写成文章——《1844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公之于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极其激动人的。有一次他同一个上流社会友人谈起这个地区的悲惨情况，他说他从未见过"造得这样坏的"城市。他的朋友若无其事地听着，然后说，"可是在这里赚的钱却不少啊，再会吧，先生"。

他在写一些论文，其中谈到英国的那些大经济学家不过是现存社会制度的辩护士，有一篇使一个年轻人印象特别深，这个人叫卡尔·马克思，他正在巴黎编辑一种激进派的哲学杂志。

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他 1818 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是海因里希·马克思的次子，属于富裕的犹太家族，这个家族不久即信从基督教，所以海因里希作为一个律师时所受到的约束较少。海因里希是个受到尊敬的人，被委任为司法顾问，只有有声望的律师，才会获得这种光荣的地位，但他曾参加非法的俱乐部宴会，在这类宴会中是要向共和政体的德国举杯祝贺的，他还用伏尔泰、洛克和狄德罗的作品来教养他的小儿子。

海因里希·马克思希望他的儿子学习法律。但是年轻的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中觉得自己完全被当时的哲学大辩论吸引住了。其时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了一个大变革计划，而那些保守的德国大学则对此意见分歧很大。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转变是生活中的常规。每个意见都会产生它的对立面，这是要压也压不住的，两者会合并成一个综合体，然后又转过来产生它自己的矛盾。黑

格尔说，历史上所记录的，一会儿这一国向那一国开火，一会儿那一国向这一国开火，只不过是意见上矛盾与反复思考的不断变动的表现。变动——辩证的变动——是人事中所固有的。但是，黑格尔说，谈到普鲁士时却是个例外，这一原则不再能适用，普鲁士政府就像个"在地上出现的神"。

这种论调对年轻的学生是个强有力的刺激。马克思加入了被认为是年轻的黑格尔学派的知识分子团体，这个团体所讨论的是一些大胆的问题，是用黑格尔辩证法来讨论的、如无神论、纯理论的共产主义等问题，于是他决定使自己成为一个哲学家。当时如果没有这个"像神似的国家"出来采取行动，他也许会成为这样一个人。马克思最喜爱的老师布鲁诺·鲍尔，渴望为他在波恩谋个职位，由于这位老师在思想上赞成宪法和反对宗教(很明显，两者在当时同样的要不得)，被学校免职，于是在学术经历中要成为马克思博士的希望成为泡影。

他改变了计划，从事于新闻工作。其时有个小型的、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叫作《莱茵日报》，他过去是它经常的投稿者，邀他去担任编辑职位。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他的这一职业刚好持续了 5 个月。马克思那时是个激进分子，不过他的激进主义是在哲学方面的，而不是在政治方面。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前来造访时，马克思对这个洋溢着共产主义思想热情的性情急躁的小伙子有些不以为然，当马克思自己受到指责，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时，他的答复是有些含糊其词的，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但是对于旨在保卫被压迫者的一种社会哲学，是不能轻率加以谴责的。"但是，不管他在这方面怎样地否认，他撰写的社论是当局所忍受不了的。当时政府颁布一条法令，禁止农民行使他们向来享有的一项权利——在森林中采集树枝，他对此在社论中加以痛斥，为此受到责难。他在社论中指出关于住房问题的种种恶劣情

况，为此受到警告。当他对俄国的沙皇竟然说出了一些不敬之词时，《莱茵日报》终于受到镇压。

马克思到巴黎去接管另一定期刊物，但它的寿命几乎同他的日报一样短促。后来他的兴趣转向政治和经济的方面。普鲁士政府不加掩饰的自私自利态度，德国资产阶级对任何足以减轻德国工人阶级痛苦的坚决抵拒，全欧洲的富裕阶级和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几乎带有讽刺意味的那种反应态度——所有这些，在他的意念中结合起来，成为他的新的历史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当恩格斯来访问他时，双方一拍即合，从此结成了牢固关系，他的那种哲学思想也开始形成正式形态。

这一哲学体系经常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说辩证，是由于它是同黑格尔不断变动的想法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唯物主义，是由于它所根据的不是人们的一些理念，而是社会的和物质的环境。

恩格斯在好多年以后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题目是“反杜林论”（它是针对着一个叫欧根·杜林的德国教授的），他说，“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品的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唯物史观就是从这一原则开始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每个社会中，产品的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是由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产品的如何交换决定的。根据这个想法，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革命的最终原因，不应该在人们的意识中，或是在人们对永存的真理和公道的日益加深的洞察力中去探求，而是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动中去探求；不应该在哲学思想中去探求，应该在经济情况中去探求”。

论证是有力的。马克思说，每个社会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说到底，这个说法所依据的是，人为了使自己能够获得衣、食、住，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活动组织起来这一不容怀疑的事实。组

织的方式，从这一社会到那一社会，从这一时代到那一时代，可以有很大差别。其方式可以是以畜牧为基础的，或者是以狩猎为中心，或按手工艺单位分组，或者是构成一个综合的工业整体。但是人们组织起来用以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的社会，不管是什么形式，它总是需要一套非经济活动和思想领域的完整的上层建筑的；它需要法律，使它可以有一个约束力量，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监管，需要受到宗教和哲学观念的激励。

但是，属于意识领域的上层建筑是不能任意选择的。它所反映的，必然是它所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没有一个狩猎团体会发展到能够利用一个工业社会的法定结构，同样情况，一个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关于法律、制度和政府的观念，显然与一个原始村庄所需要的完全不同。要注意到，唯物主义论点并不会碍及对思想的催化作用和它的创造性。唯物主义只是认为，意识虽想改变环境，但是，它却是环境的产物。

唯物主义会自然而然地把思想变成只是经济活动的、被动的伴随物。这不是马克思的论点。因为新理论既是辩证的，也是唯物主义的；在它想象中的是变动，是不断的、事物所固有的变动；在这一永不止息的运动中，这一时期发生的思想，即促进另一时期思想的形成。马克思在评论 1852 年路易·拿破仑的政变时说，“人们自己会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但是，这个历史理论的辩证的（变动的）方面，并不单是取决于观念和所谓的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还有个重要得多的力量在起着作用。经济世界自身也在变动；意识结构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也在运动中。

例如，中世纪的隔离市场，在探险活动和政治上统一的推动下

渐归淘汰，一个新的商业社会开始诞生。在新发明的推动下，旧式制造厂被用蒸气的制造厂代替，后来又诞生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叫做工厂。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生活自身的最终现实改变了形态，这就迫使发生了这种变动的社会作出新的社会性适应。马克思写道："与手推磨相应的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而与蒸汽磨相应的则是产业资本家社会。"

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变革，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后果。市场和工厂虽然渊源于封建生活方式，但与那种生活方式是水火不相容的，它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新的文化情况和社会情况。它在艰难的诞生过程中，在产生它自己的新的社会阶级方面会起促进作用；市场会创造新的商人阶级，工厂会创造工业无产阶级。

但是，社会变动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新发明强加于旧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新阶级代替旧阶级的问题。每个社会都是按照它的阶级结构组成，都是按照人们在现存生产方式中某一共同关系（不管这一关系对生产是有利还是不利）的各个集合体构成。社会变动会涉及所有阶级。生产的技术状况变动后（例如工厂摧毁手工业）旧阶级会发觉它惯有的处境也在变动，那些处于顶端的会发现他们失去了立足点，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会发现自己的地位已有所提高。在李嘉图时代的英国，我们就看到了社会阶级的这种颠倒情况，那时资本家凭着工业革命之后的余威，正在威胁着拥有地产的缙绅们由来已久的特权。

由此可见，冲突是会发展的。处于危险地位的阶级，会奋起与地位有所提高的阶级作斗争，封建主会同发展中的商人进行斗争，行会师傅则反对新兴的资本家。

历史的进程是无视人们的爱好和厌恶的。情况会逐渐变动，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中的阶级也会得到重新安排。财富的分配，就在一片骚动、混乱和极大的痛苦中发生了改变。这样看来，历史

无非是，阶级间分配社会财富的不停的斗争。只要社会在技术上有了变动，前已存在的财富分配就难免要受到攻击。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说来，这个理论对社会所预示的是什么?它指向革命——无可避免的革命。按照这里的分析，资本主义也必然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个技术和组织的基础和一个法律、政权和意识所组成的上层建筑。如果它的技术基础在发展，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必然要受到越来越紧张的压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实际是它的支撑点)是工业生产。它的上层建筑是私有财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社会产品的一部分，归拥有这一伟大技术设备的人所得。所以发生冲突，就在于这样的基础和这样的上层建筑不能和谐共存这一事实。

为什么?因为工业生产(商品的实际制造)是一个高度有机化、结构配合适宜和相互依存的过程，而私有财产的上层建筑，在社会体系中是充满着个人主义色彩的。因此上层建筑和基础就要互相冲突，工厂需要的是社会计划，而私有财产制厌恶的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变得复杂起来，它需要指导，而资本家则坚决要求灾难性的自由。

结果是双重性的。其一，资本主义或迟或早会毁灭自己。生产的无计划性必然造成经济活动经常处于紊乱状态，使危机、不景气和萧条不断发生。体系简直是太复杂了，它经常会发生不协调、步骤错乱，或者发生对某一商品生产过多、而对另一商品则生产不足的情况。

其二，资本主义会在无意之中，不知不觉地培育它自己的后继者。在它自己大工厂的内部，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技术基础(合理计划的生产)，而且还会创造一个有锻炼、有纪律的阶级，它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力量——一个愤愤不平的无产阶级。由于它

自己内部的动力，资本主义会自召祸殃，在进程中会养虎贻患，自己培养自己的敌人。

这个理论，不仅是由于对将来的预示，而且是由于对过去展开了全新的观点，因此是具有深刻的革命远见的。我们已经熟悉了对历史的“经济的解释”，对于过去有关斗争的重新评价，比如说，对于新生的 17 世纪商人阶级同重视土地和世系的贵族之间的斗争的重新解释，我们已经能安然接受。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对历史重新解释的做法问题。辩证法对由此所发生的对将来（按照《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那个将来）的影响，指的是无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也就是从这个辩证法产生出来的结论。《宣言》里的话是有些阴森可怖的，它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产生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宣言》对历史作出解释时，是其声隆隆，毫不留情的；但不是在巴黎写出的。马克思在那个城市的经过时间很短。他在那里从事编辑一种激进的、有讽刺意味的杂志，从而伤害了普鲁士政府的情感，在它的命令下，把他逐出法国首都。

他于 1843 年结婚，娶的是燕妮·冯·韦斯特法伦，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住在他隔壁，燕妮是普鲁士贵族，一个枢密院官员男爵冯·韦斯特法伦的女儿，可是他是个人文主义者，是个见解开明、无偏见的人。他曾向年轻的马克思谈到过荷马和莎士比亚，甚至谈到过圣西门（尽管被当地主教宣告为持异端者）的见解。至于燕妮则是全市中的一个美女。她长得很漂亮，求婚者多的是，她尽可以找一个比住在隔壁的、那个黑不溜秋的年轻人更加“适合的”配偶。但是她爱上了他，两家对此也都表示赞同。在马克思一家，认为这样的结合可以在社会上赢得不小的声誉，在男爵看来，

这也许是他人文主义思想正确的一次很好的证明。使人感到怀疑的是，当他表示同意时，是不是会料到他女儿将来的遭遇？因为燕妮后来将被迫同遭缧绁之灾，为了给她的孩子买棺木，以致不得不伸手向邻人乞助。她得到的，不是在特里尔愉快的享受和社会的声望，而是，为了在敌意的世界的诽谤声中，同她的丈夫同甘共苦，在伦敦贫民区两间阴沉的房子里度过她多年的艰苦生活。

然而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马克思与外人接触时是不大和善的，是多所猜疑和顾忌的，是有些怒气冲冲的，但他是个有趣的父亲和忠诚的丈夫。过后，过了很久以后，当燕妮已奄奄一息，马克思也在生病的时候，她的女儿对她所目睹的一幅恩爱缠绵的情景，作了如下的描绘：

> 我亲爱的母亲睡在前面一大间，摩尔人睡在毗连的一小间。一天早晨他觉得健旺些，可以起床到母亲那里去的时候，那幅情景是我永世不能忘怀的。他们好像又恢复了青春，偎抱在一起，一个是多情的姑娘，一个是热烈的少年，就像是要共同出发，向前途去奋斗的那样，哪里像个衰弱多病的老头子和将与世长辞的老奶奶。

马克思一家于1849年迁居伦敦，4年前他们从巴黎被逐出以后，到达布鲁塞尔，就耽搁在那里（《宣言》就是在那里写成的），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然后，当比利时国王觉得他摇晃的宝座已经充分巩固时，就下令围捕在他首都内一些激进的首领。于是马克思匆匆赶到德国。

经过的情形还是与以前一样的老一套。他接管了一家报馆的编辑工作，但是由政府勒令封闭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将末一版用红色印出，然后在伦敦找到他的避难所。

他在财务上已陷于绝望境地。恩格斯这时在曼彻斯特，却过着一种奇妙的二重不同的生活（他在曼彻斯特证券交易所是一位

受到尊敬的人物)，他对马克思一家的接济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如果马克思有点理财之术的话，这个家庭的生活也许会体面一些。然而，马克思却不是一个能使收支平衡的人，于是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孩子们学习着音乐，但家中清冷无比。生活总摆脱不了穷困，囊中空空永远是窘迫的现实。

加上莲琴(Lenchen)他家一共有5口。马克思除了每天风雨无阻地从晨10时到下午7时在不列颠博物馆里从事于他的刻板工作外，别无其他工作。他试图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一些关于政治局势的稿子，可以由此赚取一点零钱，这个报的编者查尔斯·A。达纳，是个傅立叶主义者，他对欧洲政治略加抨击的文章并无反感。这对他在经济方面曾不无小补，虽然，此举出于恩格斯之助者较多，他为马克思写了很多篇，同时马克思则不时从旁出些点子，例如，他在信中说，"您在文章中必须酌量增入一些战事色彩"等等。当这类撰稿事务中止以后，他曾试图在铁道部门谋取一个文书工作，但以书法恶劣被屏弃。于是他家里剩下来的一点东西都投入了当铺，至于家里的一些银器和比较值钱之物已早被卖掉。有时他窘迫到那样程度，以致不得不闷坐在家里，因为他的上衣和鞋都典当了；有的时候他要把作品寄给出版社，却没有买邮票的钱。为了解决困难，他遭到了极其痛苦的折磨。有一天他在穷困中在博物馆写了一整天，在晚上回家时他说，"我希望有一天，只要资产阶级中的人们还活着，会有理由使他们想到我今天的痛苦。"那时他刚刚写好《资本论》中描写关于"工作日"的使人望而生畏的那一章。

这时只有恩格斯可以依靠。马克思经常写信给他，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数学、战术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问题，特别是他自己的处境。这里摘录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一节如下：

我妻病了，小燕妮也病了。莲琴在发烧，我无法请医生，因为

手里没有钱。我们一家吃的都只是面包和土豆，这样已有8天或10天。此后能不能继续得到这些食物，还是个疑问。我没有为达纳写什么东西，因为分文所无，无法出去看。我怎样摆脱这个困境呢。最后，近8～10天来，我向几个德国同胞乞讨了几先令，这虽是可怜的，但却是必要的，否则我就得到街上掏人家的钱包。

只是最后几年，情况才略有好转。马克思的一个老朋友故世时，对他略有所遗赠，从此他没有陷入像以前那样贫困的深渊。恩格斯最后也得到了一笔遗产，他从此即不再经商；1869年最后一次到他的营业所之后，他来到野外"挥舞着手杖，满面笑容，笑着唱着"来看望马克思的女儿。

1881年燕妮死了；她埋葬过两个5岁的孩子，其中一个是她的独生子，那时看上去她已经是个老弱妇人。马克思病得太厉害，没有去参加葬礼；当恩格斯去看他时他说，"这个摩尔人也已经死了"。但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他又挨过了两年；他不赞成他两个已婚的女儿所挑选的丈夫；他对工人阶级运动展开的争吵也感到不耐烦，于是发表了一项一直使他的信徒感到迷惑的声明（有一天他说，"我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在三月间的一个下午，悄然逝去。

在长年的生活困苦中，他做了些什么？

首先是，他创导了一个国际工人阶级运动。马克思在青年时就说过"到目前为止，哲学家只是用各种方式方法来解释这个世界，但问题是在于如何改变这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历史的解释中对无产阶级已经备加赞颂，现在要着手的是指导这个阶级，如何在历史上发挥它的最大力量。

他在这一企图中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就。在《宣言》发表的同一时间，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这不过是个名义上的组织，从来

没有显著地超出这个情况；作为它的党纲的《宣言》，甚至也没有公开出售过，革命于 1848 年告终以后，这个同盟也随之消失。

随后于 1864 年，成立了一个劲头大得多的组织，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国际组织自夸有 700 万会员，在横扫全欧的罢工浪潮中，它是与闻其事的，足以证明它是实际存在的，从而赢得了吓人的声誉。但是，它的命运也是这样，其历史注定是短促的。这个组织的组成分子，并不是一支坚强的、受过锻炼的共产主义者大军，而是一群欧文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半心半意的社会主义者、偏激的民族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的乌合之众，他们对任何种革命理论都抱着怀疑态度。马克思用很大技巧把这一帮人结合在一起达 5 年之久，然后这个国际组织终于土崩瓦解；这帮人后来有些改从了巴枯宁（他是个大人物，具有西伯利亚和流放生活的真实背景，据说他的讲演是那样动人，他如果要求听众割喉自杀，听者也会心甘情愿），余者则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这个国际组织于 1874 年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会议，结果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但是，比第一国际的创立重要得多的是，马克思接触工人阶级事务时所抱的那种特殊的态度。所表现的是一个极其好争论、心胸褊狭的人，他一开头就不能相信，任何不按照他的方式进行推理的人，会有可能是对的。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时语言是明确的，作为一个哲学一历史学家时是雄辩滔滔的，但作为一个革命者时，却是粗野暴躁、要口出恶言的。他骂他的对手是“乡巴佬”、“无赖”，甚至“臭虫”。当他在早年，还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有个德国裁缝名叫韦特林的来拜访他。韦特林是个在工人运动中受过磨炼的人，他腿上有伤疤，是普鲁士监狱中的镣铐留下的，他为德国工人进行的无私和勇敢的努力有长久的历史。他来看马克思是要谈谈关于正义、兄弟关系和团结一致一类问题，可是他发觉自己所面临的是，受到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原则”的冷酷无情的盘问。可怜的韦

特林在慌乱之余，所答复的未能令人满意。马克思作为一个主考人，先是坐在那里，后来在屋里怒气冲冲地、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他高声叫嚷，"还未曾见到过，无知能有助于任何人。"于是会见结束。

威利什是又一个被逐出党籍者。他是前任普鲁士上校，在德国革命中参加过战斗，后来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是站在联邦主义者一边的一位名将。但是他坚持一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认为革命的动力是"纯意志"，而不是"实际环境"；由于这个见解（后来有一天列宁出来表明，这个想法毕竟不怎样牵强附会）他被逐出运动之外。

列入这一黑名单的还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后来逐渐蜕化为剔除"异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内部政治迫害；最能说明这种情况、最富于刺激性和预言性的一个单独事态，也许无过于马克思和皮埃尔·蒲鲁东之间的长期争执。蒲鲁东是个制桶者的儿子，是个自我教育的、才华横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写了一本叫《什么是财产？》的书，从而震撼了法国的知识界。蒲鲁东作出的回答是，财产是盗窃之物，他虽然不要求结束一切私有财产，但主张结束巨额私有财产。马克思同他会见、谈话并通信，然后又邀他与自己和恩格斯通力合作。蒲鲁东的回答是这样深切动人，这样富有先见之明，值得详细加以引述。

他说，"如果您乐意，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社会的规律、它们的运转方式以及调查研究的最好方法；但是，于推翻一切先验的教条主义之后，轮到我们上台时，最要紧的是，务必不要把另一种学说灌输给人们。我完全赞成把各种不同意见揭示出来的你的想法，愿我们之间展开诚挚的辩论，愿我们以有学识、有远见的容忍精神向世人作出榜样，愿我们不要只是由于站在一个新运动的最前面而以新的不容异说的领导自居，愿我们不要摆好姿势，像个新宗教的传道者——虽然这个宗教是个逻辑的宗教、理智的宗教。愿我们

欢迎并鼓励一切异说和抗议，愿我们谴责一切排斥态度和神秘主义，愿我们不要把问题看成是已经结束了的，即使我们已经殚精竭虑，提出了最后论证，如果有必要，也不妨借助于雄辩和反语法重新开始。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将欣然参加你们的团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干。”

马克思的回答是：蒲鲁东写了一本书，叫作《贫困的哲学》，马克想用题名《哲学的贫困》的一篇文章予以反驳，把它抹煞。

不容异说的格局始终未消失。第一国际之后，接着的是温和的和本意良好的第二国际，它所包含的社会主义者有这样一些人，如肖伯纳、拉姆齐·麦克唐纳和皮苏斯基①（还有列宁和墨索里尼），然后接着的是声名狼藉的第三国际，是在莫斯科的赞助下组成的。可是这些伟大运动的影响，看起来似乎已被那位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缔造者的共产主义气质所冲淡；这些气质是心胸狭窄，绝对不能容纳不同意见的那种愤激如狂的态度，那种惟我独尊的架势，和那种对民主政体深恶痛绝的姿态。

马克思在他长期的放逐生活中，如果除了从事工人革命运动外别无所为，就不会成为今天世界上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马克思不过是十几个革命者中之一，而且决不是其中之最有成就的，他不过是许多社会主义宣扬者之一，而且关于新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写。他的决定性贡献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于历史的辩证唯物论，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前景的悲观分析。

在 1929 年采用的共产国际纲要——《共产党宣言》的一种后期的重新陈述——里我们读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完全证实了

①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于 1924、1929—1935 年任首相；皮苏斯基（Pilsudski，1867—1935），波兰将军，政治家，于 1918—1922 年任波兰总统。——译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这些规律无可避免地要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说的是些什么规律呢？就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说来，他所作出的是什么样的预测呢？

答案就在那部巨著《资本论》中。就马克思在极度痛苦的折磨中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说来，这部书居然会完成，是非同小可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根本没有完成。在进行过程中前后经过了18年，1851年说，将在"5个星期内"完成，1859年说"在6个星期内"，1865年说，已经"告成"——实际上所完成的是一大捆字迹模糊的手稿，要用两年时间才能编成第一卷。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时，还有三卷有待整理。1885年，恩格斯发表了第二卷，1894年发表了第三卷。最后的第四卷到1910年才出现。

全书计2,500页，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读完。这是个何等惊人的纪录！其中谈到的有些是至微极细的技术问题，把一些数理方面的枝节缠得人筋疲力尽，有些则在字里行间，充满激情和怒火。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读尽了在他之前的每个经济学家的作品，是一个德国式的迂夫子，对于写脚注有强烈爱好，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批评家，他会说，"资本是无生命的劳动力，是个吸血鬼，只是靠吸取有生命的劳动力的鲜血生存"，他告诉我们，资本进入世间以后，它"从头到脚，从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鲜血，充满着污垢"。

然而我们却不可匆匆作出结论，认为这只是于痛斥万恶财主的罪恶时的一些有偏见的和表现得过于暴躁的插话。这部书充满了关于暴露人同他所假设的对手之间发生的一切复杂情况的评述，使人感到十分怪特的是，它把道德上需要考虑的方面完全隔开。这部书是在怒火满腔的情况下写成的，却用冷静的逻辑来进行分析。马克思为他自己树立的目标是，发现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倾向和运动的内在规律，他在这样做时，却避不使用单是罗列明

显缺点，这种比较轻松但说服力较小的方法。他所使用的方法是，树立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极度严峻和纯粹的资本主义，在这个纯化的、抽象的制度范围以内的，是一个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在这里，所有现实生活中的显著缺点都被清除干净，然后从事寻找他所追求的“猎物”。因为，如果他能够证明，即使是尽可能好的资本主义，也仍然肯定要走向灾难，那就不用说，现实资本主义也必然要走上同一道路，不过走得更快些，要证明这一点，那就不须费多大气力了。

于是布置了这样一个场面。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没有垄断，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人的特殊利益。这里每件商品都刚好按照其应有的价格出售。所谓应有的价格就是它的价值——这是个难以捉摸的词。马克思说（主要是追随李嘉图），商品的价值是在它的内部所含有的劳动的量。如果做一顶帽子所需要的劳动比做双鞋大一倍，那么，帽子的售价将比鞋子高一倍。当然，所谓劳动并不一定是直接的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要扩展到许多商品的企业管理劳动，或者是一种劳动，把它投入机器的制造以后，会通过机器缓慢地转移到所制作的产品中。但是，不管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一切事物都可归纳为劳动，因此，在这个完美的体系下，一切商品都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直接或间接的劳动量来定价。

在这样一个场面上，在资本主义这出戏里有两个大主角：工人和资本家——地主已降级到社会中的次要地位。这两个主角已经不完全是他们在早期类似的场面上所担任的那样的主角。工人已经不再是迫切要求生殖的奴隶。他们已是一个自由的谈判力量，在处理他所拥有的唯一商品——劳动力——时，在市场上居于中心地位，如果他的工资有所提高，他不会那样傻，用自拆台脚的增加生育的办法把他的钱胡乱花掉。

资本家所面对的是一个竞争场所。在叙述1860年英国的事态的书中，对资本家对财富的贪得之心，形容得淋漓尽致，语带讥讽。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专为求财而求财，而是个企业拥有者，同他同类的企业拥有者从事于无休无止的竞赛，他必须努力积累，因为在他所活动的竞争环境中，要末进行积累，要末被别人"积累"了去。

舞台布置好了，角色要上场了。但是现在出现了第一个困难。马克思要问，在这种情况下，利润能存在吗？如果一切事物都严格按其价值出售，那么，谁得到那份自然增值呢？没有人敢把他的价格提高到竞争价格之上，即使一个卖者要诈骗一个买者，这个买者也只须向系统中的别处，在少花这么些钱的情况下去买就行了——这么说，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别一个人的所失。那么，如果一切事物都照它应有的价值进行交换，就整个系统来说，怎么会有利润呢？

看起来这就好像是个似非而可能是的论点。如果假定，系统中是存在着垄断的，因此就可以不必顾到竞争使价格扯平的力量，或者承认资本家在偿付劳动时，所支付的低于其应有价值，那么，对利润是容易进行说明的。但是，对于这些，马克思概不容许存在，这里说的是，将自掘坟墓的纯粹的资本主义。

他看到在这个困难问题的答复中，有一样商品是与其他一切商品不同的。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工人，跟资本家一样，是严格按照其价值出售其商品的。这个价值跟一切其他出售的商品一样，所体现的是投入商品的劳动量，既然是这样，这就是"制造"劳动时所需要的那个劳动量。换句话说，一个工人的可售能量所值的是，社会在使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情况下所需要的劳动量。斯密和李嘉图对这一说法是会完全同意的：一个工人的真实价值，是为了使他得以生存时所需要的工资。这是使他得以维持生活的

最低工资。

迄今为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涉及利润的要害问题。向对方订约从事工作的工人，只能要求他所应得的工资。我们已经看到，工资究竟多少，取决于使一个人能生活下去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量。如果为了维持一个工人的生活，每天需要工作 6 小时(如果 1 小时工作定价 1 美元)，那么，他的“价值”就是一天 6 美元。没有别的了。

但是，工人订约从事工作时，并不是每天只工作 6 小时。6 小时是刚够养活自己所需要的工作时间。正相反，他同意工作足足 8 小时，或者，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天 10 小时，甚至 11 小时。因此，他所生产的是，足足 10 小时或 11 小时的价值，而他所取得的却只是按 6 小时计的工资。他的工资只能抵偿他的生活费，那就是他的真实“价值”，但是，作为回报，他使资本家可以享有他一整天所生产的价值。这就是利润所以会加入体系的原因。

马克思把不受报酬的这部分工作叫做“剩余价值”。但是，这同道德上的义愤是全然无关的。工人只有享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权利。他已得到了他应得的全部。但是，同时资本家却得到了工人整个工作日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个工作时间长于他所偿付的工作时间。因此，资本家出售其产品时，他可以按照它们的真实价值出售而仍然可以获得一项利润。因为体现在他的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多于他所不得不偿付的那部分劳动时间。

这种事态是怎么会发生的呢？这是由于资本家在一件事上是居于垄断地位的——这就是拥有生产资料本身这件事。在私有财产法的安排下，资本家“控制”着就业机会。因为他们拥有人们借以劳动的设备，如没有这些设备，人们就无法工作。如果某人不愿意工作到资本家所要求的时间，他就得不到工作。跟系统中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工人没有权利、也没有力量要求使作为一项商品的

他自已的价值有所增加。体制是完全公平的，可是一切工人都受了骗，使他们不得不在使自己生活上得以自给时所需要从事的工作时间以外，从事于工作较长的时间。

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奇怪吗？别忘了，马克思所谈的那个时代，其工作日是长的，有时长得使人难以忍受，那时，大体上说来，工资仅仅略高于足以维持生活的程度。剩余价值这个想法，在一个“血汗工厂”在极大程度上已成为过去的社会中，也许认为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却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思维的产物。这里只须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862 年在曼彻斯特一个工厂，在一个半月期间的平均工作周是 84 小时！在以前的 18 个月期间，是 $78^1/_2$ 小时。

但是所有这些，说的仍然是一出戏剧的布景。我们已经有了主角，有了他们的动机，有了情节的线索——“剩余价值”的发现。现在要让这些角色动作起来。

所有资本家都享有利润，但是他们都在竞争。因此，他们都在努力进行积累，企图在损害他们的竞争者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产量。但扩大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增加工人，为了争取工人，在资本家之间就得相互竞争，于是工资趋于上升。与此相反，剩余价值则趋于下降。看起来好像是在马克思主义下，将面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资本家所面临的困境——利润将被上升中的工资所吞噬。

斯密和李嘉图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每次工资的增长会使工人队伍发生增加人数的倾向。但马克思拒绝考虑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对此不屑一顾，只是说马尔萨斯的论点是“对人类的污辱”——总之，无产阶级是未来的领导阶级，不会这么目光短浅，只是由于放纵于肉欲，而把自己的收益浪费掉。但是，他的论调对资本家也同样起了援救作用。他说，他们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来对

付工资上升的威胁。这会使部分工人丧失工作，从而造成工业后备军，这将与斯密和李嘉图日益增长着的人口发挥同样的作用，使工资迅速回降到原来的"价值"——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价值。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酷的问题。看起来好像资本家已经获得挽救，因为他利用机器造成工人失业，从而阻止了工资上升。但是事情没有这样称心如意。他正是在为自己力求多福的这一进程中，此难方脱，彼难又起。

他用机器来代替人的时候，同时他也就是用无利可图的生产方式，来代替有利可图的生产方式。在这个不易了解的社会中，单靠精明、厉害的讨价还价，是没有人会获得利润的。对一个资本家说来，一台机器，不管它所值多少，可以肯定，他必须付出十足的价格方能取得。如果一台机器，在其整个使用年限中，可以产生价值1万美元的收益，那么，可以假定，资本家必须首先付足这1万美元。他只是在活劳动中才能获取利润，只能从剩余的工作时间，即不给报酬的那部分劳动获取利润。因此，他如果减少工人人数或比例，就等于杀鸡取卵。

然而，他扮演这个倒霉的角色也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行为中，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他只是凭他的要进行积累这一冲动行事，只是希望不要脱队，可以同他的竞争者并肩前进。当他的工资支出在上升时，他必须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来削减成本，对他的利润起挽救作用。他如果不这样做，他周围的竞争者将捷足先登。但是，由于他必须以机器代替劳动，就必然要缩小他滋生利润的基础。这就像是一种希腊式戏剧，在那里，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人都趋于死亡，人人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共同合作，走向覆没。

现在木已成舟，利润已经在缩减，于是每个资本家加倍努力，在他工厂里设置节省劳力、削减成本的新机器。他所以还能赚取利润，只是由于在行列中跨前了一步。但是，由于大家都在做完全

同样的事情，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对总产量的比例将更进一步地缩减。利润率将下降，再下降，直到灭顶之灾已在面前。利润已经削减到使生产不再有利可图的程度。以机器代人力之后，消费缩减了，因为可雇用的人数不能与产量并驾齐驱。于是倒闭、破产接踵而至，争先恐后地在市场上倾销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小型商号即告沦亡。这时，资本主义危机已近在眼前。

危机并不意味着游戏的结束。工人失去工作以后，会被迫接受低值工资。此时机器堆积如山，资力比较雄厚的资本家就可以用低于真实价值的价格取得机器。过了一阵，剩余价值又重新出现，前进的过程又重新开始。于是，每一次危机有助于更新这一制度扩张的能力。危机——现代语言称之为衰退或萧条，是这一制度运行的方式，而非衰落的方式。

然而，这一过程确实是非常独特的，每一次更新都导向相应的终结：竞相招募工人、工资提高、机器代替工人、剩余价值的基础缩小、更加疯狂的竞争、另一次危机——比上次更严重的危机。在危机发生期间，较大商行会并吞较小商行，但是，最后当工业巨头垮台时，所造成的祸害，会比小型企业覆没的情况严重得多。

最后，这出戏会演到终场。马克思对于这一幅人间地狱图景的描绘，写得淋漓尽致："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巨头，势力日益集中，人数则日益减少，这些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篡夺并垄断了一切利益，而广大穷苦人民所遭受的却是压迫、奴役、落魄和忍受剥削；但是，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也在增长，这个阶级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他们既有纪律又团结一致，实际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过程中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终于达到了与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一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这出戏将以马克思凭辩证法所推想的顺序收场。体系——纯

粹的体系——在演变过程中会把它自己活力的根源，剩余价值，挤掉，从而趋于崩溃 由于经济在本质上是无计划的，因此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就加速了崩溃的进程，虽然有些力量会对这一结局的到来起拖延作用，但其最后的死亡结局是逃不了的。

这与早期的观点是何等的不同。在亚当·斯密看来，至少就可以预见的将来而言，资本家循着这架自动扶梯，是可以扶摇直上的。在李嘉图看来，由于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栽种作物的农地不足，使进展趋于停顿，而交运的地主则大发横财，向上运动的通道，因此将受到阻塞。在穆勒方面，由于他发现社会可以按照它认为合宜的方式分配其成果，而不须看“经济规律”的眼色行事，因此对前途的发展比较有把握。在马克思看来，即便予以挽救的可能性也不具备。因为唯物史观告诉他，国家只是经济管理者的政治统治机构，有些人认为它可能作为一个中性机构履行职责，作为一个第三种力量，在其互相冲突的成员中起平衡作用，这种想法似乎没有别的，只是纯粹的痴心妄想。体系内部演变的必然结果是无可避免的，体系的这种无可改变的发展，不仅会毁灭它自身，而且会产生它的后继者。

至于那个后继者看上去像个什么，马克思对此很少敷陈。它将是“没有阶级的”，当然，马克思的意思指的是，社会一经拥有了生产商品的一切手段，社会以财产为依据的经济分配基础将被消除。至于社会将怎样“拥有”这些财产；“社会”的含义是什么；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首领与老百姓之间，是不是会有剧烈的对抗——这些马克思都没有讨论。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有一段“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以后，将是“纯”共产主义本身。

必须记住，马克思不是共产主义的缔造者，这个艰巨任务是要落到列宁的肩上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的“末日裁判书”，至于上帝最后审判日以后的人间乐园的外相是什么样的，在马克思所有

著述中几乎都没有提到。

我们将怎样理解他的启示录式的论证呢?

要处理这一整个问题并不难。要记住,体系是建立在价值——劳动价值——之上的,而体系死亡的关键在于所谓剩余价值这一特殊现象。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由"价值"构成,而是由真实的、有形的价格构成。马克思必须证明,以金钱衡量的社会所反映的,是与他所创造的抽象社会大体上相近似的。但是,从一个价值世界,过渡到一个价格世界时,他却陷入了高度的数学纠缠之中,实际是,他犯了一次错误。

这并不是一种无可挽救的错误,经过一次更严重的数学上纠缠之后,是可以把马克思的方程解"对"的。但是,指出这个错误的评论家,无意于把方案搞正确,就把对马克思犯"错误"的评判看成是确定了的。这些方程最终加以整理之后,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因为,除数学上纯洁性问题不计外,马克思的模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真的能够在垄断世界或科学技术进步中运用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吗?马克思真的解决了用"劳动"来度量价值的困难了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继续使马克思主义学者坐立不安,并且已经诱使大部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这整个框架归之于棘手和难以改变的问题。然而这样做,却忽视了马克思分析的两个独特性质。

首先,它不是另外的一种经济学模型。马克思赋予了社会研究一种新的任务,即经济学自身的批判。《资本论》用了很大的篇幅表明,早期的经济学家没能了解他们所从事研究的真正挑战。例如,斯密和李嘉图碰到过的价值问题。虽然成功的程度不一样,他们都试图表明价格如何反映——或不能反映——物化在不同商品中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指出，这还不是真正使人困惑的问题。使人困惑的问题是，男人和女人的实际劳动那么不同，怎么能够把"劳动"作为价值的一般决定物呢？李嘉图曾用捕获一条马哈鱼和杀死一头鹿的劳动时间来建立他的交换比例，即价格。然而，没有鹿是用鱼杆杀死的，猎手在丛林里也捕不到马哈鱼。那么人们怎么能用"劳动"作为决定交换比例的决定物呢？

马克思认为，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劳动——抽象劳动，一种撇开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个人归属的劳动，一种能像小麦和煤炭那样买卖的劳动。从而，劳动价值论的真缔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想的那样，是价格决定的理论，而是一种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社会制度被证实的理论。这一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社会力量（如圈地运动）已经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他们除了像出卖商品那样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纯粹的劳动能力——外，别无所有。

这样，马克思发明了一种使经济学焕然一新的"社会分析"方法。除了这一有特色的贡献以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模型虽然笨拙，但是它也似乎表现出它自身的一种生命力，并且是一种出色的方式。如果它的基本假定（角色的场景安排、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环境）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它所展示的状况便会变动，且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变动。我们业已看出了这些变动：利润如何下降，资本家如何去寻求新的机器，每一次景气如何又以新的衰退收场，小型企业在每次经济萧条之时如何被大公司吞并。马克思把这些"趋势"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资本主义未来将踏上的通路。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些预见中有那么多竟已成为现实。

企业经济中的利润确已趋于下降。这个见解不是马克思所首创的，利润的下降也不是出于他所提示的原因。亚当·斯密或李嘉图或穆勒曾指出（任何商人会同意）竞争和工资的压力的作用，

也同样能说明问题。除了一些坚不可摧的那类垄断(那是很少见的)之外,利润既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也是它的唯一弱点,因为没有一种商业可以使其利润永远保持远远在它的成本之上。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使高额利润永久存在,那就是商业(或者整个经济)必须不断发展。

但是需要增长就要牵涉到马克思模式的另一预言——对新技术不停地探索。工业资本主义始于产业革命,这并非事出偶然,马克思已经说清楚,技术进步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伴随物,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种商业要使它存在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使它有所革新,有所发明,并且从事实验;在这个富有进取心的世界,单以过去的成就为满足,是不能久存的。近来一个大型化学公司宣称,它从它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其中60%是从10年前所不知道的产品中得来的,虽然这是个特别以新发明为重的工业,但工业发明与获取利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

马克思的模型表明资本主义还有三种趋势,这也已经实现。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作出证明近百年来商业循环现象的存在和大型企业的涌现。但是我们可以谈一谈,马克思作出预言时的那种胆识。虽然未来的事件已经证明了他关于周期性繁荣和崩溃的预测,但马克思时代的其它经济学家却没有认识到危机趋向(我们称之为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对于商业界而言,当《资本论》问世时,大型企业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在市场上当家作主的仍然是小型企业。在1867年时说,大企业将在商业舞台上占支配地位,这种预言的耸人听闻的程度,不亚于在今天说,美国在50年之后,小业主将取代大公司。

最后,马克思相信,那些微小和独立的工匠以及个体工人不能抵抗大量生产的压力,于是,更大量的劳动力将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成为一个"无产阶级"。这是事实吗?是的,

在19世纪的前25年中，大约3/4的美国人是为自己劳动，或是从事耕作，或是经营小商铺。今天，只有大约1/10的劳动力是自我雇佣的。我们这里还没有把政府职员、公共汽车司机和银行职员等算入无产阶级之列，然而，按马克思的定义，他们也都是必须将劳动力提供给资本家的工人，而与农场主或补鞋匠不同，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总而言之，这一模型展示了非凡的预见能力。要晓得，这些变动既深远又可惊，在马克思眼中，单凭对社会进行检查，是不可能发现的。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变化，其演进是缓慢的，是需要时间的，其真实性就同一棵树的成长一样，是不容被注意到的。只是把经济体系归为一个微观世界，然后从中观察其加速了的成长进程，才能理解其未来倾向。

当然，作出的预测不可能是精确无误的。马克思认为利润不仅将在商业循环范围以内下降，而且将显示一种长期的向下趋势，这一点却未见发生。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缺点（我们将会看到，所作出的一些预言远不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式将如何运转的这方面的先见之明，是非常惊人的。

迄今为止，所提到的马克思作出的一些预言，就整个资本主义的前途看来，毕竟是无伤大雅的。可是，读者当还记得，模式中还有个最后预言，这就是，马克思的“纯资本主义”的终于崩溃。

在开头时就曾经说过，对这一预言是不能轻轻抹煞的。在俄国和东欧，资本主义已经消失，在德国和意大利曾经一度陷入法西斯主义。战争、蛮横无理的政权，命运的播弄，革命者的坚决努力，在其中固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无可否认的残酷事实是，这些变化主要是出于马克思所预见到的原因：资本主义在垮下来。

它为什么会垮台？部分是由于马克思已经说过会产生的那些动荡不定的因素。一连串商业循环，伴之以战祸频仍，使体系中的

中下阶级丧失了信心。但这不是个完整答案。欧洲资本主义所以失败，主要不是由于经济的而是由手社会的原因，而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所预示了的！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体系中经济上的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虽然反垄断法规和反商业周期政策，在马克思时代还没有发现，但这类活动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就马克思的想象力而言，认为在物质意义上是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东西的。马克思关于衰变的意见，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想法上的，按照这种想法，由政府来纠偏匡缺，在社会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在理智上、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不可能的。要消除资本主义的缺点，就得有一个超出单独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府，这就得假定，人们能够从他们直觉的经济上自私自利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马克思的分析使这一假定大有疑问。

正是由于缺少这种社会灵活性，由于受到了目光短浅的利益观念的束缚，削弱了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资本主义。当时许多国家所坚持要走下去的道路，正是马克思所坚决认为要走向覆没的道路。对于一个读过他著作的人来说，现在回想起来，是有些心惊肉跳的。这些政府就好像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为了要证明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就顽强地做着他说它们会做的那些事。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一切民主的工会都被残酷扑灭，在英国和德国，垄断企业和卡特尔都受到官方的鼓励，当这个时候，马克思的辩证法真是显得有些咄咄逼人，其兆不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人们想到法国、意大利或希腊的资本主义政府，对它们的企业团体不能征收到足够的税款时，当人们视察到贫富之间的巨大悬殊，而看到的迹象是后者对前者全不关心时，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感到马克思为他的历史剧选派的一些心理上定型的角色栩栩如生，就像是从实物摹写得来的。

这一期间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也有反动分子和革命者。在美国的经济史上充满了剥削和丑恶行为。不过这里的资本主义演进时所处的地区，没有接触到贵族世系和古老的阶级观念那类影响作用。由此造成了美国的社会风气，它在某一程度上，比欧洲的粗糙，因为这里的情况是，个人已经完全为大规模工业化环境所压倒以后很久，才沾上了“粗鲁而朴实的个人主义”信条，而欧洲传统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的想法，则是与公然的阶级划分同时存在的。然而，由于美国的背景与众不同，对待公私权力有某种实用主义倾向，对民主观念则普遍抱赞颂态度，从而导使国家安然越过暗礁，这个暗礁使许多国家撞得头破血流。

对马克思分析的回答，就包含在这种应付变化能力中。实际上，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历史）时越是深入，就越加感觉到马克思思想的洞察力值得重视，也越加清楚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他所断定的资本主义内部的问题，有许多依然存在，首先是经济不稳定及财富和权力的集中的倾向。可是，不同国家对同样问题的应付办法是大不相同的。例如挪威，根据马克思的标准（生产资料主要由私人拥有，市场结构大概是要产生剩余价值的），肯定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把所产生的收入，借助于一个特制的再分配计划，抵销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挪威是世界上最重视平等主义的国家之一。日本，从它的结构和外表看，肯定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它的一些大型公司，经过一个试验期之后，对它们的全部职工，实行保证终身雇用。法国的全国性规划，有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英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来，是实行残酷剥削的足以引以为鉴的一个实例，它已经首先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保障制度，如廉价住宅的供应等等。瑞典在马克思写作的时代，对人民的苛刻和压制至少不亚于英国，现在就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说，大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现在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结构，有很大的适应性。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它的一切问题。但是，以上述各国为例（还可加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看到马克思方案中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那种演变方式，已经不再可能；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地进行适应和演变。以美国为例，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一段期间，由于它富于灵活性和实用观点，以资本主义成就说，使这里的成就超过了国外，但是近年来看到的情况似乎有所转变，就社会的反应力而言，这里反而逊于国外。然而，美国一度曾起到先锋作用，现在带头前进的那些国家，以前曾居于后卫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即足以充分证明，未来不是预先注定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说来，“资本主义”仍然意味着，用19世纪50年代旧式的英国资本主义格局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国家，其地的制造商气量狭窄，其政府则反动无比，但20世纪的成就（和失败）使我们看到，今日的资本主义同已经出现的任何的社会主义一样，也能造成一个正派的社会。

然而，除了“不可避免的灭亡”之类的一些愤激之谈外，马克思的分析是不能漠然置之的，它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曾经经受过的最严重、最深入的一次检验。这不是在道德标准下进行的一次检验，不是对利润动机不公正指手画脚、喋喋不休地进行指责——这是革命者马克思的资料，不是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资料。马克思的分析尽管有激情的一面，可是他作出的评价是心平气和，不带偏见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研究结果，尽管使人见了觉得不愉快，但确是贴切和中肯的。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不只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葬礼悼词中，恩格斯说：“如同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进化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这些赞美之词也许有些

夸大，然而，恩格斯却是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这样一种观点的非凡重要性，即马克思把历史进程视为社会阶级争夺最高权力的舞台。就像弗洛伊德教会我们透过个人行为的外观而把握人们的心理过程，或者像柏拉图教会我们透过未证实观念的表象来把握所掩盖起来的哲学问题一样，马克思也教会了我们洞察历史，而不是观看历史。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这一名字和弗洛伊德及柏拉图一样长存人间的原因。马克思肯定不像强加于他的偶像崇拜那样一贯正确。他最好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绕开(unavoidable)的伟大探险者，他的足迹已经不可磨灭地留在他所发现的社会主义大陆上。所有希望继续对此探索的人，不管他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发现，必须尊敬这个首先为人类获取了它的人物。

第七章　维多利亚时代和经济学的地下派

卡尔·马克思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患了不治之症，虽然没有为它规定明确的时间表，但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作垂死的挣扎，死期已迫在眼前，它的近亲共产主义者正在留神听着，等它双眼一闭，这位近亲就要袍笏登场。甚至在《资本论》于1867年问世以前，这种在病榻边的守候即已开始，每一次病情加重，或是工业萧条的情势加剧，看守者即奔走相告，认为最后一次革命的时刻已迫在眉睫。

但是，制度并没有死亡。诚然，马克思的运动规律已经为一系列事态所充分证明：大企业变得越来越大，一再发生的萧条和失业使社会备受折磨。但是，跟这些不吉之兆的证实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被马克思说得活灵活现的预言却未见着落——无产阶级将"日益贫困"之说却未见实现。

实际上，关于马克思的所谓贫困化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存在长期的争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马克思的含义仅仅是劳动阶级的更大部分将经受作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贫困"，那他是对的。但如果他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条件将日益贫困，那他就错了。

确实，一个皇家委员会被召集起来调查1886年的大萧条，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表示相当满意，这并不是阶级辩护士的庇护性的假话。生活条件更好——可以感觉到的和有意义地更

好。回顾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罗伯特·基芬（Robert Giffen）写到："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在50年前，工人的工资只是他们现在的一半或不到现在的一半。在那个时代，他们不得不与面包价格的波动去抗争，面包价格的上涨就绝对意味着饥饿。事实上，在50年前，间发性的饥饿正是整个英国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到目前的时代，基芬写到，虽然价格上升了，但工资提高得更快。这是第一个时代，英国工人正在挣足够的钱来保持体力和智力。这是对过去的一个悲哀的评论，但却是对未来的一个充满希望的预兆。

不但工资在上升，而且剩余价值的来源也在削弱，工作时间比前缩短得多了。例如，在费罗造船厂和纽卡斯尔化学厂，一周的总工时从61减到54小时，即使在血汗劳动制下生产的纺织厂，其定额工作也不过每周57小时。一些工厂主在抱怨，他们的工资成本已上升了20％以上。虽然，要取得进步是要花费代价的，但这种代价却在产生无形的效益。当情况有所改善时，1848年的那种低沉的怨声就会平息下去。一位斯塔福郡的制造商谈到他所雇用的工人的态度时作证说，"只要使他们能各得其所，他们就无意于谈论政治问题"。

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趋向。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哀叹说，"英国的无产阶级越来越资产阶级化，结果是，这个所有国家中最资产阶级化的国家的目的似乎是在于拥有一个资产阶级贵族和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以及一个资产阶级"。

显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死亡已迫在眼前的说法未免过于草率。当然，对一个忠诚的信徒说来，在他的意念中可以感到自慰的是，对意外的事变可勿介意，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两个世代的情况只算是个小小的插曲，所谓"不可避免说"仍然是站得住脚的，

就是说，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者说来，维多利亚时代大繁荣的意义还别有所在。世界又显得对前途充满信心，生气勃勃，对于像马克思那样持异议者的预言，似乎被看成只是一个心怀不满的无赖的胡言乱语。情况是，马克思所准备的“智力炸弹”并未爆发，几乎全无声息，结果他所遭遇的并不是一阵谩骂，而是对他的说法漠不关心。

当经济学在时而是一个哲学家，时而是一个证券经纪人，时而是一个革命者的手里时，他们所阐明的是社会在行进中的整个通道，后来的经济学已变成学者、教授的特殊领域，而他们的探究所投射出来的只是一点一线的光亮，而不像早期经济学家那样阐发出来的是灿烂的烽火。

所以会这样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已经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已涉身于 19 世纪后期进步与乐观的康庄大道上。改进的气氛弥漫空间，这就十分自然，人们会较少地注意到关于航程的性质那类徒乱人意的问题。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产生了一大批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者，这些人所从事的是，极其详细地检查制度的活动方式，而不是对其基本成就有所怀疑，或者是，对其最终命运预示凶兆，从而徒然引起人们的烦恼。于是出现了一批新的专家，形成指导经济思想的主流。这些人的贡献有些是重要的，却不是非此不可的。在这些人，如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斯坦利·杰文斯，约翰·贝茨·克拉克以及其周围的许多专业者的心目中，在经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什么“狼”，因此在经济理论的领域中，不需要说明什么掠夺性活动。世上布满的都是和善之辈，都是“羊”。

对于这个“羊”的性质描绘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一册篇幅无多，叫作《数理心理学》的书，这本书出版于 1881 年，刚好在马克思死前两年。写这本书的人并不是什么第一流人物，但也许是最能揭露

情况的。他作为一个教授，性情有些怪特，还有些怕羞，名叫弗朗西斯·埃奇沃思，是玛丽亚·埃奇沃思的侄子，后者曾同李嘉图一道玩过一种字谜游戏。

埃奇沃思无疑是个有才华的学者。当他在牛津大学参加期终考试，需要解答一个特别难解的问题时，他问主考人"要从简答还是从详答"，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且不时在答复中插入希腊语，使主考者听得目瞪口呆。

但是埃奇沃思之所以醉心于经济学，并不是由于他对社会发生了辩护、解释或谴责的想法，也不是由于他对未来想开辟光明的或黑暗的新的前景。这个怪人所以醉心于此道，是由于经济学是同数量打交道的，凡是同数量打交道的任何事物是可以转化为数学的！在转化过程中需要放弃早期经济学家那种充满紧张情绪的世界观，由此得到的回报是精确和严整的世界观，因此，所得是大大超过所失的。

要建立这样一个对现实的数理式反映，就得将现实世界予以简化。埃奇沃思的简化办法是假定每个人都是一台寻欢乐的机器。杰里米·边沁于19世纪初首创的一个想法是，用一个迷惑人的名称"幸福的计算者"来表示的，在他的哲学观点下，把人类想象成那么多活着的损益计算者，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安排他的生活，使他的"心理上的加法机"的快感扩大到最大限度。埃奇沃思则对这一总的哲学思想给以数理上的精确性，从而产生一个"经济上的乐园"。

在采取这样一个观点的一切人之中，埃奇沃思似乎是一个最不适合的入选者。他自己似乎是一台可以想象得到的、构造得最差的寻欢作乐的机器。他是神经质地怕羞的，不喜欢同人一起寻欢作乐，只想离群索居，他讨厌有助于物质享受的那些东西，大多数人以拥有这些东西为乐，而他则所取甚少，他的屋里是空荡荡

的，所需要的图书是取之于公共图书馆的，他甚至连陶器、文具和邮票都没有，他最大的享乐似乎是构造他想象中的经济乐园。

但是，不管埃奇沃思具有什么样的动机，他的寻欢乐机器的假设，已经结出了奇妙的智力上的果实。如果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对每个人在竞争中可以从社会得到的那一份快乐的、那一类寻欢乐机器的研究，那就可以证明——在微分的无可辩驳的情况下——在完全竞争的社会，每台寻欢乐机器会从社会中得到最大量的快乐。

换句话说，这是个尽可能好的世界，或者说得再准确些，是个能够达到的尽可能好的世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作为一个完全竞争的竞赛场组织起来的。人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单顾自身利益，而不暇计及由此发生的不利后果，例如工会，是与人各为己的原则直接抵触的，同时无可否认的是，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使这种比赛的出发点在绝对中性上有所削弱。

埃奇沃思说，这不用担心，大自然对这一点也已安排好了。工会用联合行动的办法，就短期说也许有所得，但从长远观点看，必然有所失，然而，这只是理想的社会结构中一个短暂的缺点。如果认为高贵出身和广大财富在开始时似乎要损及经济竞赛的结果的，那么，那也可以用数学心理学来求得缓和。大家都是寻欢乐的机器，而有些人，与别人相比，却是较好的寻欢乐机器。例如，以男子与女子相比，一般说来，至少在心理上比较地善于积财；又如，有些人与工人阶级老粗式的寻欢乐机器相比，由于对“技巧与才能的贵族气质”具有敏感，比较地倾向于讲究吃喝的生活。但是，数学—微积分—心理学，仍然可以很好地起作用；实际上它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们在现实世界上看到的按性别和身分地位的划分，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数学心理学还不只是使保守主义原则合理化。埃奇沃思确

信，他对人类活动的数理上的敏锐识力，会对现实世界产生有益的结果。下面是他在数理分析中使用的方程：

$$\frac{d_2y}{dx^2} = \left(\frac{d\pi}{dx}\right)^2 \left(\frac{d_2\pi}{dy_2}\right) - 2\frac{d\pi}{dx} \cdot \frac{d\pi}{dy} \left(\frac{d_2\pi}{dxdy}\right) + \cdots$$

埃奇沃思写道，"所要考虑的是这样高度抽象的理论，要把它同实践中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当然是显得有些荒谬的。但是每一个行动步骤，必然来源于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感觉的动机，这里把它们追溯一下，未必是不恰当的"。

"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天晓得！当亚当·斯密看到，把他文章中所叙述的富有进取心的商人，贪得无厌的雇工和成倍增加的工人阶级，转化成许多类型的、了无生气的欢乐追求者，他将作何感想？事实是，亨利·西奇威克——埃奇沃思的同时代人，J.S.穆勒的信徒——曾愤怒地说，他并不是由于吃得太饱才进餐，而是由于感到饥饿才进餐。但抗议也没用；数学心理学这一规划是这样巧妙、有趣，使一切烦恼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都不存在，使一切社会冲突的想法都不沾边，因此其成功是可以立见分晓的。

试使政治经济学不涉及人的属性的企图，埃奇沃思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甚至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一个完整的数理经济学派已逐渐形成。德国有个叫J.H.冯·杜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公式，据他说，这个公式可以产生公正的劳动工资：

$$\sqrt{a \cdot p}$$

约·冯·杜能说，在他墓碑上能刻上这么一句，他就感到很满足了；我们不知道工人对它是怎么想的。法国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利昂·瓦尔拉，他说用数学可以推断出恰好可以出清市场的一个正确价格；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为市场上每一个经济项目准备一个方程，这样的方程为数将盈千累万，就得有能力从这样的情况中解决问题。但是，不用为这方面的困难担心，问题是可以

从理论上来解决的。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位名叫W.斯坦利·杰文斯的教授，写了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把生存竞争化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他说，"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性质上是纯数理的"，把经济生活中无法同他的规划相配合的每个方面，一概置于他注意力的中心之外。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计划（然而，天命不假他那样做）写一本《经济学原理》的书，重要的是他把政治经济学叫做经济学，这个说法现已成为老生常谈。但是，这类说法并非全部都是无稽之谈，虽然，它们大部分确实荒谬。经济学毕竟是与人类以及人类活动的集合体有关的，它同原子的集合体一样，也要遵守统计规律和概率法。这样，由于这些学者将他们的视角转向了均衡——一种作为谋求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偶然碰撞结果的市场逐渐接近的状态，所以，这类说法也的确阐明了社会的一些趋势。瓦尔拉的方程组也可用来揭示社会系统静态时的性质。

问题是，一个"静态"的系统能否真正揭示社会宇宙的现实——尤其是基本的现实？早期的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穆勒，自然还有马克思，在他的心中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即就其本质而言，社会是扩张的。确实，这种扩张可能遇到障碍，可能脱离主流，或者可能进入经济低潮，然而，经济世界的中心力量是与增长不可分割的。

在这种把均衡作为该系统的最具吸引力、最富展示力之重心的思潮中，缺少的正是早期经济学家的这一基本概念。突然，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的社会列车，而被视为一个驯从的、缺乏历史感的组织方式，这一制度的驱动器——曾经激励着早期探究者的驱动器——现在被轻视了、忽视了和遗忘了。在这一新的学派中，无论资本主义经济的什么方面被光大了，但它的历史感却失落了。

这样，作为这个缺乏生气的方程式世界的对应物，地下派经济学也开始繁荣起来。这样一个地下派，即经济学异端邪说的奇异领地① 是一直存在着的。但是它的学说未能达到博得社会尊敬的高度。其中有一个叫伯纳德·曼德维尔的，他的"善即是恶、恶即是善"的诡辩之词，震动了18世纪。他指出，当罪孽深重的富人恣意挥霍时会使穷人获得工作，而严守俭德、一毛不拔的人却不会起这样的作用，他说，私德有亏会有助于公共福利，而独善其身，也许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他在《蜜蜂的寓言》中的那种诡辩式的训诫，是18世纪所无法接受的。结果，他的书于1723年由朱德尔塞克斯大陪审团宣判为社会的害物，他本人则被抛入经济学的垃圾堆。

早期的那类气质怪僻和假充内行的人，已大都被斯密或李嘉图这样一些思想健全的思想家所排除，而现在这个地下派由于别种原因，又有了它的新成员。在经济学领域内，要把人类的行为和动作全面地提上论坛进行讨论，现在已没有多大可供发挥的余地。在故步自封的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社会的诊断在道义上抱怀疑态度，或企图指出激进改革之必要的人，已难以被容忍。

于是这个地下派以新的面目出现。马克思是属于这一派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使人不愉快的，其中充满的是，在一个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动物园"中决不会通行的那种举动和行为。马尔萨斯是属于这一派的，因为他的"普遍过剩"想法在算术上是荒谬的，还因为他怀疑节约的好处是同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节约的想法完全格格不入的。空想家是属于这一派的，因为他们说的全是废话，根本不是"经济学"。最后，凡是其学说跟院士们在教室中建立起来的（并且深信在教室外面也是这样）极高明的理论不相一致的任何人，都属于这一派。

---

① 原文为Limbo，系宗教用语，意指地狱的边缘，据说是基督降生前，好人和未受洗礼儿童灵魂所去之地。——译者

这个地下领域，比上述比较风平浪静的那个领域要有趣得多，其中充满了怪异人物，从而迸发了许多纷纭扰攘、离奇怪诞的思想。例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经济思想的进展过程中差不多已被忘怀。此人叫弗雷德里克·巴师夏，是个讨人喜欢的法国人，其生卒年是1801—1850，在这个短促的一生中，甚至在他更加短促的（6年）写作生涯中，他在经济学中运用了最富于毁灭性的武器——讥嘲。他说，看一看这个疯人院式的世界。它花了莫大的气力在山底下开隧道，使两个国家有无可以相通。这以后怎么样呢？作了一番努力以促进商品交流之后，却在山的两面设立关卡，尽力设置障碍，使商品难以通过隧道！

巴师夏善于吹毛求疵，他的那个小册子《诡辩经济学》内容幽默感之浓厚是经济学中从来所没有的。举个例，当建筑巴黎——马德里铁路问题在法国议会进行辩论时，有个叫西米奥特的，主张路线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地方的搬运行李工人、一些大商店、剧院等的门警、旅馆老板、轮船上的船员等等的收入大大增加，波尔多的财富增加之后，法国也就会富裕起来。巴师夏立即抓着这一点不放。他说，说得真妙，其实何必以波尔多为限，"如果波尔多有权可以从路线中断之举获得利益，那么，为了全体的利益，翁古拉姆、波阿图、图尔、奥尔良也应享有同样权利。这么说，我们把一条节节中断的铁路，可以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

巴师夏是经济学界的一个才子，但他的个人身世是够悲惨的。他出生在巴扬，幼年即成为孤儿，更糟的是还得了肺结核，他曾在大学肄业，后来从事商业，但是他没有商业头脑。他又转向农业，但情况也同样不利；就像托尔斯泰小说中那个好心肠的伯爵一样，越是辛苦经营他的家产，事情越糟。他向往英雄行为，但是他的军事冒险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味道：当1830年波旁家族逃出法国时，巴师夏集拢了600个青年，带领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一个波旁

王朝的堡垒。结果是这个堡垒毫无抵抗地投降了，邀请每个人举行了一次盛宴，可怜的巴师夏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所作的一切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他于闲散之余转而注意到经济学，开始阅读报纸，讨论时事问题。一个要好朋友劝他，不妨将他的所见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于是他写一篇关于自由贸易的文章，投给巴黎的一家日报。他颇有独到见解，而且文字的风格尖锐辛辣。这个来自乡间的默默无闻的学者，从此一举成名。

M.德·莫利纳里写道，他来到巴黎，"却没有空去请教一下巴黎的帽商或成衣商，他头发长长的，戴着顶窄小的帽子，穿着件松松垮垮的大衣，手里拿着把雨伞，使人极容易把他看作个普通乡下佬，初次到城市来观光一下都市景物的。

但是这个乡村学者却有一支锋利的笔。他在巴黎报纸上看到法国的议员和部长们，为其贪图私利的政策曲加辩解时，他即以尖刻的言词进行反驳，使巴黎的读者笑得前仰后合。举个例，下院于1840年通过立法，为了保护工业，主张提高对一切外国货的进口税时，巴师夏就写了一篇出色的讽刺作品：

蜡烛、烛台、烛剪、油灯、路灯、熄灯器的制造商
和油类、牛脂、树脂以及一切有关照明的生产者
呈下院议员请愿书

先生们：

……我们正在遭受到一个外来竞争者的无法忍受的损害，它在照明方面的生产，其所处地位似乎远比我们自己所处的优越。它用惊人的低价手段，完全冲垮了我们全国的市场。这个竞争者不是别的，这里所说的就是太阳。

我们恳求的是请你们通过一条法令，命令全国把所有的窗、天窗、圆天窗、屋顶窗统统关闭起来，把所有设在外面

和里面的窗板、门帘、窗帘都放下来，总之，把一切孔、穴和裂缝都堵塞起来。

如果你们尽可能地堵塞一切自然光线的通道，从而造成对人造光线的需求，那么，我们法国制造商岂不会深受其惠？

……如果对动物脂的消费增加，就必然会有较多的牛和羊。如果植物油的消费增加，则橄榄树的种植将扩大，我们的荒地将获得充分利用，种满含有树脂的树。

请你们斟酌而行，考虑时要注意到逻辑性。你们对国外的铁、谷物、纺织品等等，既然由于其价格已相近于零而把它们屏于国门之外，对供应价格已经是零的阳光，如果不把它堵塞起来，岂非自相矛盾！

谈到对自由贸易的辩护，再没有比他（即使有些想入非非）更带劲的。巴师夏所反对的不仅仅是保护关税，此人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学上的矛盾想法都加以奚落。于1848年，社会党人为了对社会有所助益，提出了对事物多考虑些个人爱好的方面，少考虑些其实用性的方面的想法，对此巴师夏在进行攻击时，使用了他在反对旧秩序时所惯用的武器。他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得依靠国家，但是他们忘记了国家的生存也得依靠个人”。

但是，他最恨的、所特别着重的攻击目标是，在“国家利益”的借口下建立保护关税，使私底下存在的贪得之心合理化。有一种做法是，在自由经济的幌子下，为贸易设置障碍；他是多么喜欢破坏这种表面上言之成理，而实际别有用心的想法啊！当法国的执政者建议对进口呢绒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对此议用巧妙的反论作了答复：

他写信给商业部长，“通过这样一条法令之后，人们就只能使用自制的小钝斧，而不允许使用以大木料制成的大斧。原来用斧只须砍100次的，到那时就得砍300次。原来只须1小时就能完

成的工作，到那时就得用3小时。这对劳动是多么有效的鼓励啊！因此，今后如果要有一椽可寄，就得按照我们的土法去构造，就同如果要找件衣服穿，就得按照你们的规定求得供给的情况一样"。

他的批评性意见，尽管竭尽嬉笑怒骂的能事，但实际上成就无多。他到了英国，在那里会见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几个领袖，回来后在巴黎组织了一个自由贸易协会。巴师夏决不是个干练的组织者，这个协会只持续了18个月。

将近1848年，巴师夏当选为国民议会会员。对他说来，在那时似乎又发生了另一方面的危险——人们会过于注意制度不够完善的一面，因此将盲目选择社会主义来代替。他开始写一本书，题名《经济协调论》，他在书里说，世界的纷纭扰攘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追求私利者力量，通过市场锻炼，会起升华作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利益。但是，他的健康情况在日益恶化，受到疾病的折磨，面色苍白，不过在苟延残喘，他迁移到比萨，但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写信给他的友人说，"谢天谢地，我还偷生人世。如果我能确信，死后遗留给我知交的不是深悲极痛，而是温和的、充满深情而有些感伤的怀念，那么，我在弥留的那一时刻，必然是不感到痛苦，而且几乎是感到高兴的。"他在自己的一生结束之前，想努力结束他所写的书。但是太迟了。他在临终时，口中喃喃若有所述，据在旁留神倾听的牧师说，是"真理，真理……"。

他在经济学家灿烂的一群中是个很渺小的人物。他不是狂热的、喜欢参加社会运动的改革者，甚至也不是个较重要的制度建设者。他的功能似乎是在于刺痛一下当时的浮夸作风。但是在他的讪笑和妙语连珠的下面，还存在着一个会使人感到不安的问题：这个制度是不是总是合理的？当公私福利互相抵触时，其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私利为前提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其作用过程却完全不是自动的，它对私利的作用过程到处在起着毒化作用，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能够相信以私利为前提的自动机制吗？

在上述所谓"天堂乐土"的观念下，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官方经济学对这个喜欢讥讽、喜欢开玩笑的人所提出的矛盾现象则不予注意。它只是在计量一方面的精细入微上求进展，泰然地在这个享乐主义的世界中驰骋，对巴师夏所提出的问题则置之不答。当然，数学心理学也绝不是解答"起反作用的铁路"和"小钝斧"这类难题的工具；斯坦利·杰文斯（还有埃奇沃思）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伟大建议者，他说"说实话，关于政治学，我自己也困惑不解。"不幸的是，处于这种情况的不单是他一个。

于是，经济学的地下派继续繁荣昌盛。1879年，它在美国获得了一个新成员，这是个有胡子的、态度文雅而极其刚愎自用的人。他说，"时下教导的政治经济学糟透了，已糟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是由于它已经退化，已经被加上了一道道束缚，其真理已受到歪曲，协调受到了忽视，它对于要说出口的话吞吞吐吐，结果对邪恶的抗议，变成了对非正义行为的赞可。"但是，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这个持异端者坚决认为，时下的经济学不仅没有能清楚地解答摆在它面前的贫困之谜，而且事实是，如果执行了他所说的挽救办法，则展现在眼前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时的灿烂光辉现象将非笔墨所能形容。那将是一个有修养者所隐相传述的、诗人所歌咏的黄金时代，那将是基督教精神的至高境界，碧瓦朱甍，是福地，是天堂！"

这个新成员叫亨利·乔治。难怪他要属于地下派，看来他的早期经历，对他说来，对于他认真要维护真理的想法，必然起了不怎么合乎规范的准备作用。亨利·乔治在他的一生中什么工作都做过：冒险家、金矿勘探者、工人、海员、排字工人、新闻工作者、政府官僚和讲演者。他甚至从来没有上过大学，13岁时离开学校，到开往澳大利亚和加尔各答、载重586吨的印度号商船上当水手。

当他的同时代人在学习拉丁文时，他是一个瘦削的、热情而在经济上自给的孩子，喜欢到处漫游。他从东方回来后，在他的故乡费城的一个印刷所里当临时工，到了 19 岁，他又乘船出行，这次是到加利福尼亚，其意图所在是黄金。

在他离开家乡以前，他为自己列了一个骨相评估表：

桃色运……………………………………………………大

子孙命……………………………………………………中

忠实性……………………………………………………大

宜家命……………………………………………………大

专注性……………………………………………………小

等等，对"食物营养"，自评为"充分"，对"求知欲"评为"小"、"自尊心"，是"大"，对"乐天性"是"小"。从某些方面看，估计得还算不错；虽然，他于 1858 年曾事先约定要驶向维多利亚去寻觅黄金，而到了旧金山却一跃上岸，将这一行动与"谨慎性"被评为"大"这一点对照是有些不对头的。结果他是找到了矿，不过找到的不是金矿而是铁矿。于是他感到淘金只是梦想，海上生涯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但事实的演变并不是这样——他"专注性"的性格倾向是"小"的——他成了旧金山一个印刷所里的排字工人，后转业为一个碾米厂的过磅员，然后成为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流浪汉"。又一次艰苦跋涉到金矿区，同样一无所成，当他回到旧金山时，已经陷入困境。

他遇到了安妮·福克斯，一见钟情。两个人，一个是天真无邪的 17 岁小姑娘，一个是留着小胡子的漂亮小伙子，一道私奔。小姑娘随身带着一大包东西，他以为可能是珍贵饰物之类，打开来一看，原来是通俗诗集和一些别的书籍。

以后几年是极度艰难的生活。亨利·乔治是个做零活的印刷工，要谋个正式工作是不容易的，即使获得了工作也收入很低。当

安妮生第二个孩子时，乔治写道，"我沿街走去，决意当我碰到第一个看上去手里有些钱可给时，我就向他伸手乞讨。我碰到了一个——一个陌生人告诉他我要5块钱。他问我，作什么用的。我说，我妻在做月子，我没有东西给她吃。他给了我钱。我想，当时他如果不给的话，我是会不顾一切地杀死他的"。

现在他已26岁，开始动手写作。他在旧金山《时报》馆的排字房里弄到一个工作，有一天，他到楼上把一篇东西交给编辑诺亚·布鲁克斯看。布鲁克斯疑心这个孩子是从别处抄得来的，但是，在近几天内的别的报纸上没有发现类似的文字，于是他下楼来找他。他发现乔治是个瘦小身材的青年人，长得比较矮小，脚底下要垫上一块木板，才能够得到铅字盘。结果是，乔治成了个通讯员。

过了几年他离开了《时报》馆，加入了旧金山的《邮报》，那是一家主张社会改革的报纸。他开始写作关于日常题材以外的一些问题：中国苦力及其师徒间的立约关系、建筑铁路时对土地的侵占、当地托拉斯的阴谋诡计、等等。关于外来的移民问题，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在法国的J.S.穆勒，结果他荣幸地获得了对方很长的一封表示赞可的复信。在他新近对政治发生兴趣的期间，他还从事于新闻工作者传统的冒险行动：当海船日出号来到这个港市时，其船长和大副在一些水手之间挑拨是非，致使两个水手互相扭斗，投海而亡，他们对这件事秘而不宣，乔治和《邮报》刺探出这个秘密，把这两个高级船员送交法院审判。

这个报社出盘给人了，乔治同时也设法摆脱了一个政治上的挂名职务——煤气表检查员。他并不想享受有闲生活，实际情况是，他开始对一些大经济学家的著作发生了深切兴趣；这时他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学术权威。他需要时间从事研读和写作，并向工人阶级发表关于伟大的穆勒思想的讲演。

当加利福尼亚大学准备设立政治经济学讲座时，大家认为他

是这个职位的有资格的候选人。但是，要取得这个资格，得向教职员和学生发表一次演讲，而乔治在仓促之间竟说出了这样的见解："政治经济学的名义经常被人滥用，用以反对工人阶级要求增加工资的每一次努力"，更加使听众感到震惊的是，他接下去说，"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不必具有专门知识、广大的图书馆或代价高的实验室，甚至也不需要课本和教师，需要的只是你们自己进行思考。"

这是他教学生涯的开始和结束。结果，为这个职位觅到了另一个比较合适的候选人，而乔治则仍然从事于研究、学习和编写小册子的旧生涯。然后，突然之间，"在大白天，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我起了个念头，出现了一个幻想，发生了一次神的感召——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一种万钧之力，它驱使我去写《进步与贫困》这本书，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生活下去，否则我是活不了的。当我在一个深夜中写完最后一页时，室内只有我独自一个，我激动万分，猛地双膝跪下，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可想而知，这是从心底里写的一本书，是抗议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呼声。还可以想见的是，这是过度感情用事，而在专业上考虑欠周的一部书。但是，这跟时下沉闷的课本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就难怪经济学的护卫者对它提出的论点不能予以认真考虑了，这部书充满的是这样风格的一些措辞：

> 假定有这样一个商人，头脑冷静而讲求实际，他没有理论上的知识，只懂得怎样去赚钱。向他说，"这里是个小村庄，10年之后将成为一个大城市，到那时火车将代替公共马车，电灯将代替蜡烛，到处是机器和改进措施，少数资本就可以大大增加劳动的有效力量。在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会有所提高吗？"
>
> 他会告诉你，"不，不会的！"
>
> "那么，一般劳动的工资会提高吗？"

他会告诉你，"不，一般劳动工资不会有任何提高。"

"那么，在哪一方面会有所提高呢？"

"地租，也就是土地的价值。快去买一块地，保留着，不要脱手。"

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接受他的忠告，你一生就可以高枕无忧，无须再干些什么。你可以闲躺着抽抽烟，可以东逛逛，西逛逛，像个那不勒斯的流浪汉或墨西哥的麻疯病患者那样，东走西跑，你可以乘个气球上天，也可以到地下的深洞去看看。你无须做一点工作，也无须为社会增加一点财富，在10年之后，你就可以安然成为一个富翁！在这个新兴起的城市里，你可以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宅第，但是比起公家的建筑物来，只算是一个贫民所。

对于他热情洋溢的议论，不必细读全文，读了这一段已足窥见全豹，有些人的收入(这些收入有的是大得惊人的)并不是由于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只是由于运气好，拥有位置适宜的土地，亨利·乔治对此现象深感义愤。

当然，李嘉图在他之前，早已看到这一切。但李嘉图至多只是认为，由于社会发展的趋势，使土地持有者发财致富，会增加资本家的不幸。可是对亨利·乔治说来，这种现象只是一个开端。地租这一不公正收入，不仅会夺去资本家的正当收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肩上的负担、然而，它的破坏作用还不止是这样，他看到，这会引起工业上严重事态的、他所谓的"爆发"，从而有时会使社会在根基上受到打击。

关于这个论点，他叙述得不十分清楚。主要是这样：由于经假定，地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性勒索，因此就很自然地把它看成是，在损害工人和实业家的情况下，不公平地分配给地主的一项成果。至于"爆发"——嗯，乔治深信，地租必然会导致土地价值的

疯狂投机（事实上在美国西海岸也确曾发生过），从而使其余部分的价格结构摇晃不定，最后也同样必然地陷于崩溃。

乔治找出了贫困的真正原因和进步的根本障碍之后，这对他说来，要建议一个补救办法，事体就很简单——征收一种巨额的税。这是对土地征收的税，为数之大，将并吞一切地租。到那时，将社会躯体上的这个癌症消除以后，太平盛世就有机会可以到来。这个单一的税，不仅可以免去收取一切其他赋税的必要，而且在取消地租以后，就可以“提高工资，增加资本收益，根除贫困，使愿意工作的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使人力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使文化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是一帖（没有别的话可以形容）最后的仙丹灵药。

当我们对此说试图加以评价时，觉得这是个有些难以理解的论点。只有以救世主自居、像乔治那样的人，才会把地租和罪恶等同起来，这么说，这个说法当然是天真、幼稚的。同样情况，把工业萧条归咎于土地投机，是把微小的一个方面扩大到整个经济，是与事实全不相称的。土地投机可能会引起麻烦，可是有些国家发生严重萧条时，其土地价值根本没有发生上升情况。

对这一点不必再多说了。但是，当我们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时，就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他的因因相寻的判断固然是肤浅的、有缺点的，然而他的批评基本上是道义的，不是机械论的。乔治问，为什么要存在着地租？一个人在交换这一范畴内也许一无贡献，只是由于所有权这一无理性的事实，为什么就可以由此获得利益？一个实业家所以获得利润，可以说这是由于他的远见和足智多谋，因此认为他获得的报酬是合理的。但是另一个人，只是由于他的祖父拥有一块牧场，经过两代之后，社会认为这块地上宜于造摩天楼，他因此大发横财，他的远见和深谋远虑在哪里呢？

这是个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可是要一下子宣告废止地租制

度却不那么容易，因为地主不是社会发展中唯一被动的受益者。一个扩展中公司的股东，由于技术进步而生产有所提高的工人，由于国家日益繁荣昌盛而实际收入有所提高的消费者——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发展中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其土地位置合宜的地主所享有的不当利得，在不同的形式下，也是我们大家所多多少少地享有的。这不单是一个地租的问题，而且也是一切不当利得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的话，单是从土地所有权方面来处理是不适当的。

还有，问题并不是像亨利·乔治所看到的那样严重的。有大量地租属于小型土地所有者、农场主、住宅拥有者以及小康之家所有。即使在地租收入的一个垄断性领域内——在大城市内不动产的业务经营——也在转移和流动中。地租已经不再是像犹有古风的封建时代那样处于冻结状态，它会随着土地的买进和卖出以及经过评价和再评价、而不断地从这一手转到那一手。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美国的地租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从 1929 年的 6%缩小到今天的不足 2 %。

不管这部书的论点总的说来是否合乎逻辑，或者是，它所提出的道义上的谴责是否有充分根据，总之，这部书一出世就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引起了巨大反响。《进步与贫困》顷刻之间成了畅销书，亨利·乔治一举成名，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旧金山《亚尔古英雄》报刊评论者说，“我认为《进步与贫困》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的一部巨著”；纽约的《论坛报》认为这是“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后没有能与之媲美的一部书”。甚至《检查》和《记世报》也认为它是“好久以来所出版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最有害的书”，这样的话正好足以抬高它的身价。

乔治到了英国，经过一次演讲旅行以后返回时，已成为国际知名人士。他被选派参加竞选纽约市长，在三角竞赛中击败了西奥

多·罗斯福，以少数之差，输给了坦慕尼[①]的候选人。

单一税现在成了他信心寄托的所在。他组织了土地协会和劳动协会，忙着向这里和英国热情的听众讲演。一个朋友问他，"这样搞下去是不是意味着要引起战争？除非跟你打交道的都是些胆小鬼，否则你能希望夺去他们的土地而安然无事吗？"乔治说，"我看不出有开一枪、发一弹的必要。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让它发生吧。再没有比此更神圣的战争了。是的，再没有了！"

他的朋友詹姆斯·拉塞尔·泰勒说，"在这里的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他决不因一时的气愤而轻发一枪，但是他所坚持的真理如果不能获得认可，即使因此引起世界战争，他也在所不惜。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就是这种勇气"。

不用说，作风正派的人对这一整套理论是恨之入骨的。一位天主教教士，由于参与了乔治对市长职位的竞选而受到暂被开除教籍的处分。教皇亲自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通谕。当乔治把一册精装本《进步与贫困》送给美国第一流专业经济学家弗朗西斯·A.沃克时，他不屑一顾，说"我不能讨论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方案，来冒犯我的读者。"官场是以震惊或轻蔑的态度看待他的书的，而他自己却击中了他的读者的要害。《进步与贫困》的发行量，超过了这个国家以前所有经济学书刊加起来的发行量。在英国，他的姓名已家喻户晓。不仅如此，他思想的含义——虽然，通常都是在走了样的形式下——已成为这样一些人物，如伍德罗·威尔逊、约翰·杜威、路易斯·布兰代斯[②]等所接受的遗产的一部分。实际上直到今天，还有一批亨利·乔治忠诚的追随者在活跃中。

1897年，他已衰弱多病，但仍不气馁，要从事于第二次市长竞

① 坦慕尼(Tanmany)，美国有实力的民主党在纽约市的一个政治组织，成立于1789年。——译者

② 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美国法学家。——译者

选，他完全知道，竞选运动的紧张过程，恐非他衰竭的心力所能承受得了。情形确是这样，他备遭笑骂，说他是个"掳掠者""别人权利的攘夺者""混乱和毁灭的热心倡导者"。他在选举前夕终于死亡，参加葬礼者数以千计。他是个笃信宗教的人，让我们祝愿他灵魂进入天堂。至于他的地位，当然属于经济学地下派，直到现在，所处的还是这个地位。他是个差不多以救世主自居的人，是有些半痴半癫的，对经济制度道德的一面，会提出扰乱人心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地下派中还有些别的情况在发生，这些情况比亨利·乔治谴责地租，和他在梦幻中所见到的、以单一税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人世乐园要重要得多。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在冲击着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表现这种精神的是这样一类口号："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中，生来是占优势的力量。"这种精神的传播并不限于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维克托·雨果说，"对全人类来说，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俄国专制主义代言人康斯坦丁·波比多诺塞夫说，俄国没有受到西方颓废思想的感染，因此使它在东方得以居于领导地位。在德国，它的皇帝正在作出解释，为什么上帝是站在他的一边的，在美国，则西奥多·罗斯福用类似的论点使他自己成为美国的代言人。

帝国主义的时代开始了，绘制地图者为了在图上标明各地区的所有者，忙着在图上改变颜色。在 1870 与 1898 年间英帝国的版图扩大了 400 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 8,800 万；法国在领土面积上所得也相差无几，其人口增加了 4,000 万；德国赢得了百万平方英里，1,600万殖民地居民；比利时猎得了90万平方英里和3,000万人民；甚至葡萄牙也加入了竞赛，得到了新土地 80 万平方英里，居民 900 万。

事实上，经过了三代就使这个世界改变了面目。更有甚者，西方对这个变化过程的看法，也有了同样惊人的改变。我们应当记

得,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这位苏格兰哲学家对于商人要发挥君王的作用是表示轻蔑的,他主张使美洲殖民地独立。对殖民抱有同样轻蔑态度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他把殖民地看作"对上流阶层说来,是对不住在贫民院的贫民的大规模施舍",甚至迪斯雷利① 于 1852 年也公开宣称"这些倒霉的殖民地是压在我们肩上的重担"。

但是,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变了。人们常说,英国于发作了一阵神不守舍的毛病时构成了一个帝国,但是随着帝国主义步伐的加快,神不守舍却被专心致志所代替。罗斯伯里勋爵说,英帝国是"世界上前所未闻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最大的世俗力量",这句话是很能概括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的。马克·吐温在观看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举行的、借以夸耀英国殖民地之广大的盛大游行时说,"是的,对英国人来说,《圣经》上说过,'温顺者都是有福之人,因为他们将继承这个世界'"。

对多数人民说,当时对扩充领土的努力是抱赞许态度的。在英国,它的桂冠诗人基普林的那一支流行歌曲,是道出了当时人民的心声的:

> 我们并不想寻仇觅恨,但是受到挑衅时一战也在所不辞,
> 我们有船,有人,也有物资!

有些人从另一角度对上面的论调表示同意,他们所同情的是查尔斯·克罗思韦特爵士的说法,认为英国与暹罗之间的症结所在是,"跟他们通商时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可以为我们过剩的商品找到新市场,由于商品的销路扩大,可以使我们的工人增加就业机会。"

还有一层,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会为帝国建立者导致繁荣,

① 迪斯雷利(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于 1868 及 1874—1880 年任首相。——译者

同时使萧条委员会感到不胜欣悦的是，工人阶级从海外的血汗劳动中将获得莫大利益：侨民现在成为无产者的无产者。这就难怪帝国主义成了个受人欢迎的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官方经济学稳站在一旁，眼看帝国主义在发展而泰然自若，有所评述时，也只是以新殖民地对贸易可能发生的影响为限。对这个历史新现象予以集中注意的，又是经济学的地下派。面对这个世界范围的统治竞赛，他们所看到的不只是政策方面的使人激动的冲突，或者是当权人物一时的不测之威，而是跟这些完全不同的方面。

他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全新动向，认为帝国主义所发出的信号是，资本主义本身性质的根本变化。可是，预兆更加不祥的是，他们看到，这个新起的、毫不留情的扩张过程，是资本主义没有经历过的最危险的发展——发展的结果将导致战争。

首先提出这个警告的，是一个态度比较温和的持异端者，他自己说，"这是在英国中部中等大小的城市中中产阶级的一个中产阶层的看法。"约翰·A.霍布森是个虚弱的、矮小身材的人，经常担忧他自己的健康，他说话口吃，演讲时神经紧张。他出生于1858年，打算在牛津大学从事学说研究。就我们所知的他的个性和背景情况而言，他似乎注定是要埋头于学究生涯的。

但是两个意外因素对他的前途起了干扰作用。他读了拉斯金的作品。拉斯金是英国散文家和批评家，他对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金钱价值准则加以嘲笑，他们鼓吹"财富就是生命！"霍布森从拉斯金那里学到了经济学是人文主义科学而不是经院科学的想法，他从枯燥的正统说教转向到令人兴奋的协作性的工人行会。这与工资和利润的那种乏味的研究相比，使人的属性具有较高的重要意义。霍布森坚决认为他的计划"跟欧几里得的命题一样确凿"。

作为一个空想家，他也许会受到尊敬，英国人是喜欢行为怪癖的人的。由于他是个持异端者，是传统道德的践踏者，他这就成了经济学界的“被遗弃者”。由于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了一个叫作A.F.马默里的伙伴。马默里是个独立思想家，成功的商人，还是个勇猛的登山者（他于1895年在南加帕巴特峰死去）。霍布森写道，“不用说，我与他交往，跟他对爬山的兴趣毫无关系。但是，他在智力上也是个力求上进的人。”商业会发生周期性不景气，这个一直使商界感到困扰的现象，远在18世纪就发生了，马默里对它发生的起因有个想法，按照霍布森所述，一些专家们则认为他的想法的“合理性简直与试图证明地球是平坦的想法的合理性相等”。因为马默里所思考的，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认为萧条的起因在于过分的储蓄这一事实，在于使商界长期地不能分配到足够的购买力，使它能够买回它自己的产品。

霍布森起先与之力争，后来终于信服马默里的说法是对的。他们两人合写了《工业生理学》，提出了他们持异端者的见解，认为储蓄会破坏繁荣。这是官方理论所不能接受的。从亚当·斯密起所有的大经济学家，不是都强调储蓄是产生积累的原因之一吗？每一储蓄行动，难道没有使资本资金自动地有所增加，从而使更多的人们获得工作吗？如果说储蓄会造成失业，不仅是荒唐的，极其荒唐的，而且肯定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节俭这一美德。他的这个说法使经济界感到厌恶，伦敦大学补习班的演讲打算谢绝霍布森先生出席，慈善组织团体也收回了让他发言的邀请。这位学者成了个持异端者，既是这样，就势必成为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

所有这些似乎与帝国主义无甚关系。但思想的发展是无定向的。霍布森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排斥之后，就走上对社会抱批评态度的道路。由此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非洲问题。

非洲问题的背景情况是既复杂又易动情感的。荷兰的殖民者于18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建立了他们的独立国家。他们所选择的国土地势辽阔，阳光充足，使人精神振作，而且隐藏的财富比外表所显示者为多。1869年在那里发现了金刚钻，1885年发现了黄金。于是在数年之间，从一个牛车住宅区变成了个使人兴奋如狂的投机者的乐园。塞西尔·罗兹[1]带了建筑铁路和兴办实业的计划来到了这个现场。他出于一时之间的狂热，同意对德兰士瓦展开袭击，于是英国人和荷兰人抑制已久的一腔不平之气获得了发泄机会。一场布尔战争[2]开始了。

这时霍布森已经在非洲。他把他自己叫作"神的最畏怯的生物"，他旅行到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会见过克鲁格和斯马茨，[3]还在突击德兰士瓦的前夕，曾与罗兹本人一同进餐。罗兹其人是个复杂的、难以理解的人物，他在非洲从事冒险活动的两年之前，一个新闻记者曾记录他的谈话：

"昨天我在伦敦东区参加失业者会议。听到了一些狂乱的说词，尽是要"面包"、"面包"的呼声。在回家的途中，我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所怀念的是如何为这类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使联合王国的4,000万居民可以避免发生一次血腥的内战。我们管理殖民地事务者，必须设法取得新土地来安顿剩余人口，为他们在厂、矿里生产的商品提供新市场，我一直在说，英帝国的问题是如何使人民吃饱肚子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他曾否把这类意见向霍布森陈述过，看来他大概

---

① 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1853—1902)，英国殖民地资本家、南非联邦行政长官。——译者

② 英国与布尔人在南非洲的战争，前后共两次，起自1880年，止于1902年。——译者

③ 克鲁格(Kruger, 1825—1904)，南非政治家；斯马茨(Smuts, 1870—1950)，南非联邦政治家，将军，1919—1924，1939—1948年任首相。——译者

是说过的。但究竟说过没有并无多大关系。因为霍布森已从非洲问题上看到，这是跟他和马默里的"经济上的左道邪说"——储蓄过剩论在极其出人意外的方式下深相配合的。

霍布森回到英国，写了关于侵略主义与非洲发生的战争问题，于 1902 年出版了一本书，所表达的内容是，把他对非洲的观察和他的异端见解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本书叫《帝国主义》，是一本含有破坏性的书。它对利润制度发动了空前的、最严厉和最冷酷无情的批评。马克思所提出的最恶毒的说法是，这个制度将毁灭它自己，而霍布森的说法是它将毁灭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帝国主义进程是，资本主义为了把它自己从自取的困境中挽救出来的一个严酷的、无休无止的倾向，这个倾向必然要涉及国外贸易方面的倾轧与争夺，从而无可避免地要经常牵涉到战争的危险。对资本主义道义上的谴责是从来没有比此更严厉的。

霍布森所控告的实质是什么？

就它的严酷性和非人格性来说，它差不多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虽然霍布森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目的，并无同感）。它认为资本主义所面对的是内在的和无法解决的困难，它所以转向帝国主义，并不完全是由于掠夺土地的贪欲，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使它自己在经济上的生存得以持续下去的手段。

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内在的困难——财富分配的不均匀过去很少受到注意。利润制度的作用往往会使富者越来越富，而贫者方面久已受到道义上关注的是生育问题，至于这一事实造成的**经济上的**后果，则是由霍布森来指出的。

他所看到的后果是极其惊人的。由于收入的不均等，造成了极其离奇的两难处境——一个自相矛盾的处境，在那里无论是富者或贫者都无法消费市场上全部的商品。贫者无法消费这些商

品，是由于他们的收入过低，富者无法消费这些商品，是由于他们的收入过多！霍布森说，为了出清它自己的市场，一个经济体系必须消费掉它所生产的一切事物：每一件商品必须有个买者。如果贫者买不起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事物，那么，谁来买这个余下的部分呢？很明显，是富者。但是，富者尽管有钱，却缺乏消费那么多的具体吸收力——一个拥有百万元收入的人所消费的商品，在价值上必须高于一个仅有千元收入者所消耗的1,000倍。

因此，作为财富分配不均衡的一个后果是，富者不得不进行储蓄。他们所以要储蓄，不仅是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不管怎样，是愿意这样做的，而且是由于他们不能不这样做——谈到消费，他们的收入简直是太多了。

这么说，引起困难的就是这个储蓄问题。如果要使经济体系不受购买力稳步退缩的灾难性影响，就得使社会中富裕阶层的自动储蓄获得充分利用。但问题是怎样使储蓄发挥作用。权威的回答是，把它投放于越来越多的工厂和越来越多的生产，使产量和生产率不断提高。所有的大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穆勒等都同意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霍布森在这一点上看到了困难。他问，如果人民群众，由于他们的收入过低，要购买投入市场的全部商品已经发生困难，那么，作为一个精明的资本家，怎么会在已经感到商品过剩的市场投入更多的商品呢？比如说，当市场上鞋子已经多得卖不完，再把储蓄投放到另一制鞋厂，又有何利可图呢？那么，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直截了当的。富人要为他们的自动储蓄找到一个出路，而又不至于因此引起国内生产过剩的麻烦，那就只能向国外投资。

这就是帝国主义发生的根源。霍布森说，“工业的管理人员，为了要为他们的过剩财富扩大流通渠道，就得寻找国外市场和把

国外投资作为一个手段，借以疏通他们无法在国内利用的商品和资本"。

结果是灾难性的。把剩余财富输送到国外的，不止是一个国家。所有国家的处境都相同。因此，接着发生的是对瓜分世界的竞争。每个国家都想为它的投资者找到它所能夺取的最富裕和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于是非洲成了个巨大市场(和廉价原料的来源)，在英、德、意大利、比利时之间进行分割；亚洲也成了块肥肉，日本、俄国和荷兰各尝一脔。印度成了英国商品的倾销处；中国则成了日本的一个印度。

这样，帝国主义就为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也不仅仅是一条充满危险和灾难的路，而是一条肮脏的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为它们闲着的财富竞相争取新的温床。这就为流血和屠戮形成了一个无以复加的诱发因素。

不用说，这样一个涉及暴力和斗争的理论，对官方经济学家来说是不会获得同情的。据说霍布森"总是把一些别的事物牵扯在一起，把经济学弄得一团糟"，而且由于那些"别的事物"决不是与为了追求享乐而组织起来的那个世界有任何关联的，因此官方经济学把这个帝国主义理论看作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提出这样理论的人的经济学，会伤害节约是社会美德这一常识观念。

这个帝国主义理论，一方面经审慎研究以后遭到拒绝，而另一方面，却被地下派的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热烈接受。这个"帝国主义"想法，说到底，毕竟不是霍布森一人所独创的，曾由一位叫作罗伯特斯的德国经济学家和一位德国激烈的革命论者罗莎·卢森堡提出过。但是霍布森的论述有较大的广度和深度，而对这个理论加以润饰，并使之成为马克思学术内容之一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叫作弗拉依米尔·伊利奇·乌里扬诺夫的背井离乡者，其人后来以列宁这个名字闻名于世。

这个理论从它开始出现起逐渐有了变化。霍布森感到迷惑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数十年来，对殖民地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关心的，为什么后来却劲头十足。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并不是出于武断的意见，更不是战争绝对不可避免的硬性预言。实际上他表示希望，若干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者对世界会共同商定一个最后解决办法，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基础上和平共处。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下，这个理论的音调就比较有威胁性，比较冷酷无情。帝国主义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拱门的压顶石，使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可靠增加了力量，而且使它扩大到霍布森原来的结构之外。直到同时还可用以说明近代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情况。这时出现了何等骇人的情景！

>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生产力，使全部世界打上了它的印记，将所有的殖民地、所有的人种、所有的人民拖入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削网中。同时，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大大地发展了堕落和腐朽的寄生性因素……帝国主义借助于从千百万殖民地农工手中攫取的高额垄断利润，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帝国主义创造了腐朽、寄生和垂死的食利国，以及只靠剪息票谋生的食利者阶层。帝国主义时代，在完成了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生产资料的集中、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劳动的社会化和工人组织力量的加强）的同时，也使得列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并引起战争，这些战争是单一世界经济崩溃的结果。所以，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最后形态；它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入口处。

说这番话的是布哈林，发言的场所是第三共产国际，时期是1928年。尽管作者、场合和日期不同，我们听到的见解则是列宁的。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列宁的这种资本主义互相倾轧、内部腐败

和对外劫掠的想法，仍然是对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的、正式的苏维埃解释。

帝国主义这一现象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熟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段历史的人不会不注意到，在那些无穷无尽的各国之间的猜忌、摩擦和战争的演变中，就像一条泄露真情的线索，贯穿着掠夺、领土扩张和暴戾的殖民主义活动。假使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属于帝国主义冲突的说法已经有些过时，那么，认为这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运用手段、图谋利益引起的说法，总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征服和夺取殖民地的活动是同古埃及一样古老的。俄国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入侵，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中摆明的事实，不管是不是可以用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借口，这种活动还会继续下去。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近50年来征服活动的动机，跟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后征服活动的动机，是否有所不同。要知道专制国家所以要争夺权力是简单的。帝国主义理论所需要研究的是，比较地与人力无关的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同样的最终结果。

殖民制度的辩护者认为是不会的。俾斯麦于1876年说，"一切认为会归于祖国的利益大部分是幻想。英国正在放弃殖民政策，它感到这种政策的代价太大。"这个制度的其他辩护者都附和这种说法，认为殖民地"得不偿失"，认为大国不是乐于开拓殖民地，而是由于对世界负有教化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认为得到好处的，主要是殖民地而不是它的宗主国，等等。

但是，这些话未免有些不得要领。不错，有些殖民地是没有什么利益可沾的；1865年英国下院委员会确曾建议过，除了非洲西海岸一个地区外，放弃一切占有的土地，原因是这些地区无利可图。但是，就全部殖民地来说也许没有产生利益，就某些殖民地来说，

却是非常有利的：例如，锡兰的茶叶种植场，半年间可以使新投资本获利50%。就整个工业说也许没有从国外市场获得收益，就某些重要工业说，如果没有国外市场，就简直难以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棉织业依赖于印度市场。对整个英国而言，对外投资肯定为国内储蓄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形式：1870至1914年间，英国储蓄的一半是投向国外，而从对外投资得到的红利和利息占到了英国国民收入的10%。

可以肯定，与纯粹经济动机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其他帝国主义动机，而帝国主义的那些补偿性经济效果，也不是像J.A.霍布森所说的那样简单的。总的说来，欧洲力量之所以阑入非洲和亚洲，如果认为其中不含有一些经济利益的味道，就很难作出解释。例如，就荷兰的情形说，爪哇和苏门答腊巨大的植物园经济，为它的资本提供了一个极关重要的有利的投资机会；就马来亚的情形说，其地非常宝贵而价格低廉的原料，为约翰牛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垄断机会；就中东的情形说，所提供的是石油和船舶通过苏伊士运河时战略上的控制。1885年法国一位部长说，"我们工业所缺乏、而它们感到更加缺乏的是市场"；1926年德国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说，"对原料的争夺，在世界政治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比战前起着更大的作用。对德国说来，唯一解决办法是取得殖民地。"不同的国家也许有不同的动机，但其共有的特性是争取经济上的利益。

这是否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确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答案决不是那样简单。自然资本主义从其早期开始就一直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制度，它的驱动力一直是努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于是从最初，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公司已在寻找海外领地，既为了市场也为了廉价的原料来源；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在支持这些私人企业从事这类海外冒险活动。

这样的帝国主义景观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需要从不同于霍布森和列宁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这一扩张过程：这种驱动力似乎不是国内无法利用的储蓄的累积，从而要求海外投资。相反，这一内层的推进机制似乎是经济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替代其它组织形式、并在非资本主义地区建立自身的非凡能力。正是这些技术本源、效率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学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不可阻挡。

于是，我们今天倾向于把帝国主义的过程视为资本的国际化，这一过程开始于资本主义尚未完全形成之前，现在尚在进行中。然而，这里重要的是区分不同时代的国际化。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类型的帝国主义，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移植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还包括赤裸裸的政治干预、残酷的剥削、军事控制和对贫穷国家利益的普遍歧视。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投资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大都在于英国的投资不是基于印度的需要，而是建立在并受制于英国的需要。在刚果(比)和荷属印度，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这种帝国主义老式作为的一部分仍然存在，当然，它的外向的表现已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地宣告了那种老式的经济霸权发号施令的殖民主义关系的终结。战前，那里只有苟安的殖民地，战后，这里却涌现出独立的国度。虽然这些国家的大多数过去是(现在仍是)贫穷和软弱的，然而它们的民族阶层已经使欧洲国家不能像这一世纪前五十年所通行的那样进行一种傲慢的控制。

对美国来说，则略有不同。战后，美国对一系列的不发达国家——古巴、越南以及另一种事例上的尼加拉瓜——采取了武力行动，所以，美国获得了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力量这一令人讨厌的名头。但是，促动我们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的动机却不同于将海

军陆战队送上香蕉共和国[1]和在19世纪将军舰开进中国的动机。在这里不是我们一直在保护的美国财产在起作用，而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颇为相同，我们的政府感到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威胁。可能成为新的目标的似乎是第三世界中那些脆弱和动荡的国家。结果，我们几乎把这些国家中每种社会主义趋势都当作进入由外国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楔子而予以反对，而把这些国家中的反动政府作为反对共产主义同一战争中的盟友而予以援助。

这种出于防卫、而导向侵略的政策何日终结，尚待观察。也许，美国能够通过对不发达世界出现的社会主义政府诉诸经济或军事上的压迫来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或许，这一政策将因我们自己的失落和非道德化(demoralization)而终结。然而，不管结局如何，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对于保护一个庞大的王国免受外部的干扰方面——这是一个像中国或罗马那样古老的问题，比之直接支持商业企业要好得多，虽然后者是上一个世纪帝国信仰的赤裸裸动机。这是一个外部控制的直接政治形式，而非间接的经济形式。

同时，帝国主义面目的变化还有第二方面。这一方面毫无疑问是经济上的。这就是跨国公司引人注目的大量涌现，跨国公司是资本从国内流向海外的主要形式。

跨国公司是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通用汽车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之类的巨大公司，它的制造和加工过程配置在许多国家。

跨国公司给资本的国际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它改变了资本的地理流向。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

---

① 泛指热带地区的小国家，尤其指西半球那些仰仗水果出口、旅游业的小国。——译者

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动机主要是获取原料或为它们的基本产品——如棉制品——占领市场，跨国公司已从这些基本商品转向它们占有领先地位的高技术产品，如计算机和药品。其结果是资本海外配置的重大转移。在1897年美国海外投资的近一半是投在种植业、铁路和矿业。而今天，这一比例不足1/5，大部分是投资在制造业；并且3/4的资本是流向欧洲、加拿大和其它发达国家。同样，法国、日本以及西德的国际投资的大部分是流向发达世界（包括美国），而不是地球上过去的殖民地。

跨国公司发展的第二方面的经济结果是它们将高技术与廉价的和非熟练劳动结合起来的惊人能力。现代经济生活所需要的异常复杂的机器，如计算机部件和电视组装件，能够在香港、南朝鲜和泰国生产，操纵那些科学的机器的则是刚刚脱离土地的男女。从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结局是使人困惑的。将全部生产过程移到昨天尚是农村经济之地区的能力，已成功地导向这种能够出口资本主义制度的史无前例的程度。如同我们在开篇中所经历的伟大的经济革命期间，生产要素是从前资本主义地区涌现的一样，在我们今天，一个新的经济革命正在把市场经济导入世界经济中过去是消极而非积极力量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帝国主义是海外资本主义具有生命力的巨大力量。

同时，新帝国主义已大大地加剧了它发达的祖国里这一制度的竞争。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种结局的出现，即我们已论述过的每一个国家的市场都已联通，而且还因为设立在不发达地区的跨国公司的工业“前哨阵地”能将廉价的商品“炮弹”打回本国。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此深有了解，所以，香港或台湾制造的彩电，或南朝鲜制造或墨西哥总装的汽车能非常容易地以低于加利福尼亚或中西部地区制造的同样产品的价格销售。

由于（跨国公司）发展迅速，以致不能预见到这种国际化和竞

争加速的结果，但下面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将沿着一个全球经济的方向前进，在这个全球经济中，新的交叉世界的企业很难与旧的民族疆界和特权共处。以我们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考察而言，这一结局是冷酷的，即其起源与消除资本的压力相联系的运动，以其自身更大的衰竭而告终。

约翰·霍布森死于1940年，伦敦《泰晤士报》审慎地公布了他的讣告，一方面赞扬了他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则表示他的想法没有获得普遍重视。

他确是没有获得普遍重视。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名望的一位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就跟霍布森完全不同。马歇尔是受到尊敬的、走中间道路的和得到认可的；而霍布森是个直观论者，是急进的，因此可以说是没有得到认可的。我们走过了地下派一段幽暗的地区以后，在结束这段路途时，重新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光天化日是颇为适当的。在那个光天化日之下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许没有看到比较喜欢冒险的那些人所揭露的令人不安的景象，但是他们做了一件那些异端者所没有做的事，他们向他们的世界——甚至我们的世界讲授了"经济学"。

只要看一看马歇尔的肖像，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教师的形象——白胡子，一双慈祥而奕奕有神的眼睛，满头如丝的银发。当他于1924年故世，英国第一流经济学家为了纪念他、向他表示敬意时，其中之一，C.R.费伊教授，对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作了如下的栩栩如生的描写：

> 庇古关照我，关于联谊会学术演讲事，你应当去看望他，作一联系。因此，我在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特地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区。他从一个小过道走出来，向我说"请进来，请进来"，于是我同他一道上楼。经过一番寒暄之后他问我，"您此来还有什么贵干？"我说"没有什么。"他这就拿出一本小小的黑布

面的书，一面说，"嗯，那么您听好。"他事前关照我，如果听到一个我喜欢的题目，就举手示意，接着他读出了一行标题。我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想打断他的朗诵，但是马歇尔不理会，继续读下去。读到第二页的大致一半时出现的一个标题是"最近德国的金融危机"。我曾在格里弗斯瓦尔德度过一个夏天，所以我示意对此是熟悉的。"看来讨论这个问题不中您的意"，他说。我保持静默约5分钟，后来我听到一个词"阿根廷"，我又作声请他停一停。我的唯一理由是，我有两个叔父在那里做过生意。"您自己在那里待过吗？"他问。我回答说"没有"，于是他又接着读下去。数分钟后他停下来问我，"您没有发现一个您合意的题目吗？"我说，"我说不上来。"他说，"别人也都是这样，但这是我使用的方法。那么您喜欢的是什么？"我气吁吁地说，"德国劳工与英国劳工的比较。"于是（因为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他拿出一只有电钮的小提灯，在书架上东寻西觅，取出了用德文和用英文写的一共约30本书。他说，"现在我要让您自己去体会一下，您看过后不妨把您抽的烟放一放，喝上一杯茶，养养神"。

非洲的冲突曾经激动霍布森的心情，兴高采烈的美国投机活动，曾为亨利·乔治的思想提供策源地，但这些都是很久的事了。马歇尔跟他同时代的埃奇沃思一样，是大学中磨炼出来的杰出产物。他虽然曾航行到美国，甚至穿过美国到旧金山，但是他的生活，他的观点——无可避免地也就是他的经济学却带有静穆和风雅的剑桥风味。

那么，他所教导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可用一个词来总结马歇尔的基本思想的话，那就是我们曾用其作为维多利亚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平衡。他与巴师夏不同，后者由于对经济学上的诡辩，把话头拉扯到不合理的程度；他与亨利·乔治不同，后者看到了经

济封锁后面的不公平；他与霍布森不同，后者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与人力无关的作用的背后，寻找毁灭性的趋势，而马歇尔所注意的，主要是经济社会自动调节和自动纠正的性质。正同他最得意的门生J.M.凯恩斯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创造了整个哥白尼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所有经济的因素，通过互相抵消和互相影响，都处于它应处的地位"。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以前有过的教导。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都把市场制度说成是，在极其复杂、极其有效的情况下的反馈作用过程。然而，在全面的观察和细节的深入探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未经探索的领域和有待澄清的讲解。即使就马歇尔所继承的市场平衡论来说，其间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还很多、很多，远远不是已告结束。这里即使关于某些基本问题，也还有些微妙的部分有待阐明，例如，一件商品的价格所反映的，是否真正是它的生产成本，或者是，一件商品所产生的，是不是在最高程度上的满意。钻石的价格是否过高，换句话说，是不是由于它的难以寻觅，还是由于人们喜欢戴它？这类问题，也许除经济学家外，别人是不关心的；然而，只要这类问题没有搞清楚，就很难想象，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会获得彻底解决。

马歇尔所致力的，就是经济理论中这些含糊的问题。在他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进行分析时，他把精确的数理头脑和那种从容不迫而带些散漫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其间充满了朴素的示例，从而使他的分析非常明晰易懂。他把那些困难的、经过推理来证明的部分，都有意地放在脚注里（结果使得凯恩斯带些不恭的语气说，任何经济学家对他的书的较好的阅读方法是，摆脱常规，专读书中的脚注，正文可以略去不顾），因此，即使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可以理解这种经济学。不管怎么样，这部书却获得了巨大成就；它最初发表于1890年，直到今天，对渴望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学员

来说，仍然是必要的精神食粮。

马歇尔对经济学概念上的争执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究竟是什么？主要贡献——他自己也多次提到过——是对于在平衡过程的演进中，坚持时间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的重要性。

马歇尔指出，就"平衡"说，它的基本意义是随着经济的调节过程是发生在短时期还是长时期而不同的。就短期说，当买方和卖方在市场上碰在一起时，在这个议价过程中基本上所涉及的是一个相当固定的商品量——以钻石为例，是商人在他的小提箱里所带的那么一些钻石。然而就长期说，钻石的量就不是固定的。如果需求方面有保证，就会增辟新矿，如果供给过剩，就会放弃旧矿。因此，就极短促时期说，在市场上发挥比较直接的影响的，是对钻石在心理上的效用，也就是对它的需求；但是就长期说，经常的供给流量会受到消费者需要的调节，这时生产成本就占了上风。当然，不论是成本或效用，在决定价格时不会永远互相脱离，用马歇尔自己的话说，需求和供给，就像"一把剪子的两个刀锋"，要问控制价格的究竟是供给还是需求，就同要研究一下，使一把剪刀起剪裁作用的是剪刀的这一刀锋还是那一刀锋一样，是一无意义的。但是，当两个刀锋在剪裁中都起作用时，假定说，其中一个是主动的刀锋，另一个是被动的刀锋，那么，在某一市场发生短期间的剪裁作用时，主动的就是效用—需求刀锋，当剪裁延伸到长期时，产量的规模和生产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动，这时主动的就是成本—供给刀锋。

这同马歇尔用他剖析入微的头脑来论述的每个题材一样，所体现的是有启发性的敏锐识力。然而，从《经济学原理》散发出来的还不止是理论上的光辉。如果认为马歇尔在"官方"经济学方面是个最杰出的智者，那么，他在这方面也是个最富有同情心的智者。他在前往伦敦贫民窟的路途中，对于所看到的那些辛劳的、无

告的贫民是真心关怀的，认为经济学应当是改善社会生活的工具，他的这种情绪和想法始终贯穿在他的全书中。他认为经济学是“发现真理的发动机”，当他指导这个发动机时，所要使它发现的那个真理是关于贫穷的起因及其疗法的真理。

凭他的才华和心志上的健全，似乎在经济思想史上稳可以占得一席重要地位，为什么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呢？有些讽刺意味的是，答案就在于他的分析内容之中，是他对经济分析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时间这一因素。对马歇尔说来，这个时间是抽象的，是可以随起随灭的数理曲线和理论试验中的时间，而不是什么事都可实际发生的时间。就是说，这不是不可逆流的历史上的时间——首先不是马歇尔在他自己生活中的那个历史时间。不妨想一想马歇尔在世时所看到的那些——俄国猛烈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涉及全世界的战争，初次听到的反殖民主义的怨声。想一想那时就要发生的是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奄奄不振，对政体的概念发生了世界范围的改变，美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萧条。然而对于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动，无论是马歇尔本人还是他的同道们，即有所知，也所知甚少。“自然界没有飞跃”是《经济学原理》1920年末一版和1890年初版扉页上的警句。历史也许会出现突然的飞跃，经济学也许与历史会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书中的长期观点和短期观点，也许会含有与“社会时钟”无情的滴答声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所有这些都是与马歇尔作为他经济研究中心的平衡观念全然无关的。但是，他是个忠实不欺、信心诚笃的人，他所说的话是无可责难的。困难在于，他所说的那一切都没有说到头。

假使不是为了下述的一点，则事后追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可以既往不咎的。当马歇尔和他的同道们在仔细琢磨微妙的平衡的作用过程时，有少数几个非正统的持异议者，坚决认为这不是平衡，而是变动——猛烈的变动——是现实世界的特征，是经济学要研

究的主题。在他们看来，战争、革命、萧条以及社会的紧张状态，才是经济学要加以详尽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平衡和课本中所谈的稳定社会的那种美好的调节。但是，当这些持异端者和一些非专业人员向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术界“官方”指出这种情况时，后者认为这是横生枝节，受到了嫌憎，把前者的告诫搁置一旁，对他们所提出的挽救办法也不屑一顾。

官方世界的自满心情，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些对当代的使人抱憾的议论，它还造成在智力上最严重的悲剧。假使当时的学术界是注意到这里所谓的地下派的，假使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是具有霍布森或埃奇沃思那种使人不安的观点的，是具有亨利·乔治的那种社会冤屈感的，那么，当20世纪的一场大灾难爆发时，世界就不会在完全手足无措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社会改变。现在回想起来，它给我们的教训是，不管对什么异端邪说的思想，是不能漠然置之不理的，尤其是对那些观点比较保守（就“保守”这个被误用的词的最好的意义说）的人来说，更加是这样。

第八章　凡勃伦眼中的野蛮社会

自从《国富论》于1776年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了125年，在这个期间的情况是，好像世上的一切方面（它的辉煌璀灿或卑鄙龌龊、天真朴素或心怀叵测以及技术上的伟大成就，或是有时会表现出来的在社会准则上的不够明智）都已被一些大经济学家考虑得周详无遗，使后来者再无用武之地。但是，这种对世界的多方面考虑与不同方式的阐述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以欧洲为限的。因此，其所说的一切社会演变情况，仍局限于旧世界，并多少都拘泥于一些传统形式。

要晓得，一个理发师的学徒迪克·阿克赖特，由于多轴纺织机而发财致富，会使他蜕化为理查德爵士这一现象，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英国的绅士派头占传统优势是个其兆不祥的现象，由于暴发户大举闯入高贵血统和高贵风度这一领域，才使这一现象得以逐渐消除。诚然，这类暴发户是具有一连串中产阶级意识的，甚至一连串反贵族情绪的，但是也有一种潜在感觉，认为社会上还有更高的阶层，不单是凭财富所能达到的。在言谈和风度上，有无数喜剧性事件足以证明，拥有百万资财和昌盛事业的新发迹贵族，跟与之隔邻相望的、世袭的但是已经陷入贫困的贵族，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欧洲成功的理财者也许富埒王侯，但是当他意识到，要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这不过是手段之一，而且决不是个有决定性的手段。

所有这些，在美国是大不相同的。这个国家是由深切反对在门第上分等级的那些人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独立生活和个人成

就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在美国，证明一个人的好坏的就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成就是无须由一个系家谱来证实的。因此，新英格兰的血汗工厂与古老英国阴郁的工厂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但是看一看它们各自的老板的态度和作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比较少了。在欧洲的资本家，还不免要残留着一些过去封建时代的影子，在美国的求利者则不妨在日头下取暖，他在追逐权利或享受其财富时毫无顾忌。在激动的19世纪末叶，在美国，要获得社会重视的进身之阶是金钱，在获得相当财富成为一个富翁之后，他进入上流社会之门时，就无须再有什么签证或核准手续。

因此，在这一新世界中求财致富的征逐，其方式比较粗鲁，不那么温文尔雅。所下的赌注比较大，成功的机会也比较多。因此，在竞赛中表现出来的公正风格也稍微差些。

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有个经营运输业务的杰出的天才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发现他自己的合伙人在从中捣乱——这是常有的事。他给他们一封信：

先生们：

你们在破坏我的事业，我不去告状，因为通过起诉拖的时间太长，现在通知你们，我对你们也将使用同样手段。

你们的忠诚的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他说到做到。他说，"我管什么法律不法律，难道我没有权这样做吗?"又如J.皮尔庞特·摩根① 所吐露的也是同样情绪，不过在形式上稍微文雅些。有一次，他的合伙人贾奇·加里通过律师给了他一个警告，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他咆哮如雷，"呵，我不懂为什么要请个律师来告诉我哪些是我不能做的。我雇用律师的目的

① J.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1837—1913)，美国财政家。——译者

只是为了要他告诉我，我要做的事怎样去做”。

美国人在商战中跟他们的欧洲同时代人相比所以青出于蓝，不只是由于忽视法律手续，还由于他们在竞赛中使用的不是斯斯文文的那一套，而是好勇斗狠。足以说明这一情况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从奥尔巴尼到萨斯奎哈纳一条铁路控制权的争夺。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环节分别掌握在吉姆·菲斯克和贵族似的摩根手里。摩根掌握着一条线的这一终点站，而那一终点站则是菲斯克的据点。解决争端的办法是，各自在路轨的终点站上安放一个火车头，就像庞大的玩具一样，彼此对撞着开。结果即使失败的一方也没有认输，只是尽最大的努力离开现场，离开时拆毁了轨道和高架桥。

在这场工业称霸的混战中，谁也没有讨饶，谁有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当美孚石油公司集团消灭它的一个特别顽固的竞争者时，甚至炸药也有它的用处，至于不那么凶暴的绑架手段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设计新颖，而不是由于道德沦丧。1881年，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把纽约的电报线路刮断，当时金融市场上一个手段凶狠的权威杰伊·古尔德，不得不派专人把他的交易通知单去送给经纪人，他的敌手知有机可乘，就绑架了这个使者，用另一个容貌相似的人来代替，从而使古尔德在几个星期之间，觉得对手对他的意图好像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弄得他莫名其妙。

不用说，既然这些人在同道之间使用手段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不会以尊敬态度对待公众的。他们以对投资者进行欺诈和勒索为理所当然之事，他们把证券市场看作富人私有的赌场，由公众下赌注，由金融界的权要人物来设谋定计。至于在这样的安排下，下了赌注以后，一般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公众所关怀的，这时假使没有这些权要人物从中推波助澜，诱使公众入其彀中，则公众的处境就要好得多。

要注意到，公众对“意志”是会引起反应的。当古尔德或洛克菲勒将收买铁路或铜矿或铁矿这样的消息传开时，公众就会抢着行动起来，以期快着先鞭。大发横财是快意的，要防止其中是否有诈这一想法，是动摇不了无限的信心的。基于这一信心，就有可能使实际的金融上的行虚作伪有了活动余地。一个适当的例子是亨利·罗杰斯和威廉·洛克菲勒收买安纳科达铜矿公司，他们为此，自己没有花一分钱。且看他们玩的是什么手法：

1．罗杰斯和洛克菲勒付给马库斯·戴利一张3,900万美元支票，以购买安纳科达公司的财产，条件是戴利必须把它存入花旗银行，在所规定的期间不得动用。

2．然后由他们建立一个叫作联合铜公司的名义上的组织，以他们自己的职员作为挂名经理，用7,500万美元——不是现金，而是很方便地为此印制的联合公司股票——由这个联合公司出面收买安纳科达公司。

3．罗杰斯和洛克菲勒向花旗银行借入3,900万美元，用以赎回他们付给马库斯·戴利的3,900万美元的支票，作为这笔借款的抵押品的是，联合公司股票7,500万美元。

4．下一步是将这项联合公司股票在市场上出售（先通过他们的经纪人进行兜售），从而获得价款7,500万美元。

5．用这笔收入，将花旗银行的借款偿清，将3,600万美元作为他们自己的利润，收入私囊。

当然，在这种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赌博中，其间所含有的欺诈成分，简直可以使人惊诧得目瞪口呆。一位芝加哥—圣保罗—堪萨斯铁道公司的总经理A.B.斯蒂克尼说，作为绅士，他是信任任何铁道公司的总经理的，作为铁道公司的总经理，他简直一时一刻都不敢把他的表放在他的视程之外。说出这样的挖苦话是有他的道理的。铁道公司的头头们，有一次为了各公司在货物运输费上以互

相削价为竞争手段，因此召开了一次会议，想共同商定一个划一的费率，以免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一位公司总经理趁会议中途休息时，溜出会场，打电报给他的事务所，通知它会议中所议定的削价率，想争先实行新价，以击败敌人。这个电报凑巧被人截获，在续开的会议中将此事揭穿，由此足以证明，即使在贼与贼的同伙之间，要维持公道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我们想起来就要感到羞愧的时代。它在外表的排场上是奇形怪状的（在一些社交集会中看到，为了表示阔绰，为了惊世骇俗，用百元钞票将纸烟卷起来抽），在某些场合是差不多具有中世纪武士精神的。但是，我们不可曲解了时代精神。一些大财主们不仅会横暴地对待公众，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这种不道德和肆无忌惮的行为，主要是由于在良心上和良好习惯方面缺乏约束力，而不是由于在品德上甘趋下流，或有意识地藐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摩根曾说过，"我对公众无所亏负"，他这句话是作为他哲学上的信条，一本正经地说的，不是偶尔说挖苦话。在那个以大财主为王的时代，经营商业是不讲情面的，如果讲究崇德尚义，就要被人击败。

那么，经济学从这类情况中可以了解到些什么呢？

了解到的并不怎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一向是跟着欧洲教师的脚步走的，后者硬把美国的情况纳入对美国说来全然不是它所熟悉的那个模式。把银钱上花样百出、你死我活的竞赛，说成是"节约和积累"，把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说成是"创业精神"，把阔排场的铺张浪费说成是"正当消费"。实际上是，经过这样一番洗刷过的描绘，就使人完全不能辨认其本来面目。人们读了例如约翰·贝茨·克拉克的流行得很广的课本《财富的分配》之后，是决不会知道美国是大富豪的天下的，读了F.H.陶雪格的《经济学原理》之后，是决不会看到一个波谲云诡的证券市场的。如果一个人读了

劳克林教授登在《大西洋日报》里的那些文章，他将认为发财致富是从"牺牲精神、本人的努力和技能"而来的，他会听到的是，"人人有权享受他自己发奋努力的成果，没有作出这样努力的人是没有份的"，这里的所谓权，大概还包括收买立法机构以及金刚钻之权。

总之，官方经济学起的是辩护作用，是麻木不仁的。物资充沛和享受过度是美国的精神实质，官方经济学对这些一概视而不见，它所提供的只是些形式上的没精打彩的旧框框。它所缺乏的不是诚实或勇气，也不是理智上的能力，这些品质它是有的，所缺乏的是，马尔萨斯说过的"对局势和利益的不带感情的倾向性"。美国的经济学家过分热中于当前的时代潮流，以致不能从现场退后几步，在相当远的距离下，来冷静地、清晰地考虑他们的主题和观点。

这里需要的是，有些像托克维尔或布赖斯① 那样的异乡人，由于这种景象对他们说来不是本地风光，态度就可以冷静些，就可以看得清楚些。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是个美国人，但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这里所需要的观察力。

托斯丹·凡勃伦是个怪人。他是挪威的一个农场主，外表像个农民。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他的头发是平直的，从中间分开，呈倒V字形，覆在他浅浅的前额上，他双眼炯炯，目光敏锐，好像在思索着什么。蓬松的胡子掩盖了他的嘴，一圈短短的络腮胡子围绕着他的下巴。他穿着件很厚的、没有熨平的衣服，马甲上还别着个别针。照片上看不到他的下半身，想像起来他是个瘦长而结实的身材，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他外貌是有些异相的，但内心还藏着更加怪僻的个性。他的那种锐利的目光也许足以表明，他在理智上的观察力同样锐利，他在外表上的那种乡土气也许足以表明，他在探究问题时，有时是有

① 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作家；布赖斯(Bryce, 1838—1922年)，英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家。——译者

些迟钝的。但是他在生活中的主要特征，离群索居，与世无争，却在他的外貌上无所证验。

喜欢离群索居，往往是一个人的病征，根据我们的标准看，凡勃伦在神经上必然是有些病态的。他几乎有一种喜欢与外界隔绝的特性。他与社会周旋时，就像是从另一世界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形形色色，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只是寻常现象，而在他的视线下，却成为一些尖刻伤人、异腔异调和稀奇古怪的现象，就像一个人类学者看到未开化社会的宗教仪式一样。别的经济学家——其中包含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不仅是处于他们的社会，而且是属于他们的社会的。对于他们所看到的，有的备加颂赞，有的满腔失望，有的则怒火冲天。托斯丹·凡勃伦却不是这样。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人们熙熙攘攘，互相吹捧，交往频繁，可是他却站得远远的，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抱着冷淡、疏远的态度，不使自己牵扯在内，不随流俗，孤芳自赏，使自己成为一个局外人。对凡勃伦说来，这个社会是不舒服的，是含有敌意的。他使自己与社会相适应时，就像个来到未开化地区的传教士，他不愿采取土人的生活方式，为了使自己保持完整，就不得不忍受不愉快的孤寂生活。有许多人钦佩他，甚至热爱他，但是他没有亲密的朋友，他对任何人没有一个是熟悉到直呼其名的，他对任何女子，也没有一个是倾心相爱的。

可以意想得到的是，在他身上怪癖成堆。他拒绝装电话机，把书沿壁堆在原来的装货箱里，也从不见他每天起身后有整理床铺的习惯，床罩只是每天早上塞进，晚上扯出来。由于懒惰，他把用过的盘子就这么堆着，直到碗碟橱中已经空了，然后用浇水的软管把整个肮脏的一大堆冲一下了事。当所有来访者都急于要听到他的表态或发言时，他却在静坐沉思，可以坐上几个小时默无一言。出于轻视规章制度的习惯，他对他的学生，不论成绩好坏，都

给以同一的评分等级，有个学生为了使自己有资格获得奖学金，需要较高的分数，他即欣然把他的评分从C改为A。他对学校管理规章是不太遵守的，有时会故意捣乱，例如，他上课点名时，看上去非常认真，将旷课者的卡片细心摆开，堆成一垛，然后在故意漫不经心的情况下，又将两垛混在一起。有时候他会忽发奇想，竟会干出毫无意义的恶作剧举动，向过路的农民借用一只麻袋，然后偷偷将个黄蜂窠塞在里面还给他。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问他名字的首字母T.B.所体现的是什么意思，他告诉她，其意是"玩具熊"(Teday Bear)，后者即以此来称呼他，他不以为忤，别人却不敢这样喊他。使人莫测高深的是，他不愿对任何事承担义务，有人问他，对他所编辑的某一杂志上所刊载的某一社会学家的文章的意见，他回答："每页的平均字数是400，某一教授文章的平均字数是375。"最怪的也许是，这样一个爱挖苦、不讨人喜欢的人，却总是发生着一桩接着一桩的男女关系事件，而且不一定是出于他自己的主动。有一次他问，"如果女人企图接近你，缠着你，你该怎么办？"

这样一个性格复杂、使人感到迷惑的人，又喜欢深居独处，少揽外务，要表达他的思想，这就只有借助于一个手段——从事写作。他的文风就像他本人一样，错综复杂，充满了玄妙的想法和词汇，对不习惯于他的文体的人很难接受，但是文字精炼，绝不致伤及读者脾胃。他把慈善事业说成是"自以为是的、出于己身虚构的尝试"，把宗教刻划成"属于n度的、可以普遍接受、但是无法估量的事物的捏造"。他把一些总的基督教会组织说成是"联号商店"，一些各个的教堂说成是"零售商店"，这些话虽措词刻毒，但是说得很有力。他描绘日常习用的手杖时说，"这是一种广告，表明拿着它的人，双手是闲着的，是无须从事于有用的劳动的"，还表明，也可以用它作防身武器，说"任何人，只要沾染上一点凶暴气质，当他

手里握着这样一件具体的、原始的攻击武器，就会感到很大安慰"。沾染上一点凶暴气质！说得何等粗鲁，然而却是不加渲染，不带个人感情的。

这些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在通常意义上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对凡勃伦来说，经济学跟维多利亚时代讲究礼貌和精确度的那一套是没有关系的，在那个时代，一切是用微积分来证明的，同早期经济学家解释事物是怎样演进的那一类努力也很少有关系。凡勃伦所要知道的是别的一些；他首先要知道的是，事物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此，他首先要探究的不是经济的活动，而是经济的活动者；首先不是它的设计或方案，而是得以形成一种特有的活动叫作"商业系统"的整套的风俗和习惯。总之，他所要钻研的是作为一个经济人的性质和他的经济上的礼仪风俗，在这个几乎是人类学的研究中，他认为重要的是，应注意到绅士为什么要携带手杖，以及以社会上叫作地租为收入的地主，为什么要有做礼拜等等现象。他力求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性质获得彻底了解，通过一片迷惑人的变幻表现和传统习俗，从中汲取在服装、仪态、言谈以及文明礼貌上显示出来的点点滴滴的迹象。他像个精神分析家那样，当他认为有机可乘，可以从中找到重要的、隐藏的情况时，他常常抓住一些极不重要的细节不放，对一些奇特的、甚至会引起反感的现象，也往往会全神贯注，从中寻求其意义，以期有所发现。

我们会看到，他对社会作出检查时，是不留情面的。但是，这种尖利、辛辣的特性，主要并不是由于他对事物的蔑视，而是由于他对事物所抱的特有的冷漠。对凡勃伦说来，好像什么事他都不熟悉，因此没有一件会由于太平凡而不值得他注意，也没有一件不值得他评价一番。说到底，只有怀着出乎寻常的超然胸襟的人，才会从一只手杖中看到它标榜有闲生活潜在的广告作用，和作为一个原始武器的作用。

这种超然态度的心情，似乎同他是时刻分不开的。凡勃伦出生于1857年，是从挪威移来的边境农村中一个农民的第四个儿子，第六个孩子。他的父亲托马斯·凡勃伦是个待人淡漠无情、思想迟钝、不愿受到约束的人，后来凡勃伦把他说成是，他所遇到的心地最善良的人。他母亲卡里，为人热情而性子暴躁，关于冰岛和挪威的口传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就是她说给托斯丹听的，这些故事对他发生了深刻印象，一生不忘。他开头是个性情古怪而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搞家庭杂务而喜欢躲在屋顶室里阅览他的读物，又爱给人起绰号，他起的绰号一经成立就生了根，他具有早慧现象。他的弟弟说，“现在回想起来，最初我以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我问他随便什么，他总会源源本本地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那一切，有许多都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即使是谎话也编造得很好”。

造成一个非常人物的无论是什么，在一些促成因素之外，总得加上一个教养因素，这个因素，在他自己和按表面价值评价事物的那个社会之间，起了个从中介入的作用。他有一个起先驱作用的童年时代，这个时代所表现的是朴素、严肃和贫乏，衣服是家里做的，毛织物是完全陌生的，大衣是用小牛皮制成的。咖啡和糖是奢侈品……简单到像汗衫那样一件衣服也是这样。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度过他的少年时代的。挪威人和美国人各自构成组织严密的独立的社会，在挪威人的居处，挪威语言是流行的语言，挪威是真正的祖国。对凡勃伦说来，是要把英语当作一种外文来学习的，他直到进入大学，才把它学好。当他从田间出发，把行李打好、安顿在车上准备动身时，这才觉察到，他是要到一个大学里去读书了；这种情况，对一个古老和森严的学府说来，是很少见的。

当时他17岁，他的亲属为他选择的学校是卡尔顿专科学院，这个学院处在相近于明尼苏达的一个乡，凡勃伦一家耕种之地就

在那里。他家里所以把他送到这个学院，原来的打算是，希望由此可以使他在将来谋得一个牧师职位，而他已发现这个学院的宗教气氛浓厚到极点。然而，对于一个思想激烈、对传统观念抱有反感的才智之士，要想驯服他，或是诱导他趋入虔奉宗教的途径，是枉费心机的。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上，凡勃伦提出的问题是"同类相食者的请愿"和"酒徒的辩解之辞"，使校内教职员陷于一片喧嚣。问他是不是为这些邪行恶习抱辩护态度，他坦然答称，这只是从事于科学的观察。学校方面承认他是个天才，但是对他有些畏忌之意。他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后来成为国内杰出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很喜欢他，但认为他是个"不适应环境的人"。

这个乖僻而有天才的不适应环境者，发现卡尔顿是最没有发展机会的地方。但是，他和校长的侄女埃伦·罗尔夫发生了恋爱。她聪明，又有才华，在自然的吸引下，两人一拍即合。他读斯宾塞的书给她听，结果使她信从了"不可知论"，而他则深信埃伦是北欧海盗英雄甘奇·罗尔夫的后裔。

他们于 1888 年结婚，但是他们的婚后生活充满着动荡起伏。这个性情孤独的人所能提供的爱情，似乎为量无多，却需要妇女对他的照顾，在这方面，除少数例外，他是所获甚丰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位妇女，对此似乎并不十分介意。凡勃伦对待埃伦，很难说是忠实的，她曾一再要离开他，有时是由于他生活上不检点，有时是由于对待她过于残酷，有时只是由于他城府太深，难以测知其底蕴。但是，有时他自己也会寻上门来，从而言归于好——有一次，他手里拿着双摇摇晃晃的袜子，走到她林子里的住所，问"太太，这是您的吗？"

当他离开卡尔顿学院时，决意在学术上再求深造。但是他此后的经历曲折正多，在职业生活上的经过也是这样。他在求取自身利益上肯定是不积极的，同时他的恶运如影随形，死缠着他不

放。例如，有一次他央求他从前的一个学生代他去了解一下纽约的一个城市福利组织的征聘职员情况，他的学生当即遵命而行，结果这个学生却为他自己谋到了一个职位。但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当前的情况是，凡勃伦在威斯康星的莫诺纳学院获得了一个职位，但一年后该学院即永远停办。于是他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希望获得助学金，从事学习哲学。虽经过多方设法，申请奖学金之事未能实现，于是转到耶鲁大学，于1884年毕业时考列优等，成为哲学博士，但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他回家时在巴尔的摩染上了疟疾，需要特制的饮食。但是，除了作为病人的一身之外，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他把家里一些老旧的东西拿走，说这些东西放着无用。于是他就这么闲逛度日。他的兄弟写道，"他出身于这样一个以忠诚与团结为原则的家庭，是够幸运的。在这个高度受尊敬的村落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游手好闲者。他今天读书和闲逛，明天呢，仍然是闲逛和读书"。

他读的是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谈政治的小册子、路德的赞美诗集等等，总之什么都读。但是，他的游手好闲与内心活动倾向，由于与社会隔绝的态度而愈加显著。偶然也会从事于一些零星活动，对时下的无聊事件加以讽刺和批评，跟他父亲闲聊，写少数几篇短文，寻找工作，结果一件工作也没找到。他没有神学学位，因此不受宗教学校的欢迎，他又缺乏那种文雅的风度和姿态，因此不能向别的学校推荐。他跟埃伦结婚，在她家是感到沮丧的，但这时无论如何总得寻个生计。埃伦的叔父是阿奇森一托皮卡一圣费铁道①公司总经理，他希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这里得到一个职位。

但是他的变幻莫测的恶运再一次从中作梗。这个公司发生了

① 即美国堪萨斯一新墨西哥铁道。——译者

财政上的困难，由银行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接管，谋职之事即告吹。又一个机会来自依阿华大学，他持有介绍信，还有他妻子的关系，这件事看上去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从中起很大作用的是性格的不够坚强和他的不可知论，结果又成为泡影；然后是圣奥拉大学，在最后5分钟也碰了壁。好像命运之神在蓄意跟他为难，一定要使他孤立起来。

这种孤立状态持续了7年，在这7年中，凡勃伦实际上无所作为，只是埋头读书。最后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认为他年已34岁，还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职务，经决定他应当继续从事研究院学习，再度试图进入学术界。

他于1891年选择了科内尔大学，他走进J.劳伦斯·劳克林的办公室，说"我叫托斯丹·凡勃伦"。劳克林是保守派经济学的中坚分子，当时他必然吃了一惊；来者戴了顶熊皮帽子，穿了条灯芯绒裤子。但是他的有些地方，使这位年事较长者有了深刻印象。他向校长说明后，特准接纳为研究员。后来芝加哥大学开办，聘劳克林为经济学系主任，他就带了凡勃伦一块儿去，年薪520美元。还可以补充一句，劳克林死后，人们对他作出的定评是，他对经济学作出的主要贡献是，他为芝加哥大学招致了凡勃伦这个人物。

芝加哥大学不仅是凡勃伦第一次获得职务的所在——其时他35岁——而且这个机构所反映的社会，也就是以后他将作出仔细分析的对象。这个大学是洛克菲勒创办的，下面是当时流行的校歌：

约翰·D.洛克菲勒，
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
他把所有余下的资金，
都捐给了芝加哥大学。

可以想见的是，这所大学所定的方针并不是无保留的保守主

义 正相反，它的教育方针是为商界造就人才。它的校长威廉·雷尼·哈珀年仅 36 岁，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沃尔特·海因斯·佩奇曾赞美他是个大企业首脑的典范。他是个企业家式的校长，不惜用重金罗致别校的第一流人才。芝加哥大学同美孚石油集团一样——前者是后者的奠基人——完全凭它的财力，把美国知识界很大的一个部分逼得非就范不可。所有这些，在凡勃伦的笔下，以后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但是同时，它也为他提供了知识分子的适当背景。这些知识分子中之佼佼者有艾伯特·米切尔森，那是按前所未知的精密度来确定光的速度的，有生理学家雅各·洛布，有社会学家劳埃德·摩根，他们所出的书刊为数繁多，还有关于经济学的杂志。

凡勃伦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他丰富的学识，为他博得了声誉。有个学生说，“那来的是凡勃伦博士，他会说 26 种语言。”一位知名的学者，詹姆斯·海登·塔夫茨来到凡勃伦的课室，他事后说，“当我进入课室时，考试正在开试，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提出问题。他话说得极慢，等他把一段话说完，要记着关于这个问题开首时说的话，在我是感到有些困难的。但是，过了会儿我才看出，这是个思虑周密的人，他深入到问题的基本方面，但是，除了掘发问题的真相之外，却没有暴露他自己的见解”。

但是他个性孤僻，令人莫测高深 没有人知道他想的究竟是什么。有人向他的妻子打听，他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她不得不实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个“真人不露相”主意者，彬彬有礼和有节制的客观态度是他的护身符，这就使世人无从窥见其内蕴的感情，而世人最喜欢的是洞穿外壳，一窥底蕴 有个学生问他，“告诉我，凡勃伦教授，您对待任何事，态度是不是认真的？”他诡秘地低声回答“是的；可不要告知别人”。

下面这段描绘是他晚年生活的一个片段，由此对他的为人可

以窥见一二——他来上课了，由于长夜攻读，形容枯槁，他把一大堆德文书放在案上，然后用哆嗦的薰黄了的指头——这是出于他嗜吸高级卷烟的唯一虚荣表现——一页、一页地翻动着。霍华德·伍尔斯顿牧师，一度是他学生，他对凡勃伦作这样的描写："他用一种低沉的、吱吱嘎嘎的声调，开始叙述早期德国的村落经济，然后他讲到的是，由新兴的贵族规定并得到教士方面认可的某些不公道的法律上的假设。他发出一阵冷笑，把嘴唇都牵动了，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他用辛辣的讥讽，进行分析贵族的愿望即上帝的意志这一为广大人民带来痛苦的臆说。他表明，在近代制度中也有类似现象，一面说，一面抿着嘴暗暗发笑。然后回到本题，继续讲解"。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他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学生方面坦率的感情流露得越少越好，他不想使彼此间的讨论进行得活跃起来，实际上他喜欢把他的学生赶走。有一次他问一个笃信宗教的学生，一方是她的教会，一方是一桶桶啤酒，她对两者的价值对比有何看法，而另一学生也照抄他的言词请求答复，他说，他认为此话不值得重提。他说话含糊其词，有时会信口开河，拉扯到主题以外。听他课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终于只剩下一个学生。后来在另一个大学，原规定他的授课时间是，每星期一、三、五，每次10时至11时，后逐渐减少到每星期一，10时至10时零5分。

但是，对少数能够欣赏这种单调的、惹人厌烦的说话声、对此不感到厌倦的人说来，结果是会得到报偿的。一个从前当过他学生的写道，"嗯，说起来简直是要令人毛骨悚然的。当他用低沉的语调，逐字逐句吐露其观感时，听起来与一息仅存的病人的呻吟有什么两样。但是日复一日，我习惯于这种不寻常的事态之后，就会感到，这样的表达方式，跟一个才智之士叙述其超然而略带讽刺的意念时的态度，是深相配合的。他谈话时左右逢源，辗转自如，足

以证明其胸中所蓄无可限量，这样的谈吐是富有吸引力的；但是，乍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个心志不健全的人。他学识之渊博，使人听起来感到无限惊异和愉快。他会记住一些细节——这件事会使多数人望而却步——而大纲节目仍然了了胸中。他谈锋所及，往往会说出些当时流行的行话或打油诗之类，而接下去说的却是一节接着一节的中世纪的拉丁文赞美诗。"

他的家庭纠纷跟他所要进行阐述的政治经济学纠缠在一起。他和埃伦同居在芝加哥，但是没有因此使他少离开家庭，他时常出外活动，有时甚至同另外一个女人出门远行，使校长哈珀感到不悦，他对校方的约束有点受不了，在职位上开始想迁地为良。

他在芝加哥大学呆了14年，到1903年时年薪只有1,000美元。但是这些年的光阴决不是白费的，他求知欲极强，对知识的猎取是贪得无厌的，他的这种孜孜不倦的态度终于获得了成果。他写了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文章，还出了两部不同凡响的书，因此举国闻名，但是所以轰动一时，也许主要是由于内容奇特。

凡勃伦写出第一部书时是42岁。那时他还是个低级讲师，曾向校长哈珀循例要求加薪数百美元。哈珀回答他，他没有为校方争得足够的声誉，而凡勃伦答复他，他无意于这样做。那时如果没有劳克林从中周旋，他将离校而去，假使当真是这样的话，校长哈珀将失去一个为学校增荣添誉的最大机会。这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行将问世。那时并没有迹象表明，他预料此书会发生深远影响，他曾把这部书的部分内容读给他的某些学生听，当时他淡然地说，他们将会感到其内容繁杂而语句浮夸，他为了使出版商能够接受，曾多次修改内容。但是出于意料，此书出后轰动一时。威廉·迪安·豪厄尔斯① 专为此书写了两篇长文，顷刻之间，此书竟成了

① 威廉·迪安·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年），美国小说家，批评家。——译者

当时知识界随身必备之物。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伦“它使东方温顺的人们骚动起来”。

用这样尖锐、辛辣的笔调来从事于这样有理智的分析，是前所未见的，这就难怪要引起世人的注意了。他在漫不经意的态度下，用刻毒的目光、刺人的措词和含讥带讽的见解来与这个社会周旋，所使用的语言有时荒唐可笑，有时利箭伤人，有时则直率粗野，与之密切并存的是，被风俗习惯和粗心大意所逐渐形成的、认为久已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一些事实。此书所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是怪诞离奇的，同时又是使人感到乐趣横生的，而其遣词琢句却又是非常雅驯的。这里姑且引述一段，作为小型样品：

> 法国某国王，据说由于遵守礼节，不失尊严传统，拘泥过甚，竟因此丧失了生命。这位国王在烤火，火势越来越旺，而专管为他搬移座位那个仆人刚巧不在身边，他就硬坐在炉边，不移一步，终于被熏灼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但是他虽然牺牲了，却保全了最高贵的基督教陛下玉体的圣洁，没有被贱役所玷污。

就多数人的看法而言，这本书无非是对贵族生活方式的讽刺，对富人的愚行怪癖作有力的攻击。就表面看，它确是这样。凡勃伦，用他那镂金雕玉的妙笔道出了他的主题：有闲阶级通过明显的或微妙的阔排场性质的消费来显示它的优越性，而它自己——有闲本身——的特点，由于在公众前的炫耀，也由此获得了进一步满足。总之，越是阔绰——挥霍浪费，就越加“高明”，这一点在书中受到了无数次严峻的考验，例如，

> 即使在我们自己家里的私生活中，如果日常进餐时用的是手工制的银餐具（虽然其艺术价值往往可疑）、手工绘的瓷器、精细的上等台布，我们就会真诚地、一点不带疑惑地、觉得兴头要高些，这种情形是人所共有的。当我在生活水平的这个方面

已经养成习惯，认为应当是这样的以后，如果有了任何退步，就会觉得非常难堪，简直是有损人类的尊严。

书中有很大部分是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精神病态方面的详尽研究。阐明关于财产的准则时细入毫末，就像一个考古学家发现初出土的古代文物时要详细加以爬梳剔抉那样。书中有许多是涉及每个人的爱好的，在这个比邻而居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想向隔壁的张三李四看齐，这除了向别人的生活方式暗暗叹羡、努力追赶外，是别无他道可循的。

但是，关于夸多斗靡习性的描绘，不管写得怎样引人入胜和简明扼要，不过是书中的解说性资料。单看标题即可明白，这本书是关于有闲阶级理论上的研究。虽然他可以在中途逗留一下，谈一谈他所看到的引人注目的景色，但他关心的主要是旅行的终站——经济人的性质是什么？在建立社会时，其中怎么会有个有闲阶级的？有闲阶级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就古典派经济学家说来，这类问题是可以根据常识来答复的。他们是根据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的，所看到的是各个人怎样改进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有时谈的是，比如说，马尔萨斯无指望的不断增殖的工人阶级，这时无理的人类性格就占了上风，但是总的讲，是把人类说成有理性生物的。在竞赛性斗争中，有的爬上顶峰，有的淹滞于最下层，那些交好运的或足够机敏的人发迹之后，当然要充分利用其优越处境，把他们的劳役减到最低度，这一切都是极其简单极其合情合理的事。

但是，在凡勃伦看来，对人类活动抱着这样的观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完全不能相信，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那个力量是有理性地计划出来的"个人利益"的相互作用，他甚至不完全相信，"有闲"就其本身说，是否比劳动高明。他博闻广识，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民族——例如美洲印第安人、日本虾夷人、澳洲的布什曼——

的生活方式，也未能逃出其视听范围。在他们自己简单的经济体系内，似乎全然不存在所谓有闲阶级。更加惊人的是，在这些社会团体内，生存的代价就是劳动，每个人都从事劳动，不管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劳动，劳动时不管怎么辛苦、艰难，也没有感到因此降低了身分。这些经济体系从事劳动时所考虑的，不是作为其主要动力的得失盈亏，而是从事劳动时的光荣感，和父母般的对下一代的关怀。人们在其日常工作中以多出力、做好事互相竞胜，如果拒绝劳动——闲逸——即使获得宽恕，也至少是不受尊敬的。

受到凡勃伦注意的还有一种形式的社会——波利尼西亚①人、古代冰岛和日本封建时代的幕府所组成的那种社会，在那里也具有不折不扣的有闲阶级。要注意到，属于这样阶级的人并不是闲着不干活的。正相反，这些人是社会中最忙碌的成员。他们的“工作”是掠夺性的，靠武力或狡诈来占有财富，对于要靠气力或技能来进行的财富的实际生产，则绝不沾边。

处于这种形态下的有闲阶级，虽然没有从事于任何生产服务作为回报，但这样做是得到社会的完全许可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富裕到足以豢养一个非生产阶级的，人民是朝气勃勃的，所以对这样一个阶级可以抱赞许态度。那些上升到有闲阶级的人是被看作性格坚强而能干的人的，绝不是社会中的废物或掠夺者。

结果对劳动的根本态度发生了奇特的变化。有闲阶级——用武力赢得财富的阶级——被认为是光荣和尊严的。相形之下，纯粹的劳动却染上了耻辱色彩。劳动会使人感到厌倦，这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是人类性格所固有的，而凡勃伦则把它看成是，在以掠夺为生的影响下，对一度是光荣的生活方式的贬黜；重视蛮横和暴力的社会，对人们的辛苦工作是不会给以应得的报酬的。

---

① 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中太平洋的群岛。——译者

但是，所有这些跟美国和欧洲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很大的。因为，在凡勃伦看来，现代人跟他们未开化的祖先不过一线之差。可怜的埃奇沃思看到这个说法将不寒而栗，因为这无异是把他的“欢乐机器”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首领、斗士、巫医和处于下层地位卑贱的、战战兢兢的普通人民。凡勃伦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说，“未开化生活方式的经历是最富有持久性的，在一切民族生活史的精神文明的任何方面，也许是最坚韧的，因此，历代相传下来的粗野的人类性格，现在仍然、以后也必然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凡勃伦这就从现代生活中看到了过去的传统。有闲阶级已经改变了它的生活方式，在方法上已经有所改进，但目标仍然相同——以掠夺手段占有财物，而不从事工作。当然，在具体做法上不再采取杀人夺货或掳掠妇女的手段，那种未开化方式是没有了。但是它需要猎取金钱，昔日风行的是以战利品高悬帐棚以示勇武，今日则代之以金钱的积累和挥霍以及种种微妙的炫耀方式。有闲阶级不仅是在精神上仍然在遵循着古老的掠夺性方式，而且对个人体力的赞许态度也是获得广泛支持的。在社会看来，有闲阶级成员仍然是比较英武、比较可畏的，因此，处于下层的普通人民只是向他们学样。每个人，工人、中产阶级以及资本家，他们想的只是通过金钱的讲排场消费——实际是通过明显的浪费来表示他们掠夺性的英勇力量。凡勃伦说，“在社会上要能博得世人的青睐，在财富保有上就得达到某一习惯的、虽然不十分明确的标准；这正同较早的掠夺阶段的情形一样，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未开化者，在体力上、机智上和使用武器的技能上，必须达到部落中的某一标准，低于这一标准是要受到蔑视的。”同样情况，在现代社会中所竞相注意的，不仅在同侪之中要表现得佼佼出群，而且作为这一信念中的一个部分，如果在谋生方面沾上了非掠夺性气味，例如劳动或工作，则将“本能地”感到有失尊严。

这里的说法是否有些牵强。我们是不习惯于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为野蛮人的，我们对这样的比喻是要感到于心不安的。但是，凡勃伦的言论尽管听起来有些怪诞不经，却有一点真理在内。与比较斯文的办公室工作相对，体力劳动是要受到社会的贬损的。对财富在通常情况下的积累——至少就在这一点上比较成功的那些人来说——无疑是超过了合理的所需之数的，这一点也是事实。凡勃伦的主要论点是，认为要了解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的最有效办法是，从事掘发潜伏于他们心底的那种不合理态度，而不是以19世纪为依据，把这种活动加以美化，把它说成是合理的或合于常识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接受他的这种以人类学为依据的解释，希望从中获得教益，况且由现代人来研究原始社会，总是显得有些软弱无力。

上面所说的不合理态度——心理方面或人类学方面的——指的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不必深究。我们对世人在经济活动的表现上，只要探索一下他们所以有此活动的根源所在，就不难发现，深深埋藏在对高度合理性所作出的圆满解释的下面的这一事态的真情实状。例如，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在他们的优秀作品《米德尔汤》中说，在1929年大萧条时，工人阶级中几乎所有的最贫困的部分，都首先注意节衣缩食，然后削减某些“必要的”奢侈品，至于中层阶级和上等阶级这时理应把炫耀观念上的表现减到最低度，但是只要看一看任何杂志上所载的大量广告，即可说明情况。没有人能免除竞胜观念的毒害，凡勃伦的原始人掠夺性看法，是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的。

这里还可以引出一个最后结论。“把人看作个略微染上一些文明色彩的未开化者”的想法，不仅借此可以说明一个有闲阶级的存在和以炫耀作为支出的准则这一观念的认可，还可以为社会团结本身的性质提供一个线索。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利益上存在

着强大分歧，是什么力量把它团结起来的，早期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的解释并没有过大的成就。例如，假使马克思的说法是对的，无产阶级跟资本家是势不两立、绝无调和余地的，那么，是什么阻止了革命没有立即爆发？凡勃伦提供了一个答案。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并不是处于剑拔弩张状态的，它们被一个无形的、但是刚强的共有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工人并不想取代经理的职位，他们所想的是竭力仿效他们。他们自己对于所做的工作，与他们雇主的工作相比，觉得不那么"尊荣"，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在于如何摆脱他们的上级，而是如何使自己上升到上级的地位。有闲阶级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稳定的理论。

凡勃伦于1899年发表了《有闲阶级论》之后，赢得了信誉，虽然主要是作为一个讽刺作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信誉。一般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对他备致敬慕，而他对这种赞扬之词却一概予以鄙视。同他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则在怀疑，他是不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感到疑惑，他所述的一切是不是当真的。这些人所以感到迷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对马克思一会儿赞美，一会儿又加以非难；对社会作了极其严肃的批判之后，往往会加上一两句玩笑之词，可以把这些话看作令人不寒而栗的古怪念头，也可以看作他在感情上坦率的吐露。

当此期间，凡勃伦在写另一本书——他自己对商业系统所下的定义。他在写给他的一个相识者格雷戈里夫人的信里说，"我从可靠方面获悉，有些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们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有些言不切题。书名是《企业论》。在这个标题下，我避免了一切事实方面的缠扰，无拘无束地创立我自己的理论"。

这本书出版于1904年。内容是否切于实际且不提，它比前一本书甚至更加才气焕发，更加奇妙难解。它所提倡的观点，似乎是公然与常识相违抗的。从亚当·斯密的时代起，每个经济学家都

把资本家看作经济舞台上的主动人物，一般总把他看成是（不管这么说对不对）经济进步的主要创始者。但是在凡勃伦的笔下，所有这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商人仍然是个中心人物，但不再是动力。他竟被说成是体系中的破坏者！

不用说，由于观察社会时所采的角度与众不同，才会产生这样使人张皇失措的见解。李嘉图或马克思或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总是从人类利益的冲突开始，而凡勃伦不是这样，他从经济舞台的下面，即不属于人类的工艺的下层开始。强烈地吸引住他的是机器。他看到机器在社会占着支配地位，它的标准化作用席卷了全社会，它的有规律、周期性的活动使社会不得不跟着它按时行动，它的精确性与精密度的坚决要求使社会不得不与之相适应。不仅是这样，他还想到，经济的作用过程根本就是机械性的。谈到经济学就意味着生产，谈到生产就意味着当制造商品时，就像机器本身那样地将整个社会一网打尽。当然，这样的社会机器是需要照料者的——技师和工程师——使之随时加以必要的调节，从而确保各方面最有效的合作。但是，从全面看，可以把社会描述成是一个巨大的，但是纯事实的机械装置，一个高度专业化、高度协调的、人类的时钟机构。

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商人将置身何地呢？商人所注意的无非是图利，而机器和它的工程师一类人物，除制造商品外是别无其他目的的。如果机器运行顺利，配合适当，那么，那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将处于什么地位呢？

照理说是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的。机器跟价值和利润是无关的，它所全力以赴的只是生产商品。因此商人在这里没有他的用武之地，除非使他自己转化为工程师之类的人物。但是作为有闲阶级的一个成员，他对工程学是没有兴趣的，他所需要的是进行积累，而这一点却全不是装置机器时要他来完成的使命。于是商人为了

达到他的目的，不是在社会机器的结构以内进行工作，而是搞阴谋来进行捣乱！他的作用不是在于促进制造商品，而是在于促使商品的正常流动趋于崩溃，使价值发生波动，然后可以利用混乱局势，从中渔利。于是，像实际生产设备有赖于机器那样，商人在这些设备的上面构成了一个信贷、债券和虚假的资本估值的上层建筑。下面，社会在进行着机械的日常工作；上面，则金融结构在摇摆，在转变。与现实世界相辅而行的金融结构既摇摆不定，于是因缘获利的机会就变化多端，倏而出现了，倏而消失了，倏而又出现了。但是，这种利润方式的代价是高的，代价是经常发生骚动和扰乱，甚至为了追逐私利，有意识地把社会力量导向不该用的地方。

乍一看来这个说法是有些骇人听闻的。商人连个异端分子都不如，竟会损害生产方面的利益，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

但是在我们斥之为奇谈怪论之前，且看一看凡勃伦得出这个见解时所提到的他的所见所闻是怎样一个情况。不要忘记，美国工业此际所处的时代是被马修·约瑟夫森巧妙地称之为“强盗贵族”① 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那些商界巨头们，在自高自大、不识不知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时，就像个未开化时代的部落酋长那样，有些人在掠夺性目标上往往达到了非常成功的境地。这些情况当然都可以供作凡勃伦工厂里的原料，但是还不能完全配合他的论点——商人对生产的破坏。我们还得查看一下这些“强盗贵族”的一个更进一步的缺点——**这些人对生产商品是没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用 1868 年发生的一个事件来说明情况。当时为控制伊利铁路，杰伊·古尔德正与范德比尔特展开斗争，作为工业史的

---

① “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指封建时代对路过贵族自己领地的旅客要进行抢劫的贵族。——译者

一个小插曲，古尔德和他的一伙，有一次被迫逃过哈德逊河，在新泽西一个旅馆里设栅防守。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不是这一战斗所表现的原始性，而是他们对铁路本身的全然不顾。当古尔德与范德比尔特斗争时，他收到了铁路的一个负责人给他的一封信，告诉他：

> 你所经营的这条铁路，路轨已破损不堪，在泽西市和萨拉曼卡或布法罗之间，已经没有一段可以在通常速度下安全行驶，有许多部分，只能将行车速度减至每小时10或15英里时，才能勉强前进。

当意外事故层见迭出时，这个铁路公司的副经理说，"大家要自己当心，我照顾这条路时所能尽力而为的只能如此"，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公司财政已经窘乏到极点。

古尔德也不例外，他对具体的生产事业是全不关心的。当美国的金融事业处于黄金时代时，其间的中心人物一般所注意的是，股票、债券和信贷的结构，而很少注意到支持这个结构的那些具体的现实事物。过了不久，出现了个亨利·福特，未尝不可从他开始了一个怀有一个生产观念的工业巨头时代，但是哈里曼、摩根、弗里克、洛克菲勒之流所关心的，主要是对大量无形财富的翻云覆雨，而不是生产商品这一枯燥乏味的业务。例如，经营北太平洋运输公司的亨利·维拉德，是被经济学家广泛誉为有组织天才的人物，他们如果看到了詹姆斯·希尔（也是个经营铁路运输事业的）写的一封信，对他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希尔对维拉德的企业作了一番观察之后说，"路线位置适宜，铁路所经过的地区有些很富裕，可以招致大量客运和货运业务，但为事业供应的资金远过于所需，专事夸张，不切实际，为路线选择的地段也全不适当，实际上需要重起炉灶"。

再举最后的一个例子：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建立。在凡勃

伦看来，这个钢铁集团是从事生产钢铁的巨大的社会机构，是为了在共同经营下，可以进行比较有效的协作，而把一些工厂、高炉、铁路和矿井联合在一起的集合物。但是，在“组成”美国钢铁公司的那些人看来，这些不过是所要考虑的次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庞大的公司拥有实际资产6.82亿美元，与此相对，出售的债券计3.03亿，优先股5.10亿，普通股5.08亿。换句话说，在财务方面，这个公司比它本身“大”一倍，作为其普通股的后盾的，除无形的“商誉”以外，已一无所有。可是，在创造这些无形事物的过程中，J.P.摩根公司即赚得费用1,250万美元，优先股发起人的认股利润即达5,000万美元。总之，单为创设这一冒险事业的费用即达1.5亿美元。这个新组织，如果是怀有与凡勃伦见解相同的宗旨的，就是说，是旨在于为供应钢铁而设立的有效机构，那么，所有上述情况是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的。但情况不是这样。在13年中，钢轨的开价是每吨28美元，而其制造成本还不到半数。换句话说，技术联合的全部利益，为了保持虚伪的财务结构这一目的而遭到破坏。

从时代的观点来看，凡勃伦的理论并不是显得怎样牵强的。由于它所描写的差不多全以未开化时的仪式为根据，认为这就是人类经历的最后表现，这就会使人觉得受到了刺痛。但是把它的主要论点衬托得非常清楚的是这一事实：商业巨头的职能，与实际从事生产机构的那些人的职能，是大相径庭的。商界巨头们在金融上翻云覆雨那一类大胆的狡猾手段，在商品流量方面既起了促进作用，也同样起了滋扰作用。

说也奇怪，《企业论》所引起的狂热远没有《有闲阶级论》那么炽烈。这本书从来没有能逾越专业读者的范围，因此没有能像前一本书那样引起全国知识界的激动。它比较难懂，相对而言属于专业书籍，含有少数公式，也许借以向学者们表明，他是能够写“技术性”经济学的，假使他要这样做的话。但是，在他的冷静的、不带感

情的文章的后面，是不可能不觉察到他的主导精神之所在的。在凡勃伦看来，商人，尽管由他们自己或其辩护士，用一套煞非苦心的供求律或边际效率之类的理论说明，对他们加以掩饰，但本质上是掠夺者。后来凡勃伦在《工业巨头》的一篇文章里，描写了他所实际看到的商人的面目，他用"伺机而动"这个词来说明企业家的职能：

> 一个癞蛤蟆，当它已达到成年，找到了它所寻觅的苍蝇和蜘蛛的经常出入所在，从而有机会完成上帝的仁慈旨意时，那时它所怀有的心情，可以用"伺机而动"这个词来说明。这个词本来是用以描写这一情况的，但是只须在语气上略加转变，即可用以描绘受稳健商业原则支配的工业界巨头的成熟状态。处于这样环境的工业界巨头，当他适当的群众给以金字塔式的稳定原则的保证时，他脸上的表情也跟上述癞蛤蟆的一样。

但是在《企业论》里，凡勃伦没有使用这类说词，因为其时在他脑子里有个重要意图——要提出一个社会变动理论。说得具体些，这是个商人和支持他的体系迟早将陷于最终没落的理论。凡勃伦深信，商业领导人的寿命不会长，这些人目前尽管有权有势，但是已经有一个可怕的敌人在那里进行反对。这个敌人不是无产阶级（在《有闲阶级论》中已经表明，处于下层的人民是怎样尊视他们的优胜者的），而是一个更加难以和解的死敌：机器。

凡勃伦认为，机器"会影响到人的思想习惯"。它迫使人们根据事实、根据精确的、可计量的事物，而不是根据迷信和万物有灵论来进行思考。因此，对那些接触机器作业的人来说，感到越来越困难的是，同时接受"自然规律"和围绕着有闲阶级的社会分化这两方面的设想。于是使社会形成对立面的不是贫与富，而是技术人员与商人，技工与军阀，以及科学家与仪式主义者。

他在随后出版的一系列书刊中，主要是《工程师与价格体系》

和《不在地主的所有权与企业》，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这一“革命”。最后社会上将出现许多工程师之类的人物，来接管商业体系的混乱局面。生产的实际权力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不过对商业体系与真正的、纯粹的工业体系的不能和谐共处，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总有一天，他们彼此之间会进行商议，不再与“不在地主的所有权”周旋，根据大规模、有秩序的生产原则来管理经济。假使他们不这样做呢？那么，商业的掠夺性将增加，直到最后，蜕化为专制势力的特权阶级，一切凭发号施令行事，于是商人将趋于没落，代之而起的将是旧式军阀。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制度叫作法西斯主义。

但就凡勃伦在1921年的想法而论，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后的事。《工程师与价格体系》是以这样的词句结尾的：“广大富裕居民还刚刚构成通常的不在地主阶级，在这种处境下，不会有什么东西会动摇他的情感。”这是他典型的想法。尽管他的文风是力求不牵涉到个人立场的，但是他的主导精神则充满行间。不过这里说的不是属于他个人的主导精神，与私人之间的恩怨毫无关涉。他在行文中是抱着一种自娱心情和讽刺态度的，他本人怀着潇洒胸襟，认为一切都是瞬息即逝的，认为一切仪式上的考究和装模作样，总有一天会退让给别的什么。

这里不准备对他的言论作出评价，以后会谈到这一点。现在不妨提到的是一个奇妙的对照。凡勃伦一般的探讨问题的方法，使我们想到一位最“非凡勃伦式”的人物——那个不可思议的、半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伯爵。别忘了，圣西门也是颂扬生产者的，并对喜欢装饰门面的乡绅人物加以讪笑。他对“阁下是君王的弟兄辈”之说，表示极端厌恶；如果想到这一点，我们对凡勃伦藐视商业霸王那种态度的批判就会缓和些。

凡勃伦最后一次在芝加哥是1906年。这时他在国外已开始享有名声，有一次出席了挪威国王的盛宴，他出于少有的感情上的冲

动，把那次宴席上的菜单寄给他母亲，后者看到她儿子能荣幸地会见一位君王而深受感动。但是他的私生活却不十分顺利。他在男女关系方面，未免过于随便。他虽然已经著书立说，新近还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但是他的行为同哈珀校长所标榜的大学作风还有些出入。

他想另觅一新职位，但他的声名并不怎样符合理想，因此有些困难。最后他到了斯坦福大学。他的名声是众所周知的——高深的学术成就、不可捉摸的个性和婚外通奸的恶癖。他对任何事都抱着"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态度，少数能够忍受这种无礼表现的他的同事们，认为"他决不是个无所不知之人"。他这种在私生活上不自检点的性格始终不改，有一次一个朋友以圆滑的态度提到有个年轻姑娘在他屋子里，当是他的侄女。凡勃伦说，"她不是我的侄女"，一句话道破了一切。

他的妻子于1911年终于跟他离婚。他作为一个丈夫，必然是使人受不了的(他把从他"爱人"那里来的信随意放在衣袋里，使他妻子必然会看到这些信)，然而，也许出于情感上的关系，倒是她希望他们之间的结合能恢复正常。但这个想法终于落空。有一次埃伦认为她已有孕，凡勃伦惊惶之余，把她送到老家。他认为他自己完全不宜于做父亲，认为根据人类学论点，男性在家庭中是不重要的。最后，离婚成了无可避免之事。埃伦在一封自我同情的长信的末尾说，"虽然在这次谈判中他应每月给我津贴25美元，但是恐怕他未必会这样做。"她说的话是对的。

他离婚的那一年，他的职务继续在转变，这次是密苏里大学。他耽搁在他的朋友——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达文波特家里，那是个孤独的、性格怪特的人。可是对凡勃伦说来，这是个多产时期。他回顾昔日在芝加哥大学看到的情况，把它总结为由高级学府转化为专搞有力的公共关系的中心和足球运动中心，在《美国的高级学

识》中，他对美国的大学作出了极其辛辣的批评。当此书还在编写中时，凡勃伦半真半假地说，此书的副标题应为“对彻底堕落腐化的研究”。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把目光转向欧洲，这时战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他描写德国时，把它好战的政府比作绦虫，措辞尖刻，他说“描写绦虫与其宿主之间的关系时，是不容易用言词来加以美化的，即使要用使人信服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出于习惯作用，它总是喜欢留在那里的原因，也是有困难的。”这本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书的命运是很不寻常的，虽然政府的宣传部门，为了战争上的目的需要加以利用，但是邮政部门鉴于书内对英美很多贬抑之词而禁止邮递。

当战争终于爆发时，他向华盛顿主动表示愿提供帮助。对他说来，爱国主义不过是原始文化的又一表征，但他本人却并不缺乏这种精神。他在华盛顿被摆弄得颠来倒去，人人久闻他的大名，可是没有人需要他。最后把他安置在一个不重要的食品管理岗位上。在那里他仍按自己向来的作风办事；他提出建议，怎样可以增加农作物产量，由于他的计划须牵涉到农村方面的种种问题，实行时诸多窒碍，结果被认为“值得考虑”而搁置起来。他又建议对家仆雇用者课以重税，由此可以解放一部分人力，此议也未被接受。作为凡勃伦建议的一个典型是，他曾经说过，“一些男管家和男仆大都是体格特别健壮的一类人物，只要经过日常工作的锻炼，就可以降低其肥胖度，增加其臂力，从而成为合格的装卸工和搬运工。”

他于1918年来到纽约，为自由党杂志《标度盘》担任撰稿。他在那时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叫作《和平性质的研究》，在那篇文章里，他大言无忌地说，面对欧洲的只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办法，要末使旧秩序延续下去，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战争，要末完全放弃原来的商业制度。这个方案起先还有人谈起，后来就不大流行了。凡勃

伦在《标度盘》中大肆鼓吹这个说法，但这份杂志的发行量却逐渐减少。他被邀到新组成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演讲，参与的有很多知名人士，如约翰·杜威、查尔斯·A.比尔德、罗斯科·庞德[①]等。但是，即使他的这类演讲，也变得不能投时人所好。总之，他仍是个教室中人物，他的演讲一上来洋洋洒洒，但往往后劲不足。

对凡勃伦的舆论是毁誉交集，蔚为奇观。H.L.门肯[②]写道，"凡勃伦学说光辉四射，所谓凡勃伦信奉者，凡勃伦俱乐部，对世上种种不幸事件的凡勃伦治疗法，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在芝加哥还有所谓'凡勃伦女子'，指的大概是已到中年、感到身世飘零的那类女子。"但就他本人而论，实在是个微不足道之辈。在那个学院的客厅里放着他的半身塑像，使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后来终于把它移到一个比较不触目的图书馆内，方才罢休。他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中几乎一无所能，全靠几个他的忠实的、从前的学生——其中有韦斯利·米切尔和伊萨多·卢宾，他们自己也已经是很有地位的经济学家——相助为理。有一个时期，他认为已有迹象可寻，一个新世界将展开在我们面前——一个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世界，他盼望俄国革命会产生这样一个时代。但是结果使他感到失望。新学院的霍勒斯·卡伦说，"当他所盼望的结果未能实现时，就会感到兴趣索然，意志消沉，产生一种厌世态度"。

他被邀请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个邀请来得太迟了，他当即拒绝，并说，"当我需要这个职位时，他们却不来邀我。"最后他回到加州。约瑟夫·多尔夫曼在一本权威性的传记中说，他来到西部一个小屋，认为有人非法窃据了他的土地。"他闷声不响地拿起一柄斧头，有条不紊地把窗户打破，他笨手笨脚而态度认真，就像个

① 比尔德(Charles A.Beard，1850—1941年)，美国艺术家；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美国教育家、法学家。——译者

② 门肯(H.L.Mencken，1880—1956年)，美国作家、评论家。——译者

平时懒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被激怒之后，突然活跃起来的那副神情。"结果证明是一场误会，他在一些土产家具的围绕中定居下来，在这个环境中必然会使他回想到少年时代的光景。他穿着从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商店函购得来的粗劣的劳动服装，对天然的野生植物，即使一根莠草，也一无触动，让那些鼠鼬之属自由自在地在他脚边掠过，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沉浸在不愉快的遐想之中。

回想起来，这既不是欢乐的一生，也不是个获得成就的一生。他于1914年续娶，后妻有些神经失常，认为受到迫害，以致住院治疗，他的一些友人都与他隔得很远，注意他著作的大都是些业余的外行，经济学家对这些著作大都不甚重视，至于工程师，甚至不知其名。

他现在已是70衰翁，不再从事写作。他说，"安息日这个规定真好，我决定严格遵守，决不破坏。"他的学生来看望他，感到他待人接物越来越冷淡了。他不免要受到人们的奉承，有时还收到自封为他的门徒们的来信。有一次来信问他，"您能否告诉我，当年您初次从事写作时，在芝加哥什么地方，门牌第几号？"还有一个，于读完《企业论》后写信请教他怎样谋财致富。

在1929年发生严重萧条之前的几个月，他奄然长逝。除留下了遗嘱外，还用铅笔草成了一段未签名的训谕："这也是我的愿望，倘使我一朝死去，勿举行任何仪式或典礼，为力求简便和迅速，可立即付之火葬，将骨灰投入大海，或投入江河，让它辗转流入海中；勿为我设置墓碑、墓志铭、或任何雕像、肖像、题词之类，勿发布任何讣闻、画像、照片或传记等物，勿刊布我给人或人给我的任何信函，也勿用复制或抄写方式进行流通或传播"。

情形总是这样，他的嘱咐没有被逐一依照执行——火葬是照办了的，骨灰也被撒入太平洋，但是用文字纪念的种种办法立即开始。

我们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将作何看法呢？

可以不言而喻，他是个走极端的人。例如，他在刻画有闲阶级的特性时，在这一处对它作了生动的描绘，而在那一处则竭尽讽刺的能事。当他谈到有关财富的美的准则时，巧妙地说，“绅士们的大礼帽和漆皮靴都是精光烁亮的，而磨光了的袖子也同样有一种光泽，单就其与人体外形的配合来说，前者未必比后者具有更高的真正美感”，此说未尝不言之成理，我们不妨安然接受。但他后来说，“以牛作为景色中的点缀，总不能免于伧俗和小家子气，这是这一生物在装饰用途上始终存在的缺点”，这就不免流于荒谬。倔强的门肯针对这一点进行了攻击：“这位大教授考虑这一问题时在乡村里观光过没有？假如是的话，他曾经到过有牛呆在那里的牧场吗？曾经跟在后面注意一下牛的动作吗？曾经……？”

关于凡勃伦对商人以及对有闲阶级本身特征的描绘，也可以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他说在美国资本主义美好、平静的时代，那些金融巨子实际是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这个说法听起来虽不愉快，但无疑是事实。但是，他跟马克思一样，没有看到商业风气是会变的，商业制度跟英国君主政体一样，是会使自己与广大的变动了的世界相适应的。说得更加切要些——因为这就可以更加接近于他自己的研究态度——是他没有看到，对整个生活会起到重新安排作用的机器，固然会变更企业机能的性质，但也同样会变更工人的思想进程，到那时，由于商人负有管理巨大的、不断前进中的机器的任务，而不得不越来越近似于官僚主义类型。

诚然，凡勃伦那么重视机器，会使我们引起一点顾虑，作为一个思想家而这么缺乏抒情性，听起来是不怎么好受的。机器也许会导致我们的思想趋于枯燥乏味，但是在哪些方面枯燥乏味呢？查利·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并不是个愉快的、对时代适应得很好的人。一批工程师也许会把我们的社会管理得很有效，但是，能不

能管理得通情达理、顺应人情是另一问题。

凡勃伦确曾过问到变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赫然存在，其重要意义超过任何其他问题，奇怪的是，在他的同时代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问题是，在20世纪历史变动中，技术和科学作为一个主要力量的涌现。无疑的是，工艺时代的开始，作为一个文化演进的转折点，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历史上发生的任何转折点，机器的逐渐引进，终于发展到与人生须臾不可离的地步，由此所完成的一次革命，可以与人类驯养动物和由穴居野处到移居城市这类过程相媲美。机器的发明，跟一切伟大发现一样，情况虽明白如昼，而事前则无法预见其演变趋势。凡勃伦在这一点上未免过于急躁，需要几个世代、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过程，他却预计在几十年甚至几年之内即可成熟。然而他却看到了，机器是他的时代的经济生活方面头等重要的事实，这是他的一份功劳和光荣，单是这一光辉的启迪，就得把他在经济的哲学家中放在最突出的地位。

他还使经济学有了一副新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经过凡勃伦对日常生活细节一番不客气的描写之后，要把社会描写成彬彬有礼的茶会之类的做法，将越来越感到困难。他曾经写道，"一帮阿留申群岛的土人，往来于破船残骸的泥淖中，手里拿着耙子，口里念诵着咒语，在忙着捕捉贝壳之属，然后坐下来庆祝他们的功绩，同时共同商议，在租金、工资和利息方面，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旧学派的轻蔑之意。对原始式人类斗争的传统的解决办法是，使它纳入不带斗争色彩的体制，凡勃伦对此同样予以讥嘲，他强调用一套不完全的、已经过时的先入之见来了解现代人的行为，是枉费心机。人是不能用一套微妙复杂的"经济法则"来了解的，在这个法则下，人所固有的凶暴性和创造力，都被符合经济原则这一借口所掩盖。较好的对付方法是，用一套人类学

者或心理学者所使用的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比较基本性的词汇来进行讨论：认为人是具有坚强而无理性的倾向的生物，他的性格轻信易惑、天真无知而崇尚仪式。凡勃伦要求于经济学家的是，且把另一时代的先入之见搁开，先找出原因，为什么人类实际上的行为动作会是这样的。

他的门生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自己就是个有地位的经济研究者，对他作出了这样的总结："托斯丹·凡勃伦抱有一种使人不安的研究精神。他就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观光者，对人们在无意之中早已习见的、日常的平凡事物，会加以仔细分析，对人所司空见惯的一些思想和事态，就好像是些外在力量所导致的奇妙产物，会在他心头引起作用，发生反应。像这样在严峻环境中的思想解放者，在社会科学界还没有见过，像这样扩大研究领域的人，也没有见过。"

第九章　凯恩斯的“标新立异”

托斯丹·凡勃伦在离世前几年曾在证券市场上从事投机，这是件怪事，是跟他的性格不相投的。一个朋友劝他买石油公司股票，他在晚年不免要注意到自己的经济问题，就拿出一部分储蓄来从事冒险事业。起先略有所获，但是他所买的这家股票价格刚要上涨，这个公司就发生了事故，牵涉到了当时流行的石油丑闻。他的投资终于变得一文不值。

这件事除了足以表明凡勃伦在自保其身方面又一微小的弱点以外，它本身是不重要的。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一不幸事件未尝不富有启发性。因为足以使凡勃伦自己成为牺牲者的那个眩惑人的诱饵，也就是当时蒙蔽了全国的诱饵——当即使最清醒的观察者也不免于随风而靡时，则全国把繁荣看作永久不变的现象而处于自我陶醉情况，又何足怪呢？

诚然，繁荣的迹象处处可见。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全国就业人数达4,500万，工资、地租、利润和利息总额共达约770亿美元，这样大的收入，同世界上以前所看到的情况是无法比拟的。当时赫伯特·胡佛总统说，“靠了上帝的恩惠，在不久的将来，贫穷将在我国绝迹。”这句话也许说得目光过于短浅，可是，谁不是这样想的呢？他的话所根据的是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就美国的普通家庭说来，与世界史上迄今为止的任何处的普通家庭比较，在衣、食、住和生活享受方面都是独步一时的。

这个国家自有它的一种新的憧憬，其意气昂扬的气势，远非所谓“强盗贵族”的海盗式理想可比。民主党议长约翰·J.拉斯科

布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每个人都应当富裕起来"，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如果每人每周节省 15 美元，用以投资于可靠的普通股，到 20 年之后他至少可得 8 万元，用以投资，每月可得收入约 4 百元。他这就可以富裕起来"。

根据这个计算，假定的只是，此人以其收入的一部分不断地进行再投资，其所投之资则按周年 6 厘计息。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加诱人的生财之道。假使一个拉斯科布的信徒把他的收入**花费掉**，只是让他的资金按股票价格的动向增长，他也会同样迅速地达到目的，而在过程中所受到的痛苦却要少得多。假定他于 1921 年用每周节省 15 美元的办法得来的 780 元购买股票。到 1922 年，他的资金将是1,092元。如果他每年投资 780 元，他将会看到，于1925年时他已拥有 4,800 元，一年之后将是 6,900 元，1927 年时将是 8,800 元，1928 年时，将是难以置信的 16,000 元。难以置信吗？到1929年 5 月时，他的财产将超过 21,000 元。在不到 9 年之间，他的储蓄 7,020 元将增至 3 倍。当这个以多头占优势的市场，以几乎无间断的涨势，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代之久时，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致富捷径，谁能说他不对呢？理发师或擦皮鞋的人，银行业者或商人，个个在赌博，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这时在多数人心目中的唯一问题是，为什么在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做。

结局是无须多说的。1929 年 10 月的那个可怕的末一周，市场一下子崩溃了。对证券交易所场内经纪人说来，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从窗户里冲了进来，市场上一片叫卖声，如海覆江翻而至，使他们无法应付。他们叫嚷得声嘶力竭也找不到一个买主。眼看着大量财富，如阳光下的冰雪，都化成水了。

当一场风暴过去，痛定思痛，看一看这场风暴带来的损失时，情况是非常可怕的。两年来所赢得的阵地，在这昏天黑地的两个月里完全丧失了，整整 400 亿的价值化为乌有了。投资者三年前

通过浮夸的估值，比方说为21,000元的财产，三年后不但无所增益，倒反减去了80%；原来7,000元的储额，而今只值4,000元。那种认为"个个都是财主"的说法，结果证明原来是虚诞之词。

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这场风暴是无可避免的。证券市场是在无数贷款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它仅能承受这么多压力，再多就受不住了。还不止是这样，支持着繁荣这一壮丽景色的，有些都是枯枝朽木，它们本身就不可靠。议长拉斯科布提出的退休方案，在数字计算上是够精确的，但是，当一个人的平均工资只有30元，而要他拿出15元来储蓄这一问题没有解决时，这个方案将如何实现？

就国民收入数额之巨大说来，无疑是赫赫洋洋，令人叹羡的，但是从它的分配中会看到，其间存在着极其显著的不均和不公平。处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顶端的约2.4万户的收入，约3倍于处于金字塔底层的6百万户的收入；前者各户的平均收入，高于后者约630倍。这一点还不是在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唯一缺点。在无限繁荣这类喧嚣的后面是，有2百万居民陷于失业状态，银行的门面尽管富丽堂皇，而在大爆炸到来之前的6年之间，银行倒闭者平均每天有2家。还有，一般美国人喜欢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利用繁荣，他们竭其所能地进行抵押借债，在购货时可以分期付款的诱惑下，危险地扩大其资源，最糟的是，为了求财心切，盲目地买进数量大得惊人的股票，据估计约达3亿股，而买进时的方式不是一手交款一手取货，而是用缴纳保证金，即信用借款的方式。

对于结局是否会避免，当时是无人看得清的。那时，总是传播着一些使人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感到振奋的消息。即使像耶鲁大学的欧文·费希尔那样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被繁荣的表面迹象所骗倒，说我们正在向着"无边际的高原"行进，这句话正好成为当时的笑柄，因为在此后的一星期，证券即跌落到这个高原的边缘之外。

这种现象尽管是激动人心的，但是，证券的狂跌，并不是最足

以摧毁"永不会完结的繁荣"的一个世代的信心的唯一因素。它是内部所固有的，不是被某一现象所激发的。在这个阴森的岁月里，有几件事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在印第安纳州的芒西，于1930年终时，每4个工厂里的工人就有一个失业。在芝加哥，女工每小时的收入，大多数低于25美分，其中的四分之一还不到10美分。单是在纽约的鲍厄里街，每天就有2千个失业者排队领取食物救济。全国住房建筑一下子减少了95%，9百万家储蓄帐户化为乌有。商号关掉了8万5千家。全国薪金数额缩减了40%，股息减少了56%，工资减少了60%。

在这次大萧条中最使人沮丧的是，瞻望前途，似乎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没有转机，没有解除痛苦的希望。1930年，政府果敢地号召，"好日子又要来了"，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收入从870亿降至750亿。1931年流行的歌曲是"我赢得了5元钱"，这时国民收入则继续降低到590亿。1932年的歌声就更加凄凉了："兄弟，你能不能施舍一毛钱?"，这时国民收入则惨落到420亿。

1933年，这个国家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国民收入已降至390亿美元。还是在4年前所看到的繁荣，而今大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的生活水平，已经退回到20年前的规模。有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闲坐在家里，或是在大街上逛来逛去。看上去好像美国人已经永无振作起来的希望，从此将一蹶不振。

最难忍受的是失业。成百万找不到工作的人，对国家说来就好像是肌体上的赘疣，一般经济学家对此只是说制度上出了毛病，只是搓手顿足而无计可使，既不知症结所在，也拿不出治疗方案。失业——这种形态的失业是制度病态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是越出常情之外的，是荒谬绝伦的，从而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确存在着。

生产不足，而同时又存在着人们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这看来是

个不可解之谜，试图解答这个谜的人，看来应当是个左翼人士，是个愤愤不平的无产者；这个说法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实际上再没有比这个说法离开事实更远的。解决这个难题的人是个业余艺术爱好者，或者是近似于这样的一个人，绝无好勇斗狠气质。事实上，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例如，他写过一本关于数学概率的极其深奥难解的书（伯特兰·罗素[①]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怎么赞扬也不会过分”），然后他又在生财之道上大显身手，通过对外汇与商品的交易，积资达50万镑。更足以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是，他所写的关于数理方面的精深微妙，只是他的一种副业，他还担任着行政方面的职务，至于从事于积蓄私财时每天所花的时间，只是他未起身前的半小时。

但是，这里所说的只是他作为一个多面手的一些范例。当然，他主要是个经济学家——是剑桥大学学院的学监，但看这一职位，其人之尊严和博学可想而知，但在择妻时则舍去女学士不顾，却挑选了著名的迪阿吉利夫集团中一个演主角的芭蕾舞女演员。同时他既与上层阶级社交生活水乳交融，又是个知识界中的出类拔萃人物，还是个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各个方面应付得八面玲珑，头头是道。他在微妙的国际外交问题的处理方面是中流砥柱，但是，他尽管主持公道，对欧洲其他政治家之纵横捭阖以及在财务方面的诪张为幻则又无所不知。他在收集现代艺术品方面，在此道尚未流行之前已经开始，同时他对牛顿著述的私家收藏之精，是属于世上第一流的。他还经营着一个剧院，而后来又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他认识罗斯福和邱吉尔，也认识肖伯纳和毕加索。他喜欢玩桥牌，但喜欢独当一面，不喜欢合约进行。有一次他说，此生只有一件事引以为憾，喝香槟酒时量再大一些就好了。

---

①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译者

这里说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一姓是英国的故家望族，可以追溯到威廉·德·凯汉恩斯和1066年。凯恩斯是个传统主义者，想到他这一族源远流长是颇为自负的，他的父亲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其人自己就是一个很有名声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儿子的资质是不同寻常的，所凭的不单是上代的遗传，好像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才形成这样一个天才人物。

他出生于1883年，就在这同一年，卡尔·马克思与世长辞。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生存的时间上这样接近，在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上又都产生了这样深刻的影响，但就思想的不同而论，再没有比这两个人更加泾渭分明的了。马克思心情沉重，怀着满腔怨愤不平之意，仿佛时刻处于背城借一之境，是"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的起草人。而凯恩斯所感受的是此生之可乐，他在一生中总是驾着轻舟从容前进，终于圆满地成为"会繁荣生长的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所以要热衷于作出资本主义一定要崩溃的预言，说成是由于他实际生活的坎坷不平；假使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凯恩斯所以能重新唤起人们的信心，所以能使死灰复燃，是由于他生活的一帆风顺和丰富多彩。

凯恩斯的童年时代正处于维多利亚学派风行之际，那时他已崭露头角。他4岁时已经在推敲利息的经济涵意，当他6岁时，对于他自己的脑子是怎样运转的，在感到疑惑，7岁时，他的父亲认为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不久他到准备进入大学的预备学校去求学，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待同伴的能力：他有一个"小厮"代他拿着教科书，恭顺地跟在他后面，作为交换，凯恩斯帮他解决比较棘手的课外作业方面的问题；同另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孩子订了个"君子协定"，凯恩斯答应为他每星期向图书馆借一本书，交换条件是，对方的一帮人平时不得无故走近他的一帮人的15码之内。

14岁时，他向伊顿公学[1]申请并获得了奖学金。关于英国公立中学的恐怖故事是传闻很广的，但凯恩斯肉体上既没有受到凌辱，精神上也没有受到折磨。他已进入青春时代，考试时得到的评分是最高的，因此得奖累累，他为自己买了件淡紫色的背心，渐渐染上了饮香槟酒的爱好，他的背略有些驼，蓄起了小胡子，参加了划船比赛，渐渐成了个令人生畏的辩论家，他并无阿谀讨好之意，却成了个伊顿学校的狂热分子。从他17岁时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所表现的洞察力，就他的年龄而论是很少见的。当南美布尔战争达到高潮时，校长发表了一次演说，凯恩斯用了短短几句话概括了当时的情况："这是我们具有的品质。我们应当表示欣慰；记着我校的光荣传统，同向有的情况一样，如果要干什么就得尽力而为"。

他在伊顿公学的经历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也获得了巨大成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希望他成为一个专业经济学家，庇古教授(马歇尔未来的接班人)每周同他共进早餐一次。他当选为大学学生俱乐部秘书，这个职位最后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最著名的非官方辩论会之一的主持人。他被伦纳德·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2]物色到了，结果产生了在伦敦的所谓"文化设施集中区"。他癖好很多，喜欢买书，常常午夜不睡，思考问题。总之，他不是个平凡的人，是个杰出人物。

但是，即使是一个非凡的人也得穿衣吃饭，这就发生了做些什么工作的问题。他手里的钱很少，而从事于学究生涯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他怀有较大的野心。有一次他写信给斯特雷奇，"我想

---

① 伊顿公学在伦敦西面伊顿(Eton)镇，是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的中学。——译者

② 伍尔夫(Leonard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译者

办一条铁路，或者组织一个托拉斯，或者至少从事股票投机，要掌握这些方面的原则是容易的，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没有人请他办铁路或托拉斯，从事投机事业的想法也只是表明了凯恩斯想象的不诚实方面。于是他流入宦途，借此求得升腾。他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参加了文官考试，这就促使斯特雷奇的一个姊姊问他，他是不是在装腔作势。他说不，他对试题已经了然胸中，何必烦躁不安，折磨自己，这又有什么用；他准定会名列前茅。结果当然如此，他是第二名，在答案中他分数最低的是经济学部分。他后来说，"主考人所懂得的经济学大概还不及我"；就这里的情况说，假使他所说的不是事实，人们将责怪他狂妄至极，然而情形与他说得完全一样。

他于1907年被派到印度政府机关服务，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工作。当时他在国内正以充沛的精力从事于写作关于数学的论文，觉得在政府机关当个小官，跟他经营铁路的愿望差得太远了。经过两年，觉得在这方面的经历已经够他受的了。他说，他的一番努力，无异是把一条纯种牛从英国冤屈地运到孟买。他在行政工作中还发觉，一些考虑欠周的对他的评论会把他葬送掉。于是他辞去职务，回到剑桥。但是，他在印度的岁月不是完全白费的。根据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写了一本叫《印度通货与财政》的书，于1913年出版，看到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杰作。就在这一年，由官方组织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从事于研究印度通货问题。其时凯恩斯年29岁，被邀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这是很少见的荣誉。

他比较喜欢的是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是一向受到尊敬的，不久即被邀请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个杂志是英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刊物，这个职务他担任了33年。

比剑桥大学更加合他的意的是文化设施集中区。这个集中区既是个场所，也是个代表着一种心情的表现的所在。一小簇知识分

子(凯恩斯在其之间是个"尚未取得学位的学生")聚在一起，现在他们有了个家，有了个集中表现的哲学观念，有了声望。属于这个有魔力的圈子里的人物，也许不到20名或30名，但是，他们的意见足以形成一个艺术上的标准，其一字之褒或片言之贬，都不是开玩笑的；总之，在这个集团中人才济济，有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赖伊、利顿·斯特雷奇等等。如果这个"文化集中区"面呈喜色，那个诗人就可以成名，如果皱眉蹙额，那个画家就要倒霉。据说，它可以用十几种不同的声调来表示"真的吗?"这个词的不同涵意，其中表示厌烦是绝非最少用的皮里阳秋。它的态度是变化多端的，时而是理想主义的，时而是冷嘲热讽的，时而勇往直前，时而心虚胆怯，是难以捉摸的。

在这一切活动中，凯恩斯是个中坚人物——是顾问，是参赞，是公断人。他可以用完全有把握的态度来谈任何事物。担任"作曲"的威廉·沃尔顿和担任"舞蹈动作设计者"的弗雷德里克·艾什顿以及许多其他艺术家和专业人员，常常听到凯恩斯对他们说，"不，不，关于这一点你完全搞错了，……"

对于要努力整顿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人来说，这些不过是他初踏进社会时小试其技。

在战争期间，这个"文化集中区"有点陷于中断状态。凯恩斯被召到财政部，派他处理海外财政事务。他在那里必然也是干得很出色的。一个老同事后来曾谈起他在那时一段有趣的轶事："当时迫切需要西班牙货币比赛塔，费了点气力搜集了一些。凯恩斯及时报告了财政大臣，后者说，无论如何，在短期间我们总算有了一批比赛塔了。凯恩斯说，'啊，不是这样!'他的上司吃了一惊，'什么!'他回答，'我把它全部售出了，几乎压垮了市场。'他真是这样做的。"

他不久就成了财政部中的中坚人物。为他写传记的人以及他的同辈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都说,凡是见解成熟的人都认为,就对战争获胜所作出的贡献来说,在文职官员中再没有超过凯恩斯的。尽管这样,他还会找出时间从事别的活动。有一次为财政事务来到法国,他有了一个念头,如果法国人把他们国立美术馆所藏的画卖给英国一部分,未尝不有助于两国之间帐务的平衡。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为英国取得了价值以10万美元计的科罗、戴拉克瓦、福赖因、高盖因、安格尔和莫内的作品,还设法为自己买到了一幅塞尚的画。此时德国的大炮在轰击巴黎,画的价格在低落。他回到伦敦,有一次出席了一个舞会,通过西特韦尔一家① 结识了擅长歌舞的莉迪亚·洛科波娃。凯恩斯说的是标准英语,莉迪亚所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个,两人之间的相得可想而知。

但是上述的一些都是枝节,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战后的欧洲臻于安定。凯恩斯现在已是个重要角色,准备对国是有所献助,但仍然处于幕后,他实际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尚未被人识破。他作为财政大臣的代理人,在来到巴黎最高经济委员会上作出决定时拥有全权。他在和会上是财政部的代表。但是,他只是次一级官员,在看台上虽然占有一席,但对台上的纵横捭阖则无权直接干预。当凯恩斯从旁目睹到威尔逊被克列孟梭挫败和人道主义和约被报复性和约所代替时,他必然是非常痛苦的。

他于1919年写给他母亲的信里说,"我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写信给任何人,我感到疲乏不堪,这部分是由于工作,部分是由于对周围的恶势力感到沮丧。我从来没有像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那样地感到难受。这次的和约是荒唐无耻的,而且是行不通的,它会促成的只有灾难,再没有别的"。

---

① 西特韦尔(Sitwell,1860—1943),英国作家,其子女均为名作家。——译者

他勉强从病榻上爬起来，对于他所谓的"维也纳谋杀"提出抗议，但没有能阻止潮流。这个和约是迦太基式的和约。据此，德国所应付的赔款数额之巨，为了挣得那么多的英镑、法郎和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它将不得不无所不为。当然，这不是民意所在，但是凯恩斯还从凡尔赛和约看到了由此在无意中引起的后果——更加可怕的德国的独裁制度和军国主义。

他在失望中辞去了职务，在和约成立的前三天，开始对它进行攻击。他怀着满腔怒火，用高速度写成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2月间发表，他也由此成名。

这是一篇辉煌的、具有压倒一切力量的文章。他看到一些首脑人物在发挥作用，他是用小说家的技巧和上述"文化集中区"尖刻的批判精神，来描写这些首脑人物的。他说克列孟梭"在意想中只有一个幻觉——法兰西，还有一个是不属于他的幻觉范围之内的——人类，其中至少包括他自己的同僚"。对威尔逊他说，"就像个奥德修斯，[1]当他坐下来设谋献计的时候比较明智。"他对人物的描绘固然才智焕发，对和约危害性的分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凯恩斯看到，审定和约者的意图，只是在于清算政治上的怨恨，而全不计及当时的迫切问题——使欧洲从创伤中恢复过来，成为一个团结的、活跃的整体。

> 四巨头所全神贯注的别有所在，而不是这些问题。克列孟梭所注意的是要挤垮敌人的经济生活，劳埃德·乔治只希望搞到一个协议，能暂时敷衍过去就行，总统所关注的只是正义和公理。至于欧洲的饥饿和分崩离析这个基本问题却不能引起这四巨头的注意，这是个非常怪特的现象。赔偿问题使他们在经济领域内迷失了方向。他们只是从神学、政治学，选举方

① 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译者

面的诡计、从一切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操在他们手里的有关国民经济的前途却漠不关心。

他接下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因此，我们面临的威胁是，欧洲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降低，对某些国家说，已经降低到实际上挨饿的程度(俄国已经实际达到了这一点，奥地利已将近达到这一点)。人是不会始终甘心淹没在沟壑中的。由于饥饿，有些人将垂头丧气，陷于无告的绝望状态，有些人会神经失常，铤而走险。当他们处于极端困境时，为了不顾一切地满足个人的迫切需要，就会推翻战后残留的组织，会毁灭文明本身。这就是我们必须把所具有的资源、勇气和理想集中在一起来共同防御的危险。

这本书问世以后获得了巨大成就。条约的难以实行，在一开头就已显得情势了然，但是首先看出、首先说出这一点的、并且直率地提出要进行修改的是凯恩斯。他已经以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知名。当他 1924 年所提出的道斯计划开始了打破 1919 年造成的僵局这一漫长过程时，他富有远见的天才获得了证实。

他现在已经成名，余下的问题是干些什么。他选择的是冒险性尽可能大的业务，他开始用几千镑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从事投机而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资金。有一位银行家，从来不认识他，但对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留下了深刻印象，靠这位银行家的贷款，结果积累了价值 200 万美元的财产。这完全是凭偶然的机会造成的。他从事投机时，对内部消息不屑一顾。他曾说过，华尔街的商人如果不去理睬那些内部消息，就不难致富。他自己的法门没有什么别的，只是仔细审查一些资产负债表，此外所凭的是，他自己对金融的广博知识，对于一些人物性格的直觉观感，和关于经商的某种资质。他早晨未起床时，就逐条审阅金融市场上的情报，作出决定，把他要进行的交易通知经纪人，就是这么回事；这样他就可以腾出

整天的时间来处理较重要的事项，如有关经济理论的探究。这样他就可以同大卫·李嘉图的大名并驾齐驱。

顺便说一句，他有时并不专为自己赚钱。他为皇家学院掌管财务时，曾使戋戋之数30,000镑变成380,000镑。他曾管理过一个投资信托公司，领导过一个人寿保险公司。

他的活动目标，在同一期间总是不止一个——他为《曼彻斯特导报》写稿子；在剑桥大学按时上课，为了使枯燥的理论增添些趣味性，不时地掺入一些关于当代人物或国际商品市场上发生的情况的描绘；在此期间还娶了利迪亚·洛科波娃。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成了剑桥大学学院教师的妻子，这是她的一个新任务，但她完成得很出色，使凯恩斯的友人有些诧异，他也感到宽慰。当然，她放弃了她的专业生涯，但根据一个老朋友的报告，则与此说颇有出入，说她仍在练习故技。

她长得非常美丽，而他只是一个正常的爱慕女子的男人，并不漂亮，但个子很高，仪表威严。他那壮大而略带些笨拙的身躯，同他偏长的三角形脸正相配合，他鼻梁挺直，有着从在校时就留起的剪短了的小胡子，厚嘴唇，尖下巴。他的一双眼睛善于表情，在弯弯的眉毛下有时庄重，有时冷漠，有时则闪闪发光，大概要看对方是政府的使者、投机家、“文化集中区”的行家还是芭蕾舞迷而随时变化。

凯恩斯对客寒暄时有个怪癖，喜欢把两手拢在袖子里，袖手而谈。由于他对别人的一双手特别注意，又由于对自己的手感到自豪，因此这一藏匿双手的姿态，就格外显得难以理解。他甚至把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手制成模型，还收集了他的朋友们的手的模型；当他遇到一个人时，第一件事就是注意对方的手掌、手指和指甲的特征。后来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谈话后，记下了如下的对这位总统双手的观感：

当然，我起先没有密切注意这类问题。后来我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双手。他的手很结实，相当有力，但是显得不大秀气或不大灵巧，他的指甲短而圆，像个商人的指甲。我无法如实地加以描绘，他的手（在我的眼里）虽然不是什么特殊的，可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类型。不管怎么说，我似乎是在哪里见到过的。哪里呢？我足足花了 10 分钟，就像追忆一个忘记了的名字一样。我终于想起来了，是爱德华·格雷爵士——一个更加踏实的、美国化的爱德华·格雷爵士。

罗斯福写信给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时说，"我跟凯恩斯作了一次有意味的谈话，我对此人倾倒之至。"他如果知道，他在凯恩斯眼中被看成个具有一双某一外交大臣的商人式的手，他是否会这样说就大有疑问了。

1935 年时，他已经有了显赫的经历。《印度通货与财政》虽然篇幅无多，却是部精心杰作，《和约的经济后果》是一次巨大成就，《概率论》的专业性虽然强得多，情况也是这样。关于上述最后一本书有一则小小趣闻。凯恩斯与马克斯·普兰克教授一同进餐，普兰克是一位在数学方面具有天才的人物，量子力学就是在他手里发展起来的，这门学问是人类智力比较惊人的成就之一。他对凯恩斯说，他曾一度考虑要从事研究经济学，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它太难了。凯恩斯把这句话作为一个趣闻，转告他刚从剑桥回来的一个朋友。后者说，"啊，这就奇怪了，伯特兰·罗素有一次告诉我，他也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因为它太简易，决定作罢了"。

但是，我们知道，数学不过是他的副业。他 1923 年发表了《货币改革论》，又一次使世人瞠目结舌。他猛烈抨击对黄金的盲目崇拜，反对人们甘愿放弃对自己的通货作有意识的管理，而把这个职责托付给一种自然的结构——国际金本位制。当然，这是一本专

业性很强的书，但是它跟凯恩斯别的作品一样，其中充满着生动的笔调，使读者情趣盎然。谈到关于某些古老的经济学说所论及的"长期性"后果时，他冷冰冰地说，"就长期而言，我们都是要死的"，这就对英国一向有的传统想法，给了当头一棒。

更有甚者，于1930年他发表了《货币论》，这是一本试图说明整个经济动态的书，它的篇幅很大，很难懂，有时光辉夺目，有时令人迷惑。它要说明的主要问题是，使经济时而活跃起来趋于繁荣，时而衰退下去趋于萧条，使它运转得这样不平稳的是什么，从而使它成为一本吸引人的书。

当然，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了几十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且撇开不谈——如1929年的大爆炸以及历史上在其前发生的事件（如密西西比公司倒闭时18世纪在法国所看到的情况）——就商业的正常进程说，一系列的扩张与收缩，就像波浪般一起一落，这种经济上的表现，又有点像生物的一呼一吸。例如，就英国说，商情于1801年不振，1802年较好，1808年衰退，1810年又颇有起色，1815年复转弱，如此起伏不定者经百年之久；在美国的情况也差相仿佛，不过在日期上稍有异同。

在这个繁荣与萧条交相更迭现象的幕后是什么？起先认为商业循环是一种群众性的神经错乱现象。1867年时一位观察者写道，"这类周期的崩溃实际是心理上的现象，其促成因素是沮丧情绪、兴奋心情、对前途的希望、失望和恐慌。"这个说法，对华尔街或伦巴第人街、对兰开斯特或新英格兰的那些人的心情说来是很好的描绘，但是对基本问题没有作出交待。造成这样广泛的歇斯底里的是什么？

有些早期解释，则在经济程序以外寻找答案。W.斯坦利·杰文斯——他的"快乐与痛苦的演算"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学，我们在上面的一章里谈到过——把罪责归之于太阳黑子，这个说法

并不像我们初看起来那么牵强。杰文斯注意到从 1721 到 1878 年间历次经过的商业循环，从这次繁荣到下一次繁荣的平均间隔期间为 10.46 年，而太阳黑子（那是威廉·赫谢尔于 1801 年发现的）的周期是 10.45 年。杰文斯深信，这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得太密切了，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他的想法是，太阳黑子的时隐时现促成了气候上的周期变化，从而促成了降雨量的周期变化，从而促成农作物收获量的周期变化，终于促成商业上的周期变化。

这并不是个要不得的理论——除了某一点。但是，如果经过进一步仔细计算，把太阳黑子的周期拉长为 11 年，则天体的机械运行和商业的变化莫测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不存在了。太阳黑子是天文学上的问题，要探索商业周期的激发因素，就得回到地面上的与世俗有关的方面考虑。

实际上要回到的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由马尔萨斯在直觉的和带些笨头笨脑的情况下所首先指出的那个领域，即"节约"领域。我们也许还记得，马尔萨斯当时所怀的疑虑——一种说不大清楚的感觉，认为由于某种原因，节约会导致"普遍过剩"。对此说李嘉图加以嘲笑，穆勒则不屑一顾，结果这个想法就成了经济学地下派的一个附属物。认为节约会成为烦恼的根源的说法，是对俭德本身进行非难！这简直是邪辟之辞。亚当·斯密不是说过的吗，"如果对各家各户说来是谨慎明智的行为，那么，对一个大国说来也决不会是愚蠢行为"。

但是，当早期经济学家拒绝考虑节约会成为经济进步的一个障碍这一设想时，他们并不是在思想上离经叛道，只是在观察现实世界中的事实。

大体上说来，在 19 世纪初叶进行储蓄的人也就是使用储蓄的人。在李嘉图或穆勒的艰苦时代，能够进行储蓄的，事实上只有那些有钱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聚拢的资金，一般说来，*总是*要用于

这一种或那一种的生产性投资的。因此把储蓄正确地叫作“积累”，由于它象征着一个金钱的正反两面，一面是一宗货币的积聚，另一面是可以直接用以购置生产设备或房屋或土地，从而挣得更多财富的资金。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时，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财富的分配有了改进。随之而来的是，进行节约或储蓄的可能性扩大到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同时，商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失去了个人的色彩。它不断地寻求新资本，所寻的对象，不仅是各个经理人物的钱袋，还有全国不知名的储蓄者的钱袋。这就是说，储蓄和投资彼此渐渐分道扬镳，改由各不相谋的两类人物来分别执行。

财富分配的这一改进，的确为经济带来了烦恼。说到底，马尔萨斯毕竟是对的，不过他从来没有预见到其中的症结所在。

由财富分配的改进所引起的这种烦恼，在性质上是非常重要的，是萧条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花些时间来弄清这一点。

首先必须了解我们是怎样计量一国的繁荣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着手。不是用黄金来计量——贫穷的印度拥有很多黄金。也不是用物质资产来计量——建筑物、矿山、工厂、森林于1932年并没有消失。谈到繁荣与萧条，主要不是过去的光荣，而是今天的成就，因此是用我们挣得的收入来计量的。当我们各个说来的大多数（因此也就是集体说来的大多数）享有高收入时，国家就是富裕的，当我们全部个人（或者说是全国）的收入降低时，我们就处于萧条状态。

但收入——国民收入——不是个静态概念。实际上，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收入从这一手转到那一手的不断流动。我们进行的每一次购入，就是把我们收入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别一人的袋里。同样情况，我们收入的每一枚钱，不管是工资、薪水、租金、利润还是利息，归根到底，总是从别人所花费的资金中得来的。想一想你所

享受的收入的任何部分——当你为某人服务，或者是他光顾你的店铺，或者是帮助维持你拥有债券或股票的那一个公司的业务——就会明白，收入是从别人的袋里转来的。

经济就是通过资金在彼此间循环流转的这一过程，也就是使彼此的愿望得以满足的这一过程，得以经常保持它的新的活力的。

资金的循环流转，也就是收入的不断移转，一般说来是很自然地、在不发生阻力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大家都把收入的大部分花费在供我们自己使用和享乐的商品，也就是所谓的消费品上。由于我们购买消费品时具有相当的连贯性，是相当有规律的，这就使我们国民收入的相互转移有了保证。由于我们必须穿衣吃饭，由于我们需要享乐，这就使我们这一方的经常而稳定的花费有了保证，从而使另一方的经常而稳定的收入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简单，都很直截了当。但是，我们收入的一部分并不是直接投入市场从而成为别人的收入的，于是发生了我们所储蓄的那部分资金。如果把我们的积蓄塞在床垫下，或是用现金贮藏起来，那么，收入的循环流动即由此中断。那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冻结了从社会上取得的收入的一部分，结果是我们所还给社会的，少于我们从社会所取得的。如果这样的冻结行为广泛而持续地进行着，则每个人的货币收入，不久将发生累积性下降，在彼此之间周转的数目越来越少。在每一次不景气中，我们势必要受到损害。

但是，收入流量这种危险地趋于停顿的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在文明社会中，我们不会冻结自己的积蓄。我们会用自己的积蓄来购买股票或债券，或存入银行，这样就可以使这项积蓄再次被利用。这就是说，如果用以购买新股，就是把积蓄直接供厂商使用；如果存入银行，就可以由银行贷给需要资金的厂商。无论存入银行或购置保险单或有价证券，使这些积蓄通过工商业活动再

次投入流通的渠道总是畅通的。当我们的积蓄被厂商所接受和使用时，它就会重新转变成某人的工资、薪水或利润。

但是，要注意到的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储蓄——投资渠道绝不是自动的。厂商在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储蓄的协助来经营它的业务的，它是在正规预算内进行活动的，是在售货的收益内支付它的开支的。厂商只是在扩大它的经营范围时才需要储蓄，因为，它如果要建立一个新厂或增加大量设备，通常的收益往往是不足以应付的。

困难的根源就在这里。节约成风的社会，总是要在它收入内试图把一部分储蓄起来。但经济并非一直是处于要扩张的境地。当经济的前景不妙时，不管其原因是某一特有市场上的"大量过剩"，还是由于国际形势紧张，或者是因为厂商对通货膨胀心存疑虑，或者是因为别的其它原因，投资的冲动就会减弱。当厂商对前景感到忧虑时，他怎么还会扩张他的事业?!

发生萧条的可能性就在这里。如果我们的储蓄没有被厂商用于扩大投资，我们的收入就必然要下降；就像我们大家用窖藏方式把积蓄冻结起来时所处的情况一样。

这样的事态会不会发生呢？下面还要谈到。目前要注意的是，这是个奇怪的、不动感情的"拔河游戏"。这里没有贪得的地主和资本家，有的只是善良的平民，他们谨慎地要从收入中节约一部分，还有同样善良的厂商，他们同样谨慎地在精打细算，处于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冒险从事购置一台新机器或增建一个新厂，有没有充分理由和获利的保证。可是，经济命运的为荣为枯，就要看对这两者敏感的抉择的结果如何而定。如果作出的抉择脱了节——比如说，如果厂商的投资额低于社会作出的储蓄额——那么，整个经济将经过一次萧条的折腾来再整乾坤。萧条或繁荣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取决于这一点，即主要取决于这一点。

我们的命运因储蓄与投资的一起一落而易遭挫折，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经济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在苏联或法老时代的埃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在用法令来规定一切的经济下，储蓄和投资是由上面决定的。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由上面全面控制，就可以保证使全国的储蓄刚好是构造金字塔或发电厂所需要的金额。但在资本主义世界却不是这样。因为，关于储蓄的决定和投资的促进，都是由经济行动者自己主张的。由于作出决定时是自由的，所以会发生脱节现象。会发生的现象是，投资过少，远不足以吸收储蓄，或储蓄过少，远不足以供应投资。经济自由是极其值得向往的，但是在萧条和繁荣中必须准备面临可能有的后果。

谈得很多，我们几乎忘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货币论》。但是并没有忘记得干干净净。《货币论》对储蓄与投资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其中的见解并不是凯恩斯所独创的。有好多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商业循环中这两个因素的关键作用。但是，他所写的像他所写的别的作品一样，单是对经济学提出的抽象理论，即足以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例如：

> 人多以为世上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出于各个人的节制行为，他甘愿放弃从消费中获得的眼前享受而为将来更大的享受着想，这种行为叫作节约。但是要晓得，单是节制行为，就其本身说，是不足以建立城市、开辟田园的。
>
> 建设和改进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的是企业。如果企业在进行着，是活跃的，不管节约方面的情况如何，财富就会积累起来；如果企业处于睡眠状态，不管你在节约上如何努力，财富将趋于萎缩。

上面在《货币论》里作出的分析，尽管很高明，但是它刚被写出(在比喻的意义上说)就要被撕去。因为储蓄与投资的跷跷板理论漏掉了一个要点：它没有说明，一个经济在长期萧条中怎么能依然

存在着。实际上，跷跷板这一比喻本身就表明，处于在重压下的过剩的储蓄，就好像在相当短时期内必然会自动地跷向那一方，从而恢复正常。

储蓄和投资——节约和创业并不是完全互不相关的经济活动。正相反，它们在市场上是拴在一起的，厂商从事于"购买"储蓄，或者至少在金融市场上借贷储蓄。储蓄跟别的任何商品一样，有它的价格：利率。因此（比方这样说），当不景气处于低谷时，储蓄泛滥市场，其价格将低落，同鞋子过剩时鞋价将下跌的情形一模一样。当储蓄的价格下跌（利率趋低）投资将受到鼓励而增加：某人想建一新厂而筹措资金的代价是10厘因而觉得成本过高时，现在只须5厘即可筹得这笔资金，在他看来建厂的前途就有利得多了。

因此，根据跷跷板理论，商业循环本身似乎存在着一个安全开关，当储蓄过剩时，借起来会便宜些，从而使商业受到鼓励，增加投资。根据这个理论，经济也许会收缩，但收缩之后，肯定会弹回来。

但是，1929年大萧条，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不起作用。利率降低了，但是市场上不起反应。于是一些老秘方都提出来了，有些可以收局部治疗之效，有些是大剂量，但是不论把什么药投下去，病人仍无起色。从它的逻辑而论，总能使储蓄和投资的跷跷板恢复平衡的利率机制，要顺畅运转，显然还缺少些什么，还需要别的一些什么，才能使经济恢复正常。

凯恩斯的杰作已经酝酿了一些时候。1935年他写信给肖伯纳（出于肖的建议，他刚刚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重读一遍，觉得无甚兴趣）"您得知道，我的想法是，我相信，这里正在写的一本关于经济理论的书，在人们如何考虑经济问题的方面，将引起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在下一个10年期间。在现阶段，我不能指望您或任何别人会相信这个说法。但是在我自己，我不只是希望，而是十分肯定，我说的不会错"。

他是一向不会错的。这本书问世后简直是爆发了个炸弹。至于肖伯纳——如果他认真读过的话——是不是这样想，则深可怀疑。这本书有个严峻的标题——《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内容则更加严峻。书中第25页说，"设Z为雇用为数N之人所产产品之总供给价格，则Z与N之关系，可写作Z＝Φ(N)，可称之为总供给函数"；人们可以料想，肖伯纳是瞪着眼看这一段的。如果这还不足以使大部分人望而却步，那么还有一点，作为一个外行人，在阅读斯密、穆勒或马克思的著作时，预计会看到的对社会活动的全面观察，在这里会感到极端缺乏。书中也间或出现一些精彩的段落，就像出现在代数与抽象分析之沙漠中的绿洲，其中有一段把选择股票绝妙地比作在选美大会上挑选优胜者。

然而，这本书却是革命性的，再没有比此更适当的说法。它与《国富论》和《资本论》一样，在经济学领域内都是第一流的。

《通论》的结论使人吃惊，也使人沮丧。说到底，经济是没有自动的安全结构的！经济并不是像跷跷板那样，总是会纠正自己，而是有些像升降机，它会上升或下降，也会停在那里完全不动。它会停止在顶端，但也同样会停止在底层。换句话说，萧条也许无法自救，从此一蹶不振，像个搁浅的船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当萧条达到谷底、储蓄泛滥市场时，难道不会压低利率，从而使厂商受到鼓舞、利用廉价资金扩大它的工厂吗？

凯恩斯根据经济生活中最明显、最简单的事实，发现了这一争论的缺陷：**当萧条处于低谷时，根本不存在储蓄泛滥市场这一事实**，因为当经济发生混乱时，其收入将收缩，这时一些储蓄都被挤出来了。当人人都处于困境时，怎能指望在这个社会从事储蓄的，会像人人都处于顺境时的那么多呢？凯恩斯说，十分明显，这是不可能的。萧条的结果，不是储蓄过剩而是储蓄枯竭，此时的储蓄不是泛滥成灾，而是不绝如缕。

事实上也是这样。1929年美国居民从收入中储存了37亿美元，1932和1933年实际上无所储存，甚至还把这几年以前的储蓄提出来应付需要。起初，公司在缴税与支付股利之后还隐藏了26亿美元，3年后发现它们在这笔帐上反亏损了60亿。很明显，凯恩斯的说法是对的，储蓄是一种奢侈品，是经不起艰难时期的考验的。

储蓄减少的更大的后果，远比由这一减少所带来的个人债券的损失的重要性为大。因为储蓄如果没有剩余额，对利率就没有压力，以鼓励商人进行借贷。如果没有借贷和投资支出，从而就没有扩张的动力。从而，整个经济就会寸步难进，也就是说，尽管存在失业员工和未利用的工厂和设备，经济仍然处在"平衡"的条件下。

这就出现了"丰裕中的贫困"的难题和失业与资源闲置并存的异常现象。当萧条处于低谷时，就会出现一种使人啼笑皆非的矛盾：一方面迫切需要商品，一方面生产不足。看来这纯粹是精神上的矛盾。经济的作用，不是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谈到需要往往是一种梦想，是没有限度的。经济所生产的商品是用以满足需求的，而需求是以人们所拥有的货币为限的。因此，失业在经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无异是一赘疣，他们为市场作出努力时，有如水中捞月。

要知道，投资额下降，经济规模缩小，社会即陷入苦难中。但是凯恩斯指出，这不是实在的社会苦难。国家的同情不能成为充分投资的一个实在的代替者。由于储蓄是与投资一道减退的，经济的流动仍然是平稳的，数额尽管比过去所惯有的减少这一事实，对此，并没有任何影响。

这诚然是个特殊事态，尽管是一场悲剧而其间并没有一个坏人。储蓄显然是个人之间的事，没有人能为储蓄方面发生的事故

而归咎于社会；要责备厂商为什么不踊跃投资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是如果他们看到有机可乘，比谁都更愿意争先进行。这么说来，困难所在已不再是个精神上或道义上的问题，其间并不涉及公道、剥削或人性的愚昧等等。这是个技术上的困难，差不多是个机械性的错误。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却不会因此稍低。代价不是别的，是失业。

就在这里，存在着最难解决的一点。投资愿望是不可能无期限地持续下去的。投资迟早会趋于收缩。

一项工业，在任何时候，总是以它所供应的那个市场的范围为限的。试以19世纪60年代时的铁路为例，其时建筑新路需要巨大投资。早期的那些巨头，并不是为1960年的市场供应需要。假使他们为百年以后的经济铺设轨道，那就是在无人烟地区为不存在的城市构筑连接线，没有人会干这样的傻事。因此，他们所构筑的只是当时对他们有用的路线，这一点满足以后就不再进行。汽车工业也是这样。亨利·福特于1910年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建立一个1950年的劳奇河分厂，他将由于过于性急而宣告破产，这是由于公路、加油站和那么多汽车的需求，当时都不存在。再从离我们现在更近的情况说，1985年，美国商界花费了3,000亿美元来增加它的耐用设备，然而，它却没有增添5,000亿元的设备，虽然，某一天，它会肯定这样做。原因就在于，在1985年，没有人能够充分利用如此多的设备。

投资趋势似有一个固定的格局：开始时急切地要利用新的机会，然后就小心谨慎以免盲目投资导致生产过度，接着，当市场暂时饱和时，投资便告终止。但是，如果每一投资项目停止之后，都有另一项目接踵而来，那么萧条就不会发生。但是，事实不一定如此。人类欲望无限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投资都是有利可图，大量企业由于轻率或盲目扩张而倒闭的现象是举目可见的。投资

需要的不仅仅是预期前景乐观，它还需要某些具体的东西，如新的发明，更好的制造方法，能够吸引公众的新奇产品等等。然而任何企业家都会告诉你，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

所以，当某一投资项目结束后，不大可能有另一项目立即取而代之。如果有投资项目出现，并能维持原有投资规模，即使是改变了投资构成，也可以使经济平稳运行。但是如果每项投资结束后，没有其它投资替代，衰退就必然发生。

正是看到了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脆弱性，凯恩斯写道：

> 古埃及无疑由于它所拥有的巨量财富而双重有幸。它同时从事两种活动，一个是建造金字塔，一个是搜罗贵金属，贵金属是不能适应人们消费的需要的，却由于它在从事建造金字塔活动，因此不致被堆积起来变为废物。中世纪时造大礼堂和唱挽歌的情形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大人物死后造两个金字塔或做两次弥撒，岂不好上加好；但是，如果从伦敦到约克郡造两条铁路，就不能这样说了。

于是，《通论》得出了如下的悲观判断。

第一，处于萧条中的经济很可能继续停留在那里，其间并没有内在于经济机制中的力量能把它拉出。

第二，繁荣有赖于投资。如果用于资本设备的商业支出下降，则衰退的螺旋将开始作用。只有当商业投资上升时，随之而来的才会是扩张的螺旋。

第三，投资是经济中靠不住的原动力。从而资本主义的核心存在着不确定的、非安全的因素。由于非商人所能负责的过失，投资经常会发生饱和状态，而饱和即意味着经济收缩。

总而言之，经济是在崩溃的阴霾下生存的。

当然，这里的景观是不稳定的。但凯恩斯不是那样的人，作了一番悲观的判断之后就撂下不管，不再去想它了。他尽管作了凶

恶的预言，《通论》却不是一本谈世界末日的书。他作出了诺言，提供了治疗方案。

事实上在药方尚未开出之前，治疗已经开始，在医师尚未能确定症结何在时，已经在下药。在美国执行所谓新政的百日之间，在20年来受到政府的漠视之后，颁布了许多社会法规。这些法规的用意在于，对一个受到挫折的国家，改变一下风气，振作一下精神。但它不是一个使病人得以起死回生的社会法规。这帖补药是另外一些东西，是主动进行的以刺激经济的政府支出。

在开始时，政府支出只是权宜的救济工作。其时失业达到了这样严重程度，以致迫切需要采取纯政治行动——总之，这个时候迪尔本新近发生了暴乱，在华盛顿发生了衣衫褴褛者的游行，有些人麇集在市办焚化所取暖，有些人甚至在垃圾车内扒寻食物。救济已不容稍缓，于是这项工作在胡佛任内开始，在罗斯福任内将它变成"在草地上耙树叶"的工作，然后又变成建设性业务。政府自己突然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投资者，所经营的有公路、水堤、礼堂、飞机场、港口、住房建筑等等。

凯恩斯于 1934 年来到华盛顿(就是他对罗斯福总统的一双手特为记下他的印象的那一次)，他竭力主张进一步扩大方案。统计证明，私人投资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由扩大商业而来的工资、薪水和利润，于 1929 年计 150 亿美元，于 1932 年降低到骇人听闻的 8.86 亿美元，一共降低了 94%。这时总得出些力，来发动这个"投资引擎"，以便把这辆"经济列车"从陷井中拉出来。他希望通过政府的花费会起到这样的刺激作用，从而为全国的一般购买力打气；在那个时候，把这种措施叫作"起动水泵"。

因此，《通论》于 1936 年问世时，它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项新的、激进的计划，不如说是为一种已经采用的行动步骤进行辩护和解释。《通论》清楚地指出，美国——实际是西方整个世界——所面

临的，不过是商界方面缺少足够投资的结果。因此，所作出的补救办法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假使商界未能进行扩张，政府就必须代为进行。

下面是未全照原文引录的凯恩斯所说的一段话：

> 假使财政部用一些旧瓶装满了纸币，把它们以适当的深度埋在废弃的煤矿里，在上面堆满垃圾，然后根据业经反复考验过的自由放任原则，让私营企业把纸币重新挖出来，那时就未必再会有失业情况；再加上由此发生的影响，社会的实际收入，很可能比目前将有大幅度增加。当然，比较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建造房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业；但是，如果这样做时有实际困难，那就还是无所作为的好。

在某些人看来，那些比较非正统的政府项目，其中有许多并不比凯恩斯想入非非的建议高明多少。但是在上述计划后面有一个理论基础：如果私营企业发现自己对某一事业无法以规模足够大的投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政府就得挺身而出，力助其成，此时对刺激因素是具有那样的必要性，几乎任何行动总比袖手旁观的好。

如果投资不能直接起刺激作用，那么，至少消费是能够起这个作用的。投资固然是经济体系中一个捉摸不定的因素，但消费却是经济活动中一个坚实的底层。因此，一般认为用振兴署计划来解决问题是具有一箭双雕作用的；它既可以帮助维持，否则将因失业而不复存在的购买力，又可以使私营企业重新走上扩张的道路。

凯恩斯于 1934 年在亲自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里说，“我是按照下面的观点看经济恢复问题的：正常的私人企业什么时候才会出来起到挽救作用？在它尚未出来的期间，不正常的政府支出，要在什么规模上、用什么权宜之计、经过的时间要多久才是适当的？”

要注意“不正常”这个字眼。凯恩斯并不认为政府计划是对商业活动的永久性干预或者别的什么事物，他认为，只有当体系已经滑出轨道、正在挣扎着希望恢复正常时，由政府从旁助一臂之力是可以的，此外都是不对的。

这似乎是常识的精髓，实际上也确是常识的精髓。意在诱导致力发展经济的政府投资，从来没有能导致计划者所希望的结果。从 1929 到 1933 年间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徘徊于 100 亿美元左右，后来提高到 120 亿到 130 亿，然后于 1936 年提高到 150 亿。私人投资这时力图振作，恢复了所失去的阵地的三分之二。私营企业于 1936 年投资约 100 亿。于政府参加投资的 3 年之后，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上升了50%。可是失业现象历久犹存，不过比较易于处理些，尽管如此，找不到工作者，其数仍然至少有 900 万；很难说这是新经济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

政府所提出的疗法为什么没有发生更好的作用，其间有两个原因。第一，政府的投资计划从来没有贯彻执行到使经济得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后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开支上升到高得异乎寻常的 1030 亿美元，由此不仅带来了充分就业，而且带来通货膨胀。但是在 30 年代的和平时期结构中，这样的不顾一切的支出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际上即使是政府有节制的投资支出，不久还引起了贼贼喳喳的议论，说联邦政府所行使的权力超过了传统界限。使事情更糟的是，联邦储备局在通货膨胀（在衰退的谷底时！）与失业之间，更害怕前者，于是，所确立的政策是限制银行贷款。

第二个原因是与第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凯恩斯和政府支出者都没有考虑到，这帖新药的受益者会把它看成比疾病本身还要坏。政府投资的用意是在于对厂商帮一手。而商界则把它看作一种威胁的表示。

这也是不足奇的。所谓新政是在反商业高潮中开始的。实际是，已成为神圣的“价值”、“标准”一类词突然受到怀疑和批评，认为须加以仔细研究。关于“经商权”、“财产权”和“政府的任务”这些概念都发生了猛烈的动摇。在几年之内，对商业的要求是忘记过去的传统，采取与工会合作的新的哲学观念，接受新的规章制度，过去的做法有许多应加以改革。这就难怪要把华盛顿政府目为有偏见、不友好的、彻头彻尾的激进派。在这样的气氛中，也就难怪，从事于大规模投资的那种热情，将由于心神不定和对社会风气的隔膜而受到阻抑。

因此，政府每一次想肃清所有失业者的大规模计划（原来的计划规模也许比实际上所进行的要大出一倍）都会被指斥为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的又一明证。同时，政府确曾采用的一些折衷措施，恰好足以把厂商吓退，使他们本来想进行的大规模努力也裹足不前。这个情况跟医治病人很相似，药物治愈了一种病，其副作用却引起了患者的另一种病。政府支出从来没有真正医好经济上的创伤，这并不是由于在经济理论上有失误，而是由于在思想上会起搅乱作用。

这并不是说政策本身会起搅乱作用，而是说这个政策是在走投无路时逼出来的，不是从容设计出来的。假使政府不要一上来就打开公共投资这道闸门，则私营企业最终必然会重新走上它的阳关大道。过去的情况总是这样的，这次的大萧条尽管比以前严重，但总有一天会找到表现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的新途径。但是要它这么静候着是不可能的。美国人民已经等待了足足4年，他们没有心情再等下去了。不仅是发生了动乱事件，而且纷纷议论，啧有烦言。马克思的呼声比前更高，有很多人认为失业现象就是个证明，证明马克思的话是对的。凡勃伦所咕哝的专家治国论一时也甚嚣尘上，他们所求索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工程师。还有个更

加使人听了要感到寒心的论调，有人一再指出，即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知道怎样对待他们的失业问题。在这一片议论纷纭和宁可铤而走险的绝望挣扎中，凯恩斯在《通论》中的语调，相形之下，肯定时比较中允的，是可以使人放心的。

凯恩斯虽然拥护"计划资本主义"政策，但不反对私营企业。他在《通论》里说，"与其把极权统治的手段施之于同胞的银行存款，不如施之于自己的存款"，他又说，政府只应关心为它自己提供充足的投资，至于经济的大量活动，尽可以也应当让私人来进行。现在回顾起来，《通论》并不是在主张激进的解决办法，而是在说明为什么势难避免的补救办法会奏效。如果对毫无生气的经济无限期地听它放任自流，则政府的无所作为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比大胆的非正规行动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真正的问题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写了一本书，叫《通向奴役的道路》，尽管其内容有夸张之处，对过度倚重计划的经济却抱有真诚的愤懑不平之意。凯恩斯对此深表同情，他也喜欢这本书。但是，尽管加以赞扬，他写给哈耶克的信里却说：

>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要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无计划，甚至也不是少订计划，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几乎可以肯定，我们需要更多的计划。但是在某一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其中尽可能多的人（包括领导者和追随者）须完全怀有与您自己相同的心情。如果执行计划的那些人，在他们自己内心上、即在方针上是对头的，那么，适度地从事订立计划是完全无害的。实际上，就已经在进行的有些情况看来，已经是这样。但祸害是在于，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可以说他们所以需要计划，并不是为了要享受其果实，他们的想法恰恰与您的相反，他们所要侍奉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

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否过于天真？这就是说，行政方面的计划者处理投资时就像使用水龙头一样，可以开关自如，同时公家投资又决不用以代替私人投资，只是作为私人投资的补充。用这样的方式来管理资本主义，行吗？这一问题至今仍伴随着我们，仍然没有解决。

然而，我们对此不再评论，这将是下一章的任务。因为我们离题不管怎么远，但是在这里所论述的，总不外是凯恩斯这个人和他的信念。我们要认清的是，他的宗旨是要在想扼杀资本主义那一企图中挽救资本主义，不认清这一点将发生严重错误。诚然，他极力主张投资社会主义化，但是，即使牺牲了一个部分，他也是为了保存全体。

他在内心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一个长期赞赏埃德蒙·博克和他坚持的有限政府传统的人。他于1931年（当时这一观点还不能为许多其它人分享）写道，“我怎么会接受共产主义信条？他们把它当作圣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妄加批评。这无非是一个陈旧的课本，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也不适用于现代世界。它重视江河中的泥土，胜于江河中的鱼虾，它把粗鲁的无产阶级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他的缺点，乃是人类的精华，人类的一切成就都要依靠他们来传扬。我怎么会采纳这样一个教义”。

也许有人会同他的理论、他所作出的诊断和所提出的对策发生争辩。有些人坚决认为，对一个进行得挺好的经济体系说来，凯恩斯只不过是个无中生有的爱管闲事者。但是为了公正起见，必须说明，他们之中还没有人能提出考虑得更周到的理论、更加深切的分析和更加有说服力的治疗方案。凯恩斯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消灭失业现象（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存在，是个最大、最严重的威胁）的资本主义经济；到目前止，还没有人能否定

这个目标。

他是个不耐烦"在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的人。当他为《通论》起腹稿的时候，他自备资本在剑桥建立了一个剧场。这是个典型的凯恩斯式冒险事业。开头时亏本，两年后转亏为盈，至于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同一期间总是在干着许多事。他在金融市场上买进卖出，有票房收入可得，是一位女主角的丈夫（莉迪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极度地受到观众青睐），甚至还是某些特许权的享有者。他在剧院旁附设了一个餐馆，留心观察来就餐者因心境不同而食量各异的情况，他却以此为乐。他还设立了一个酒吧间，那里的酒售价特低，以广招徕。这大概是在他愉快的一生中最足以使他赏心悦目的插曲。

但是这段时光没有能维持多久，1937年时被打断了，那时他心脏病发作，他的活动不得不停顿下来。但是所谓停顿，只是比较而言的。他在商业活动中仍然很活跃，仍然在编辑《经济学杂志》，有时还写几篇出色的文章为《通论》作辩护。此书发表后，一位学会会员说"爱因斯坦实际上圆满解决了物理学，而凯恩斯则自以为圆满解决了经济学"。但凯恩斯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个人的，必要时他是会使用他那支尖利的笔的。于是开始有计划地、逐一和全面地驳倒他的吹毛求疵者，他使用的方式是，有时含讥带讽，间或妙语如珠，偶尔也破口大骂。他说，"X先生对我不愿意进行了解"，说这话时就像在无可奈何中发出一声长叹。

但是，战争已迫在眉睫，慕尼黑事件发生之后，情势进一步恶化。凯恩斯在《新政治家和民族》上看到某些左翼人士写的那些卑怯的书信而感到愤慨，他向该刊专栏投函说，"我断然不信世上会真有'社会党人'这样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他又说，"到了摊牌的时候，要不了四个星期，这般人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是不抵抗主义者，到那时就会用失败主义者的口吻向你刊投函，把保卫自由和

文明的职责，推给漫画中人物上校毕林甫和守旧派塔埃，然后为他们欢呼三声"。

当战争爆发时，他因病不能担任政府中的固定成员。当局为他在财政部安排了个房间，请他随时设谋献计。他这时又已写了一本书《如何筹措战费》，提出了"扣存储蓄"这一大胆的计划，以此作为筹措战费的主要手段。计划很简单，将每个人工资的一部分自动地投资于政府债券，此项债券规定于战后偿还。结果是正当消费者开始需要有所购入时，此项证券即可以兑现应用。

强制储蓄——这与早期要努力实现的强制投资对照，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变化是由于境况不同，而不是由于凯恩斯在思想上有了什么转变。旧问题是投资过少，其症状是工人失业。新问题是投资过多，全力从事备战，其症状是通货膨胀。但《通论》的实质是，既可用以理解通货膨胀，又可用以理解膨胀的对立面——失业。只是前后的情况颠倒了一下。现在是每经过一次周转，拿出来的收入就有所增加，而不是有所减少。因此，所开的药方与萧条时所开的恰恰相反。凯恩斯起先主张的是，要用尽一切方法鼓励投资，现在他却主张增加储蓄。

有很多人误以为凯恩斯是个赞成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所以指出上述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经济处于萧条的深渊时，他确曾主张"通货再膨胀"（他极力主张扩大收入来源而不是提高价格）。但是，如果认为他赞成为膨胀而膨胀，是无视他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里所写的如下的一段：

据说列宁曾说过，要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是，先从破坏它的通货入手。通过通货的持续膨胀，政府可以在暗暗的、不受到注意的情况下，没收人民财富的一个很大部分。他们使用这个方法，还不仅是在进行没收，而且是在强制地进行没收。列宁这段话肯定是说得对的。要颠覆一个社会存在的基

础，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阴险、更有把握的了。这个方法动用了经济规律在破坏方面的一切潜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识破其中的奥妙。

但是，凯恩斯提出的方案尽管富有逻辑性和号召力——他极力表明，他的扣存储蓄计划，由于人人都成为政府债券的拥有者，这就扩大了财富分配的范围——却没有能获得很大支持。这是由于这个方法过于新奇，结果仍然使用了赋税、定量分配和自愿储蓄这类比较牢靠的老方法。关于收缩信贷计划，只是敷衍了一番，却从来没有像凯恩斯所设想的那样地认真实行。

但是，关于他计划的未能受到重视，他已无暇深致惋惜，现在他已完全卷入英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1941年他乘飞机经里斯本到美国。这是他 6 次这样的飞行的第一次；莉迪亚则作为他的护士和管理员随着他一道去。打从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她就担任了她不知疲倦的丈夫的计时员的职务，当规定的时间已到时，她即向她丈夫和婉而坚定地说明此意。她说，“先生，请注意时间”，于是一切活动即告结束。

他到美国所接洽的是，关于英国战时财政这个微妙的问题，以及英国在战后期间、在财政上可能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含有威胁性的问题。这里所牵涉的不止是一个英国；同时美国也想为国际贸易打下一个坚实基础，以免发生金融上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引起了真实的作战。计划中将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货币在国际流动中的监护者，用此来代替狗咬狗的旧世界。在那里，每个国家只是想扼杀对方。希望以后将发生一种新的协作精神，当某一国家在财政上发生困难时，别的国家即群起相助。

最后一次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凯恩斯当时虽然因有病而感到疲乏，主持这次会议的显然是他。这并不

是说他的观点在会上占优势，实际上会议中得出的最后方案，接近美国观点的程度，远远超过英国，这里是根据他在个性上的表现而言的。当时的代表之一，在他日记里对凯恩斯在那个时期的表现，作了细致的描绘：

> 晚上我参加了布置得特别精美的一个庆祝会。今天是剑桥皇家学院与牛津新学院订约500周年纪念，凯恩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在他屋子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他像个孩子一样，对这件事已经盼望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时显得极其高兴，即席发表了动人的讲话。这位特殊人物的性格极其复杂，是个耐人寻味的典范，他在纯理智问题上显得有些激进，但在文化问题上是个真正的伯克式保守主义者。所说的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是与这里的气氛很适合的温文尔雅的表现，但是谈到我们国家的债务问题时感情激越，确是很动人。

凯恩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的最后致词中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次有限度的任务，如果我们能继续完成更大的任务，那就是世界的希望所在。”全场起立向他高声欢呼。

他向来是这样，一面在主要工作上努力，一面总有些小型活动。他已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又是新成立的关于音乐与文艺的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因此，他一方面承担着向国际经济会议提示英国方面的观点这一重任，一方面与一些流动的音乐团体、诗歌朗诵集会和图书展览等不断地保持着联络和通讯。有一次他为福尔杰图书馆觅得了斯宾塞著作的一个珍本，他向馆中人说明，为了取得这本书，是负了小小罪责的，是利用了外交部邮袋寄来的。

这时一切荣誉源源而来。他被提升为贵族，现在称作凯恩斯勋爵了，正式称呼是蒂尔顿男爵。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在中年时买进的一块地，往年曾为凯恩斯家系中的一支所拥有。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以及他自己肄业过的大学，都以名誉学位相赠。同时

他又是国家美术馆的理事。此外还有任务，英国所欠债务必须与对方进行谈判，作为代表提出英国的见解的，当然又落在他的肩上。当他出行一次回来之后，一个记者问他，是不是英国当真要成为第49个州，凯恩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没有这样好的运气”。

1946年，苦难的经验已经过去，他回到苏塞克斯，从事阅读和休养，并且打算在剑桥重度教学生涯。一天早上，莉迪亚突然听到他一阵咳嗽，赶忙飞奔到他身边，此时他已经瞑目而逝。

丧礼奉行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时年93，他的母亲，弗洛伦斯，也已奄奄一息。他们尽管满怀悲痛，但是生出这样一个儿子的，世上究竟能有几人。全国为失去一个重要领导人物而哀痛，正在最需要他的智慧和才干的时候，他却一去不复返了。《泰晤士报》于4月22日一篇漫长的讣告中说，“他的逝世，使国家失去了一个伟大的英国人”。

他毕竟不是个天使。这位才华焕发的大经济学家不过是个凡人，虽然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也有任何人所必然具有的缺点和弱点。他会在玩桥牌时从两位伯爵夫人和一位公爵那里赢得21镑而高兴得大叫大笑。他在阿尔及尔会克扣一个擦皮鞋者的钱，而且拒不承认错误，说“我不是会伪造货币的那种人”。他对待一个思虑迟钝的学生会非常和蔼（他说，一个经济学家就像个牙医生那样，要谦卑谨慎），而遇到一个他觉得与他气味不相投的商人或高级官员，就往往会无端引起他的反感，对他声色俱厉。有一次，国立地方银行行长哈里·戈申爵士说了句刺耳之言，劝他“遇事还是听其自然的好”。凯恩斯回答说，“遇到一类无谓情绪的触发时，要笑就笑一阵，要怒就怒一阵，难道这样倒好吗？也许最好还是让这位哈里爵士自己去实行他的所谓‘听其自然’原则吧”。

当他不是为自己写照时，却提供了关于他自己的才能的一些线索。他在谈论他的老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他在爱戴中带

着爱昵的口气，嘲弄他是个“迂阔的老夫子”）说明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

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有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是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精通的是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他必须善于运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断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既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时必须保持着既不是无所为而为之，又不是无偏无倚的态度，像个艺术家那样地头脑冷静和孤芳自赏，然而有时也必须像个政治家那样地接近尘世环境。

凯恩斯说，由于马歇尔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缺乏破坏传统观念的精神，因此他的经济学没有能渗透到社会内层，只是接近于这个完美的典型。凯恩斯却比较近似于这个理想。他具有伦敦文化集中区中的人那种“无所谓神圣”的态度，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经济学正统观念的思想境界中。于是社会再一次被置于这样一个人的注意力的焦点之前，此人并不是那样盲目的，以致看不到其间的病态，同时在感情上和智力上又不是都不沾边的，以致无意于进行治疗。他既精通经济学，在政治上又有一片热忱，他既有技术上的头脑，又具有满腔热情，他之所以伟大就在这里。

第十章 约瑟夫·熊彼特的自相矛盾

1930年，当大多数人为深重的经济萧条而忧虑之时，凯恩斯却构思着一种色彩完全不同的观念以自娱。虽然他自己曾表明，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掉。但他还是以余光注视着未来，一个长远的未来，而且他所作出的预言与当时关于经济停滞的一片吵嚷截然不同。凯恩斯放眼未来所见到的，除了难以控制的人口浪潮以及毁灭性的战争灾难以外，并不是目前苦难与焦虑状态的延续，而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前景，其美好程度绝不亚于亚当·斯密普遍富裕的极乐之土。

凯恩斯将他对未来的小小涉足称之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当然凯恩斯本人是没有这些可能性了。那么，这些可能性是什么呢？如果说得不太夸张，他暗示着一个比较美好的太平盛世。到了2030年，凯恩斯认为经济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了，而且解决的不是经济萧条的暂时痛苦，而是经济问题本身，即长期的供应不足的现实。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至少对于英国人是如此，将从与短缺的斗争中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从社团议会桌上，得到慷慨的帮助。

这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上的、典型的凯恩斯式冲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举世陶醉于自我庆贺的光彩之中时，只有凯恩斯在密室中把骷髅弄得咕咕作响。在30年代中，当举世转为自艾自怜时，同样只有凯恩斯大胆地指出阵痛即将终止。并且，他不是只在黑暗中吹吹口哨而已。相反，他是在研究过去所有伟大的计划家所致力于研究的经济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成长趋势。

在大萧条时期,这个趋势往往受到忽视。但是,回顾过去资本主义200年的发展,这个体制的特征,并不仅仅是欢欣的繁荣和沮丧的萧条之间毫无意义的交替过程,而是呈现一种稳定、而又不规则的上升趋势。当然,凯恩斯时代的4千万英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未来丰裕的捐助人,但是尽管他们经历了时代的艰辛,在大自然的餐桌上,他们毫无疑问比马尔萨斯时代的1千万英国人享受得更多。

这并不是大自然本身变得更慷慨,相反,著名的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得很清楚,当大自然被更集约式地开发后,她越来越吝啬地奉献出财富。事实上,经济增长的秘密在于,每一代人不仅以其自身的精力与资源去开发大自然,而且要利用先辈积累下来的生产设备遗产。随着这份遗产的不断增长(这是由于每一代人都在过去的财富之上添加一份新的知识、工厂、工具和技术),人类的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世纪60年代美国工厂的工人,每人每小时的生产量相当于南北战争时期的5倍以上,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工作得更卖力,或技术更熟练,而是由于他们运用的技术力量使他们与南北战争时期的前辈相比,简直成了超人。

如果生产力的这种加速增长过程再持续100年,不过三代人而已,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便可以解决物资不丰富的问题了。根据凯恩斯的计算,按照前100年的增长速度,再经过100年的财富积累,英国的实际生产力财富将增加7.5倍,到2030年,每个工人手边支配的机器会使他们与本世纪30年代的祖辈们相比成为超人。

然而,这种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将带来很多变化。它将把作为"稀缺之学"的经济学打入史册,那时,社会的新问题将不是如何寻求闲暇,而是如何去排遣那么充裕的闲暇时间。为此,凯恩斯得意地引用了一段老女杂工的传统墓铭志:

不用为我悲哀,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哭泣。

因为，往后我将永远不必再辛劳。

天堂里将响彻赞美诗与甜美的音乐，

而我甚至也不用去歌唱。

当然，这仅是对未来的一种理论奇想，没人会把它过于看重。1930年机器的响声令人心惊，所以人们只把这种设想看成愉快的梦呓而已。而且，凯恩斯本人也为了分析当时使世界陷于瘫痪的失业问题，而将它抛到九霄云外了。

但是，不管是一相情愿还是理智的推论，凯恩斯的预言对我们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书，首次使我们面对了自己未来的经济问题。在此之前，我们所考虑的所有问题，毕竟只是历史而已。不论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17世纪的专制与规范化社会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演变，还是李嘉图预言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从地主经济中脱颖而出，还是马尔萨斯所担忧的人口爆炸难以维持生计的社会，或者是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必然自行消亡的趋势，还有凯恩斯所剖析的长期萧条趋势，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预测，无论多么有趣，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历史的每个转折点，我们都知道其最终后果是什么。目前，我们处的位置并不太舒服。至于现代经济学家，他们已不再讨论有助于塑造我们历史的思想。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子孙后代的遗产等问题均摆在我们面前，悬而未决。

所以，我们必须从对过去的研讨，转向对未来的评判。今天的资本主义处于何处？它将走向何方？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极大的关注。

因此，我们将转向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大概比凯恩斯还有过之，他对我们所讲的毫无疑问都是现代问题。这个声音来自一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出身贵族的人，他喜欢戏剧散文和舞台动作，这个人名叫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

大萧条时期，他正在哈佛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大步跨进演讲大厅，脱去欧洲式的大氅，向那为之一震的课堂发出他的维也纳口音："先生们，你们都为大萧条而忧虑，其实大可不必。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萧条是一次很好的冷水浴(Cold douche)。"作为当时受到震惊的学生中的一员，我可以证实当时听众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douche"这一词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都立即感觉到，这个非常奇怪的信息，绝不是凯恩斯主义的。

熊彼特大概是第一个强调自己对经济生活的看法与凯恩斯的不一致的人。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的社会意识，他们都赞美资产阶级有教养的生活，都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在对未来的看法上，观点却截然不同。如前所述，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决定了它时常要受到经济停滞的威胁，对我们子孙后代的乐观展望，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给予恰当的支持。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动力，它会自动增长，并且认为不需要政府开支作为永久性的辅助引擎，虽然他也同意当发生萧条时，政府开支可以用于消除社会贫困。

除了他确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活力以外，熊彼特的长期展望与凯恩斯的截然相反。他以近乎怪异的取笑方式首先坚持说，在"短期"，资本主义制度也会明确显示出向上的运行轨迹，同时他指出，在这里"短期"是指一个世纪。然而他的最终结论却令人感到困惑："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生存下去吗？不！我不认为如此。"我们需要对这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人作进一步的了解。

约瑟夫·熊彼特于1883年诞生在奥地利，与凯恩斯同年出生，出身贵族，但家族并不显赫。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年后，母亲又嫁给一位著名的将军，年青的熊彼特被送进一所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学校。一般说来，年青时代去接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他世界观的形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熊彼

特很快就学会了其它同学的风度、举止和爱好，从而他的一生都带有一种贵族气质。他不止在一所大学，由于以骑马的习惯出现在教师会议上，而激怒他的同事。他总是喜欢说我只有三个愿望——一是个大情人，二是个大骑士，三是个大经济学家。这三个愿望中，生活只成全了他两个。然而在他所有的贵族气质中，我们将看到，熊彼特最终把历史的桂冠授予了其它人。然而，对于这个不得不等到本章结束的故事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小波折。

他进入维也纳大学读书，那也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科的中心。并且立即成为明星学生，著名经济学家亚瑟·斯皮托夫(Arthur·Spiethof)对他评价说，"从不是个初学者"。但他同时也是个十分难缠的学生，他敢于公开与更著名的老师庞巴维克唱反调。从维也那大学毕业后，他旅居英国，这导致了一个草率的又不太愉快的婚姻。然后为埃及的一位公主作了一段财务顾问，挣了些钱。熊彼特曾把公主的地产租金减了一半，但却使她的收入增加了一倍，成为当时的奇迹。更重要地，在埃及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这本书使他在奥地利赢得了学术地位。3年以后，27岁那年，他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立即被公认为是部杰作。

《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似乎是分析我们目前所说的不发达世界，然而在1912年，不发达世界的经济状况和问题还没有展现在人们面前，那时还是不以为耻的殖民时代。熊彼特书中所言的是另一种发展——资本主义增长的发展趋势。这本书学术味十足，篇幅冗长(虽然也不时闪烁着耀目的思维火花)，不会使粗心的读者感到其政治意义很大。但这部学术著作注定要成为另一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的基础。

书中的分析以熊彼特的矛盾方式开始，该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动态和增长，但却以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存在增长的描述开

始。熊彼特首先形象化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缺乏使其增长到斯密、穆勒、以及马克思和凯恩斯世界的最基本因素，就是说根本没有资本积累。熊彼特描述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虚无的积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产之流是完全静止不动的，只是以环流方式再现自身，永远不会改变或扩张自身以创造财富。

他的模型很像李嘉图和穆勒的静态分析，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人认为静止的状态似乎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而在熊彼特看来，静止状态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起点。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详查他的生产环流模型的特性。由于体制本身不具备动力，那么经济生活的规则就是遵循惯性。熊彼特写道："我们所有的知识和习惯，一旦掌握了，就会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就像地球上的铁道路基。"所以，一旦我们用反复尝试的方法找到了最适合我们的经济进程，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惯例而不断重复。经济生活开始时可能是一种挑战，但它会变成一种习惯。

更重要地，在这个永无变化的生产环流中，竞争将会使任何人的收入等于他对产出品作出的贡献的价值。这意味着雇主之间的竞争将使他们对雇佣工人支付其所创造产品的全部价值，而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同样只能以地租形式收到产品中来自他们拥有的资源的价值。可见，工人和土地所有者都将从生产环流中得到各自的份额。资本家如何呢？又是令人吃惊的结论，资本家除了作为生产管理者的工资以外，将一无所得。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品在产出品中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归纳为制造产品的劳动的价值，和产品所含的资源的价值。因而，恰如李嘉图和穆勒所预见的，在一个静态经济中，没有利润的位置！

为什么熊彼特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不要说扭曲的——我们制度的形象？也许我们已经猜到了这种手法背后所要达到的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静态模型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利润是

从那里产生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谨慎地研究过利润的源泉这个问题，斯密的观点在利润是劳动所创价值部分扣除，和利润是产生于资本自身的某种单独收益之间摇摆不定。显然，如果利润是劳动所创价值的一部分，那么这种解释就意味着劳动者是被蒙骗了；如果利润是来自资本的贡献，那么就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利润归于机器的所有者，而不是归于它们的发明者或使用者。穆勒认为利润是资本家节欲的报酬，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资本家这种显然是自己情愿去做的事情要得到报酬。当然，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第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他并不了解利润的确是来自劳动者所创造的实际价值的一部分，这是人人皆知的错误的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所以不必再考虑。

熊彼特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精彩的答案，他认为利润既不是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也不是来自资本的收益，而是产生于其它过程。**在静态经济中，如果生产环流改变了其固定的路线，利润便产生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个极不实际的生产环流是个非常精彩的起点，在所有能打破固定流向的因素中，有一个最为重要，那就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创新，比如新的和更经济的制造方法，或者是全新产品的制造方法。**创新的结果会产生新的收入之流，这部分收入既不能归于劳动，也不能归于资源的所有者。**这个新过程能使创新的资本家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与其竞争者相同的产品，这种情况如同肥沃的土地使其所有者能以比贫瘠土地的所有者更低的成本生产粮食的情况一样。那么，如同幸运的地主，创新的资本家从成本之差中，获得了“地租”。但是，这个地租不是来自上帝所赐的土地位置和肥沃程度，而是来自创新者的意识和知识。并且，一旦其它资本家也掌握了开创者的诀窍，它

就会消失。所以，这个收入之流不是什么或多或少永久性的地租，而是瞬间即逝的利润。

创新就意味着有创新者，他们把生产要素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他们显然不是按常规行事的一般企业家。这些使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人属于另一个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另一个集团，因为创新者可从任何阶级中产生。熊彼特使用了一个旧经济名词来形容生产中的革命家，他称他们为“创新者”（entrepreneurs）。创新者和他们的创新活动，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利润的源泉。

《经济发展理论》绝不仅仅是对创新者的赞歌，熊彼特从发明创造对生产环流的影响分析中，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利润的源泉，而且找到了利息和信用的源泉。除此之外，还解释了经济周期。熊彼特指出，发明创造是先驱者的活动，但是领导者毕竟很少，而且很难。可追随是很容易的，紧跟发明家后面的是一大群熊彼特称之为“模仿者”（imitators）的人。于是，最初的改进会在行业中推广，同时大量的银行借款和投资支出使经济达到繁荣。但是同时，创新推广的过程也抹杀了优势之差，竞争迫使价格降低到新的生产成本水平，利润消失了，生产又按固定的线路环流。随着利润消失，投资也趋下降。确实，随着一部分模仿者进行了时机不当、或引导有误的投资，衰退就要发生了。

后面我们还要继续探讨熊彼特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但目前我们还是先考查他所强调的创新者的作用，这个有趣的问题。注意，创新者本人不一定是利润的接受者，虽然他是利润的创造者。利润归企业所有者所有，如同地租归土地所有者一样。比李嘉图的资本家还有过之，熊彼特的创新家的收入份额，被他自己所启动的动态过程所挤掉。

并且，创新活动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可以世代承袭的职位，而是一种特殊的领导能力，它不像创造将军和政治家的那样富

有魅力，而是受到较低社会尊重的发现和把握商业时机的才能。

熊彼特写道："我们应当知道，创新者绝不感情用事，而这却是所有其它社会领导方式的荣耀。并且，无论单个的还是集体的创新者，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不稳定。事实上，当他们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时，他们得不到文化传统和观念上的支持，其社会地位也只是个暴发户，他们的行为被人耻笑。所以，我们应该理解，这种人永远是少数。"

那么，为什么创新者要从事不确定，而常常又是劳而无功的事业？熊彼特指出："首先，他们有去寻找自我王国的理想和意志，……。于是，就有了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要奋斗的冲动，去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他们要成功不是为了享受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最后，他们认为发明创造，完成工作，或只是把精力和想象付诸实施就是最大的乐趣。"

这是一幅奇怪的肖像，他既像凡勃伦所赞美的那种由工匠的本能所驱动的人，又像凡勃伦所极端鄙视的那种有掠夺欲的人。当然，斯密笔下的资本家绝不是为了赢得公众的尊敬而进行资本积累，马克思笔下的工商巨头也不是迫于这些复杂的压力而扩张他们的资本。熊彼特的创新者更浪漫些，像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骑士游侠。创新者本身不一定是资产阶级，但他们渴望成为资产阶级，创新者通过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注入了生机。而且，后面还将谈到，创新者所起到的作用，比熊彼特本人所精心描述的还要广泛得多。然而，这也必须等到熊彼特的理论全部曝光后才看得清楚。

《经济发展理论》使熊彼特步入了学术生涯，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曾经短期涉足政府和企业界。1919年，他同意在新社会主义德国政府建立的一个促进工业国有化的委员会中任职。一位年青的经济学家曾问他，何以一个对私人企业如此倍加

赞美的人会在促进企业国有化的委员会中任职。熊彼特答道:"如果在某人想要自杀时，有位医生出现，那可是件好事。"同年，他应邀担任奥地利新成立的中央社会主义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稳定奥地利货币，但是在计划获准实施以前，斗争和意见分歧就迫使他辞了职。计划也许不会成功，因为当时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平息不断聚集的通货膨胀的巨大冲击力。后来，他又当了一段维也纳一家私人银行的总裁，但是在通货膨胀的风暴中，银行倒闭了，当然也与合伙人背信弃义有关。银行倒闭后，他这位总裁发现自己已经负债累累，出于贵族的风度，他对债权人支付全额债务，而没有躲在破产法的后面。当然这使他赔尽了资本，而且在以后的10年中，他继续用自己的收入偿还负债。他的私生活中还有一段不幸，他娶了母亲的公寓住房监管人21岁的女儿，他们相爱已经5年了，他还送她到巴黎和瑞士去上学，以使她能成为更称职的妻子，但是婚后不到一年，她就死于难产。这个损失使熊彼特本来就深沉的个性，更加阴郁。

此后，他真正的学术生涯开始了。起初，作为访问教授他到了日本，然后去了德国，很快又到了哈佛大学，在那儿他的行为举止和他的大肇很快使他成为校园中的特殊人物。在那儿，他娶了伊丽莎白·波迪(E.Boody)，她也是个经济学家。最后还是在那儿，他宣布萧条是很好的冷水浴，这个评论至少会使一个年青学生终生难忘。

大萧条实际上是对熊彼特观点的一次验证，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从创新者的发明创造中获得能量，为什么创新者的冲动会在30年代的艰难岁月中消失?凯恩斯指出萧条反映了企业家的预期状态，但是熊彼特的理论并没有促使他去解释为什么创新情绪会如此之低。熊彼特有个更急迫的任务，他证明了繁荣和萧条是由于创新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家蜂拥而上，那么，长期萧

条的情况就必然要求他对为什么创新不能及时出现而作出解释。

1939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一书，这本书有1,000页左右，分上下两册，书中把萧条的原因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他认为，事实上存在着三种类型，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经济周期——第一种是非常短期的，第二种出现的频率为7—11年，还有第三种，50年出现一次，它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发明的出现，比如蒸汽机车和汽车的出现有关。当所有这三种周期的谷底都相互重迭在一起时，就发生了严重的萧条；另一方面原因是来自外部因素的不良影响，俄国革命以及错误的政府政策都包括在内。这后一原因不是来自经济周期理论本身，但是它无论如何会使危机加深。

这也是关于经济危机的杰出论断，虽然对企业家群起模仿创新形成经济周期的现象并没有进行严格论证。然而，人们之所以对熊彼特的这本书感兴趣，是由于其它原因。资本主义制度，像其它社会制度一样，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而生存。它还需要信仰，就是说，需要有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建立起来的文明美德和价值观的信仰。**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但是在信仰方面却日益失去其更新力量。**

同样，这本书也是以互相矛盾的按语作为结尾。就纯粹的经济根基而言，资本主义制度积累金钱的路还很长。的确如熊彼特在此书临近结尾时所说的，如果他的三种相互作用的投资周期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经济在未来30年中，肯定比以往的20年中更有活力。然而，他的最后结束语却是："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败坏趋势，却不会有所改变。"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他有关论点的暗示，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暗示变得更加明确。但是，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完整构思，是在1942年完成的，当时熊彼特发表了《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

这本书从马克思展开论述。很奇怪地，熊彼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他的学术生涯却主要是与人辩论。凯恩斯是他最不喜欢的人，熊彼特不仅与凯恩斯主义在哲学观念上完全不同，而且在个人方面，他厌恶凯恩斯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誉，而他自己却只能满足于得到学术同行们的承认。与他的风度相反，他永远不会把应属于他的声誉，授予凯恩斯。当《通论》问世时，熊彼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他是“致力于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但是又反常而令人难以理解地对此书不屑一顾，认为对它“谈得越少越好”。

但是，熊彼特学术生涯中的真正论敌不是凯恩斯，而是马克思。从学生时代开始，熊彼特就研究马克思，并参加过研讨会，与当时最著名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鲁道夫·海佛丁(Rudolph Hilferding)和奥托·博尔(Otto Bauer)共同讨论。据认为，他比任何其它西方经济学家都更熟知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他当时读过的许多马克思的著作，直到50年代才出现于欧美世界。在哈佛执教时期，他随时都乐于同年青的同事讨论马克思。的确，他对马克思比对凯恩斯更为坦率。所以毫不奇怪，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要从马克思开始论述，因为只有马克思是他真正的论敌。

马克思是预言家，马克思是社会学家，马克思是经济学家，马克思是教师，这是此书的前四章。也许这两个人的相同与不同观点已经很明显，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在于辩证的发展和自身造成不均衡状态，而这也正是熊彼特所要论述的。的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展的观点，都毫无疑问地为熊彼特提供了论据。但是，马克思把动态发展的原因归于劳动者阶

级和所有者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不间断地去争夺剩余价值，进而促使所有的资本家（不仅仅是开创者）去从事节省劳动的发明创造，以提高利润。

在这一点，熊彼特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他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另一种看法，即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产阶级一方，但确不是他们贪得无厌和掠夺成性的外表。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是对理性和享乐的企业家的文词描述，他认为企业家正是虚张声势，自鸣得意的勇士的反面。他写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演变，可以很容易，也许是最生动地比喻为我们普通衣着的起源，"这是凡勃伦式的评论。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通过它的中心形象——资本家，来获取它的全部前进动力的，而是通过一个局外人，一个外来者，即领头的创新家。马克思或者是凡勃伦，会怀疑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但这一点却是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制度剖析的关键。

我们不用再纠缠于他与马克思的分歧了，熊彼特可能不会对他的对手作出明确评价，但是很明显地，他勾划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有识之士，这个对手他必须面对，而且要在他的领域里战胜他，这正是熊彼特要做的。翻过"马克思是教师"这一章，他写道："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生存吗？"答案令人双倍吃惊，"不，我不认为如此。"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原因却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所以我们将精心描述熊彼特所说的"近乎合理的资本主义"（plausible Capitalism）。什么是近乎合理的资本主义？它很像凯恩斯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过仔细推敲的美妙预测，即实现一个世纪增长的可能性。这是熊彼特所作的最好预测，作为研究萧条的学者对投资机会消失的担心被超然放在一边，因为他认为占领空间与同获取印度一样重要。其它经济学家对垄断力量迅速扩张的忧虑他也不屑一顾，认为资本家的创造发明是打破垄断的四季强风，

而垄断者本身又同时是发明创造机构。这种状态的资本主义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论证。近乎合理的资本主义是经济体制的恰当模式，它在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实现增长。

下面又是熊彼特式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可能是成功的，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却不成功。如前所述，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创造它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有理性但又不浪漫，是关键但又不夸张，它是为普通人而不是为贵族设计的制度。然而最终，又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状态和资本主义思想会摧毁这个制度：

> "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一种关键性的精神状态，它摧毁了众多制度惯例的道德权威，而最终又会把矛头转向自身；资产阶级大为惊异地发现，理性主义者的观念不会因任何权威而停止，而是继续向私有财产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观进攻。"

所以伟大的创新事业的停止，并不是由于工人阶级起来了，或者是由于这个制度最终不能控制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仅仅是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个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强，创新活动本身变成了制度化的例行公事。作为资本主义价值观传播媒介的资产阶级家庭，也染上了理性主义的疾病，资产阶级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于是，当一切事情表面上都运行正常时，"已产生了一个通向另一文明的潮流，它在潜层中慢慢地发挥作用。"

我们再一次翻到下一页："社会主义行得通吗？当然行得通。"

这完全是熊彼特式的社会主义，温和的、官僚统治的计划经济，我们将在后面简要评论。应注意，熊彼特论点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是在马克思的范畴中击败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能否生存，这个看起来是争论的关键问题上，他向马克思投降。但是他证明，至少是提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于熊彼特的原

因，而不是马克思的原因，在这方面他击败了马克思。马克思得到了一切荣誉，但是熊彼特的观点却是得胜了。

是这样吗？这个问题之所以极其重要，不仅是赞扬熊彼特，而且是因为作为熊彼特正在描写其命运的社会的居民，这一预测与我们息息相关。

首先，这里有一个欣赏和怀疑相混合的耀目现象。不论熊彼特是在捏资产阶级保守分子，还是在捏马克思主义狂热信徒的鼻子，他毕竟有点装腔作势。他在书中散布了那么多奇特的观点：马克思是个大保守主义者；垄断可以扩大高智商者的势力范围，可以减少低智商者的势力范围；一个国家越是全盘资本主义化，就越是不具有侵略性，这个论断会使研究19世纪大英帝国，和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学生感兴趣。

所有这些观点必须合理地归纳，以反映他的完整看法。这些论断具有权威性吗？巨大的未开发的技术领域，经济和政府部门的不断官僚化，资产阶级道德和精力的逐渐减弱和消失，所有这些展望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前景吗？请记住，这本书发表于1942年，作为预言家，熊彼特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当代左派分子作出草率的预测，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当代中间派则天真地希望，他们确信适度的政府开支可以立即，并且永久性地解决一切问题；而当代右派则作出凶险的预测，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走向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论断使所有这些预测相形见绌。

然而，熊彼特的预测也并不都正确，如仔细推敲，就不像起初那么令人信服。毫无疑问，熊彼特正确地预见到一个广阔的技术领域前景，但是他没看到技术的质量方面，从核武器、核能源，到计算机化，都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投资领域形成巨大的威胁。他预测到大企业的官僚化会迅速增长，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他认为巨大企业的崛起会使它们的进取性削弱，是不正确的。当代巨大

的跨国公司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壮观场面，与熊彼特预测的资本主义扩张动力萎缩现象完全相反。

那么，扩张力的衰退，以及信念的丧失，真会推翻资本主义世界吗？如果我们处于60年代末，这种预测就的确显得有些远见。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在明显地趋向于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但是20年以后，这种预测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我们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信念的复苏。因为，向更高程度的计划体制迈进时，开始促进增长，然后是通货膨胀，最后对计划过程本身的信念也丧失了。当今的形势并不是静静地等待熊彼特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来临。

当然，熊彼特描述的是长时期，而我们用短期的时间间隔去批评他。资本主义信仰的复苏很可能被证实是短期现象，而形成某种模式的温和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势可能恢复。也许，官僚集权化的演变趋势最终将利用企业的主导地位，巨大的跨国公司合作结成巨大的卡特尔，把世界分成若干私人经济王国，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

这些不过是推测，并且熊彼特的构思也的确是种推测，是一种模式的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不是唯一的一种。他的构思光彩夺目，但并不是从李嘉图、斯密或马克思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体制。**因为熊彼特的预测并不完全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一系列往往是很精辟的论证，而这些问题却不一定能使斯密和马克思建立起他们可畏的理论。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对破坏这一前景起着极大的作用，因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遵循资本家积累资本和商人互相竞争的相同法则。如果企业家认为他们的活动得不偿失的话，他们会向文化，而不是经济压力屈服。熊彼特的最后结论确实是令人振奋的，即经济过程本身不足以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

对他的构想，不能用对其它大思想家的同样标准去评判，他的构想与其说是经济预测，还不如说是历史预测，或者说是对文化发展方向的判断。熊彼特有贵族的气质、孤傲的学者风度，以及政治和商业上的实际艰难经历，所以他应该是评判事物发展趋势的最好人选。对凯恩斯来说，世界性的成功来得太容易了，而对马克思来说，事事都不如意。然而，他获得了敏锐的洞察力，却丢掉了曾使古典预言家们赋有想象力的严格的经济逻辑。

熊彼特理论的涉及面很宽，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对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思想家的伟大成就无非在于他们能够推断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经济学的建立，也在于它大体上能够预测未来。然而，熊彼特的构想却使这些都成为过去，就是说，无论经济学能否作出预测，现在都无关紧要了。在最后一章，我们将讨论这些决策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谈完熊彼特，这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物本身。最后还有一段波折，我们将看到这一段的意义不仅仅是有助于领悟熊彼特的一生。

我们还是以考查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前景预测的核心矛盾作为开始。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制度描写成静态的、依靠惯性运动的、永远不变的环流；但是，同时他也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在动态变化中实现发展，这种动态后来被称之为发明创造的飓风。为什么熊彼特要用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去描述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个制度的典型特征说成是不变的环流，但又说这个制度具有连续不断地自行发展变化的特性，其目的究竟何在？

我们知道熊彼特的解释是，环流可以使我们看到创新活动的作用，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前进动力，而且是利润收入的唯一源泉。还有另一种方法解释熊彼特独特的论证方法，前面曾指出，熊彼特的创新者不是来自任何特定的阶级，他们只是具有发明创造天赋的人。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内

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来自非资产阶级的英杰。

毫无疑问，熊彼特本人确信历史中杰出人物的作用，即少数具有特殊天分的人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曾以人的音乐才能为例，去谈那些杰出人物：

> “我们可以假定任何健康的人如果愿意都可以歌唱，在一个相同人种的集团中，可能有半数的人具有中等水平的歌唱能力，有1/4的人能力很差，另外1/4则具有中等以上的水平。在这部分人中，如果连续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歌唱技能，那么能够掌握较高技能的人就越来越少，最后，我们发现了卡罗索。”

同歌唱能力的情况一样，还有人们的领导能力，包括经济方面的领导能力，熊彼特认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领导能力极差，他们只能从事经济生活中最日常的工作，如企业中的秘书和普通办公人员。还有大约1/2的人具有中等水平的创新能力，这里面可以包括“实际上所有的企业界人士”，他们主要依靠来自经验的可靠常规办事，但也能应付一般的挑战。其余部分，就是真正的人杰了，“这些人的特点是具有超高水平的智力和意志”。

那么历史呢，历史记载的只是发展和变化，即杰出人物对惰性的社会大众产生影响的事迹。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能够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才能有所不同，封建社会需要军事天才，市场机制社会需要经济天才，但是，各种类型的杰出人物，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永远存在。于是，社会各层次的领导者就构成了一个集团，他们处于社会的顶层，领袖人物可以更换，但领导阶层永远在上面。熊彼特写道：“社会的上层，实际就像一家旅店，虽然总是客满，但是客人总换。”

这里又是对马克思的攻击，矛头所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观点。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完全错了，无产阶级不

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仅就其数量而言，无产阶级肯定主要由能力一般的人构成。无产阶级中的个别分子有可能具备领导才能，因为领导权本身只能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也许这就是熊彼特在理论上认为社会主义必将来临的原因，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衰亡的最终后果是出现一个有管理的经济，那么谁来经营它呢？当然，那将是具有较高能力的资产阶级。他写道："有这样一个阶级……它聚集了人类中的英才，因此他们是国民的财富，任何社会组织都应该加以利用。"所以管理阶层没有理由惧怕社会主义，指挥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技能，与经营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技能极为相象，资产阶级的精英理所当然要居于社会的顶端。

这是经济理论吗？按照传统的观念当然不是，恰当地说应是历史运动理论。经济学仅仅描述特定社会中这些运动的发生所采取的方法，而这个特定的社会只对在市场中显示的技能提供报酬，而不能对在战场上和讲坛上的技能提供报酬。

熊彼特运用他的经济模型展示了一个更大的"构想"，这个世界是熊彼特的。直至在他临终时都在从事的经济思想概览著作中，他这个"构想"位于核心。他的分析可能是经济学的伟大成就，但是分析却并非完全出自经济学家的观念。在逻辑将展示的预想以前，有一个预先的分析过程，这个过程是必要的，而且被渲染为我们最根本的价值观和偏好。熊彼特写道，"分析工作……体现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形象。只要在特定条件下，存在渴望看到这些事物的任何可能动机，那么就很难把我们看到事物的方式和渴望看到事物的方式互相加以区别。

那么，经济学难道是想象的科学，是一种关于我们渴望见到，或者是不可能见不到的分析，而不是对显然存在的世界进行公正和客观的剖析吗？我们将在本书下一章全面评价大经济思想家和

经济学家们的贡献时，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

绳上还有最后一个结，回忆一下，熊彼特年青时曾到维也纳的一所贵族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形成了一些对他来说一生都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些价值观被带进了他对历史的构想，即杰出人物是历史前进的核心动力。当然，这个杰出人物是个贵族，是确信天然优越的少数人，这是社会中全部贵族观念的核心。但是要注意，熊彼特的少数天才并不是根据血缘选择，而是根据“智力和意志”，是天才的贵族，这才是熊彼特所说的杰出人物。根据熊彼特的想象，历史的舞台并非只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也确认了熊彼特本人的历史地位要比他的家族和生命更为持久和有价值。这样，个人的经历和历史的观念就最终达到了统一，这解决了许多矛盾的问题。

这大概不是熊彼特本人所希望得到的评价，但是他也不大可能否认。他渴望成为一名大经济学家，在他生前是否实现了这个愿望，还不大清楚。很有趣地，熊彼特从来不宣讲他自己的理论，除非应他的学生和同事之邀。有位学者认为，原因是在他的最后分析中，论证尚不充分。他是否渴望成为一名幻想家，这不得而知，而他的确是个幻想家。作为分析家或者是幻想家，任何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必须与他争论，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所成是在一定规矩之内，而是因为在他的所成之中显示了其间的界限。

第十一章　在经济思想的幕后

我们已经到了本书的结尾，应当作一下回顾了。所以我们应把注意力从单个大思想家的成就转向他们的共同贡献，即他们所推动的经济思想进程本身。回想一下这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作的一切，我们能对他们的研究说什么呢？只是重复前言中的话，说这些大经济学家多么成功地发现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和意义？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我们了解日常生活表象后面的组织结构和发现繁杂事件中的剧本。

这些问题使我们必须再度思考上一章中谈到的经济学的两个方面。先谈谈预测问题，大经济学家真的确信他们能预测事物发展的进程吗？答案是肯定又是否定的。他们全都对经济的未来动向或趋势作出预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最接近经济的不可知论者，他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通向稳定状态的可能路线，例如条件是人口的增长是否快于资本的积累。然而即使是穆勒，在他的多种选择中，也有一个"最可能"的抉择。而且绝大多数伟大的经济学家，我们已经看到，都只是向读者展示一条路线。

当然，经济学家绝不会愚蠢地认为社会是沿着经济的轨道运行。也许最接近完全正确的预测，是马尔萨斯的不能更改的第一部《人口论》。然而，我们回忆一下，在第一部《人口论》发表几年后，他又出版了观点不大鲜明，较为谨慎的第二部《人口论》。即使是通常被认为是伟大预言家的马克思，虽然他的确道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但在发表观点时也是极端谨慎。比如马克思主义者们仍在争论，马克思是否认为从资本主义制度跃入社会主义

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没有彻头彻尾的，无条件的预测，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经济预测是很困难的，它不像少数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或物理学，事件是在没有搅扰的空间实验室发生，或者是在某些人造的模拟条件下进行。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无法找到一个事物可以在没有外界力量干扰下进行的环境。现实社会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宇宙空间，它时常被震动或干扰，有时是来自自然界本身的侵袭，但最常见的干扰还是来自社会内部的行星和原子，即社会团体和个人，他们令人厌烦地总要按各自的意愿行事，并且他们的行为方式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任何参照物。

因此，大经济学家在谈论未来时，绝不像他们在作股票市场的具体预测，而像是在勾划潜在趋势的长期后果。亚当·斯密写道：“公众如果情绪悲哀，那么黑布的价格就要上升。”我们会微笑表示赞同，但这是经济预测吗？严格地说，不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下一次公众情绪悲哀时，黑布的价格可能不会上升，比方说，如果布商手边刚好还有一大批上次公众悲哀时积存下来的黑布存货供应。当然这不是斯密想要说的，他的意思是，总的来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商品需求的增加会抬高商品的价格，至少在短期是如此。需求的这种运动方式，我们可以在他的市场机制分析中找到。

李嘉图也有同样的论述，他指出人口的增加将使地租提高。这也同样不是真正的预测，因为人口的再度增加就不一定会提高地租，比如由于天气极好，在粮食获得超常大丰收的情况下。李嘉图不是在说每次人口数量的增加，一定要使地租提高，只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即在不考虑天气异常，以及其它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是如此。

可见，大经济学家们都是大趋势的预言家，而不是具体情况的判断者。这个区别意味着他们确信可以辨别社会内部的趋势，因为某些规律性的行为方式，社会理论家是可以依靠的。亚当·斯

密关于黑市价格的预测，是基于他确信对某商品的需求增加会使它的价格上升。他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不言自明的普通常识，不用再加论证。然而，斯密和所有的后来者，正是根据这些常识性的普遍情况，来发表他们关于未来的宏论。

这些普遍情况，或者说是"规律"，并不意味着可以毫不含糊地应用于实际生活。相反，预言家们都是假设在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使背景环境发生变化的因素（如买者和卖者的偏好等因素）干扰条件下，该事件会发生。因此，如果任何特定的情况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也不能证明根据规律作出的整个预测是错误的。只有在事态的长期发展足以证明存在一个与预期情况不同的"趋势"时，才能推翻原有的预测。

什么因素会导致情况的发展有可能背离最初理论推演的路线呢？我们马上会看到。很明显，经济学家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可能作出冒险的预测：

首先，**有规则的行为方式必须主导社会中每个人的行动**。没有规则，也就没有规律可言，进而也就没有可能作出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前景预测。那么，规则存在吗？大经济学家们当然认为存在。回忆一下亚当·斯密笔下的工人和资本家，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才出来工作。另一个曾经被认为普遍存在的规则是马尔萨斯提出的，高工资永远会导致人口增长；还有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家永无休止的扩张资本运动，以及凯恩斯发现的，人们总是把所增加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的稳定"倾向"。

以上例子说明，经济学家们并不是根据相同的规则建立他们的理论，也不是用完全相同的方式解释这些规则。但是他们又都依靠某些有规则，并且可以预测的经济行为或者是反应。大概最简单，又是最基本的规则是，买者总是寻找最便宜的市场，而卖者总是找最贵的。

其次，作出预测还需要确信经济行为的结果可以对社会的演变形成核心和主导的影响。所有的大经济思想家都承认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及其它类似因素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更为注重社会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认为经济方面的影响是次要的。但是，他们也都确信这些次要的经济因素的后果，在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斯密总体上乐观的社会展望无疑是基于他预期有一个长期向上的经济增长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命运的构思则完全来自于他对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解；凯恩斯对子孙后代的希望，也是基于他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会得到医治。

以上作经济预测的条件清楚地表明为什么熊彼特是个划时代的人物，因为他在以上两方面，都背离了他的前辈们论断未来的基础。第一，他不再认为体制中的经济活动是大体上固定不变的。相反，主要角色的行为方式是变化的，这对于他的展望非常关键。斯密和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自始至终都在积累资本，然而在熊彼特笔下，最终却变成了官僚阶层。第二，在大经济思想家中，是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逻辑上的经济构思，然而又随之宣称这不能作为社会演变的基础。如前所述，经济学与社会和政治过程相比，降到了次要地位。

所以我们再谈到预测问题时，其重要性就有了新的意义。作出特定的预测的确是经济研究的一个部分，然而经济规律不一定能使我们看得很远，看得很清楚。经济规律有其局限性，但必须指出，经济规律显然是存在的。然而在政治、文化或社会活动方面，却没有行为规律与市场中的经济规律相适应。说明买者寻求低价，卖者寻求高价似乎是件小事，但是这样简单又普遍的事情可能造成的后果却异常复杂。因为绝对没有这样简单，又可以计算的模式能用于预测国王、议员、或选民的行动；儿童、父母、老师和学生

的行为；将军的谋略和士兵的纪律；科学家的研究或者是罪犯的行为。经济学完全不具备天文学或者是化学的预测能力，但是与其它社会科学姐妹相比，经济学还是了不起的，因为它毕竟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预测能力。

于是我们要问：多大程度？

局限之一是非常明显的，大经济思想家们的预测都具有时间性。斯密的想象华而不实，连一个世纪的生命力都没有，《国富论》对用轧钢厂取代大头针作坊的工业资本主义没有作出任何微小的暗示。李嘉图关于经济发展会受到土地肥力限制的著名模型也不能面对马歇尔时代英格兰的情况，50年以后，农业地租在经济中已经是非常次要的因素。1870年穆勒去世时，事实已经很明显，他关于稳定状态的设想纯属子虚乌有。马克思的预测较能经受事实的考验，但是在他逝世50年以后，在大萧条中人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但另一方面国家干预经济的首次实验也使他的预言被推翻。凯恩斯的生命之长足以使他看到由政府支持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会产生自身的机能失调，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通货膨胀。我们还看到熊彼特的预测，虽然总的来说仍然相关，但已经显示出过时的迹象。

什么因素使这些预测都不能持久呢？早期经济学家预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能预见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后果。斯密没有预见到即将来临的工业资本主义，因为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出现于他写作时的50年之后。李嘉图没有预见到经济部门会战略性地由农场转移到工厂，因为他没看到即将出现的蒸汽动力和钢铁机器。的确，在马克思以前，还没有人能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技术开发力量，也没有人能充分意识到技术的力量可以对经济的进程产生影响。

有种解释认为，早期的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能预见到技术的

变化，是由于他们都不了解机器可以替代劳动，机器可以形成对人口增长的人为控制。斯密认为，机器的增加可以使手工业师傅多雇佣人力，好像机器不过是一件更精巧的工具。我们还记得，是李嘉图第一个指出机器实际上可以取代人力，但他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可能性。直到马克思，机器取代人力的过程才成为整个经济体制运行的组成部分；并且，马克思的分析至今仍有争论。

除了科学技术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使经济学家们的预测能力带有局限性，即现行社会意识方面的变化。例如在整个19世纪，工人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战斗性，而不是像斯密预见的那样，越来越没精打彩。斯密的太平盛世是基于他确信社会秩序稳定，显然不能是阶级斗争。另一个例子是民主思想所暗示的政治地位平等，同资本主义思想所要求的经济地位不平等之间的冲突。马克思预期或期望出现的社会革命，是基于他确信这种对抗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和平解决，他的运动规律至今没有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是这个预期被证明是错误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政府成为干预经济体制决策的核心力量。这些概念对于19世纪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都是陌生的，就像日本式的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20世纪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一样。

所以，即使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所作的预测也有局限性，因为他们不能看遍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同时预见到影响经济活动进程的社会风俗和技术结构方面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历史时代，似乎已经历了三至四个转折，从重商主义开始，过渡到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大致是斯密到李嘉图的时代；然后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这是穆勒、马克思、到凡勃伦时代；随后是资本主义的有指令、有干预的阶段，这一时期自凯恩斯开始，直到目前为止。另外，现在也许又进入了一个全球统一市场和高技术的新纪元。在每个时代，大经济思想家们的思想和观念，都打开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逻

辑通道，但是每个人的预想最终都不能超越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社会意识结构方面的障碍。当极限到来时，预想就不再具有生命力了。市场中买者和卖者的行为方式可能永远不变，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市场规律的作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大工业时期，是不相同的。

经济学家们的预测都有局限性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应用于我们目前时期，而且应特别强调。即规则本身变得不再是规则，或者说经济科学可以预测的反应，变成不再是可以预测的。

阿道夫·洛尔（我们在“序言”中曾提到过他）像其它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长期以来对社会中的“秩序”问题很感兴趣，即那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自由行事的人们互相合作或互相冲突，以追求各自的经济目标，这却可以向整个社会供应必需品，使这个人们从未提及的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然而，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洛尔从未把这解释成是市场机制的一种自然结果。他只是提问：要达到这个明显的目的，什么行为方式是必需的？还有，什么社会环境可以产生这种行为方式？最后，如果社会环境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结果又会怎样？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经济学家们都了解：如果每个人都大体上像斯密笔下的人物那样行事，那么市场行为就导致一个运行正常的经济社会。这意味着上面所说的经济秩序只存在于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的买者和卖者同样都必须不断地追求最大的眼前货币优势。只有当每个人都如此行事时，我们才能指望市场机制实现其社会分配功能。然而，只有洛尔一个人指出了，这种一心只想追求货币的行为产生于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当时普遍的贫困现象，自由竞争的公民秩序，以及人们对经济成功的贪婪追求，形成了经济秩序所必需的行为方式。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问题：人们追求眼前货币优势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所赖以生成的条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弱化。贫困现象已经消失，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了需要用广告来创造需求的地步，而以前需求是由纯粹的需要决定的。人们对眼前实惠的追求，也让位于更长远的考虑，大规模的企业建立起长远的战略目标，这是在自由竞争的汪洋大海中挣扎以求生存的小企业所绝对办不到的。而且，大多数的社会目标也不是由市场机制来独自实现了，现在还有政府，它凌驾于市场之上，并且操纵着市场。

所有这些对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居民来说，大概都是好事情，没有人希望回到狄更斯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前进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经济秩序所必需的那种行为方式，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行为方式越来越不相同。资本主义制度变得更富余了，但结果是自我调节的机能变得更差了。这个制度的秩序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从外部强加的，而不是从内部生成的了。

洛尔最关键的论点是：如果现代的，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维持正常运行，那么经济学本身同社会的关系也随之改变。只要行为规律在体制内部能够发生作用，那么经济学就只能是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消极的解释，或超然的评论。可以肯定，分析家们都会力促某些社会行为进程，所有的大经济学家们都深深的关切政府是否采用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政策，然而他们提出政策建议，是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任其自然，那么体制会沿着行为规律所决定的路线发展。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了这些，经济学随之成为有效的，主动干预事物进程的工具，它的功能已不限于作出预测或预期，因为那已经是不可能的。由于行为方式越来越不确定，经济学新的、也是唯一的功能就是控制经济。关于控制，洛尔并不

认为是专断的中央计划。他认为经济控制的任务是通过适当的市场行为，来引导体制实现社会的理想目标。市场行为可以通过适当的，非常温和的政策来建立，比如税赋引导，也可以通过更大胆的直接影响供给和需求的政府行动来调控。不论温和的政策怎样，经济学的任务与从前已大不相同。旧的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经济学，而新的经济学则必然是一种政治的经济学，是一种必须找到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的规则。

洛尔的说法正确吗？经济体制正在变得失去自调机能，越来越依靠非市场力量来维持正常运行吗？这个论点合理吗？经济学难道会变得越来越缺乏思想性，而越来越倾向于作为干预手段吗？这个问题值得争论。上一章曾谈到，目前人们对经济计划已经不抱幻想，而另一方面，对市场则倍加赞赏，甚至是崇拜，认为市场是寄托我们命运的工具。经济的航船也许需要"政治的经济学"作为新的导航设备，但是，它需要展开风帆，以乘上旧的市场规律之风。

这个论点与经济思想的一个方面有关，这个方面我们时常遇到，但直到目前我们才明确提出。这就是构想，用熊彼特的话，是"预先分析"以找出这样或那样的动机作为最强的历史推动力，或抓住这样或那样的思想以作为最有意义的历史观念。熊彼特的关于杰出人物重要作用的观念是一种预先分析构想，但显然不是唯一的一种。斯密的全部思想形成了他关于人类历史具有阶段性的观念，他认为社会的进步是物质和文化成就层次的不断提高，直到人类最终实现了全部必需的条件，达到了"生来自由"的社会阶段。就人类的解放是伟大的主题而言，马克思的构想与斯密的相关，但不同的地方是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生来自由"社会还是个阶级社会，与人类需要作艰苦努力方可达到的无阶级社会还相距甚远。同样，穆勒的构思认为人类进步是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他关于个人自我实现之社会的观念比斯密的更为激进，比马克思的更为保

守。凯恩斯也把他的体系建立在一种把自由派哲学家 G.E. 莫尔(Moore)的观念和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爱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的观念相结合的构想之上。

对于如此不同的思想模式，我们作何评论呢？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思想都包含私人经历的因素，熊彼特年青时期被置于贵族同学之中是最生动的例子。显然，他们的兴趣和偏好无疑都是合乎理性的，即熊彼特所说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忽视了所有这些伟大构想的知识穿透性和感情色彩的核心，那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说过，探寻社会事物的根源是激进的，然而根源就是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所有这些构想都是激进的，都是致力于考察人和人创造的群体生活。

这个总的评价只在一点上不能成立，把大经济思想家们描绘的情景付诸实施，这个重要的想法又暗示着他们的构想并不能认为是基于无可否认、不可争辩的事实。换句话说，有那么多的构想，这意味着经济学本身并不是最终的，不可再推演的社会理论层次。经济学研究社会过程的复杂结果，包括交换的行为，资本扩张的动力，以及其它我们称之为"经济"的行为方式。然而这些行为方式本身，反映它们赖以存在的历史，或人类环境。交换或积累的行为是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个基础本身又包含全部社会生活中间或底层的互利互惠和制约的关系。事物的本源是人，但不是"经济"的人，而是精神的和社会的人，对他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经济理论是人类自传中精彩的一章，但不是第一章，也不是最后一章。

目前还有大经济思想家吗？当然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只在美国就有 2 万多个，这个职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通。有经济顾问委员会（如果认为这里没有政治顾问委员会，可就是一个白痴了），有经济学诺贝尔奖金，每个公司和银行中都有经济学家。在早晨

的报纸和晚间的电视广播中，设有经济学家专栏。如果以声望和地位作为标准，目前是经济学家的最好时代。

但是，他们是经济思想家吗？作为伟大的预言家或构想家，他们都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建立经济发展的宏伟模型，都不怎么感兴趣，只有少数人例外。第一位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的名望是建立在他对数理经济学领域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其它人获此殊荣是由于改进了一些实用的，但总的来说是中性的分析工具，如计量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变量关系的假设检验，或者是研究整个体制结构关系的投入—产出分析。也有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致力于纯理论研究，例如研究维持体系一般均衡的可能性，或者是具体条件。

所以，一般说来，经济学或大经济学家的工作与传统的已经大不相同。只有很少的人是由于他们的经济思想而扬名天下，其中之一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令人信服地宣讲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但是他获诺贝尔奖却不是由于这方面的贡献；另一位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同样令人信服地宣讲了市场制度已如何过时。但是从主流看，经济学已变成一种技术性的、特殊的职业，对未来的大胆想象和预测已不列在经济学的目的之中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也是热衷于抨击时弊，而不是对创造斯密式的、马克思式的、或熊彼特式的模型更为感兴趣。

为什么经济学对经济思想观念丧失了兴趣？当然不是因为没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或者说经济前景良好。作为经济学家，不一定非要了解严峻的经济形势已迫在眉睫。衰退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始终存在，体制的经济震荡问题仍然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然而又出现了新的挑战，市场的全球一体化，改变了生产的经济地理分布，威胁着老牌工业国家的立国之本。穷国依赖着富国，富国也反

过来依赖着穷国，而且关系越来越紧密。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矛盾的感受，物质财富伴随着生态威胁，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萎缩，生命伴随着死亡。

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它们的后果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只用经济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在这些力量发生作用之前，必须事先判断它们作用的严重程度。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国际生产和国际金融，全球性债务危机，还有技术发展对生态的破坏，这些都是经济问题，但是其发展进程和后果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是听凭市场抉择，还是让政府决策来解决这些问题。洛尔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改变他们关于经济学能作什么的观念，他是否正确还不得而知，但是似乎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政治决策将决定经济手段的进程。如果这些决策问题倾向于让市场来解决，这将是一番景象；如果政治的钟摆摆向由国家总管经济事物一方，那么就将是另一番景象。这两种情况都不可预测，政治和经济力量都太复杂。能够预测的只有一点，即这两种解决方式需要以不同的社会意识环境为前提，在特定的环境中，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如果倾向于听凭经济力量的自由选择，那么这个命运攸关的结论就要由个人和市场机制的力量作出，伴随着的将是经济不稳定和道德上的视而不见。如果倾向于计划解决，那么问题的结论将通过政治决策的贯彻来得出，伴随着的将是官僚化趋势和没有效率。在我们试图建立时代的历史逻辑运动模式之前，必须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当然，这两种情况都需要经济学，市场的经济学或政治的经济学。于是，我们就不大可能有一个经济思想了，现代生活环境不会接受任何伟大的经济学家所作出的预测。我们可能会有伟大的设想家，和伟大的体制缔造者，但是他们的想象和体制不大可能像以往大思想家的那样简明有力。以往大经济学家们完成论述的时期，

恰是社会的经济运行方面被推到一个历史性的中心位置，现今的经济学家已不可能重新占据这个位置，即使我们选择的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为经济思想写结束语了。不会有更多的社会剧作家，敢于把如此大规模的论述建立在如此窄小的动机基础之上。

然而，经济思想家们也不会被流放到思想博物馆中。经济学永远不会像过去那样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了，在当今社会中他们的论述不够充分，但肯定会有人努力去创造新的论证，经济学的逻辑会有政治学或心理学逻辑的支持，也有可能成为这些逻辑的附属。我们无法预言这个更深刻更广泛的历史演进前景能否实现，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像少数其它思想家一样，经济思想家们也告诉我们，社会的演变就像一部戏剧，只有那些不受特殊征服力量支配的人，才能理解其间的涵义。经济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对社会的理解，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我们是不会忘记的。